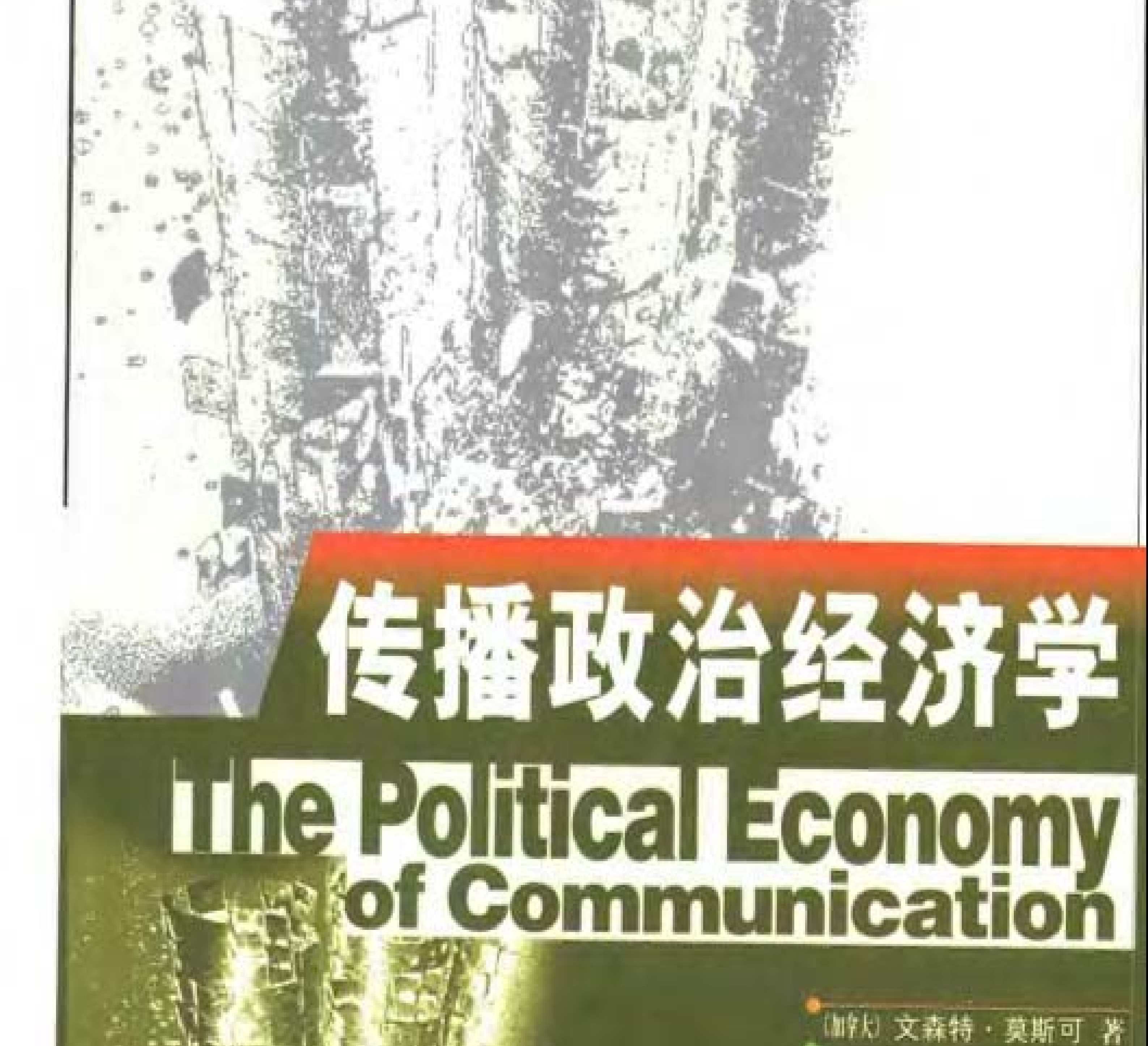


传播政治经济学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 著

華夏出版社
Sage Publications

北京广播学院指定教材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

传播政治经济学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加拿大〕Vincent Mosco 著

胡正荣/张磊/段鹏/付春怡/洪丽/宋菁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莫斯可(Mosco,V.)著;胡正荣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6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
书名原文:*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ISBN 7-5080-2180-0

Ⅰ.传… Ⅱ.①莫… ②胡… Ⅲ.①传播学:政治经济学 Ⅳ.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1181 号

传播政治经济学
〔加拿大〕 文森特·莫斯可　著
胡正荣　张　磊　段　鹏　付春怡　洪　丽　宋　菁　译

策　　划: 刘　力　蔡　翔
责任编辑: 裘挹红　蔡　翔
封面设计: 阿　东　韬　杰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房山区先锋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30×988　　16 开
印　　张: 19
字　　数: 308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总　序

我们知道，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人类的传播活动开展伊始，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过。

最早的传播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和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我们尚能每每从《修辞学》或《论语》中找寻到对传播现象研究的精辟论断。

虽然早期的传播研究提出了不少值得后人珍视的观点，但遗憾的是，它们都不可能实现传播研究向传播学的转化。这种转化实际上是一种飞跃，即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学术范畴的完整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成果的系统性的形成与确立。

真正认识到传播活动的本质，利用自己学科的范畴研究传播活动，从而认识传播规律，进而产生传播学这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还只是本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情。1949年，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编辑出版了《大众传播学》，第一次提出大众传播学的框架，汇集了前人有关大众传播的研究成果，它标志着大众传播学正式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的开始。人们在对大众传播规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范畴和理论体系普遍化，继而形成了传播学。

传播学的诞生与壮大是建立在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的基础上的。宏观上，现实社会及经济形态中信息资源的地位越来越高，信息流动带来的价值和效益越来越大；微观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信息及信息的传播媒介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愈发彰显出它的重要性。于是，人们日益关注和研究信息及信息传播的规律。另外，百余年来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都为传播学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并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

几十年来，传播学在美国和欧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科不断壮大。美国的传播学以其实证、定量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体系庞大、成熟且关注现实的学科特点；欧洲的传播学以思辨、定性的研究为专长，蕴涵深刻的思想，敏锐而具有批判性。当代传播学研究如何适应社会形态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传播形态的进化，不断地调整自己，加快发展，业已成为全球传播学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社会上及学术界对传播学的认识程度不高，目前只是处于传播学研究的初级阶段。1978年，复旦大学新闻学刊物《新闻大学》上第一次出现了专门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文章，随后，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一方面译介、学习和研究国外传播学的方法和成果，建立与世界传播学界对话的共同经验范围，另一方面则建立基础，调整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致力于深化本土的传播学研究。毋庸置疑，他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从无到有，确实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这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学科体系中已经确立位置。

但是，在中国传播学界空前发展的繁荣景象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西方传播学发展迅速，成果不断，但我国全面而忠实的译介甚少，而且，在目前为数不多的译著及译文中，仍然存在误读之处，这在相当程度上会对初学者产生一定的误导。

为了使我国的传播业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当前迫切需要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系统介绍国外先进传播理论与实践的优秀教材，以培养出更多具有国际水准的传播工作者，推动我国传播业的发展，强化传播学的学科建设，繁荣传播学研究，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与具有远见和紧迫感的华夏出版社精诚合作，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遴选书目、洽谈版权、商定体例到布置工作等一系列的繁冗事务。

为了本译丛能够高质量的出版，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严格把关

首先是书目的选定问题。我们的原则是，首选那些经过教学与实践严格检验，在西方传播学界有较高声望和影响的优秀教材和经典专著。既要有传统学派、批判学派的名作，也要有针对学理与学术在不同层面所作的思考。力求全面、系统地反映出传播学在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在不同形态下的传播实务进行的探索。

其次，在翻译的组织上，尽力为每一本书审慎地选择合适的译者。他们中既有多年从事传播学教学与研究的专家、教授，也有留学国外的博士及中青年学术骨干。在要求信、达、雅的前提下，严格遵循学科规范，精益求精。

最后，在编辑出版过程中，要求以教材的高质量标准，在编校、设计、版式、开本、材料、印刷等诸环节严格向国际标准看齐，从而使一本好的原著，经过认真的翻译，出成一本好书。

译丛的第一系列已经与读者见面了。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固然可喜，然而，前面的路还很长。无论是译介国外的已有成果，还是进行本土化的自主研究，我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仍然需要我们不懈地努力。由于受我们的认识水平及信息所限，可能还有一些好的传播学著作暂时未能进入这个译丛。好在我们立志将长久地致力于传播学教材及专著的翻译、编写与出版，因此，这个译丛是开放式的，欢迎各界专家、学者给我们推荐更好的传播学著作；我们也衷心地欢迎有识之士的参与，让我们不断努力，把这个工作共同做好。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 编委会

1999年12月

谢　词

这是一部关于政治经济学变化势态的书。本书最初酝酿于前南斯拉夫,也就是现在的斯洛文尼亚。1990年8月,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在布莱德湖畔召开会议。会议期间,我在与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柯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及SAGE出版社的史蒂文·巴尔(Stephen Barr)的数次闲谈中,激发了撰写本书的热情。在此,我对他们二位在我写作期间给予的长期的、耐心的支持表示感谢。

如果没有那么多人费时费心地给我指点和批评,这本书的创作就无法完成。首先,我要感谢接受我正式采访的人们。他们就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前景知无不言,侃侃而谈,给我很大的帮助。这些人包括(以接受采访的时间为序):已经过世的达拉斯·斯密塞(Dallas Smythe),他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三代传播学者;俄勒冈大学的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荣誉退休教授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前主任、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前会长詹姆斯·哈洛伦(James Halloran);拉夫伯勒大学的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和格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院的托马斯·古贝克(Thomas Guback);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尼古拉斯·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感谢你们花费宝贵的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感谢你们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你们的工作和生活,感谢你们坦率地说明了传播学研究的现状。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在本书的各个准备阶段向我提供了极有助益的建议、想法和批评。他们是:珍妮·爱伦(Jeanne Allen)、罗伯特·巴比(Robert Babe)、杰克·班克斯(Jack Banks)、罗纳德·贝提格(Ronald Bettig)、奥立佛·波伊德-巴瑞特(Oliver Boyd-Barrett)、彼得·布鲁克(Peter Bruck)、威廉·巴克斯顿(William Buxton)、安德鲁·卡拉布里斯(Andrew Calabrese)、列文·乔巴坚(Levon Chorbajian)、安德鲁·克莱蒙特(Andrew Clement)、华莱士·克莱蒙特(Wallace Clement)、托马斯·库帕(Thomas Cooper)、亚瑟·考代尔(Arthur Cordell)、杰拉尔德·考特(Gerald Coulter)、詹姆斯·柯兰(JamesCurran)、苏珊·戴维斯(SusanDavis)、马杰里·弗格

森(Marjorie Ferguson)、奥斯卡·甘地(Oscar Gandy)、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吉尔·希尔斯(Jill Hills)、苏·柯里·詹森(Sue Curry Jansen)、约翰·伦特(John Lent)、爱琳·马奥尼(Eileen Mahoney)、米歇尔·马丁(Michèle Martin)、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史蒂芬·麦克多威尔(Stephen McDowell)、凯瑟琳·麦克切尔(Catherine McKercher)、爱琳·米汉(Eileen Meehan)、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安东尼·奥庭格(Anthony Oettinger)、曼朱奈斯·潘达库尔(Manjunath Pendakur)、柯林·罗奇(Colleen Roach)、爱琳·桑德斯(Eileen Saunders)、丹·席勒(Dan Schiller)、舍德·施尼亚德(Sid Shniad)、弗雷德·斯派罗尼斯(Fred Sperounis)、杰拉尔德·苏斯曼(Gerald Sussman)和德温·温赛克(Dwane Winseck)。

卡尔顿大学的几位研究助理和研究生也为我提供了出色的帮助和建议。他们是:卡拉·布朗(Carla Brown)、安东尼·费拉(Anthony Ferrare)、路易斯·凯(Lewis Kaye)、帕特里西亚·曼泽帕(Patricia Mazepa)、罗杰·派里特(Roger Perritt)、安德鲁·瑞迪克(Andrew Reddick)、凡达·瑞迪欧(Vanda Rideout)、欧罗拉·沃利斯(Aurora Wallace)及温迪·扎提尼(Wendy Zatylny)。卡尔顿大学图书馆的南茜·派顿(Nancy Peden)为我查阅各种资料,并将她认为可能有用的材料也一并送来。与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实在是一桩赏心乐事:他们不仅收集你所指定的材料,并且还预计和查找你可能需要的材料。

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特别是那些在我的指导下完成了有关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论文或参加我的政治经济学研讨班的学生们。他们的见解、批评和支持令我获益匪浅。

本书的完成有赖于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会提供的资助,从而解决了研究助理、差旅、研究材料的费用,并使我得到一年的休假时间可以专心写作。我因此特别感谢卡尔顿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尤其是安妮·伯格斯(Anne Burgess)的帮助,在她的指点和支持下我才得以申请到这笔资助。我也要感谢盖尔·穆顿(Gail Mutton),他是我的资助金管理人。卡尔顿大学还以研究奖的形式为我额外提供了一年的假期。人文学院前院长詹妮丝·叶顿(Janice Yalden)及她的后任 G. 斯图亚特·亚当(G. Stuart Adam),还有新闻传播学研究所主任彼得·约翰森(Peter Johansen)都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

许多机构向我提供了检验我的想法和研究策略的机会,其中包括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学院举办的年度沙普讲座(Sharpe Lecture)引发我首次考虑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对当代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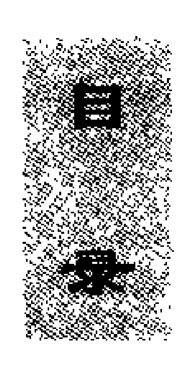
和信息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哈佛大学的信息资源政策计划慷慨地为我提供了驻校学者的职位。此外,还有不少组织邀请我就这一课题发表演讲或举办研讨会。它们包括加拿大信息研究协会、加拿大图书馆协会、伦敦城市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麻省大学洛厄尔分校、穆伦伯格学院、西北大学、渥太华大学、纽约市立皇后学院、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威斯敏斯特大学。

我要特别感谢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来自各界的传播学者,包括专攻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在此如鱼得水。我有幸担任了该协会政治经济学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协会数次会议中展开的热烈讨论令本书获益良多。

我衷心感谢向本书提供帮助的人们,而本书内容则由我本人单独负责。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

编辑委员会



济学已在许多课题上,尤其是传播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一点我将主要在第2、第3章进行介绍。这一过程将实现默顿(Merton,1968)和贝尔(Bell,1973)提出的知识整理和学科概述。不过本书的目标与他们所指的含义有所不同,因为我已觉察到知识的整理必须与特定社会和历史环境相联系。这种观点符合威廉斯(Williams, 1976:21-22)的谆谆告诫:

> 这个学科不是必须学习的传统,不是必须接受的共识,不是因为它是"我们的语言"而具有了天然权威性的一系列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在各方的不同学说中,它是一种形成和重塑活动;我们应用一套词汇来寻找出路,并在创造我们自己的语言和历史的过程中,对它进行必要的修改。

本着这一观点,第4章到第6章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变迁普遍存在,并可以理解为三个动态过程: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这三个过程是研究社会领域的入口或起点。最后,反思与更新意味着考察政治经济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这里指的是政策研究和文化研究(第7章)。

理论的理论: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批判的认识论

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和批判的理论的理论。它提供的就是西蒙尼(Shimony,1993)所说的**整合认识论**(integral epistemology)。[②] ***现实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构成元素是多组主观设定的名义上的范畴,或概念性范畴的物质体现(Garnham,1990:3)。但现实主义者并不满足于唯名论者或概念论者的观点,而认为存在由感性的观察和解释性的实践共同构成。根据这一学说,现实由我们的所见及我们对自身所见的解释两部分构成。这一学说源自巴赫金(Bakhtin,1981)的结构语言学和威廉斯(1977)在研究文学理论时提出的社会—历史取向。正如默多克(1989b:226-227)所说,在实践中现实主义者总是尽量避免完全依赖抽象的理论或经验性与解释性的描述,他们给予理论思考和经验思考同等的重视。

② 西蒙尼的学说源于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提出的"描述性的、有条件的和综合性的认识论",本书的研究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库恩(Kuhn,1970)推广了一个观点,即概念、它们在概念体系中的排列及其理论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因为它们能对解释的形成产生影响。理论不只是对经验材料进行概括条目的整理,它帮助我们构建描述性和解释性的材料。理论指出这些材料的内部元素的联系,以及这些元素与某些过程和实践的联系,这些过程和实践为经验性的描述和解释提供了基础(Resnick & Wolff,1987)。实证主义者所说的"事实"具有特殊的本质,不受任何概念的污染。这样的事实绝不可能解决各种理论上的争端,因为它们并不存在。概念和思想总会延伸到行为和经验事实之中。另一方面,理论是没有生命的,即人们常说的"漫无目的的沉思",欠缺经验的或解释的基础。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事实可以超越理论,表现为实用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所说的"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迫使概念体系反躬自省,从而要求人们或者为某一概念提供依据证明其合理,或者修改这个概念。然而现实世界中并没有纯粹的理论或纯粹的事实——两者相互渗透。理论上的实践和经验性的/解释性的实践彼此影响,*并*受到它们所处的社会实践大环境的制约。所以,本书认为理论和经验性/解释性实践的关系是***多重决定***和***互相建构的***。[③]

对于政治经济学家和传播学者所采取的广泛研究取向,本书采用***兼容并蓄的***、开放的、非简化论的角度进行描述。这首先意味着两层含义。第一,理论不可能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纳入其中,这一点不言而喻。任何分析都包含着冲突,我们一方面对社会生活有所了解,另一方面又意识到社会生活中包含了某些因素使我们无法对它进行彻底的了解。尽管掌握完整的知识不是人类力所能及,这个观点仍要求我们尽力理解社会经验。马克思认识到了这个矛盾,于是他超越理论而向实践推进;弗洛伊德认识到了这个矛盾,于是他超越了解释性心理分析转向治疗性刺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第二,没有哪一种研究取向能够独立地构成权威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传播研究是考察社会生活广泛层面的切入点。传播政治经济学取向又是其他诸取向中的起点或入口。其他取向中包括文化研究和政策研究,它们是处于政治经济学边缘的研究方向。

兼容并蓄的立场对本书结构的两个方面至关重要。第一,本书不是各种观点的概述,也不为某一特定的观点辩护,而是努力领会以上两者的

---

③ 阿哈麦德(Ahmad, 1992:287)在谈到理论时提出,理论若要自我修正,就必须"*同时*参考事实本身的历史及其自身以前的和现在的构成"。单纯以事实来修正理论的后果"只会是压制。这种压力将持续纠缠并瓦解现有的理论和历史"。用理论来修正事实也会产生同样后果。几百年来,托勒密(Ptolemy)的知识使人们不去反思本体沿完美的轨道绕地球旋转这一理论,却忙于用数学手段凭借他们的观测结果来"修正"事实。

价值。我将尽可能介绍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以及政治经济学家如何探讨传播问题。我知道这种百科全书式或者“教科书”式的写作方法有着很大的局限,尤其是它可能使本书变成政治经济学诸元件的罗列,缺乏结构、过程、联系或结果的论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书介绍了这门学科中的一系列课题和讨论,提供了比较和对照观点的不同方法,从而使书中各部分的价值达到平衡。第二,本书不只是将政治经济学所取得的成就重新展示,也不只是试图改变这门学科。在兼容并蓄思想的指导下,我希望本书能兼顾上述两个方面。第一部分介绍指导一般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及其在传播研究中的运用。尽管这一部分的目的是概述成就,但我仍然从比较和批判的角度进行描述。本书第二部分从不同切入点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介绍了政策研究和文化研究等边缘学科对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挑战,强调了反思和更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具体方法。

兼容并蓄的立场当然内含风险,最根本的风险是本书试图容纳超过一本书的内容。单是这一风险就促使许多作者对他们的写作进行限制,或者以教科书的形式对这门学科进行概述,或者提出新的方法重新对它进行概括,两者只取其一。这些明确的限制自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向它们挑战。教科书取向的方法必须假设该学科有一个共同认可的立场,或一整套各不相同的立场,至少也要有一系列可供引用的辩论。然而大多数学科,特别是人文领域内的学科,都就各自学科的权威归属问题争论不休。社会科学、生物学、物理学的情况也是如此。这种争论在今天愈演愈烈。若是自限于复述各种学派,那么无异于捍卫一张前苏联的地图,或牛顿关于宇宙运行规律的论述。在一个学术界纷争四起的时代,深刻反思推动学科构建的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显然更有价值。这项工作要求从批判角度反省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已经取得的成就,二是如何重新构建现有成就,即重新叙述、重新综合、重新思考,并由此进行更新。

这个风险值得一试,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可以借此获得更大的成就。对认识论、理论、学科属性及政治实践的自觉反省有助于使目前的讨论跳出为“学科之内的学科”定义的狭窄领域,与传播研究现状的讨论以及更重要的当今知识生活状态的讨论接轨。因此,本书力求通过对本学科现状的内省,以及对从事本学科研究的人们共同关心的各种问题的反思,达到兼容并蓄的目的。

兼容并蓄的立场加上现实主义的认识论,为克服二元论提供了武器。二元论的存在虽然可以理解,但却无甚裨益。在这方面,本书认同女权主

义者对传统认识论的批评(Harding & Hintikka,1983;Massey,1992)。女权主义者认为,二元论的观点“与我们的社会对性别的根本区分有关,与分配给两性的不同特征有关,与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有关”(Massey,1992:72)。尽管典型的二分法以差别或客体关系为基础来实现形式上的平等,然而事实上,存在与不存在,“A 或非 A”却暗示了一种偏好。二元论不仅鼓励了这样的思维方式,还拒绝考虑第三种可能性,即存在于二元论范围之外的选择。如此一来,二元之外的惟一属性就是混沌,这实际上距一元论更接近。[4]我们常常可以见到二元论的实例,比如主体和客体、具体和抽象、基础和上层建筑、经验和理论、政治和经济等等。类似的方法也被用来划分特定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例如对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广为人知的区分,还有对《国富论》的亚当·斯密和《道德情操论》的斯密所作的不那么著名但与此类似的区分。本书采取的方法是兼容并蓄,因此不对某位理论家或某一学派进行具体的、“正确的”解读,而是致力于包容各种不同观点,从而强调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多元思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筛选,但筛选工作必须基于一种开放的、兼容并蓄的、非简化论的认识论架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采取明显的非简化论的、泛化决定或多重决定的[5]研究取向。受近年来对认识论的批判研究的影响(Outhwaite,1987;Resnick & Wolff,1987;Shimony,1993),本书拒绝将一个人、一种关系、一次历史事件所具有的明显复杂性简化成一个核心本质或核心概括,因此,不会做出类似“经济和文化是历史变迁的基本动因,其他的因素都无关紧要”这样的简单论断。另外,本书承袭了葛兰西、卢卡奇、阿尔都塞和威廉斯的学术研究,相信理论和社会的定义都是泛化决定或多重决定的。也就是说,个体、社会制度、思想观念的存在由各自和彼此的构建过程决定。我特别赞同威廉斯的解释,他提出决定意味着设定界限和施加压力。用阿哈麦德(1992:6)的话说,决定的作用不是“人前掘井”,而是要“指出个体***做出***选择、***进行***生活、***创造***历史的环境”。采用泛化决定(或者用我更偏好的说法:多重决定)的视角可以避免将孤立的行为当成是完全独立的事物,同时还能强调行为的相对独立性和相互作用力。克服了传

④ 梅西(Massey,1992:75)认为,这并不是说要引入女权主义实在论以代替其他学说。她是这么说的:“问题在于:对时空特性的二分描述,以及前面简要提及的所有二元论与它们内涵的相互联系,都反映并与其他因素一起构成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性别歧视的社会所具有的男人气和女人气。”

⑤ 除了普遍认识到的泛化决定这一概念的缺陷之外,我对“泛化(over)”这个前缀也有保留意见,因为它带有“过度”的色彩。所以我还是倾向于多重(multply)决定一词,尽管它有些拗口,但更加准确。

统的学术分歧之后，我们就能从更理想的角度考察奥康纳（O'Connor，1987：11）提出的命题："现代经济、社会、政治和历史的危机如何相互渗透，最终转化为同一历史过程的不同方面——现代世界的解体与重构。"这种分析方法虽然以相互建构为基础，但也要求详细说明不同过程之间各种关系的性质、强度、方向和持续时间。相互作用并不意味着各因素具有相同的影响力。对相互建构的具体分析源于理论上的论证和经验上的调查。

多重决定与特定的因果论有关。史莱克（Slack，1984）综合了阿尔都塞等人的学说，以结构因果论代替了线性因果论，以强调泛化决定，并对技术的社会脉络进行分析。我将史莱克的观点又推进了一步，提出重新考虑"因果论"一词的要求。虽然线性因果论（或称表述性因果论）已经发展为结构因果论，但它仍带有牛顿物理模式所特有的机械色彩。牛顿模式曾帮助我们获得了大量分析和实践成就。此外，牛顿物理学还是所谓的简化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化论大约二千五百年前诞生于希腊，种种迹象表明它目前正处于鼎盛时期。它试图统一几种公认的基本作用力：重力、电磁作用力和强弱核子作用力（Weinberg，1993）。[⑥]尽管如此，各个学科的研究者仍指出了牛顿模式的诸多缺陷（Gleick，1987；Kuhn，1970）。其中最主要的缺陷之一在于古典物理学将客体置于首位，认为它们的存在先于它们的关系。这个观点给许多学科，包括经济学和政治学，带来了不幸的后果。它将观察者置于客体场域之外，使观察者不能对客体及其相关关系进行**全面的**考虑。当代物理学则认为：***现实或事实的特性取决于它们的相互关系，观察者也是关系场域的一部分***。甚至人们对时空基本单元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时空被看作是由独立的三维构成，现在人们相信相互联系的四维占满了时空。我并不是想说明古典物理模式一无是处，事实上，它们经常在理解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时大显身手。例如，它们能指导人们如何将波音 747 飞机从洛杉矶导航至多伦多。不过，尽管古典的客体模式和间隔观察模式继续襄助实践活动，它们仍然受到了重大的挑战。挑战来自理论的根本性变化。新理论强调关系、过程，强调将观察者纳人观察场域。

本书研究了以上的批判文献及目前有关非线性模式如混沌理论的论

⑥ 然而，即使支持简化论观点的人们也承认，所谓的终极理论并不是指能适用于所有事物的万能解释，因此并不标志着科学的终结。数学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1993：11）指出："没有人真的认为这个在次原子过程领域内形成的理论能够解释气流或雪花的类型，它更不可能开启生命之谜和意识之谜的大门。"

著(Gleick,1987),从中吸取营养,从***相互建构***的角度探讨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果论的含义是:事物的属性由其概念进行提炼,它总能影响其他与之具有相近属性的事物。相互建构不再暗示事物(尤指完全成形的结构)会对其他完全成形的结构产生影响。相反,主要的分析单元应该是过程,如商品化。它们为构建分析框架提供了起点或切入点,并与其他影响它的过程(如创建公共领域)发生辩证联系。这些过程在各个方面相互作用,其方式往往很难界定,但仍有迹可寻。因此,本书的重点是重新思考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因为它们是从一成不变的社会结构出发来考察这些结构的再生产方式,并提出强调社会过程的建构以取而代之。

界定相互建构的困难之一在于,它既存在线性模式又存在非线性模式。线性关系很容易理解:它们可以用一条直线表示出来;它们可以拆解也可以重新组合;最重要的是,任何学习基础物理学的人都知道它们是可解的。另一方面,非线性系统的定义基础正在于它们不可解。因此,科学家们在创建一套微分方程系统解释他们的观察结果之前,总喜欢先去除导致非线性的因素,如摩擦力。当非线性因素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或只需对短期趋势做出预测时,这种做法卓有成效。例如,在大多数天气预报中(除了大风暴),或者只需对短期内(明天或下个月)潮汐的大致情况(水位高/低)做出预测时,潮汐的非线性因素并不重要。气象学家们失望地发现,即使最先进的电脑系统也无法预测你的居住地一个月后的天气状况。非线性系统常被谑称为"蝴蝶效应":一只蝴蝶今天在北京扇动翅膀,也许就会改变纽约下个月的天气。现在所说的混沌理论或复合理论,其核心观点就是:最终结果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因而总是难以预测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混沌理论对现代科学的基础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以至于人们将它与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相提并论。有位物理学家曾说:

> 相对论消除了牛顿式的绝对时空;量子理论使牛顿关于可控测量过程的美梦破灭;混沌理论破除了拉普拉斯(Laplace)关于决定论式预测的幻想。(转引自 Gleick,1987:6)[⑦]

⑦ 量子理论引出了海森伯测不准原理,该原理大意是:我们无法预测一套系统的精确状态,因为测量过程本身就会改变它。这其实是以另一种形式说明了科学是多重决定并相互建构的:科学由它的研究客体构成,又构成了它的研究客体。拉普拉斯是18世纪的一位数学家,他受牛顿和启蒙思想的鼓舞,相信科学能够创造出一套包含所有过程的等式体系,由此开启知识的大门,对时空进行彻底了解。

1961年,数学家和气象学家康纳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开发了一套用来预测长期天气情况的简单电脑系统,戏剧性地展示了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具有何等的重要性。他从同一起点两次运行了同一基本气候模式。两次运行的数据相差几乎不到千分之一,这样小的差别似乎无关宏旨,而他当时也根本没有注意到它。这个相当于一缕清风的差别不久就导致两次运行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他突然领悟到,如果不从根本上重新定位他的思维方式,他就无法了解长期气象预报何以总是出错,而且还会继续出错。解决这个问题仅靠建立一门分支学科,如非线性分析,是远远不够的。用数学家史坦尼斯洛·尤蓝(Stanislaw Ulam)的话说,这样做等于把动物学称为"对非象类动物的研究"(Gleick,1987:68)。以此类推,这样做等于把社会学称为对二人关系的研究;把政治经济学称为对理性、完善行为的研究;或把传播学称为对信噪比的分析等。任何人想要概述某个学科,并提出对之进行反思和更新的方法,都必须将20世纪科学思想的转变纳入考虑的范围。就这项工作而言,社会科学才刚刚起步。正如第5章所说,社会科学家已经开始论述我们时空观的变化。另外,学习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人都熟悉霍桑(Hawthrone)效应和皮格马利翁(Pygmalion)效应,它们其实与海森伯测不准原理大致相同,即要求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计算在内。这两种效应的提出造成的影响已是有限,至于混沌理论和复合理论的发展如何改变我们对社会科学的认识就更无人问津了。在科学成就早已对因果论和决定论模式提出质疑之后,社会科学家们还在呼吁以它们为核心建立理论体系,这就不只是一种讽刺了。政治经济学家们还在继续讨论"决定"这个概念(全部的、部分的、最先例证、最后例证),其他学科中也不乏他们的同道中人。大家以极大的信心立志确认决定性,甚至希望精确描述出决定性中全部、部分、最先、最后等概念的真正含义。[⑧]

本书将非线性科学的发展纳入其中,因为它指出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思维方式的诸多缺陷。要做到这一点,方法之一就是分析向传统取向提出极本性的、典型的质疑的著作。此外,除了确认传统取向的局限性,本书如果再参考受非线性思想启发形成的认识论和实例分析,一定更有裨益。在这一部分,本书一如既往地强调社会变迁的普遍性、多重决定、相互建构和非简化论,并以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切入点和我们构建传播这

⑧ 例如,考列提(Coletti,1979)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就倾向于将***时间上的最先***(即分析的历史起点)误解成***分析上的最先***(即分析的真正基础)。

一概念的过程为例,说明非线性科学的含义。具体确认非线性的路径相当困难。但相对倒退回线性模式而言,体会到这个任务的必要性就已经是一个进步。线性模式虽然容易理解,但它往往模糊了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对它们进行描述和解释。因此,众多的理论已开始在物理世界和社会科学之间架设新的桥梁,将这些理论记录下来就是一个初步的努力。[9] 马特拉夫妇(Mattelart & Mattelart)曾论及从非线性角度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这是已出版的论著中对此问题的少数论述之一(虽然斯密塞也在他未出版的著作中谈到过这个问题)。他们提出(1992:191)我们应该关注呼吁横向思考的新范式。

> 这些新范式打破了线性思维在原因与结果、来源与受者、中心与边缘之间建立的单向关系,并向带有确定的历史与进步概念的排他的决定论挑战。

此外,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91:14)举例说明了如何用混沌理论的非线性思维分析全球经济:

> 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历史体系,因此也有其历史寿命:它有一个起源;它有一套独特的循环节奏和一个长期存在的趋势;它有诸多的内部矛盾,最终将导致它的灭亡。这里要提出的观点是:短期性矛盾导致了中期性解决方案,中期性解决方案又会转变为长期性线性曲线,向渐近线逼近。在曲线向渐近线靠近的过程中,回复均衡的压力逐渐减小,造成更大的振荡和分叉。不是大幅度偶发性的波动导致曲线的细小变化,而是细小的波动导致曲线的大幅度变化。(另见 Peters,1991)

本书的取向也是***批判的***。在这里,批判指的是一系列的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者们所设定的一系列标准与研究记录之间的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之间的关系;上述两方面与反思和更新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发展出的一系列标准之间的关系,反思和更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一个界定的过程,即确认哪些问题可以交给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且取得丰硕成果,哪些问题则应该留给其他学科;同时确认

---

⑨ 注意,我所说的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这并不是说要不加批判,不与当前物理科学的学说相互对话而将两者简单组合到一起。

以上学科与实践观的关系，这种实践观将智力劳动看成社会干预的一种形式，即实践。最后一种关系的关键在于从较广泛的层面来理解学术活动，面向普通学者之外的更多的公众。这样的观点对本书提出了额外的要求，即要使专业以外的人士也能读懂读通。[10]

传播政治经济学：三个起点

除了采用上述的认识论方法进行研究以外，本书还以**本体论**的立场，强调了社会变迁和社会过程。这样做的原因在于本书希望克服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即通过描述可限定社会要素如制度、价值或人的特性和关系来分析社会生活。以传统观点来看，社会变迁就是时间上的一系列插曲，将我们由一些本质带至另一些本质。或者也可以借用描述古典物理学的那个广为人知的台球比喻：社会变迁是由某本质撞击其他本质后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从***社会变迁普遍存在***这一观点出发，本书强调了变迁过程的特征，包括社会领域中各过程和行为者自身及彼此之间不均衡发展状态的相互建构。没有一个社会行为者、一种社会关系或一种社会制度是基本的。它们都参与了多样的、普遍存在的、多重决定的相互建构过程。本书的目的是了解这些使传播政治经济学具体化的过程。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传播过程的切入点，传播过程构成了社会领域。

本书完成这一目的的方法是将关注焦点集中于三个具体的切入点或切入过程，即**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空间化**(spatialization)和**结构化**(structuration)。切入点提供了本质的研究焦点，帮助我们深入社会领域思考社会实践的特性，又不会使人误以为这些切入点就是对该领域整体性的本质界定。它们的性质介于海德格尔(Heidegger)的概念即武器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简单工具论之间。更具体地说，本书要阐明由某种关系引出的知识之间的相互建构。用阿哈麦德的话说(1992:122)，这种关系存在于“终极决定的可疑性”和“多重、相互渗透决定的完全历史性”之间。本书呼吁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两个方面之间，在物质劳动决定意识内容和历史来源于时空特有力量及动因的多样性两种观点之间，

[10] 当前学术界出现了一些高度技术化的批判。对此，本书赞同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卡辛(Alfred Kazin，转引自Sutherland, 1993:23)的观点：“批评不应太过专业，使得它只能被专业人士读懂。”奥斯汀(J. L. Austin)也曾指出(转引自 Phillips, 1993: vii)：“把所有的事情弄得晦涩难懂并不能显示我们是多么聪明。”

建立起一种创造性的对峙。

从这些本质概念出发进入传播政治经济学并构建它的框架需要对强调重点做出选择。不过,从开放的、兼容并蓄的和非简化论的认识来看,这些概念只是一种特殊的、有效的社会研究策略的起点或门槛,而不是可以归纳所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它们三者构成了分析全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承认它们的特定运行形式取决于具体社会结构中的时空或历史/地理因素。正如政治经济学是了解传播的起点一样,商品化也是考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此外,它们三者都是描述过程的概念。它们不是对某种静止状态的界定,而是提示我们如何看待一个不断冲突的社会过程。最后,这些概念是多重决定的,即它们的特性由彼此及其他所有参与社会运作的过程共同构建。

本书的创作同样有赖于与其他两门邻近学科的交流,这两门学科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和**政策研究**(policy studies)。文化研究从许多学科中汲取养料,尤其是文学批评、诠释社会科学以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各种流派。这些学科提供了另一种取向,注重文本和论述的分析。文化研究对传统科学及其认识论、语言学和社会学基础进行了长久的、持续的批判,但同时它自己也被指责为相对主义、唯心主义和蒙昧主义。政策研究植根于政治学、经济学和制度学派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研究理论,其目标是评估传播的不同行为方式,尤其是政府行为和国家行为,但也并不局限于此。政策研究的代表分支是公共选择理论。该理论试图将新古典经济学模式应用于政治学,从而创造一门政策科学。与文化研究相反,公共选择理论主要借助社会理性—社会行为者模式进行分析。这门学科对传播研究的影响主要在于精神上(保守)也有一些不太严格的运用。本书贯穿了政治经济学与这两门邻近学科的对话(如对认识论和实践的探讨),并在最后一章对此进行专门论述。该章节主要讨论文化研究和政策研究对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挑战,以及更新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如何回应这些挑战。

变化中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

写作这本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书固然有知识上和学术上的考虑,但过去几年中震动全球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也是导致这项研究的原因之一。这些变化包括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受挫,资本主义的停滞

与转型，第三世界分化的进一步加深，以及突破传统阶级划分的社会运动的高涨等。

政治经济学发源于18世纪，部分原因是为了解释、维护和支持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它摒弃需要国家强力支持的重商主义政策，认为它们低效率和低产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主要来自各种运动（如欧文式的乌托邦社会）和学术思潮，这些思潮主要以马克思的著作为基础，同时也借鉴了广泛的、民主的、公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

20世纪媒介产业的兴起使得企业也对传播经济学日益关注。其结果是各种各样的研究应运而生，对象从如何生产和销售收音机和电视机，到如何向广大观众推销产品无所不包。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部分地就是从批判角度来对这个过程进行分析的，即将大量营销与更广泛的经济过程和社会过程联系起来，并从人文价值的角度批判这些过程。这方面的论著大多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它是众多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精神源泉。这些运动如今都已大受挫折，如前苏联和东欧。保留下来的国家有的陷入困境，如古巴；另一些则如许多西方社会民主党一样，尽管万般不愿，但还是接受了主流政治结构。葛兰西、卢卡奇、布莱希特（Brecht）、巴蓝（Baran）和斯威兹（Sweezy）等人的著作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都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自省和更新的能力，但众多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消亡对这套理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同样的挑战也摆到了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面前。它从社会主义世界中寻找模式、证据、灵感，试图取代以市场为基础的传播体系。它的源泉包括前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那里的艺术和文化运动（如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先锋派）不仅是一次文化革命，也是一次政治革命（Lunn，1982）。随后，传播政治经济学又从前苏联和东欧的异议分子及地下媒介"萨密兹达（samizdat）"中汲取营养（Downing，1984），信仰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中国也是它的重要源泉（Smythe，1981）。不过，它最主要的研究灵感还是来自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集中于后殖民时期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中欠发达的世界（Mattelart & Siegelaub，1983；Schiller，1976）。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们耗费了无数精力，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并对这一目标坚信不移，因为新秩序承诺的是发展、民主、平等和欠发达国家对媒介和信息系统的主权（Preston 等，1989；UNESCO，1979）。这个希望如今几近完全破灭。

虽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大肆宣扬共产主义的颠覆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和学术后果,但它自己也没什么可庆贺的。世界上最富裕地区的经济停滞和转型使得持续的政治经济分析如同雪中送炭一般及时。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纷纷陷入经济危机,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提出的传统解释和疗法都不再奏效。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实际工资停滞,贫富和收入差距加大,这些使政策分析家束手无策,使最高层决策者们寝食难安(Bartlett & Steele,1992;Bowles 等,1990;Harvey,1989)。[11]美国、加拿大和西欧政府都无力应付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形势(与此相仿,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也陷入二战以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这使分析家们倍感困惑,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具有批判意识的经济评估。下一章将介绍其中的一部分(Block,1990;Bowles 等,1990;Lane,1991)。

结构与空间的转型同样意义深远,企业和政府领域发生的转变尤其如此。虽然国有或地方企业逐步发展为跨国企业的过程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但长久以来这些企业基本上仍以本国为基础。如今,这个基础也不再那么重要。时代—华纳、三菱、新闻集团、索尼、哈谢特、芬尼维斯特与贝塔斯曼等集团公司的分支遍及世界各地。此外,整体经济的重构模糊了传统产业分工的界线,媒介产业也不例外。出版、广播、电信、信息服务等行业越来越难以区分。AT&T 等公司利用政府管制减少和通用数字电码普及的时机,也突破了原有的产业界限。随着银行、保险公司、零售商等传统非媒介企业涉足传播业和信息业,原先的分工越发难以维持。此外,商业企业的经营范围明显扩大,这也部分源于传播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关于这些发展的重要性存在着极大的争议。用哈维(Harvey,1989:147)的话说,新的组织形式"取决于劳动过程、劳务市场、消费产品和消费模式的灵活性",将导致"崭新的生产部门、崭新的金融服务方式、崭新的市场,以及最重要的是更密集的商业、科技与组织的创新速率"。如何领会新组织形式的内涵也同样存在极大的分歧。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向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许多挑战。"时空压缩"(Harvey)和"时空延伸"(Gid-

---

[11] 如今,再听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首脑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公开提出标准的经济分析与金融工具似乎不再管用时(这里指的是他1992年在东京与日本高级经济官员的那次会晤),我们已经不再吃惊了。而他是美国政府银行体系的领导人和美国金融政策的建构者。他(转引自 Szengold,1992)指出:"没有一种模式能解释我们正在体验的这种经济类型。"与格林斯潘呼应,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金(Lawrence King)在分析迟缓的生产力发展在过去25年中如何拖住了小时工资这个问题时,提出的答案是:"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毫无头绪。"(转引自 Passell,1992)

dens,1990:10-21)指出了决策者方面时空缩小的特征,也指出了他们利用运输和传播成本的下降向更广泛、更分散的地区传播他们决策的能力。这一类创新的观点有什么价值?这是否真如某些人所说(Castells,1989),反映了基本劳动力和资本资源空间流动方向的根本转移将带来根本性的转变,即重新划分资本主义世界?或者这只是对从商业资本主义早期便已存在的模式进行的最新分析?

除了资本主义的停滞和转型,我们每天还必须面对来自另一些地区的大规模骚动,这些地区在相对和平的时期被称为第三世界,这一提法在当时就不是很恰当。当时看来极有可能,现在已成为事实的是:第三世界正分崩离析,成为若干个世界。其中的一部分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全面发展,其速度超过了西方国家和日本。一些南亚国家将最新技术与最古老的独裁统治相结合,在它们和其他不发达国家之间拉开了可观的经济差距。这些新兴工业国(NIC)成为全世界的发展楷模。然而,这方面的讨论都回避了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台湾地区对本地工人的压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成功发展的故事来自布莱克(Blake)笔下"黑暗的魔鬼磨坊"的当代版本,甚至情况可能更糟。种种侵犯并不仅限于国内的经济建设。凭借美国和其他西方强国的武力支持,印度尼西亚对近邻东帝汶温和民族主义者的起义施行残酷镇压,观察家称只有"种族灭绝"一词才能准确描述当时的情景。此外,生产成本的提高,包括因工人反抗而导致的工资增加,也使经济成功的光环在某些部分黯然失色(Bello & Rosenfeld,1992)。不过,尽管分析家们逐渐认识到新兴工业国家的成功和恐怖故事与西方工业化过程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我们仍应该承认,它们所有的经济成就使之摆脱了欠发达世界、成为一个单独的类别。

在另一个极端,许多不发达国家实际上已被排挤出了全球政治经济的版图。被称为依附理论的一支学派曾经提出,主要西方国家设置的条件迫使大部分比较贫困的国家长期依附于它们,陷入不发达状态。而现在,该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Cardoso,1993)提出,这个理论必须修正,因为它不适用于最贫困的国家,理由是最贫困的国家与全球经济基本无关,因此不能说它们依附于发达国家。由于它们无足轻重,称它们为被排除的国家才更贴切,它们只在全球经济中占有微不足道的商品、服务和人员流通量。新兴工业国与被排挤国家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例如,韩国和索马里之间的经济断层如此之大,以至于再将这些国家统称为第三世界

已没有太大的意义。[12] 共产主义的受挫、资本主义的停滞和转型、世界上较不发达地区分化的加深都因动荡而起，这些动荡向政治经济分析提出了挑战，也使它的任务更为迫切。再者，由于传播在这些动荡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扮演了核心角色，我们更有必要将此分析持续而系统地运用到传播政治经济学之中。

遍及全球的社会运动也催化并加剧了普遍的社会变迁。妇女运动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冲击不可低估，因为目前对全球父权制的挑战是有史以来最有力的。这项运动还动摇了数世纪以来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男性统治支配下的社会实践和社会信仰，并针对特权的捍卫者进行愤怒的反击。作为一门有机的学科，政治经济学与其社会环境相互建构，因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女权主义的冲击。古典政治经济学致力于将牛顿物理学模式应用到经济生产、分配和交换等领域，从而增加物质财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 1962)曾说，虽然经济学自称是一门普遍学科，但实际上它仍认同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批判政治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空想社会主义学派希望揭露古典经济学分析的阶级本质和它对完全不平等的维护。虽然它们也论及父权制，但却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分析。当代女权主义者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分析盲点，并努力建立女权主义经济分析方法来弥补这一空隙。用沃瑞(Waring, 1988)的话说，这个分析方法对世界的思考"把女人也算了进去"。这种取向受到了无数的挑战，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动荡不安，正如康奈尔(Connell, 1987)所说，"国家将男人武装了起来，同时解除了女人的武装"。更新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在于，除了坚持以了解和克服社会阶级分裂为己任之外，它还要研究这一现实。

人们逐渐认识到，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正在摧毁这颗星球上的生命。遍及全球的各大社会运动由此展开，对环境与和平问题予以关注。与其他社会运动一样，这里的行为和信仰也各不相同，从接受资本主义到对之坚决反对，不一而足。政治问题非常复杂，其结果也无法预料。但是，这些运动促使政治经济学家重新思考他们的观点，即土地最先，也最重要的属性是生产要素。武器与硬纸板箱一样只是一种产品，其核心意义在于

---

[12] 前苏联的解体似乎支持了世界系统论(Wallerstein, 1991)的观点，世界系统论一贯认为，共产主义阵营也没有对世界经济形态的单一提出挑战，世界上仍然只具有资本主义的体系，它围绕着单一的分工形成。尽管如此，卡多索(Cardoso)认为数量越来越多的被排挤国家几乎并未能参与到这个单一经济体系之中。对于卡多索而言，问题不只在于不平等的交换和依附体系助长了全球的不平等，相反，整个国家都被从这个体系中排挤出去了，即使作为依附国家也没人需要这一体系。

它的边际生产力。这些运动也对批判政治经济学家们提出质疑，批评家们虽然了解了阶级剥削，但却维护对物质资源的剥削，将它作为克服阶级剥削的主要手段。政治经济学的挑战在于，既要研究这些问题，又不能掉进新马尔萨斯论的陷阱，用环境保护论来维护特权。第 2 章的开始就将讨论这些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中引起骚动的议题。我们首先就要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上编

传播政治经济学概论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介绍它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以及介绍围绕着它与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中一系列学科的关系而展开的讨论。

本书的第一部分描述了内涵丰富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形形色色的研究取向。首先，我们评估了各种相互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有的从非常具体的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出发，有的则着眼于比较宏观的社会生活的控制及生存过程。不同的定义方式反映了对政治经济学本质界定的分歧。政治经济学是否应该选择一个狭窄的定义使得它的一些基本概念更便于实验研究之用，还是应该为其他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一些基本原则？后一种选择可以确保我们用最普遍的概念研究人类活动——即使并不是所有生命活动——的基本过程。

讨论了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之后，我们将介绍这门学科的一些主要特征。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是18世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一批道德哲学家们。从他们开始，一代又一代的政治经济学家致力于对这些主要特征进行研究。无论是在当时道德哲学家还是在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表现出对一些共同问题的强烈关注。这些问题包括四个方面：对历史的分析，对社会整体性的理解，对道德哲学、社会价值及理想的社会秩序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介入和社会实践的论述。以上四个特征拓展了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并且成为这门学科与其他社会和文化分析取向交战的阵地。

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的另一个特点是思想流派众多,这就确保了观点的多样性和内部讨论的活跃性,而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最重要的分歧源于对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们建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不同回应。一方本着传统的研究思路,强调个人是分析的基本单元,市场机能是其主要的结构,二者交汇于一个核心过程,即个人在市场中表达其欲望和需求。逐渐地,这种研究方法将古典学派对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与实践的关注抛诸脑后,而将政治经济学变成了建立在对市场行为的经验调查之上,并用数学语言加以概念化描述的经济科学。这种学派被泛称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或简称为经济学,它作为正统学派已经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它将劳动力简化为众多生产要素中的一个,使劳动力和土地、资本一样,其价值由其生产能力或增加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的能力来衡量。

另一方反对这种倾向,主张保留对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及实践的传统关注,即使这种做法意味着放弃建立起一门实证科学的目标也在所不惜。这种思路引发了形形色色的研究取向,它们殊途同归,统称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一学派的第一次浪潮由保守主义者们掀起,他们用传统的集体权威代替了市场个人主义。随后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高度肯定了古典学派所主张的社会介入,但要求将社会群体置于市场机能之前。此后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它将劳动重新置于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生产者**(*Homo Faber*),或者说制造者这一角色才是界定人类物种属性的本质特征。尤其是人类具有将概念和行为合为一体的独特能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正是这种能力使善于思考的建筑师和凭借本能行事的蜜蜂有了区别。

以后的各种对于古典学派的反应,大抵就是脱胎于保守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并由此形成了当代形形色色的研究派别。正统的经济学属于知识谱系的中间和中间偏右的位置,尽管如此,在运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内容考察所有以扩张个人自由为目的的社会行为时,却是正统经济学中的保守派占了上风。政治经济学制度学派的主张是中间偏左的。举例来说,它认为制度和技术的限制使得市场向有利于掌握制度和技术的政府及企业的方向倾斜。制度派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一是在经济史中加入了劳动者和工会的内容,这对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狭隘的、个体化的概念提出了挑战。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向包括法国的规范学派、世界系统论和其他卷入关于福特主义的辩论中的学派,它们将劳动置于研究的核心位置,论题主要集中于垄断资本主义、非技术化

和国际分工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不同的社会运动也孕育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学派，主要包括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生态政治经济学。前者主要反对长期不变的父权制，并强调指出学术界对家务劳动乏人问津的现状，后者则专注于对社会行为和较广泛的有机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尝试着回答“什么是政治经济学”这个问题之后，本书进而考察传播研究如何利用各派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同成果。在传播学发展的现阶段，以区域性为基础勾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概况是比较可取的方法。除了会有交叉和例外，北美、欧洲和第三世界的研究取向有相当大的差异，值得进行分别研究。此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尚不完备，无法在统一的范围内进行描述。

北美的研究受到两位奠基人思想的极大影响，他们就是达拉斯·斯密塞和赫伯特·席勒。斯密塞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首先开设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并且是迄今致力于此的四代学者中的第一代。席勒曾在伊利诺伊大学和斯密塞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他的研究成果也同样影响了其后数代政治经济学者。他们对传播的研究综合了制度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不过，他们并不像其他人（比如欧洲学者）那样热衷于建立传播理论。他们的著作及在他们影响下该地区开展的大量研究，就其动机而言，都是源于一种激愤之情。这种情感的产生是由于传播业已经日益发展成为具有剥削性和专制性的财团统治秩序的一部分。虽然斯密塞和席勒主要关注国内（加拿大和美国）的情况，但他们也领导了全球跨国媒介公司的权力和影响力增长态势的研究。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影响，北美的研究者花费了许多笔墨来论述跨国公司和国家权力在产业和阶级范围的表现，其特点是注重参与正在进行的斗争——包括工人阶级的斗争，以此来改变主流媒介，创建非主流媒介。这类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促使制定规章制度和政策的政府有关部门关注公众利益，包括支持一些活跃于国际论坛（如联合国）的活动，它们力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信息及传播秩序。

欧洲的研究并没有某个特定的奠基者。虽然它也与谋求社会变革的各种运动紧密相连，尤其维护服务于公众的传播系统，但这一地区的主要研究工作更注重于将传播研究融入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之中。欧洲的研究有两个主要方向。其中之一强调***阶级权力***，最著名的代表是加汉姆的著作及戈尔丁和默多克的著作。这一研究方向建立于法兰克福学派和雷蒙德·威廉斯学说的基础上，主要论述了在商业与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传播制度如何整合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且论述了在与新保守政府所鼓吹的传播产业自由化、商业化和私人化的对抗中反映出来的下层

阶级和下层运动的反抗。另一研究流派突出了**阶级斗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阿曼德·马特拉。他撷取了广泛的理论成果，包括依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民族解放运动的世界性经验，将传播领域视为反抗强权的主要源泉之一。

第三世界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表现出研究者的广泛兴趣。不过一个主流研究学派已经形成，它主要针对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现代化或唯发展取向的模式而展开。这个模式试图使传播研究与主流的知识和政治利益融为一体。其主要观点认为，媒介与都市化、教育和其他社会力量一起，共同刺激经济、社会和文化渐进到现代化，所以媒介的发展状况可以视为发展的指标。第三世界的研究基于依附理论、世界系统论及其他国际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流派之上。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学家反对上述模式，尤其质疑它的科技决定论及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力量关系的回避态度，因为这种关系决定了两者之间经济与社会互动的方式，塑造了双方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多重阶级关系。

发展模式吸纳媒介投资论的失败使主张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者开始对其进行修正。他们试图将电信和新的电脑技术作为媒介吸收到他们的理论之中。政治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是指出这些新技术的力量在于整合全球性分工。最初的学者从地理位置的分界出发来研究分工：非技术劳动力集中在最贫困的国家；半技术劳动力和较复杂的装配劳动力集中在半边缘社会——一种在经济上处于中间位置的社会；研究、发展与战略策划则专属于第一世界，这里是企业财团的所在地，也是大量利润的最终归属地。较近期的研究承认阶级的分化不分国界，认为影响国际分工发展的核心因素是控制传播与信息科技的企业在运作上趋于灵活，从而克服了由来已久的时间与空间限制。

本书第一部分在勾勒传播政治经济学实际概况的同时，也将展示它所覆盖的广泛知识领域，包括多样的立场、重点和兴趣等，正因如此，有人指责政治经济学是唯心主义的实在论，更有极端者甚至贬低它为唯经济论，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门学科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学者，他们汇集到一起与其说是出于单一的理论视野或是一种团体感，毋宁说是为了分享知识活动的研究方法和对于学术想像与社会介入之间关系的理解。此外，本书还将阐释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这些挑战部分源于全球化的社会和文化转型，部分源于政治经济学邻近知识领域（尤其是文化研究与政治研究）的进展。由这些挑战出发，本书第二部分将重新思考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念，以强化它的知识取向以及它对学术想像、社会介入等问题的关注。

第 2 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为了了解我们的文化结构和它的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在总体上把握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核心问题。

(Garnham,1979:129)

本章将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核心问题作一概览。政治经济学有多个不同定义，本章的开始将从不同定义之下对这个领域作一系列的考察。笔者认识到，关于政治经济学史的构成存在着不同意见，因而本章简要地回顾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及其主要取向，并阐明了一些定义的范围。本章首先介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其他学者，然后是保守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在 19 世纪晚期，受到想要模仿物理学及生物学模式来创造社会科学的驱动力的影响，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等人创立了新古典主义的范式，直到现在它还是主流经济学的模式。他们选择了集中描写各个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不同组合所导致的各种结果，偏好使用成套的微分方程作为讨论的工具，这个学派将大多数的政治因素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的分

析之外。[1]

在20世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赢得了库恩(1970)所称的“标准科学”的地位。与牛顿式的机械论成为物理学的代名词相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取向成为经济学的代名词。然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派成为经济学标准的过程却是知识上与政治上不断争论的过程,这本身便值得就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取向另立专著(比如 Slaughter,1984)。新古典学派中,被称作“奥地利学派”和“剑桥学派”的两翼就市场的核心及政府的角色等问题争论不已。此外,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者和社团主义者对新古典主义范式的前提、概念、结论及其对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态度等一些更基本的问题都作了批评。

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地位引发的争论持续至今。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在学术及政治生活中似乎已经取得胜利。各类经济期刊大多都是在处理新古典主义范式之内的各种疑难问题,或是将各种关系演化成数学编码。政府和公司的公务员、政策分析家与政策制定者的职位也全被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那些聪明机敏的分子所占据。另一方面,对一般经济学的局限性进行的根本批判也已开始。受过经济学系统教育的学者们也在质疑它的能力,即使是在它的正式势力范围内,一般经济学能否解释问题都值得怀疑(McCloskey,1985)。政策制定者抱怨说传统的药剂没有效力,或者糟糕到使病情加重的地步(Reich,1991)。谁能取代新古典主义的正统呢?就政治谱系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从继承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保守传统的学者,如迈克尔·奥凯肖特(Michael Oakeshott)等,一直数到制度学派和主张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就实质议题来看,我们可以举出的例子至少就包括女权主义、生态学、伦理经济学以及家庭、性欲等“实证”政治经济学。总之,有意取而代之的角逐者并不匮乏,并且它们似乎都认定,这门相因承袭的经济学在概念、方法论或处理实质问题方面均失之狭隘,应当予以必要的扩充。要公正地评价当代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大大小小的辩论的影响,需要使用远远超过这区区一章的篇幅。因此,本章仅限于对这个领域作一概览,并针对主流经济学与各种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差异提出分析。

或许有人会怀疑这样一本以传播为讨论焦点的书却用整章的篇幅从一般层次上讨论政治经济学是否恰当。这有以下几个主要理由。首先,

[1] 这并不意味着这门新的经济科学缺乏政治理论。明确地选择将政治排除在外反映出一种很重要的权力观和政府观,这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中以及在这个范式的维护者和批判者之间,都引发了不绝的争论。

在我们概括了解了政治经济学以后，可以以此为基础，思考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的重点是什么，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它的不足之处。即使如此，有人可能还是会认为，只需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个章节中对政治经济学加以简要论述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但本章的用意并不仅在于设定基础以利于我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评估，同时还加入了传播学者对政治经济学这个领域的思考所得，这样会使我们了解到对此曾有思索的传播学者是以何种方式来介入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最后，重新思考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反省这个较广泛学科的基本假设，这就要求我们对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领域的纷争加以评估，并认识其重要性。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

雷蒙德·威廉斯认为，在下定义时，应该从基本的社会实践入手，而不完全是概念的营造。他(1977:11)号召我们的词源学应该同时以社会史和知识史为基础：

> 当我们猛然觉察出绝大多数的基本概念……并非概念，而是问题，不是分析上的问题，而是迄今还未解决的历史变迁时，我们就不用再理会这些概念的冠冕堂皇的召唤，也不必理睬它们的铿锵作响。只要能做到，我们只需复原这些概念形式的实质内涵。②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是财富的科学”，它“所处理的是人们为了满足需求和欲望所做的努力”(Eatwell 等，1987:907)。但是，用威廉斯社会词源学的说法来看，政治经济学在成为一门科学之前，在成为一种知识名称用以描述整个系统的生产、分配与交换之前，它所指的其实是关于如何首先“当家理事”，然后“管理社区”的社会习俗、社会实践与社会知识。更具特殊意义的是，“经济学”的语源是古希腊文的“*oikos*”，意即“房舍”；以及“*nomos*”，意即“法律”，因此，经济学起初所指的正是家政管理。这个观点一直延续到创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身

② 此外，威廉斯在另一本书中还提醒道：既然我们不再认为意义是自然形成的，那么我们也就不会认为真实性(authenticity)的营造仅仅是中性工作而已。毕竟，“这里并不是在中性地评估意义的问题。这里所讨论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问题，我们从特定的历史及社会条件中继承了这些问题，而让这些问题得以存在并发扬的正是成百万的人们。如果想让这些人们积极地对待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这些问题承袭自特定的时空条件，然后再以批判的态度来探讨它——这些问题可能会改变，也可能会持续不已。”(1976:21-22)

上,如苏格兰的启蒙人物弗朗西斯·哈其森(Francis Hutcheson)及更重要的亚当·斯密。[③] “政治”起源于希腊文“*polis*”,意即“城邦”,它是古典时期政治组织的基本单位。因此,政治经济学的起源为家务管理和政治经营,在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前十五年,斯图亚特(Stuart,1967,原出版于1761:1:2)就将二者联系起来,“正如经济属于家庭,政治经济则属于国家”。

同样重要的还有,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把客观描述和主观规范结合起来。这就是传播学者斯密塞所说的驱动政治经济学的力量,或称之为“宏大(meta)政治经济学”。它是“整体的理论与实务,它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向复杂程度不同的社会组织的领导阶层提出建议”(1991年12月4日的一封信)。这个说法与《经济学术语词典》的定义相符合,这一词典指出政治经济学最初想作为“治世方略”出现,而目前却只被“当成是一种研究,只是对特定的问题做出道德上的评判”(Gilpin,1977)。

其他的定义集中阐述了经济学由最初的宽阔领域而终至窄化的过程。早在1913年,最初的《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就提到:“尽管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仍然保存着,但根据目前状况,这门科学并不是严格的政治经济学。换言之,它并不局限于政府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反之,它处理的主要是个体的产业化活动。”(Palgrave,1913:741)1948年的《现代经济学词典》中也有类似论述。它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经济事务的理论与实践”,并提及:

> 起初,这个术语指实际成本、剩余和分配等范围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社会事务,也是个人所关心的事务。……到了19世纪晚期,在效用概念引入后,整个重点移向了强调市场价值和个别公司的均衡问题,这些范围便不再需要广阔的社会结构,不再需要强调政治。(Horton,1948:110)

这个过程本身并不是毫无冲突,引不起反应的。同样是这本1948年出版的词典还提到,从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界定政治经济学的做法再次被普遍关注。它意识到“强调的重点再度回到了政治经济学”,因为“国家对

③ 这里忍不住要指出极具讽刺意味的一点: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已有两千年历史,它最初正是围绕着家政管理等问题而诞生的,但如今的女权主义经济学家还必须为将家庭劳动的价值算人经济产值而大声疾呼(Waring,1988)。

公共福利的关切程度得以改善”。《新帕尔格雷夫》(Eatwell 等,1987:906)也承认这一倾向的存在。据这本词典所述,“从未放弃政治经济学这个旧有术语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20 世纪 60 年代那些主张彻底的放任自由的芝加哥学派,再加上弗吉尼亚技术学院的公共选择研究中心”,都使这个陈旧的学科重获新生。

以上的说明展示了我们看待政治经济学的多重角度,而下一节将讨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产生影响的定义和特征。借此,我们可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视为:***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正是它们共同构建了资源的生产、分配与消费***。从这个观点来看,媒介产品如报纸、书籍、录像带、电影和受众是主要的资源,对于传播研究者来说,这种观察方式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因为它使我们注意到市场运作的根本力量和过程。它所强调的是传播产品的制度性循环,这个循环使主要生产者与大型分销商、零售商和消费者产生联系,而消费者的购买、租赁和使用,又反馈到生产,从而形成新的生产过程。这个定义提供了一整套的基本项目,使我们得以区分不同的功能。比如,华纳兄弟是一家主要的电影制片公司,奥迪盎多电影公司是一家重要的发行商。除它们之外,消费者和消费类型也不尽相同,比如到电影院看电影者和在家收看电视者的区别等。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经济学更加强调集中力量去分析一些特别的社会关系,即使受到制约的人会有反抗,这种关系仍然会存在。有了这样的认识后,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就会密切注意随着生产、分配与消费循环发生的控制形式的转换。比如,马特拉(1991)就论证了跨国行销公司如何通过成为消费者信息的主要制造者来强化它们在媒介行业中的权力。

这个定义的主要误区在于它假设我们能以相对轻松的方式来区别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但这个假设却不一定能够成立,尤其是在某些特例中。比如,在电影产业中,将电影生产者(也就是将创作一部影片的所有步骤加以组织并落实的单位)与发行商(即找到上映场所的单位)分开是比较有益的。但是,制片并不这么简单。对制片商而言,这些发行商由于能够保证制片所需的财政支持而显得格外重要。就这种实践看来,电影的发行商不就是制片商或制片—发行商吗?与此相同,尽管将受众当作媒介产品的消费者不无启发价值,但是,把他们当作生产者也是有道理的。也许有人会认为,事实上马克思在《大纲》里就已经指出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制造了他们自己。换句话说,消费者在消费媒介产品(或文本)时便生产了符号价值(或意义)。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生产者在生产过

程中也消费了资源。他们还可能借助自己作为生产者的良好声誉而开展发行工作。以上告诉我们,虽然前面的定义是个有用的起点,但如果运用时太过僵化或太过机械,则会受到局限,有所缺憾。

一个更概括、更具雄心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为:***对社会生活中的控制与生存进行的研究***。控制特指个体及团体成员的内部组织,而生存则指他们通过何种途径来制造再生产自身所需的东西。控制过程大致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们涉及了一个社群内各种关系的社会性组织。生存过程从根本上说则是经济性的,因为它们涉及了生产和再生产。这个定义的长处在于它给政治经济学提供了足以包括所有人类活动的宽广范围,甚至包括了全部有机的运作过程。这样一来,它也就与所有环境、生态及生物差异研究的分析类型相一致。它们的目标都是要确认所有形式的生命的运作过程,并评估它们之间的差异和相互关系(Benton,1989;Lovelock,1987;E.O. Wilson,1992)。在传播和信息研究中,明确持有此种观点的例子并不多。詹姆斯·贝尼格(James Beniger,1986:107 - 109)引用信息系统论来决定生命系统的根本过程:组织、新陈代谢、成长、反应、适应、再生产和演化。为了探讨控制与生存的复杂性和社会争执,达拉斯·斯密塞(1991)引用了混沌理论,目的在于了解生命体系中传播与信息的辩证关系。

这个定义对政治经济学和传播研究的狭隘性提出了质疑,很值得我们探讨。毫无疑问,这些学科来源于对现存人类行为(主要是男性行为)的研究,但结果是使我们忽略了人类如何与其他生命发生关系,同时也忽略了当代资本主义之外的各种人类秩序所展现的社会实践,特别是传播实践。[4] 这种定义的缺陷还在于它使我们忽略了人类的政治经济和控制与生存的一般过程是有所不同的。这些不同包括:人类毕竟有自觉,人类有能力意识到目标的存在并反省自身。它也可能让我们低估了当代资本主义发生彻底转型、形成历史断裂的可能性。由于这种定义想要寻找超越自然与历史差异的共同过程,我们也就有可能忽略一些当今世界的特定过程,这些过程的转换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造成这个转换的物种拥有的力量足以消灭其他所有物种的自然状态及其历史。尽管存在着这些缺陷,这种较为宽泛的政治经济学定义还是提醒我们:无论我们选择的

④ 传播研究深受这样一种观点的影响:传播的历史几乎全是在西方发生的,并且始于电报的发明。这种偏见的源头在于用技术形式来界定广播电视、电信、出版领域及其历史(从印刷媒介到广播电视到计算机传播)。这个倾向可以理解,但却是错误的。

特定起点和分析焦点是什么，它们必然会与更长的历史及更巨大的有机整体相联系。在下面评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特征时，我们将继续就这个观点展开讨论。

核心特征

另一种描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就是将重点放在能够表现这门学科特征的一系列核心本质上。这些核心本质使政治经济学的内涵进一步扩大，不再受到一般定义方式的限制。本节借鉴了戈尔丁和默多克(1991)的著作及其他学者的研究，将着重阐述奠定政治经济学基础的四大特征：社会变迁与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和实践。

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所要优先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变迁与历史转型***。对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古典理论家来说，这一工作意味着全面认识资本主义大革命，即以农业劳动为主要基础的社会转向商业、制造业，乃至最后成为工业社会的过程。对于马克思等批判政治经济学家来说，他们的任务是考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和变迁的动态力量，其目标一是要确认社会短期的扩张与收缩周期，二是要确认社会长期的转型循环，后者标志着社会体系的根本性变化。举例来说，对于政治经济学家头脑中认定的历史的核心角色，英格拉姆(Ingram，1923：xviii)是这样解释的：

> 众所周知，所有的社会都会经历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任意的，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任何社会事实都不可能在脱离其历史的条件下被人们正确认识。因此，旧式学派所推崇的“现成公式”，即适合所有历史事例并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定理，已经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光彩。经济学的研究取向逐渐采用了***历史的***角度，认识到社会演化的各个阶段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从而要求在不同阶段不断修正它介入的方式。

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英格拉姆对于历史将在这门学科上赢得胜利的乐观态度显然有点儿用错了地方。历史仍将保持着它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但获得大部分经济学家支持的新古典学派曾将历史搁至一边，最多也只是让它充当一下背景而已。这主要是因为历史使经

济学更难成为一门科学。[5] 巴蓝和斯威兹的观点(1965:29)和英格拉姆的乐观主义相似,他们在对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们的历史敏感度大加赞扬之后,对当代经济学进行了攻击:

> 当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彻头彻尾反历史的学说。它鄙薄任何对正在进行的社会变迁的本质或其发展趋势进行探寻的努力。

贝尔(1981:79)则认为,时间感和历史感的匮乏是经济学理论所面临的总体危机的一部分:

> 最后,经济学理论将不得不回归到时间(就逻辑而言)和历史(就经验事实而言),以便对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规模的扩展和新领域的产生引出的新的社会秩序做出反应。

重新思考政治经济学的动力之一就是确认我们现在是否处于当年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相类似的划时代的转型期。人们似乎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迁。令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他们是否正在见证一场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根本性重组,这种重组反映了对后工业主义、后现代主义或后福特主义中某一状态或三者混合状态的回归;或者这只是从资本主义崛起时期便已存在的一些根本趋势的深化和扩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现出我们对待社会变迁的态度。此外,这个问题本身就显示出曾推动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思维的复苏。[6] 这一从历史角度出发的研究方向已被确立为"新加拿大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新加拿大政治经济学的两位代表人物(Clement & Williams,1989:7)将这门学科定义为对"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诸因素的历史互动之中的社会变迁过程"的研究,这一过程的动力则是社会—经济冲突。通过对历史分析进行传统的论证和重新论证,

---

⑤ 在这里我要感谢斯密塞这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先驱,正是由于他的介绍我才开始阅读英格拉姆的著作。斯密塞在1991年12月4日的一封信中写道,他在1932年攻读博士学位时,阅读了英格拉姆的著作,这对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在英格拉姆提出历史思维将取得胜利之时,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研究已经逐渐脱离了对历史的强调。尽管如此,对这位年轻的经济学研究生来说,这本书仍然占据了他学习中的核心地位。埃里克·罗尔(Eric Roll)1942年出版的著作《经济思想史》也似乎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赫伯特·席勒产生过类似的影响。

今天,正如麦克劳斯基(McCloskey,1985)所说,经济史是一门边缘的亚学科。经济学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建立当今社会的各种严格的数学模式之上。帕克(Parker,1986)对经济学界错误处理历史的态度作了批评,他的著作是近年来较为出色的成果之一。

⑥ 抛弃历史的不仅限于主流经济学,正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eric Jameson,1985)所说,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噪音》(一部有趣而新颖的音乐政治经济学著作)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在经历了"历史主义"遭到普遍的诋毁(Althusser),历史和历史解释被贬庶为仅仅是变相的"语言史"(Saussure)或是神话式的叙述(Lévi-Strauss)之后,这本著作代表了历史思维的复苏(Attali,1985:vii)。

政治经济学已经做好准备来回答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不过,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进一步关注历史与它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之间的联系。政治经济学一直注重研究相对稳定的企业中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考虑到时代—华纳、索尼、贝塔斯曼、三菱、新闻集团、AT&T 以及 IBM 等大型企业财团的绝对力量,这种研究倾向就不难理解了。但这种倾向却使政治经济学中很难纳入历史角度的理解。诚如康奈尔(Connell,1987:44)所说:"历史进入理论,成了结构再生产的基本循环之上的***添加品***。"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将研究重点从结构再生产转向建构过程。这里不妨再引述康奈尔的一段话(1987:44):

> 要使历史成为这门学科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将社会结构看成处于不断的***建构***过程而不是再生产过程之中。当然,只有首先承认社会结构可能以各种不同方式建构,这一假设才有意义。拥有权力的团体确实努力想要再生产出带给他们特权的社会结构,但他们是否会成功,以什么方式成功,均是未定之数。

政治经济学自创建之时开始就主张本学科必须植根于对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整体***进行的分析之中。这意味着政治经济学将涉及一些如今已分属于多门学科的问题。这些问题中带有社会阶级色彩的归人了社会科学;带有政府管理色彩的归入了政治学;带有市场色彩的归人了经济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学科的界限。从那时开始,政治经济学就以研究社会生活的共同结构及多重限制为已任。穆勒(转引自 Stone & Harpham,1982:12)曾如此描述从广泛的取向来研究社会生活的必要性:

> 出于实际的需要,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哲学紧密相连,不可分割。除了一些细枝末节,也许没有任何实际问题可以仅仅从经济学前提出发来做出决定。

和许多政治经济学家一样,穆勒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只是把它当成了解社会整体的一种手段,他甚至承认其研究取向与他称之为"社会哲学"的其他分支相互交叉。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它还可以引导我们认识各种学科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固然是社会生活的某一特定方面,但它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海布莱纳(Heilbroner,1986:

15)所说:“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从不会在治学方面小题大做。他们以整个世界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并以各种大胆的态度——激愤、失望、期待——来描绘这个世界。”

这种整体论的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着主导地位。人们认定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所追求的目标,甚至在这门学科的名称被改为经济学之后,通行的教科书仍然支持这种基础宽泛的政治观。英格拉姆(1923:xvii)对此也有论述:

> 谈到经济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位置,我认为对财富的研究不能与其他社会现象割裂开来,除非只是对一些暂时性的或假定性的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必须牢记,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相互联系且相互作用的。[7]

这种对社会整体性的关注也反映在另外一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中。除了这一点之外,它们与上述的理论取向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这些理论一般被称作公众选择理论,或更宽泛地称为实证政治经济学或专门研究社会构成的政治经济学。它从经济理论的保守流派中吸取养分。姑且不论推动这个理论的假设和观点,我们只需知道一点,即这一研究取向坚持认为它可以并且应该适用于所有的社会行为方式。根据布里南和布坎南(Brennan & Buchanan,1985:x)的说法,研究社会构成的政治经济学标志着向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回归。它将经济学看成是对“市场如何运作”的研究,这里的“市场”应该从广义上理解,即包含了“通过制度性结构对个体行为进行的调整”。对于支持这一理论的人来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主宰个体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规则。他们提出,这些规则是由“理性的、自我取向的经济人在最大限度地运用当代经济理论之后”做出的选择所构成的(p.65)。因此,整个社会领域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从传统的私人商品市场及劳务市场,到选票、择偶、儿童、性等市场,任何能够创造出规则以控制各种市场的选择都是其研究的对象。[8]

---

⑦ 有趣的是,英格拉姆(1923:xvii)将经济学仅仅看成是社会学的一部分:“正确地说,其实应该只有一门内涵广泛的‘社会学’,经济学只是其中的一个章节,它必须与其他章节紧密相连。”这对于将近年来的学科地位排序定为金科玉律的人来说,倒不失为一种使之冷静的参考意见。

⑧ 实证政治经济学弥赛亚式的热情令人瞠目结舌。用布里南和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的话来说(1985:150),这不是在建立一门学科,而是在创造一种“市民宗教”。它将使我们“局部回归至18世纪对政治和政府的怀疑主义精神”。他们致力于“使我们的视线投向***钳制政府的规则***,而不是投向为维护政治对市民生活日益扩张的侵入所做的改良。作为社会哲学家,我们的标准角色就是这种市民宗教的塑造者。这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对他们来说,考察社会完整性是一种道德责任,目的是为了维护他们所说的个人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制度论者的研究取向成为另一些政治经济学流派的灵感源泉。这些流派与公众选择理论的观点迥乎不同,只是在一点上达成共识:不论理论家如何不同,他们都注意到了对社会整体性的研究。这一观点深植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并一直延续至费边社会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欠发达理论者、罗宾逊等后凯恩斯主义剑桥政治经济学家及追随康芒斯(Commons)、维布伦(Veblen)和加尔布雷思等人的制度论者,他们的许多观点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观点相冲突,但他们也承认,并试图以独特的方式解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及政治、经济与周围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制度及实践的关系。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承认社会整体性就意味着要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由于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着一些唯经济论和工具主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涌现出大量的著作来反对这些倾向,论证相对于经济而言,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Jessop,1990)。由此触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并重燃人们对国家发展、国家与社会阶级、性别、种族之间关系的兴趣及对政治经济学中政治与经济之间动态关系的注意。这场辩论引发的百家争鸣估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Wood,1986)。[⑨] 不过辩论的中心仍集中于"*相对*自主性"。尽管"相对自主性"这一说法语义模糊,并会阻碍学术观点的交流,但辩论的各方并没有真正主张将政治从经济学的研究中分离出来。大部分人都承认知识型劳动力的现有分工其实是所有影响因素的反映,其中包括当代资本主义对政治与经济所做的形式上的分离,包括经济学为了模仿物理学而带给自身的压力,以及认为经济学在消解了政治内涵后就可以免除意识形态偏见的观点等等。尽管对资本主义国家中政治与经济的形式分离已达成共识,但大多数辩论者仍然认定经济学家为了追求科学而回避了许多有趣的问题,而经济学家消解政治内涵的目标本身就已经背上了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

延续制度学派、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还在努力确认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学与较广泛的社会与文化领域之间的联系。制度学派政治经济学家以维布伦(1934)的著作为基础,将兴趣投向研究欲望与维布伦所谓的"炫耀性消费"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炫耀性消费即是对权力和地位的追求。它的动力不是来自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理性,而是来自深藏不露的非理性冲动。

---

⑨ 伍德认为政治与经济密切相关。根据她的观点(1986:150),两者之间惟一重要的分离也仅仅是形式上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分离"在不危及经济剥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展了纯粹的司法与政治的自由和平等"。

法国规范学派的学者们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发,致力于确认积累政体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及政治规范模式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这些规范既包含了国家,又超越了国家的范围(Aglietta,1979;Boyer,1986;Lipietz,1988)。与此相关,在《荒原之后》(Bowles 等,1990)一书中,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中的优秀人物介绍了规范理论的美国版本。美国规范学派的研究核心是积累式的社会结构,即通过塑造积累过程而形成具有某一时期特征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实践。此外,皮沃和萨伯尔(Piore & Sabel,1984)观察到了政治经济秩序的转型。这种转型源于大型国内企业所组织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经济模式的衰退。他们认为造成这种转型的原因是,在较大范围内,社会、经济与文化福特主义向基于弹性特殊化原则的后福特主义社会转移。最后,以沃勒斯坦(1991)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反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观主义(强调意义理解)学派与经验主义(强调法律定律)学派中流行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方法,呼吁学者们扭转"使我们的分析单元从整体性系统化的现实转向个体(或其等价组织即公司、家庭、国家)"的趋势。

这种以社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主张虽然拥护者众多,但却并未得到知识阵营的全体支持。例如,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同盟者就反对甚至断然拒绝社会整体论。虽然这些观点彼此之间分歧颇多,但也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认为**社会**这个词将统一性强加于一个从根本上多元分化、互不相关因而也无从定义的事物之上。他们否认社会整体性、个体完整性和论述整体性。根据这一观点,20 世纪生活的"内爆(implosion)"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新的传播科技和信息科技打破了整体性,瓦解了曾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统一感的时空量度(Lyotard,1984),留给我们去完成的工作就是了解这些区域、局部和片断。这些部分以前曾被看成是一个更广泛的整体的组成要素,现在学者们却发现它们互不相关或者只是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社会整体性只是意识形态的粘胶,一旦不再受它的约束,我们就能理解这些片断真正的价值,并最终赞颂它们对所有试图整合社会的概念——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及所有宏大叙述的生产者——的反抗。

第 7 章考察了这一学说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现在我们只需集中介绍政治经济学对此的特定回应:它既承认后现代学说的合理性,又坚持社会整体论。他们对社会整体性的理解始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大纲》),他们的观点与涂尔干等古典结构论者和稍近些的帕森斯和阿尔都塞等人的主张刚好相对立。斯密与马克思的

学说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但他们却一致摒弃了本质主义，本质主义的观点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化简到社会整体，而所有的分析也同样可以化简到涂尔干后来所说的“社会事实”。斯密和马克思对历史的重视和对社会生活本质中偶然性一面的认识都排斥了这种本质主义的思想。事实上，援引社会整体性的概念并不需要本质主义或简化论的思维。马克思、葛兰西和卢卡奇提醒我们，辩证思维引导我们认识到现实世界既是一个整体，也可以分割为各个部分，它由社会生活的构成元素——既矛盾又统一的**具体的整体**组织起来。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或是松散，或是紧密，整体本身则可能包含了无数的分裂、突变和扭曲。根据这一观点，只分析部分或只分析**整体**都是不够全面的。它反对系统论中的唯心主义和常规科学的实证主义，这种实证主义要求对社会领域中的每一种联系都进行直接的、感性的观察，同时它也反对本质主义者所主张的全球绝对优先或本地绝对优先的分析步骤。

戴维·哈维(1989)是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他承认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分散、流动、弹性和重组现象的发展，这种发展反映了认同的转移和地方性的抗拒，但同时也标志了资本主义的组织更趋紧密。资本主义通过对科技和专业技能的控制增强自身的弹性，以容纳、抵御、吸收、忽略这些抗拒或使之商品化。各种学术范式从根本不同的角度对古典科学和分析科学进行的批判反映了当前学术界的纷争。

后现代主义倾向于集中研究地方、“不同物”和局部，科学化思维则倾向于从更强烈的**整体**意识出发来进行研究：

> 相对论和量子论从不同的途径得出整体不可分割的结论。但是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解释过，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秩序观，它包含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可分整体，为我们拓展新的物理学内涵开启了大门。这种新的物理学内涵不仅包含了相对论和量子论，而且具备了超越二者的可能性。(Bohm & Hiley，1993:353)[⑩]

研究结果显示出抗拒与控制、强大与弱小的性质和范围。阿哈麦德(1992:121)虽然支持文学批评领域要从**整体**视点出发，但他还是提醒人

⑩ 莱文思和利温廷(Levins & Lewontin，1985:3)从当代生物学角度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整体和部分相互渗透、不可分割，部分从互相之间的关系中发展形成自己的特性，“并由此带给整体新的特性，这些特性又从部分的变化之中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事实的辩证属性：一个事物不能离开另一事物而独立存在，其中一方从它与另一方的关系中获得其特性，双方特性的发展是彼此相互渗透的结果”。

们必须把"影响任何既定领域构成的抉择放在历史背景下区别对待"。不过,"只要拥有该领域的充分知识,就有可能区分出该领域的主要意识形态构成和叙述形式"。[①] 政治经济学以其"承认偶然性的、非本质主义的"社会整体观的开放态度奠定了这类研究的基础。

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个特征是**道德哲学**。我们所说的道德哲学指的是社会价值(有关需求的需求)和对适当的社会实践的理解,这种特殊的分析形式是为了澄清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道德立场并使之显现出来,因为在这些学说中道德观往往是隐蔽的。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是前共产主义世界经济重建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当被问及他在这一区域的工作时,他首先声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道德挑战"(转引自 Rusk,1991)。他的同事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1988)曾著书攻击里根经济学的过度行为,他在每一章节的开篇都引用《圣经》。戈尔丁和默多克(1991:18－19)在论及传播政治经济学时,提出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特色在于:"也许最重要的是它超越了效率这一技术性议题,而专注于正义、公平和公共利益等道德问题。"以上的例子来自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学派,研究者们对于将科学与道德相割裂的习惯做法普遍感到不安,他们对道德哲学的兴趣反映了一些政治经济学奠基人的核心理论关怀。

亚当·斯密不是一位经济学教授,而是一位道德哲学教授。他认为推进社会福利的方法不是通过个人利益的调整,而是如他后来在《国富论》中提出的通过系统的社会善行来实现:

> 因此,实现人性的完美必须要多为他人着想,少替自己打算,制止我们的私欲,广施我们的仁爱之心。这样人类社会才能产生和谐的情感和善心,并由此实现人的尊严和礼仪。(Smith,1976:Pt.1,Sec.1, Chap.5,p.71)

与此相类似,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一个牧师的儿子,要求人们警惕不加节制的人口增长所造成的道德后果。而卡尔·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则立足于创建一个用以满足人类需要,而不是以阶级强权为基础的社会。不论对他们特定的看法和价值观有何意见,我们

---

① 阿哈麦德(1992:121)坚决捍卫他所提出的"整体性"概念。他曾撰长文批评说,有些人基于对"寥寥几部用宗主国语言翻译的作品进行的分析",就指出"第三世界文学"中具有某种倾向(如民族主义),以为这就是"整体性",这种做法恰恰是对这一概念的误用。

都无法否认这些的确是他们分析的核心，道德领域是他们的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诚如政治经济学家罗宾逊(1962)所说，择取“伦理学这个分支”，将它变成一门“努力成为科学”的学科只能留给以后的分析家了。

以下我们将介绍两个研究核心。第一，道德、文化或精神领域本身就是学者们分析的中心议题。亚当·斯密之所以在分析市场分工之前先着手撰写《道德情操论》，是因为在19世纪后半叶，了解正在上升过程中的英国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问题至关重要。他自谓《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有价值，并在其晚年重新研究了该书提出的种种问题。据卢士(Lux，1990:98)介绍，这是因为“不受节制的商业动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超过了他早年的预料”。与此相近，马克思也是从道德哲学着手开始其研究生涯的。虽然这些著作因为是“青年马克思”的作品而受到冷落，但它们却是了解正在成长的工业社会价值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人是道德理想家。他们相信，作为社会哲学家，他们的基本责任就是寻找适当的道德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道德眼光把理智(reason)和理性(rationality)区别开来。这似乎很难理解，因为西方文化习惯于将科学与道德分开，科学用理性、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说话，而道德则只是一种普通的语言，它可以与科学辩驳，却不具有与科学平起平坐的地位。要想兼取二者，通常我们最多也只能达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46)的境界。韦伯认为研究工作可以由道德关怀所激发，但在分析过程中，科学的小舟却容不下道德情感的负载。这一观点的支持者提出的理由是，道德关怀阻挡了科学研究的进展，最终也将阻止科学找到方法来解决道德家自己所提出的种种问题。道德主义者则反驳道，许多问题，从核扩散到环境破坏，都是不具自我反省能力的科学的杰作。

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变的核心断层之一在于韦伯式的观点被人们广泛接受。韦伯认为价值中立划定了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界限。经济学也可以研究价值，尽管这实际上意味着将价值等同于市场选择所反映的主观偏好。在经济学家的分析与评估中，道德评价的作用微乎其微。有学者指出，道德哲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仅仅意味着前者隐蔽起来，转而潜入经济学家的假设和对思想、概念、变量的选择之中。例如，将劳动力看作与土地、资本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也许对分析很有帮助，但不论多么含蓄，它还是反映了一种道德观，即人与资本是可以互换的。经济学家辩称，这样的观点仅限于经济领域，是对经济实践的反映。批评者则反驳道，学术观点总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中去。经济学家为了进行研究而将工人看作是一种工具，导致工人在其他场合也被如此看待，随之

也被如此对待。[12] 经济学家为在经济研究中将活生生的劳动力贬为生产要素的某些习惯做法竭力寻找着理由，不意在此过程中却为强有力的道德观打开了后门。

关于事实与价值、分析与惯例、经济学与道德哲学等多种分离现象的辩论仍在继续，不过风向已经开始转变。正如本节开篇所介绍的，当今主流经济学的权威人物在论述经济问题时，已经不再那么反对使用道德语言，尽管这种“道德挑战”更常见于他们的演讲而不是在他们的学术论文中。他们还可能利用某些道德哲学家的著作，尤其是罗尔斯(Rawls)的公平理论，它使道德思想与福利经济学联系起来(Amsden,1992)。这鼓舞学者们开始从明确的道德哲学角度重新思考主流政治经济学(Etzioni,1988;Lane,1991)。不过真正接纳道德关怀的仍是基于政治经济学之上的异端学派。“实证”政治经济学或者说专门研究社会构成的政治经济学的保守派试图将政治分析的工具延伸至道德选择中，以利用经济学建立起布里南和布凯南(1985)所说的“市民宗教”(详见本章注释8)。马克思主义和制度派政治经济学者也热衷于讨论道德哲学的地位。近年来这些辩论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人道思想的挑战。为了将《资本论》中的逻辑套用在思想和行动的普遍形式上，阿尔都塞呼吁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去除道德哲学的内容。这种对道德的攻击持续至今，其中的活跃人物开始转向以尼采思想为基础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道德哲学的价值大肆攻击。然而，道德内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仍然极受重视，因为它捍卫着民主平等以及而临强大的私人利益威胁的公共领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尽管分析学派和解构主义者对道德攻击不断，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们仍坚持将道德哲学放在重要的位置(Golding & Murdock,1991; Schiller,1993)。

政治经济学取向的第四个特征是**实践**。实践观念深植于哲学史中，并由法兰克福学派直接引入到传播学研究之中。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实践指的是人类活动；从特殊意义上来说，它指的是人类用以生产和改造世界及其自身的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这个词源于古希腊文，主要是指自由人所从事的政治和商业活动(它也是神话中一个鲜为人知的神的名字)。[12] 它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强调。亚里士多

---

[12] 雷宾克(Rabinach,1990)指出，将人等同于机器这种唯生产论取向正是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

[12] 这个词显然激发了作家费·维顿(Fay Weldon)的灵感，他以一位名叫“普瑞西思”(即“实践”)的女性为主角创作了一部小说。在书中，“普瑞西思”这个词意为“转折点、高潮、行动；极度兴奋”。

德认为，经济、政治和伦理研究都属于实践知识，它应该与理论及生成(poiesis)相区别。理论探求真理，生成研究生产，实践的目标则在于行动。在中古时代及早期现代哲学中，实践一词在学科划分的辩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实践在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中开始占据核心地位。康德认为，理论包含了完整的理性，实践或实践理性在理论的结合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道德的定义则为“绝对实践”。黑格尔也承认实践优先于理论，但他寻求二者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使真理达到自由的境界。在那里，绝对精神在哲学、艺术、宗教诸领域中实现了自我。马克思在他最早的著作，即论述希腊哲学的博士论文中就开始关注实践问题。他坚持哲学必须务实。他对实践一词的兴趣主要在于创造一种异化劳动的替代物。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将劳动从生存的必需这一异化中解放出来，目的只是为了以另一种异化——使劳动力变形为可交换的商品——取而代之，革命的目的是将异化劳动转化为实践或不受约束的、普遍的、自我的活动。

葛兰西和卢卡奇运用实践这一概念，攻击了马克思主义中较具决定论色彩的部分。这些倾向主要存在于《资本论》和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的再解读之中。实践一词通过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被引入关于传播理论的辩论之中。该学派中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对实践尤为强调，将它定义为一切行为的普遍形式，而劳动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长期以来，劳动一直占据着经济学思想的核心位置，因为人类历史一直被迫局限于维持生存的必需这一条件之中。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越了生存的必需。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于是转向实践的其他形式，以期能够找到自由王国的构成元素。在批评马克思时，哈贝马斯(1973)提出了劳动(或者说有目的理性行为)与互动行为(或者说是传播行为)之间的差别。马克思主要致力于研究劳动，因为在资本主义引起的社会转型中，劳动是其核心因素。哈贝马斯则认为，社会实践由劳动和传播行为共同组成。传播行为基于共享规范与一些基本符号，为人们提供了各种社会生活模式，但前提是这种模式不能被扭曲，这种扭曲的罪行就是精制了民主的、公开的传播。

实践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前提和本质内涵的发展均十分重要。简而言之，以实践为引导的知识论强调：知识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不断发展的产物。它指出，认为“真理是由冥想而来”的认识论是片面的，知识的获得仅靠概念的锤炼和净化是远远不够的，它产生于概念和行

动相互完善的过程中。[⑭] 实践还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性发展。毕竟，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家务管理和城邦统治，亚里士多德将它列入实践学科，认为这类学科可以指导统治者的进退行止。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冲突：一方面它要了解财富和生产力的来源，另一方面又要为社会精英出谋划策，确定合适的劳动、贸易和福利政策。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者明确主张将政治经济学家和活动家的角色结合起来，融为葛兰西所提出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曾因反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而锒铛入狱。他在狱中笔耕不辍，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理想模式，即一方面掌握分析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具备实际政治斗争和反抗的常识。这个冲突也远远地延伸到了知识的另一领域。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一边为是否用精确的数学来净化经济学而举棋不定，一边又竭力向企业和政府兜售他们的建议。这并不是说研究实践引出的问题就等于完成了包含政治经济学及经济学在内的广泛思考；更重要的是，只要涉足于这些研究领域，我们无论费多大的劲也无法回避实践引出的这些问题。特别是政治经济学与政策研究紧密相连，传播政治经济学对这种联系所产生的力量和隐患都应有所论及。第7章将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本章现在将转而简要介绍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并在结尾处评价主流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区别，指出当代经济学思想的危机所在。

古典学派的典范

关于政治经济思想史的起点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古希腊时期，它是"政治经济"一词的语源滥觞。另一种说法认为这门学科源于18世纪苏格兰启蒙时代道德哲学家的思想，并由亚当·斯密发展至顶峰。[⑮] 不论赞成哪一种说法，当你在查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文献记载时，都必定会注意到大部分记载都以一种宏大叙述为前提，这种宏大叙述认定这门学科来源于西方白种男性认知活动的特有类型。举例来

⑭ 马克思主义认为概念与行动的分离是走向异化过程的关键一步。布里弗曼(Braverman,1974)运用这一区分完成了研究当代劳动过程的开山之作。对实践的强调不只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之中。在皮耶思(Peirce)、詹姆士(James)、杜威(Dewey)等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中，虽然不一定使用了"实践"这个词，但实际上都突出地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哈特(Hardt,1992)在他的传播学研究中，提出实践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之间的桥梁。

⑮ 主张政治学起源于现代的学者之间，彼此的意见也未能统一。大多数当代教科书都以介绍斯密的著作开篇，但也有一些追溯到更早期的学者，如威廉·佩第(Sir William Petty)，他在1690年出版了《政治算术》。在这本书中，作者探讨了钟表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并暗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来源。

说，一个被明显忽视的地区就是阿拉伯世界。我们的历史文献中忽略了该地区社会科学的发展。对我们西方所谓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科学来说，那里的研究要领先几个世纪，其中伊本·哈尔登（Ibn Khaldun）的著作尤为出色。[16] 本节要对政治经济学做一次回顾，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难，即如何在很短的篇幅之内，既要介绍大多数经济类学生所学习的正统理论，又要评述各种试图修正和改变正统理论的非主流学派，并使二者在章节比重上取得平衡。[17] 笔者已将这些目标牢记在心，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概述大部分政治经济分析的传统理论基础，为下一章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状况作铺垫。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支柱是启蒙时期笛卡尔的理性论和培根的经验论。大致说来，古典政治经济学试图通过将伽利略和牛顿机械力学的原理运用于18世纪与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之中，来拓展17世纪物理科学革命的成果。贝尔（1981）提醒我们，这一科学计划的重点就是逐步放弃研究物体的具体形态，转而注重它们的抽象属性，如质量、速度、加速度等。对于苏格兰启蒙思想的继承人亚当·斯密及英格兰启蒙思想者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穆勒等人来说，这意味着需要判断哪些经济常数在这个正在经历巨大转变的世界中构成了稳定的、基本的现实。他们所确定的这些常数中，最重要的大概是“生产劳动的价值”这一概念，这与重农论者所主张的观点截然不同。重农论者认为经济财富根植于土地，这一观点在当时风行一时。

对价值、价格、成本等变量的研究引向了以数学形式概括整理的抽象法则，这些法则描述了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此外，政治经济学的古典学派将价值这一概念抽象化，使它突破了重商论者和重农论者对它的狭隘界定。前者将价值等同于贵重金属，后者将它等同于土地，古典学派则将它广泛应用到了工业和贸易的各种形式之中。古典学派并不是经济学思想的第一个学派，但它很可能是最早一个将一系列被认为适用于所有经济

---

[16] 我要感谢哈米德·莫拉那（Hamid Mowlana）提醒我这种被忽略的现象，还要感谢我的第一位经济学指导教授易卜拉辛·欧维斯（Ibrahim Oweiss）及我的知识史指导教授夏沙姆·莎洛比（Hisham Sharabi）。后者正在为拓展乔治城大学的主要研究传统而做不懈努力。关于西方政治经济学与伊斯兰教思想的当代联系，可以参阅格兰（Gran，1990）书中所记载的有关讨论。

[17]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的编辑们已经领教了这种平衡功夫的难度。该书出版后，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梭罗（Robert Solow）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对它大加挞伐，指责这套书过度沉缅于批判性观点。梭罗以一种宿命论的语调，断言经济学注定无法逃脱“意识形态的污染”。他列举了马克思主义（“最始终如一”）、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与新李嘉图主义的种种范式，并由此攻击《新帕尔洛雷夫经济学词典》未能均衡介绍各学派的“范式”。编辑们则用一个数据回答了这一批评。据统计，书中约15%的条目在“当前业内共识”范围之外（Amsden，1992：795－797）。

活动的抽象变量整理成系统的学派。[18]

罗尔(1942)认为,古典学派的观点源自三种相互关联的传统思想。从政治哲学的洛克学派中,它发展形成了私利、私有财产和劳动价值论等思想。重商论者贡献了交换价值的概念,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将它运用到劳动价值论中时作了一些修改。最后,古典理论虽然舍弃了土地是价值的最终源泉这一观点,却吸收了法国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说,与主张干涉的重商论者分道扬镳。

古典理论继承了启蒙思想,主张个体有能力运用理智尽量扩大他们的私利。推而广之,整个社会都会因此受益。社会可以简化为个体的集合体,没有特殊的存在形式,也没有目的。制度是人类互动的自然结果,但应该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它,因为它们具有限制个体选择和社会交往的倾向,使观点、商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影响。只有促进社会交往才能提高效率,从而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政府的设立尤其值得警惕,因为统治权的传统赋予它维护自己辖地的权力,所以极易滋生出特权,包括产生限制工商业的联合组织。

古典取向的多样性使得后世的政治经济学者不乏赞成或反对的对象。在各个派别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斯密的学说(1937:Book I, Chap.2, p.14)。他多次重申私利重于善心的观点:

> 我们的晚餐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面包师的善心,而是源自他们对个人私利的考虑。[19]

马尔萨斯将这一观点引至极端,他主张应该允许未经处理的污水溢满街道,以确保人口控制和适者生存。根据这种观点,政府不应该采取行动控制疫病的传播,并且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只会增加人类社会的苦难,因为不加节制的人口和被弱者占用的资源只会削弱社会的力量。[20] 不过,斯密虽然反对政府的控制,却也不赞成将它的角色只限制在国防方面。在认识到劳动与文化的关系之后,这个主张连大头针的制作也应分工的

---

[18] 斯密和其他一些人认为抽象法是普遍适用的,并不局限于对经济活动的分析。这个观点导致一位评论者(Anderson,1988)在研究斯密对宗教市场的评估时,称他为"第一位经济学帝国主义者"。

[19] 斯密关于屠夫、酿酒商、面包师的比喻被广为借用,但同样出自《国富论》的另一段话(Book Ⅲ,Chap.4, para.10)却表明他对人们过分强调私利有些不安:"一切为己,毫不为他人考虑,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代都是那些得意者信奉的卑鄙的座右铭。"

[20] 马尔萨斯一贯反对政府干预,但对《谷物法》却是个例外。这项法律允许政府通过收取高额税金以保护英国地主。马尔萨斯支持《谷物法》,称政治经济学是"道德学与政治学",而不像是数学,因此并不适用于《谷物法》(Lux,1990:41)。

学者承认,“一个一辈子都只从事简单操作的人……往往会变得极度蠢笨无知。政府应该尽力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1937:734-735)。此外,在写于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该书早于《国富论》17年)一书中,斯密驳斥了霍布斯(Hobbes)的私利概念,呼唤人类的善行:

> 因此,多为他人着想,少替自己打算,克制我们的私欲,广施我们的仁爱之心,这才能构成人性的完美。(Smith,1976:71)

我们不是要讨论哪一种说法代表了真正的亚当·斯密,只是想指出批评斯密的人将他过于简化了,尤其是那些把他看成主张放纵市场的人,更是过于片面。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象常常被定位为自由市场经济论公然的源头,但大卫·李嘉图(1819)和穆勒(1848)的学说比斯密更加远离这一形象。他们注意到自由市场造成的分配结果引来了剥削和不平等的幽灵。李嘉图将攻击矛头指向了地主利益,认为地主利用自身对土地这一重要资源的控制,谋取高额地租,从而损害了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穆勒在骨子里是个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总是远远避开社会主义,以免与之发生纠葛。他主张推广教育以控制人口,并由此减少人类的欲望。因此,在研究日程上,提出系统化的新形式来取代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的任务,就落在李嘉图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当然还包括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的身上了。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思想的重要性有诸多方面。虽然他们彼此之间分歧颇多,但他们成功地使研究重心由当时盛行的对金银的强调转移到了生产劳动之上。他们明白市场中的分工将创造出大量财富。他们还认识到分工的拓展正在改变他们所熟知的世界,他们也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对刚刚开始经历的变化究竟是福是祸而深感迷惘。

古典学派的学说引来了保守主义者和马克思社会主义者的大量批判。批评者的观点为经济学其他流派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不过在转入批判者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明白一个问题,即古典学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违背了它的基本原则。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十分强调自由和个性,却又将经济民族主义的目标视为理所当然。例如,斯密的主要著作都是为了解释和增进**国家**财富,他所说的国家财富其实就是指不列颠的财富。贸易可以促进一国或多**国**的生产力。琼·罗宾逊在她的《经济哲学》(1962:125)一书中评论道:“他们虽然声称自己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立场上,但却不由自主地跌人国民收入等习惯思维之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就够他们操心

的了。”民族主义的霸权观念如此强大，以致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成功地将许多早期思想观念拉下了神坛（比如土地是财富的源泉等），却根本没有将国家福利与人类普遍福利之间的冲突问题纳人考虑之列。

激进派的批判

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对古典学派进行了广泛而有力的批判，其对象包括依据古典学派理论颁布的政策所带给人类社会的破坏，及古典学派对启蒙理性莫须有的认同所导致的理论缺陷等各个方面。他们的激烈反应得到了许多社会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的支持，由此他们的批判理论突破了知识分子阶层，吸纳了工业革命激发形成的众多民主力量。

空想社会主义批判者在参与反抗压迫的社会运动中发展了自己的理论，这些运动由英国的平均派（Levellers）和法国革命的激进分子等发起。戈德温（Godwin）和佩恩（Paine）等人都记录了剥削进一步深化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源于政府取消了对贫苦饥饿者的保护，其实这些保护本来就已经少得可怜。此外，他们还攻击古典学派未能以启蒙理性批判新型经济的基石——私有财产。在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们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却不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而古典学派居然对这种做法加以维护，还有什么知识系统（还有什么——用卡莱尔的话说——“沉闷的科学”）比这更缺乏理性的呢？古典学派辩称饥馑和苦难是人口增长和土地缩减的必然后果，但戈德温和佩恩强烈的道德立场和政治信仰却使他们无法接受这一观点。其后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尤其是欧文、傅立叶和圣西门等，明确宣称要以计划的、公有的社会来取代他们所说的无政府状态的市场。

马克思的理论建立在这一批判立场之上，同意将讨论焦点转移至平等与公有问题上，但反对用维护抽象而观念化的人性论的道德义愤（不论其如何正当）来代替持续的唯物主义分析。唯物主义分析的力量招致了众多的批评，但也赢得了批评者或勉强或毫不勉强的尊敬。[21]本节所作的

---

[21] 1942年，马克思的重要反对者之一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p.3）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的话在这个为“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的终结”而欢呼的世界里有着特别的意义：“大多数智慧和想像力的创作永远地消失了。有的存在了一个时代，有的则只在餐后闲谈中被略过，但还有一些却不是这样。它们可能暂时隐退，但必定会卷土重来，它们不是文化遗产中那些无法辨认的组成部分，而是有着独特的装束，带着人们可见可感知的创伤的那些部分。我们称它们为伟大的创作——这一说法将伟大与生命力联系起来却没有什么不妥。从这个意义来说，‘伟大的创作’一词无疑正可以用来形容马克思的学说。”

概述并不能、也不想对马克思理论的贡献及对它的无数种解释做出公正的评判，此处的目标是要描述马克思主义理论读解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主要方面，而这些是从他对古典学派思想的批判之中生发出来的。

马克思的许多观点以古典理论为基础。他同意古典理论将劳动作为价值的主要源泉这一看法，但他又将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纳入考虑范围，系统性地修改了古典学说，发展出了一套剥削理论。他指出，劳动的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差异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通过工作日的延长（绝对剥削）和工作日内劳动强度的增加（相对剥削）而被资本获得。

马克思的观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他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从历史的角度来作详细分析，尤其是分析劳动。古典学派虽然关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但除了讨论资本主义是否具有内在的、与生俱来的贫穷化倾向等特殊问题之外，古典学派在考察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时，历史思维的运用受到了较大的限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套前所未有的物力论体系，通过新技术和组织劳动工序的新形式不断革新其生产过程。尽管资本主义经常陷于斗争和反抗的漩涡之中，并由此不断改变它的实践和形式，但最终却没有任何习俗、仪式或价值观能束缚市场的发展、商品（包括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增长。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倾向被熊彼特（1942）精确地概括为"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它只能由资本主义内部产生的力量加以阻止。这些力量中包括了工人阶级，他们被迫出卖劳动力却无法控制生产资料。古典理论已经认识到这些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但却将它们解释为纯自然性的。[22]马克思力图将资本主义置于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之中来考察，而且这个历史是物质的历史，它将打破史学研究中的既定主流，即以黑格尔著作为代表的，认为观念、信仰、国家的历史高于一切的研究倾向。[23]事实上，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某些传统，尤其是他的《逻辑学》和他的实践哲学目标（意即融合理论与实践）的同时，更对其学说进行了彻底革新。他的主要手法就是展示人类如何在非自身创造的条件下创造历史，创造自我。对马克思面言，历史首先

[22] 马克思在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在《资本论》（1976a:175）中，他这样评论他们的理论体系："这些公式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

[23] 马克思（1976b:467）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派别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这些人拒绝正视斗争和变革的物质根源。"既然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相信哲学家们的观点，认为**现实的**分裂起源于**概念的分裂**，那他们又何必要提起'社会'？既然这种哲学信仰相信概念具有创造或毁灭世界的能力，那他们也不妨同样假设某个人通过某种方式'消除'了概念，从而也就'消除了生活中的裂痕'。"

意味着人类如何通过劳动来创造自我。

除了激进的历史观，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另一个方面是提出了一个同样激进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概念。资本主义是一套物质体系，这不是因为它的表现形式，即一系列的物（如机器、工厂、产品等等），而是因为它包含了一套史无前例的**社会关系**。自然主义的外观掩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按阶级界限进行重组的事实。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并不是使资本主义成为物质体系的原因。商品生产固然重要，但也毕竟只涉及了商品。马克思确实花费了大量笔墨论述商品，他在可以算是最成熟作品的《资本论》（1976a）中便以"商品"这一章作为开端。但他在该书的第一句话中就明确指出：商品虽然无所不在，但这只是一种表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p.125）剥开层层表面，我们发现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特别要指出的是"所有的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p.130）。

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体现了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关系。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必须向它的所有者出卖劳动力。生产资料所有者阶级由独立的公司组成，彼此在各种商品、劳务、原材料和资本市场中竞争。竞争促使各公司从生产者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以增加资本积累。对于劳资关系的准确定义和它所产生的后果，马克思主义学说内部也存在着争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建立于"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之上的社会制度将导致劳动的日益机械化、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最明显的原因就是"生产过剩的倾向"（Mandel引自 Marx，1976a：82）。人们可以在一些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尤其是李嘉图及其中间偏左的追随者们的论述中，找到这些观点的种子。但在马克思之前，从未有人能如此彻底地剥开资本主义的表面特征，对其进行分析。从这些表象看起来，资本主义世界天经地义，理应如此，马克思则提示出其中一系列社会动态因素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矛盾，因而造成动荡不安的现实。

在无数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学说中，有一个观点对传播研究特别重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还不够深入。这不是指马克思忽略了经营资本主义和服务型经济的兴起，这种观点虽然广为传播，却明显是一种误解。对于站在善意立场的批评者，如威廉斯（1977）、鲍得里亚（Baudrillard，1981）和斯密塞（1981）等人来说，这种误解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而在本质主义者或对劳动进行狭隘理解的人身上，它产生的后果要严重得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十分强调劳动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早

期著作以及《大纲》(该著作与《资本论》一脉相承)中,他将劳动视为包含着社会活动的宽泛概念,人们在社会活动过程中构建自我和历史。不过即使是这些著作,强调的仍是劳动的工具属性和生产属性,而非其表达属性和构成属性。《资本论》对劳动的论述显示出更为明显的唯生产论倾向,马克思的支持者称,这是因为《资本论》是一部批判资本主义的作品,而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将劳动狭隘化,成为工具——唯生产论所说的雇佣关系。但是,一种把劳动视为基本物质活动却又将它窄化为一种雇佣制度的理论,将导致传播、文化、语言、社会再生产等其他物质活动被认定为是建立在由劳动决定的物质基础上的非物质的、从属性的反映。极端者甚至认为它们不过是物质基础的上层建筑。哈拉威(Haraway,1991:132)认为,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劳动包含了人类自身的生产,但他们最关注的仍是生存资料的生产,因而对劳动的性/性别分工等理论最多也只是提供了一个起点。传播政治经济学要想以批判的眼光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进行交流,其中心任务之一就是阐明传播与文化如何成为物质实践,劳动与语言如何相互构建,以及传播与信息如何成为社会活动的辩证实例。

保守主义的批判

18世纪后半叶,社会与知识巨变横扫欧洲。对此,英国保守主义哲学家埃德蒙·伯克(1910,原出版于1790:73)宣称:"骑士的时代已经结束,随之而来的是诡辩家、经济学家和算计者的时代。欧洲的荣耀一去不复返了。"伯克认为法国革命不仅是一次失败的政治行动,也是失败的精神革命。他和托马斯·卡莱尔等保守主义者都认为法国革命证实了启蒙思想的彻底失败。启蒙思想主张将宇宙看成是一个巨大的理性机器,它就像一只大钟,可以了解,可以安装,还可以向更好的方向修正,而以理智、民主和自由为名的革命却带来了恐惧和专制。根据保守主义者的观点,社会不是可装可卸的机械,而是由传统和智慧连在一起的脆弱的有机体。

这种典型的反现代主义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不太可能改善人们的物质或精神生活。事实上,正是卡莱尔最先将政治经济学冠以"沉闷的科学"之名,并称它与"猪的哲学"相差无几。如果伽利略和牛顿的大钟无法为社会顺畅运作(事实上它只能增加人类的傲慢,引起注定失败的革命),

那么，它对于受它的启发而建立的经济模式也同样无能无力。保守主义者尤其反对一个假设，即经济发展源于自利的个体理性地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同样是出于自利，斯密所说的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也可能自相残杀。其实，财富产生于有机的秩序，这种秩序引导人们尊重传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并建立一种道德基础来调动人们扮演自己角色的积极性。私利也许能在短期内奏效(法国革命已经表明这一时期有多么短暂)，但从长远来看，对私利的理性追求只会是社会一致性的脆弱基础。

保守主义理论一旦到达极端，就会竭力维护性别、种族、阶级的等级制度和地位差别。天生的秩序应当由男性、白种人和富人领导。在保守主义者阵营中，不会出现穆勒、马克思或沃斯通克拉福特(Wollstonecraft)这样的人来主张以平等作为一个有序社会的基础。然而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对工人的支持远远超过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者。例如，卡莱尔(1984)就曾建议给予直接生产者更多的权力，以便增强他们在工作场所中的集体意识，营造出更和谐的气氛。他还支持政府通过干预建立规范来保障工作场所的健康与安全，并呼吁为这些被资本主义制度抛弃的人提供社会援助。这个阵营中也不会出现马尔萨斯，主张用溢满街道的污水来控制人口。尽管如此，保守主义者也不会欢迎空想社会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不论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和贫苦大众需求的关注有何表面上的共鸣，他们的理论还是存在着根本分歧。保守主义者设置了社会干预的底线，只有在社会变迁带来最糟后果时才启用干预手段。他们拒绝社会民主派和马克思倡导的启蒙主义观点，即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设有限制，甚至允许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秩序，从而建立一个更为理性的世界。保守主义者尤其反对将干预的权力交给大众，由他们来完成这个社会变革的使命。

从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因此我们无法精确指出前者何时变成了后者。不过在19世纪后半叶，一些研究成果逐渐向一种理论靠拢，这种理论最终表现为新古典研究取向。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边沁(Bentham)的功利主义观点越来越深人人心。边沁攻击古典学派对自然法则和天赋人权的维护，在《功利主义》(1890)一书中，

他声称决定伦理和道德行为的惟一因素是快乐和痛苦，而不是某些自然规则；不论这些规则如何有道理，如何有根据，都无济于事。在他看来，哲学家的职责就是研究出一种“幸福微积分”，在快乐最大化而痛苦最小化的原则上，对社会福利进行精确测量，并建议实行必要的社会变革来实现这一目标。边沁在1870年的书中试图重新命名经济学，杰文斯(1965：101)直接吸收了他的观点，将这门学科界定为“研究功利和私利的技术”：

> 经济学的问题是如何用最小的努力最大限度地实现我们的欲望——以最少的无用物换取最多的有用物——换句话说，也就是尽可能地增加快乐。[24]

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不同，它并不在分辨人类需求和权利(不论是自然天赋的还是其他的)等问题上下功夫。相反地，它关心的是在偏好中表达出来的需求，以及人们在资本、劳动、消费品和服务市场中做出的可辨别、可测量的选择。正是这些选择构成了这门学科的实质内涵。此外，经济学对一件商品的绝对效用兴趣不大，它更看重的是商品最难得到的那部分效用，即它的**边际效用**(marginal utlity)。1871年，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Menger)以及后来美国的克拉克(Clark)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当所有条件相同时，商品或服务越容易获得，它们的有用程度便越低。以最不常用也最不必要的需求量作为**边际单位**(marginal unit)，正是它的效用决定了一切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同时，边际这个概念不仅适用于商品或服务的需求领域，也可以推广到它们的供应领域。李嘉图曾经证实，对农业生产的持续压力迫使土地所有者开垦不那么适合耕种的边际地带，从而提高了生产成本。稍后，杰文斯和与他同时代的人注意到制造业中存在着相同的倾向：当工厂想要从机器和劳动中攫取更多的利益时，成本就会增加，结果是供应领域也同样而临着由边际决定的回报和效用缩减的问题。

无数后来的研究者运用各种方法将这些见解融合到了一起。一般公认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成功地完成了这一综合工作，并由此建立起新古典体系。简而言之，这个体系的基本理论是：市场价格(商品、服务、劳动和

---

[24] 边沁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他的著作又深深植根于前人的理论，这些学者们的立场大概比边沁还要强烈。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大卫·休谟(David Hume)关于如何在图书馆中筛选有用书籍的论述：“如果我们拿起了一本书，比方说是神学或形而上学的论著，我们应该问，***它包含着任何数或量的抽象推理吗？*** 没有。***它包含着任何有关事实和存在的实验性推理吗？*** 也没有。那么把它丢到火堆里去吧：因为它除了诡辩和幻想之外空无一物。”(转引自McCloskey，1985：8)

资本的价格)由下滑的需求曲线(下滑原因是边际消费欲望的衰减)和上扬的供应曲线(上扬原因是边际生产成本的增加)的交会点来决定。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将这个观点发展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论述。曾在新古典领域制造主要分裂的凯恩斯称该论述为“一套完整的哥白尼体系。所有的元素通过平衡的力量和相互作用力在经济宇宙中各安其位”(转引自 Heilbroner,1986:208)。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出版于 1890 年,其后直至 1920 年之间的时间里不断重印。该书的两个主要观点涵盖了经济学的全部学科特征。第一,经济学家在华乐斯(Walras)等人著作的影响下,对社会秩序特别关注,侧重描述处于均衡状态中的各种力量。天文学家与物理学家证明了物质世界在本质上是和谐共存的。与此相仿,经济学家也想找到维持商品世界平衡状态的经济单位具有什么样的属性和联系,并加以描述。用华乐斯的话来说,运动主要由“探索(tatonnements)”构成,即个体回应着外部环境的信号摸索前进。第二,正如该书扉页的简要拉丁文题词所说,*Natura non facit saltum*——自然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经济世界和牛顿的力学世界一样,由细小的累积的变化构成,因而必须在承认宏观制度设置合理性的前提下对它进行分析。由这些观点出发,自然会引出一个结论。杰文斯对此有明确的论述:“如果一定要将经济学变成一门科学,那么它只可能成为数学化的科学。”(转引自 Galbraith,1987:125)

为了成为数学化和简化的科学,经济学抛弃了政治经济学的大多数根本特征。出于对均衡状态的兴趣,经济学对被传统历史取向忽略的部分进行了大量的断代研究。经济学家认为,对制度变化和结构转型的研究不可能像数学那么精确,他们应该把对社会变迁的兴趣限制在对整体均衡模式中微小的、累积的调整的研究上。经济分析的方法适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但却无法解释一个时期向另一个时期的转型,尤其是当这些转型中包含着分裂和动荡时,经济分析更加无能为力了。

此外,简化这一要求使经济学不得不放弃了解宏观社会整体性的系统化兴趣。在经济学这门全新的科学中没有政治的立锥之地,因为没有一种工具可以使经济学家用数字式的精确来考察政治体系。这样的工具也许永远不可能有。[25] 经济学家也巴不得将社会制度、心理力量、文化价

---

[25] 杰文斯道出了新古典阵营中众多研究者的心声:“说到政治,我还真是一头雾水。”(转引自 Heilbroner,1986:184)难怪他建议将“政治经济学”更名为“经济学”,并称“政治经济学”是“我们这门科学又老又麻烦的复合称谓”(转引自 Clark,1991:32)。

值这些研究对象一并放弃，而这些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来却是全面分析的核心部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与他的政治经济学前辈和当代同仁一样涉猎广泛，但即使是他也呼吁将经济学研究限定为“个体活动与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即与物质福利的获取和使用关系最密切的一部分”（转引自 Clark，1991：92）。许多经济学者将自己的工作仅仅界定为了解稀有物质资源在不同用途中的分配。马歇尔却与众不同，他关心并加以论述的是工厂和社会的权力分配。无论如何，经济分析必须经得起数学式的严格考察和科学客观性的检验，这意味着它必须与社会学、政治科学及历史学一刀两断。

这同样也意味着经济学必须与道德哲学一刀两断。身处过渡时期的新型经济学精英对于被他们搁置在一边的这门学科其实十分精通。以马歇尔为例，他曾研究过伦理学，并表现出对康德及黑格尔的道德关怀取向的深刻理解。这使得他对环境污染（负面的外部表现）及市场体系提供教育等普遍利益的能力十分关注。尽管如此，马歇尔和其他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却都坚信经济学家应该研究通过偏好所表达的需求（wants），而不是由道德哲学所决定的需要（needs）。他们承认需求经常受到道德立场的限制，但这个立场却与了解需求的经济重要性毫不相关。因此，我们可以从知识兴趣或更强烈的人文主张出发来关心道德问题，但如果将这种道德关怀融人经济分析之中，也不会有什么进展。

最后，经过层层剥离，经济学家将研究社会实践的兴趣也束之高阁。和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在大学中被日益制度化，并屈服于主宰学术分工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其后果是导致学术与社会运动及公共的知识生活相脱离。有些人，如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维布伦，在抵制这一趋势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更为普遍的状况是，学者们躲人相对舒适的校园生活中，远离可能引起混乱的人和事。总之，要达到数学准确性或科学准确性代价高昂：不但要抛弃政治经济学，也要抛弃将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与实践融人研究和知识生活内涵的努力。[26]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反对将一门学科的早期发展仅仅当作今天研究成果的种子。虽然这种倾向可以理解，但当年有杰文斯、门格尔、克拉克、华乐斯和马歇尔并不意味着今天一定该有萨缪尔森（Samuelson）、托宾

---

[26] 海布莱纳（1986：211－212）对此后果进行了反思，将其概括为“极大的知识悲剧”：“假如学术界对下层社会予以关注；假如马歇尔有霍布森那样的忧患意识；假如埃奇沃思（Edgeworth）能够像亨利·乔治（Henry George）那样敏锐地觉察到社会的种种弊端，那么20世纪的大灾难也许就不会突然爆发，使这个毫无准备的世界对这场根本性的社会转变措手不及。”

(Tobin)、弗里德曼(Friedman)和萨默思(Summers)。政治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经历了广泛的分歧和知识上的冲突。新古典思想中有一个分支不愿意放弃历史和道德关怀,尽管它的分析还是偏重于个体私利、理性行为和自由市场的效率。这一分支是新古典范式中的奥地利学派,其创立者为门格尔、博伊姆-巴维克(Böhm-Bawerk)以及稍后的冯·米赛斯(von Mises)和诺贝尔奖得主弗雷德里克·哈耶克。他们对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迟缓而漫长的衰落过程十分敏感,从道德上排斥了来自阶级冲突和社会主义的更为切身的威胁。他们坚信纯粹的资本主义自有其长处。他们的著作旗帜鲜明地捍卫新古典主义方法,并维护不惜任何代价强求纯粹市场经济的做法,认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提供基本的供需法则并确保资源的有效分配(这些资源包括商品、服务、劳动、资本和理性行为所需要的信息等)。

新古典思想的另一主要分支是剑桥学派,它并不完全接受个人主义的市场中心论。不过,马歇尔理论的继承者们,尤其是皮古(Pigou)、罗宾逊、凯恩斯等人仍然同意市场中心取向的基本分析单元,他们研究了市场在哪些范围内会失灵,其外在表现如何,并要求建立一种调整机制,其中包括采用政府干预的手段。皮古对市场外在表现的论述常被用作采取课税或津贴政策的依据,这些政策可能会给企业增加额外的成本或者带来额外的收益。凯恩斯觉察到市场无法确保全民就业,因而建议政府采取财政干预。新古典范式的内部争议反映出它所面临的困境,这些困境直至今日仍在引出各种重要的问题。

新古典模式的胜利在20世纪初还未见端倪。事实上,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或者说直到30年代左右,新古典经济学一直不被人们所青睐,因为它显得太学究气、太抽象,并且脱离历史,无法解释大型跨行业财团的发展——这些财团的主要竞争领域几乎遍及各主要行业。新古典模式自救的方法是开发新的工具,做出新的修正以回应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攻击。统计分析和数量经济模式的发展给予了它强有力的和有气势的(这一点同样重要)工具,用以展现经济的现状并模拟其主要特征的变化所带来的冲击。[22]此外,张伯伦(Chamberlin)关于垄断竞争的分析,凯恩斯的"经济不稳定和资源低效利用是资本主义固有倾向"的论断,使得部分新古典主义者在自己的学说中加入了中间偏左派的某些批判观点。除此

[22] 这些工具的形式绝对优雅,极富吸引力,这一点不容忽视。正如肯尼思·伯克所说(转引自 McCloskey,1985:55):"被形式征服后,你就要准备认同它的内容了。"

之外，货币数量论的发展巩固了新古典思想中的货币论学派，这些发展构成了贝尔所说的“经济学黄金时代”，它的时间范围大约为1947年至1973年。这些年正是战后经济繁荣时期，这表明经济的发展也为经济学研究注入了强心剂，使它名正言顺地在解释这一繁荣时期的同时也成为经济繁荣的代表。

今天，新古典范式在政治谱系中占据着中间和中间偏右的位置。中间派保留了诸多凯恩斯主义的痕迹。它的论点是：商业循环是市场活动的自然结果，市场活动不断为商业决策提供适当的信号。凯恩斯及其追随者认为，这个信号机制（即大量的失业人口和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的成本远远高于效益。根据这个观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在所难免，它是当时抑制储蓄的经济政策的必然后果。决策者们假设减少的储蓄会*自然而然地*流向生产投资领域。凯恩斯（1964）提出，这在经济衰退时期根本不可能实现，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的后果将在经济领域引起连锁反应，由此加剧萧条。凯恩斯的理论呼吁政府采取财政手段，主要是增加经济衰退时期的财政支出，以此抵消消费者和商业企业支出的减少，最终刺激投资。从短期来看，这样做会增加政府的预算赤字，但是一旦经济开始复苏，政府就可以重新节制支出，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会增加政府的收入，从而弥补以前的亏空。不同形式的凯恩斯主义经济论对二战后的经济学及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28] 20世纪50年代经济的持续增长使经济学家将凯恩斯的财税政策当作一剂良方，以为它可以解决长期困扰资本主义社会的“景气—破产”这一循环（Heller，1967）。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所撰写的目前最为权威的教科书中，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奉为宏观经济分析的标准方法。但是70年代中期席卷全球的经济衰退激起了新的涟漪，经济不景气，并且出现了“滞胀”，即低速增长*加上*通货膨胀。现实提醒了人们经济学何以是“沉闷的科学”，并激发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向和政府经济策略的转变。[29]

20世纪70年代末，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中间偏右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日益扩大。与凯恩斯主义者相反，这些货币论者把他们的解释性工具的基础定为货币供应，他们的政策指导注重通过

---

[28] 这些不同形式的凯恩斯主义经济论的产生源于各国不同的政治考虑。美国实行了军事凯恩斯主义，即引导公共投资主要流向国防部门。西欧国家，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主要围绕着民用部门来制定财税政策，支持国有企业和国内社会福利政策，如全民医疗保健等。

[29] 许多凯恩斯主义者辩称，他们的分析和政策指导并没有错，问题在于政府忽略了他们的处方中要求在经济增长时缩减支出这项内容。

削减政府支出和提高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他们承认,这种紧缩的政策会在短期内导致失业率增高,但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的严重破坏(他们认为与失业相比,这显然更为重要),付出这样的代价还是值得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采纳了货币论者提出的政策,并通过他们控制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将这些政策强加给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30] 今天,各种版本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论仍在角逐新古典经济学主流的宝座,就经济学的现状及其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有何价值等问题争论不休。其实,更接近经济学本质的那些问题却往往由主流学派以外的分支提出。

政治经济学或异端经济学各流派

当代经济学领域表现出一种矛盾:新古典理论虽然内部颇多龃龉,但似乎仍在专业领域和公共政策的制定领域中赢得了胜利。不过对该学说的批判之声也日益高涨,新老批评者一同加入到这个行列中。下面一节将探讨这些批判流派,它们当中有不少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的建立颇有贡献。以下将首先介绍被称为造成经济学普遍危机的一些学说,以及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思维模式的根本差异。这些讨论将为第3章探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新保守主义

既然主流经济学在政治谱系中占据了中间和中间偏右的位置,保守派的批判似乎就没有多大的容身之地了。批判自由主义的反现代主义者(Oakeshott,1962,1975)基本上算作新古典经济学的右翼。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发觉,来自保守主义的重要批判分属两个流派,彼此之间也常常相互竞争。其中一派的特征是指责主流经济学过于小心谨慎,过于专注对经济行为的分析,这种取向可称为公共选择理论、理性期待学派、新政治经济学或实证政治经济学。它致力于将经济分析的原理运用到所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领域(Stigler,1988)。比如,斯蒂格勒(Stigler,1971)

---

[30] 货币论学派有无数变体,它们也同样受到各国政治发展状况的极大影响。里根和布什时代的美国似乎采取了一种混合的策略:一方面强化军事凯恩斯主义,另一方面在民用部门加强货币论学说的运用。

和威尔逊(Wilson,1980)为政府规范行为的分析奠定了基础,他们认为应该把规范领域看成有组织的市场,意在谋求利益的公务员利用他们对这个市场的控制,增加政府规范的数量和范围,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收益,这种做法甚至限制了人们对极有价值的资源的使用。有一种解决官员自肥的方案在20世纪80年代十分盛行,这一方案就是减少规范以消除国家对竞争活动的约束。近年来,公务员控制说的支持者越发大胆,他们把这种方案运用到家庭、性别、性行为等领域的研究之中(Posner,1992)。他们用同样的论点来解释儿童领养机构的拖沓和“官僚作风”,他们提出的治疗方案也并没有什么不同。理查德·波斯纳,这位被前总统里根提拔为联邦法官的经济学家提出,提高领养儿童分配效率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他所说的“父母权交易”市场。从这个观点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实在太过胆小了;市场行为和边际效用的根本原则适用于人类行为的所有领域,这种学说内含着亚当·斯密的目标,但更趋于系统化。斯密被安德森(Anderson,1988)称为“第一位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因为他试图将经济学建设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科学。

保守主义批判者的另一翼是**社团主义**(corporatist),其代表人物是尼斯贝(Nisbet,1986)和克里斯托(Kristol,1983)。他们对另一派的目标不以为然。这一翼的内部虽然不那么一致,几乎不能称之为一个学派,但他们对新古典学派的批判却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新古典学派忽视了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曾经为了它的科学证书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们抛弃了政治,正好使它落入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手中。公共选择理论也曾尝试重新夺回这一阵地,但却没有成功。社团主义者认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它过份信奉个人主义和契约论。取代个人主义的方案是将社会看成是社团集合体,它有自己的有机规范秩序,经济活动仅仅是秩序的一部分。指导个体行为的不是理性期待,而是社会习俗(包括异于常理的各种习俗)。这些社会习俗与经济逻辑截然不同。这一翼的保守主义者希望确认传统社会习俗和公共美德,通过政治干预提倡传统习俗的道德价值,建立政治经济学。这种理论是社团主义的保守派变体,它认为得体举止的最佳指南是各种社会制度中的精英们所建立的那套标准。公共选择理论“创造市场机能”的美梦在这里受到了挑战,政治保守主义者对此极其反感,称它是对有机道德秩序的严重侵犯。

保守派两大阵营都同意经济世界与政治世界之间泾渭分明。在这一点上它们倒还能够相安无事。前者是功利主义的辖地,后者是习俗和秩序的家园。新实证政治经济学的成长则标志了学术界对政治与经济的割

裂日益不满，也标志着不同学说不仅与主流经济学相抵触，它们彼此之间也将不断产生冲突。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及其追随者立志建立的新"市民宗教"，似乎也不能带来世界前途的平静。

制度经济学

左派的异端立场主要来自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前者认为控制生产、分配及商品与服务交换的主要力量是经济的组织结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市场。组织结构的分析融入了制度史、官僚活动社会学、技术限制与技术机遇的评估、社会习俗以及法律和文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等各个方面。制度学派要求建立明确的历史观和整体观，试图恢复新古典经济学在追求简化，追求数学式的严密性和科学正统性的过程中失去的东西。最强硬的制度派范式不仅要求以新的重点（制度约束和习俗）取代原有的重点（市场、代表价值的价格），还提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融合了德国史学的循环论思想（如马克斯·韦伯）和英美实用主义（如约翰·杜威关于社会价值和实用主义行为的论述）。

维布伦、查尔斯·艾瑞斯（Charles Ayres）、约翰·R. 康芒斯和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等人勾勒出制度学派的雏形。在他们（尤其是维布伦）描绘的世界里，新古典学派世界里的例外情况，反过来成了主宰。当时已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型托拉斯和垄断企业的崛起，不啻是对竞争市场模式的莫大嘲讽，而该模式正是新古典理论的核心。维布伦的著作《有闲阶级论》（1934，原出版于1899）提出了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即影响消费者选择的因素既不是理性，也不是常识，而是意识深处的非理性因素。这具体表现为我们所说的"炫耀性消费"，消费成了地位的象征，人们以此来互相攀比。维布伦特别对工人阶级和企业领导者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前者是在模仿、而不是试图去推翻他们的老板；后者的"作用不是帮助制造商品，而是为正常的生产流程制造麻烦，引起价格波动，以便利用混乱从中渔利"（转引自 Heilbroner，1986：236）。维布伦秉承圣西门一脉的学说，认为机器和工程师才是最终的赢家。[31] 康芒斯及其追随者们不同意这个结论，他们致力于了解技术与作为集体行动工具的制度之间的联系。不过，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认为新古典主义理论忽视了当代

---

[31] 维布伦对高等教育能否理解或遵从他的分析并不抱什么希望，他的另一著作《美国的高等教育》的副标题便是"论彻底的堕落"。

经济的核心特征：竞争的崩溃和垄断的崛起；需求和价值的社会建构以及技术革新所带来的转型效应。

当代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颇多，主要有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肯尼思·戈登(Kenneth Gordon)、沃尔特·施特劳斯曼(Walter Strassman)等人。毫无疑问，加尔布雷思的著作读者最多，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文字比较大众化，并且擅长在嘻笑怒骂之中表现他的睿智，如果维布伦尚在人世的话，也一定会极其欣赏他。[2]加尔布雷思还推广了欧洲版本的制度经济学理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熊彼特的著作。[3] 加尔布雷思的著作发展了维布伦对消费的分析。新古典学派提出，通过市场表现出来的需求体现了消费者的主权，加尔布雷思对此予以了驳斥。《富裕的社会》(1958)是其研究广告业对社会的需求建构有何影响的一部早期作品。加尔布雷思更重要的著作是《新工业国家》(1967)。在这部书中，他重拾制度理论对技术和结构的传统兴趣，考察了他所说的企业**技术结构**(technostructure)。这个说法指的是，企业的技术力量和组织力量进行了行政性组合，从而使企业能利用自己的规模和努力控制先前的自由市场。当代其他的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如肯尼思·鲍丁(Kenneth Boulding)关注技术结构的一个特别具有影响力的表现——军事—工业联合企业的发展，不断寻找着有别于经济权力集中的其他结构方式。总而言之，制度学派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使它既有别于新古典学派，也和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制度学派经济学者认为，与企业追求最大化利润的行为相比，行政系统最大程度地扩张权力的行为(姑且不论其好坏)更能推动经济活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流派都对新古典主义采取批判制度。本书既然旨在概述，自然不可能详尽地描述所有细枝末节，因此，这一节将介绍几个主要范式，它们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影响。巴蓝和斯威兹、蒙代尔(Mandel)、冈德·弗兰克(Gundor Frank)等经济学家的批判理论均明显源自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们信奉充满决定论色彩

---

[2] 我们不妨领教一段加尔布雷思所作的评论，其评论对象是当前经济学教材中对个别价格理论的强调："将来，一心扑在价格理论(这可是个古老的名字)上的经济学家定会缩得像一座公共雕像，其高度不会超过凯恩斯的牙医。"(Galbraith, 1987: 289)

[3] 无数学派都对熊彼特的学说大感兴趣。熊氏著述极丰，且有许多模棱两可的含混之处，使得整理工作相当艰巨。他认为经济的集中化和官僚主义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后果，制度学派宣称继承了他的这个观点。

的认识论，钻研劳动价值论、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经济权力的集中、帝国主义及其经济危机等问题。他们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只能解释累积的社会变迁，遇到其他问题便束手无策。根据他们的观点，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以及资本主义内部由自由竞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型，都标志着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然而新古典主义者对此视而不见。他们还指责新古典主义者将经济学变成了一门狭隘的、技术化的学科，不能对蕴含着国家冲突和阶级斗争的整体社会做出分析。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在技术分析和道德分析之间找到了一条折衷路线，对非理性问题（市场在资源“分配”上重商品销售而轻教育）和剥削问题（在第三世界是绝对的剥削，在工业化国家是相对的剥削）进行研究。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倡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功不可没。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学说相当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些身处冷战时代的勇士们经常遭人围攻，反对者认定他们的立场有误，要求他们闭嘴，在这种情况下能坚持立场尤为难得。1964年巴蓝去世时，他几乎已经是美国学术界硕果仅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了。[34]然而，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女权主义和学生运动带来的社会动荡又引起许多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复苏。巴蓝死后第四年，也就是民主党吵吵嚷嚷地开完1968年的年会之后，一群美国研究生发起成立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URPE，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该联盟在20世纪70年代蓬勃发展，即使在新保守主义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其规模也维持在1,000名成员左右。联盟的一位成员（Miller，1992：4）称其为“学术界规模最大，历史也最为悠久的左翼学术团体”。[35]

在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有人承袭传统，继续运用《资本论》研究当代政治经济，并深化和拓展其适用的程度和范围。另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则试图从根本上重新评价《资本论》和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在美国，《每月评论》及其图书系列代表了前者的取向。虽然《每月评论》也刊登父权制和环境危机等方面的分析文章，但它主要集中于进行***阶级分析***（资本的结构与运作、阶级分化的性质及后果、劳动过程、阶级斗争等）和对***帝国主义及其附庸***的调查（资本运动的全球化、军国

[34] 巴蓝的一位友人（Miller，1992：4）在他去世后不久写道：“他的离去，使这个自称开放的社会彻底地关上了大门，它的体制再也无法容忍学术界或其他领域有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存在。”

[35] 激进政治经济学大行其道，吸引了主流媒介的注意，但它们着重强调了激进分子在面对变化中的世界时所作的妥协。《商业周刊》就曾如此发问：“如果你们最终发现自己在历史进程中选择了错误的一边，你们会怎么办？”（Mandel，1991：78）

主义、阶级压迫及附属国的斗争等)。

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桥梁是《世界体系透视》一书。该书的立场综合了以费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为先锋的法国**年鉴**(Annales)史学派(1975)的唯物主义历史分析法和美国的以马内利·沃勒斯坦的全球社会学(1979,1991)。批评和支持这本书的人都承认唯物史观和对社会整体性的综合理解在该书中占有核心地位。这些观点紧密交织在一起:历史就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而世界经济由国际阶级体系、核心—边缘等级制度、跨国体系和全球市场共同构成(Chase-Dunn,1989)。世界系统论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分析的基本要素,包括社会化商品生产、主要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以及雇佣制度等方面。早期的世界系统论者曾被人指责忽视了阶级分析,因此他们逐渐吸纳了阶级矛盾的定位核心,包括工厂、国家以及核心—边缘关系并对此一一进行考察。另外,在文化、传播和信息技术等范畴,尽管这些年来世界系统论者开始有所关注(Wallerstein,1991),但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相比,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仍是相当不足。

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性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对新古典经济学展开批判。《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Cohen,1978)综合了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各门学科,真正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精神。书中攻击新古典学派对资本主义的维护,这不只是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不平等,更主要是因为当资本主义可以减少劳动时间时它没有这么做,而是仍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新古典主义者的价值观也受到攻击:不是因为他们的体系未能提供社会保障安全网(事实上它提供了),而是因为它无法保障人们拥有追求自由的空余时间。

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受到某些著作的影响。这些书籍承认市场机制的长处,但仍然排斥资本主义。诺夫(Nove,1983)和米勒(Miller,1989)一直在寻求一种**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并以此作为社会组织形式。市场社会主义消除了劳资差别——将雇主阶层与失去生产资料控制权的工人之间的差别代之以建立在工人所有制企业基础之上的市场体系(另见 Bowles & Gintis,1986)。这些著作点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部的大辩论(McNally,1993)。分析派马克思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科恩认为(Cohen,1991),只批判市场的低效率和无政府状态,新古典主义理论者应付起来绰绰有余。他坚持认为,市场更明显的缺陷是,它最终的结果历来有违公平原则,而且市场理论对人们动机的假设贬低了人类

的品质。[35]

争论的对象也包括了企业结构和劳动过程的重要性问题。新古典主义者认为企业集中只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异常现象；制度学派认为这种现象深植于资本主义结构之中，但可以通过国家干预(如反托拉斯法或其他独立规范)进行校正。在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经济集中看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经济危机的指标。相对而言，新马克思主义学说对经济集中的意义并没有定论，关于“后福特主义”、“弹性特殊化”、以及规范模式的辩论反映出这一学派正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中。

这些争议源于研究者们所观察到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主要变化，包括生产技术、工业组织和全球市场的转型。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皮沃和萨伯尔的著作(1984)。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着由批量生产向工艺生产或**弹性特殊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的转变。这个过程涉及到生产体系的转型。新的生产体系以制造改进型的和多样化的产品为基础，定位于特定的市场区域，使用精密的(“智能的”)机器和适应性强的熟练劳动力进行生产。克里斯托弗森和斯托帕(Christopherson & Storper, 1989)发起了一场关于弹性特殊化对传媒事业影响的讨论，他们认为这个过程减少了好莱坞主要制片公司的影响力(关于该问题的不同意见，见 Aksoy & Robins, 1992)。

弹性特殊化学说的不同版本在肯定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系统的同时(这一观点在它们的文章中越来越少见了)，也希望将偶然性的作用融入到它们的分析之中。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规范(regulation)学派(Boyer, 1986; Lipietz, 1988)，它考察了以积累政体和规范模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积累政体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稳定的、可复制的关系，它可以用来描述全球各地的经济现象。但由于各国的历史及其在国际分工中所占的地位不同，因此，每个国家的积累政体都具有各自的特征。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四种主要的积累政体：粗放型积累、不包含大众消费的集约型积累(称为泰勒主义)、包含大众消费的集约型积累(称为福特主义)，以及正在形成的后福特主义政体(其定义尚未明确)。规范模式由制度化的规范机构组成，用以确保个体和团体对主流政

---

[35] 科恩(1991:18)认为市场贬低了各种社会地位的人：“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中，生产活动的直接动机往往是贪婪和恐惧的混合体，二者的比例依个体在市场中的地位而定。在贪婪的人眼中，其他所有人都是财富的可能源泉；在怯懦的人眼中，其他所有人都是财富的可能威胁。”

体的适应。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着由垄断规范向弹性规范的转型。[37]

与规范学派相比,系统论学派更加确信我们正在转向**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时期。这方面的著作受到激进地理学的深刻影响,致力于综合运用后福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t)的理论对全球范围内流动方式的转型(物质流动、信息流动和文化流动)进行分析(Castells, 1989;Harvey,1989;Thrift,1987)。非主流学派还包括沉湎于政治科学的制度性文献研究的学者,他们(Lash & Urry,1987)认为资本主义正在由组织化转向**组织解体**(disorganized)。最后要提到的是,弗瑞曼(Freeman, 1984)和他的合作者更直接地钻研经济理论,熊彼特关于技术和制度变迁的论述以及孔卓提夫(Kondratiev)的著作《持久的革新浪潮》尤其如此。孔卓提夫在书中提出,我们正在进入革新的第五次浪潮,这次浪潮由新的信息和传播科技推动,带有许多后福特主义的特征(见 Hall & Preston, 1988)。

马克思主义传统至今仍使政治经济学各流派受益匪浅。尽管内部龃龉颇多,但大致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学派都重视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和实践。本节随后将要介绍两种学说: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生态政治经济学,它们都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间的差异也相当明显,需要进行分别处理。这两种学说都发祥于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运动,并且都对新古典学派进行了大量有力的批判。

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再生产的政治学》(1981)一书中,玛丽·奥布莱恩(Mary O'Brien)介绍了能与女权运动的广度相匹配的女权主义学说的学术成就,并对之大加赞誉。在陈述的过程中,她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分界线,作为女权主义与主流分析的区别:

> 女权主义学术研究不能掺和到当前社会科学界盛行的学科分化中去;也不能沉溺于"此时此地"的经验主义而忘记了历史。(p.196)

她更进一步要求建立"统一的社会科学,这种统一将克服政治经济学

[37] 美国版的规范理论体现于波莱斯(Bowles,1990)等人对社会积累结构的分析之中。布洛克(Block,1990)的论述则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取向。

的片面性"。沃瑞(1988)对她的评价是:其志可嘉,但不太可能实现,除非政治经济学在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之后,终于承认有必要建立一门"家政"的科学,对主要从事家务劳动的人进行研究。就其本质而言,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不在于它太唯经济论,而是恰恰相反,正因为它没有足够地讨论经济问题,才会将全世界大多数女性的工作排除在外。沃瑞的思想对于促成独特的女权主义经济学贡献良多,但正如她自己所说,这样的批评也算不上新鲜。19 世纪末,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1966,原出版于 1889:235 - 236)就曾攻击被沃瑞称为"政治经济学初学者"的新古典主义,指责它是"幼稚的男性中心论":

> 他们设想的"经济男性"若非迫不得已,决不会轻举妄动。他所做的任何事都只是为了摆脱痛苦,获得快乐,并且毫无疑问地,他会尽占自己所能得到的东西,并竭尽全力,与对手斗智斗勇,以战胜对手,甚至在必要时摧毁他们。对于这个假设他们深信不疑。

主流经济学以及大多数异端经济学普遍忽略了这些论述。

女权主义发祥于行动主义。例如玛丽琳·沃瑞最初便从事社会运动的组织工作,并因此进入了新西兰议会,负责评估依照联合国国家统计系统(UNSNA,United Nations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做出的提案。[⑧] 沃瑞很快便觉察到,由于这套系统依据的是市场和交换价值的原则,因此它"支持了对妇女劳动、环境价值及类似因素的抹煞,并从形式上将其确定下来"(1988:xx)。例如,将孩子送进托儿所,使用市场上买来的燃料,由工厂制造或加工食品,通过管道输送自来水,在餐馆吃饭或在洗衣店洗衣等,这些都会被列入 UNSNA 来计算价值。但一个赞比亚妇女的家务劳动尽管要承担上述的所有工作,却不能纳入这套系统的考虑范围之内。联合国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将每天工作 8 小时的男人归类为"活跃的劳动者",而他的妻子每天花费 11 个小时忙里忙外地操持家务却无人注意。她只是"帮助一家之主的工作"而已(Waring,1988:29 - 30)。

学者们把对家务劳动的忽视归咎于概念上和方法论上存在困难。但女权主义者的批评指出,对非法地下经济、毒品交易、卖淫嫖娼等问题的研究存在着类似的概念上和方法论上的困难,学术界对此花费了大量精

⑧ 设计这套系统的理查德·斯通爵士(Sir Richard Stone)因此获得了 1974 年的诺贝尔奖。

力来解决，却百般冷落家务劳动和养育儿女的课题。玛格丽特·瑞德(Margaret Reid)在她1934年出版的论述家务劳动的著作中提出了计算家务劳动的指导原则：任何劳务活动或产品生产活动，只要我们可以通过雇佣他人完成或以购买的方式得到其结果(劳务或产品)，那么不论它是否有财务交易发生，都应该属于经济活动。尽管如此，世界各地的经济实践和政府政策依然体现着1968年版《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论调，它对于"劳动力——定义与测量"这一条目是这样解释的：

> 家庭主妇不计入劳动力，因为她们的工作不在生产或工作机构特有的系统之内，况且将她们计入劳动力无助于政府决策者解决美国社会的重要经济问题。

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女权主义经济学呢？关于这一点，学术界争议颇多。女权主义经济学家致力于揭露经济学意识形态领域的缺陷，即将男性主宰的工作体系视为社会独有的和天然形成的。[39] 近年来，女权主义者们攻击的焦点就是"家庭薪酬"。它从名义上把女性的劳动计人男性的薪酬中，认为这份酬劳包括了整个家庭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这个观点出发，改革的内容就变成了增加家庭薪酬，而不是单独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巴瑞特和麦金托什(Barrett & McIntosh，1980；另见Seccombe，1974)指责这种家庭薪酬观从根本上歧视妇女，因为它只是通过她们的丈夫间接计算她们的劳动。同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观点也站不住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的薪水一直偏低，而男性则不论其是否有家庭都会拿同样的报酬。今天，家庭薪酬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发觉大部分家庭仅靠一份薪水生活是不够的。不过，尽管妇女挣的钱应该远不只是"蝇头小钱"，但仍有人坚持认为她们的薪酬应该放在家庭收人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不只是要将所谓的"非生产性劳动"列人价值计算之内，而且还要将所有形式的妇女劳动置于权力体系的适当位置的原因。在以前的权力体系中，女性劳动的价值总是被减至低于男性的薪酬劳动。在政治上，女权主义者要求打破目前的公共政策体系，因为它投资和奖励的活动都是父权主义定义下的生产

[39] 女权主义经济学家提出，尽管一些异端经济学说也承认工作组织中存在着父权主义，但是，它们对这一发现并未深人研究。例如恩格斯(Engels，1972)就曾考察过性别与经济分工之间的关系，但却只是把它与经济关系的其他的社会结构要素搁置一旁。因为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抱有牛顿式的理想，更希望能够找出的是资本主义的运动定律。

性劳动。[40]

生态政治经济学

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是传统分析模式中的非理性,认为它无法对全世界大多数女性的工作进行评估。生态政治经济学论述的是另一种学术典范的非理性,这种典范提出,大规模的石油泄漏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为清理工作会增加劳务和资本设备的支出。生态问题对经济分析十分重要,这已经是老调重弹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著作就对土地的负载能力极为关切,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日益增长的人口。

今天,我们目睹了许多观点的复苏。新马尔萨斯学派将人口动力学重新引入到经济分析之中,并警告人类:自然已经接近其所能承受的经济发展的极限。主流环境保护主义者与主流经济学家一样,致力于节制市场的过度膨胀,或另外创造一个能够明确体现环境价值的市场,进而将资本主义从自我毁灭的趋势中拯救出来。一些立场强硬的环保主义者对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都大事讨伐。"绿色经济学"就反映了他们的主要观点:

> 这两支学派都献身于工业发展和生产资料的扩张,致力于势不可挡的技术进步以及物质主义的伦理,在他们看来,物质主义伦理就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最佳手段。(Porritt,1984:52)

最后,我们还要介绍社会主义生态学。这个取向实际上是各种不同取向组成的松散联盟,它试图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联合,其立场通过《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这本期刊而闻名(另见 Benton,1989)。它信奉社会主义,也支持环境保护主义,声称只有以集体主义和决策参与为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才能产生健康的生态学。另外它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之间的联盟,就必须纠正马克思主义中的简化论倾向,因为"这个倾向主张社会因素可以支配自然因素,这无异于煽动要让生物尽数灭绝"(Soper 引自 J. O'Connor,1991:10)。社会主义生态学家意识到自己背负着生物决定论

[40] 其中包括了所谓的工作福利政策,根据这项政策,外出工作的单亲家庭妇女可以得到资助,但她如果选择在家尽母亲的责任就不能获得这笔资助。

的包袱，对人们指责他们重拾社会达尔文主义十分敏感，因此他们呼吁政治经济学应该与一种新的生物学相结合。这种联合的基础是生态学和地理学关于自然界内部及其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定位和物质交换的论述。这是一种注重过程的生物学，它对于结构的论述也以过程的结构为主，或者借用当前地理学流行的说法：以流动的空间为主。

社会主义生态学拓展了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整体性的论述，因为它将有机生命的自然整体性纳入其研究范畴。同时它也扩大了政治经济学对道德哲学的关注层次，因为它将道德关怀从人类延伸到了所有的生命过程。不过，它仍然将人类看成是惟一的道德执行者，是惟一能够以民主实践的形式将概念和行为结合起来的生命体。

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

保守主义、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及环境保护主义对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进行了广泛的批判，由此可见这门学科即使不是陷于危机当中，也是处于争鸣的局面。这与经济学当初在社会科学及公共政策领域中的胜利者姿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章在作结时，整理了上述对经济学的各种批判，同时也指出了具体的不同之处，有助于我们明确政治经济学的非主流性。

从以上的概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关于是什么构成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上，总是存在着知识界的斗争，而这些斗争既反映又反过来影响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力量的运作状态。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是对经济大萧条的反应，它的政策提案又对西方经济在二战后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相似的事例在20世纪70年代再度出现，当时的停滞型通货膨胀造就了货币学派的大发展。我们的概述集中描述了经济学所面临的实质性问题，特别提到了它在社会理论方面的不足，因此也使得政治经济学的非主流研究取向呼之欲出。

经济学倾向于对静态模型进行描述，在平衡状态中解决问题。它假设变化被限制在一系列既定的制度关系下逐渐发生。然而，就像广阔的社会和物理世界不会轻易地受到限制一样，真正的经济实践也不会。均衡仅是结果的一种，渐变只是形式的一种，既定的制度关系也只是许多可能关系中的一种而已。

经济学并没有将许多决定生产力的重要社会经济因素置于自己的考

虑范围之内，其中包括企业结构与企业产权、教育和培训、家庭背景等等。经济学往往忽略了权力对于财富的关系，并因此认为结构的力量对于市场控制是无足轻重的。经济学家认定市场竞争的结果终将使权力得到驯服，这些话简直像托勒密的追随者们拒绝承认哥白尼的"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理论时所说的一样。他们始终认为，垄断与寡占是例外情况，需要进行一些托勒密式的调整从而重归竞争模式的正轨。批评者则坚持认为，经济权力的日益集中会使得这个模式濒临崩溃边缘。

经济学假定，信息的自由流动使得消费者能够在市场中登记自己的需求。它又提出，需要(needs)与需求(wants)应当并为一谈，前者对每个人来讲都十分普遍，而后者与个人的癖好和心理偏向息息相关，经济学清除了二者间的界限，把人们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当作需求来对待。而对它的批评意见认为，经济学往好里说不过是提供了一种解释需求产生的初级理论；而最糟时它简直是一种赘述，毫无用处，只是把需求界定为在市场中发生的任何事情。经济学排除了对生产、营销和欲望(desire)之间复杂关系进行的研究。而正是这些关系使信息只能在特定的结构中按特定的方向流动。经济学低估了营销构建需求的能力和人类欲望的复杂性。它并未解释欲望(欲望即欲望的选择)，或者当它处理时只把欲望减化为理性的选择。资源的贫乏迫使人们做出虽然痛苦却充满理性的选择。贝尔(1981:71)简明地总结了对经济学的批判："这个享乐主义的算计本身是以最狭隘的文化内涵来解释人类行为，它一方面忽略了传统主义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忽略了道德的反省能力。"[41] 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因为传统与道德同需要与欲望之间关系密切，但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计算标准，传统与道德的标准经常会拒绝被限制在需求的计算中。

经济学倾向于将市场看作个体互动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社会活动的许多方面之一。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学夸大了布洛克(1990)所说的社会的"市场性"，或者说它扩大了在明确界定的市场环境中进行的交易量。在经济学家的市场模式中，人们的惟一动机就是对价格的工具性考虑，这个模式在商品市场中表现得最典型，但实际上，它的发生率并不高，并不像经济学家使我们相信的那么高。根据雷恩(Lane,1991:6)的观点，市场行为应该被置于广阔的行为心理学的考察中，"市场可能是'满足人类需

[41] 贝尔(1976:23)认为，社会取向的缺失使经济学中产生了大量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所谓的市场经济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资产阶级经济"，因此它的生产结果是个人性的而不是集体性的，而且它获取财物的动机是需求而不是需要。

求'的最高机制，也可能不是，但对于许多需求来说，市场甚至算不上是最重要的舞台"。再者，当经济学试图探索非市场行为的时候，它认为非市场行为身处的市场王国并不完美，至少也认为这些行为与有组织的等级制度联系紧密，这种制度总是导致结果差强人意。有了这些不完美和差强人意，正统经济学家就能够主张扩大市场范围，减少非市场的或组织的活动。这加强了经济学的信念，他们认定社会福利只不过是个人福利的产物，个人是决定他们自己福利的最佳人选。这样一来，经济学家便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市场制造外部负面效应有余，生产公共物品不足，其影响就像污染了的江河一般。

这种观点超脱了社会关系，使市场从阶级、种族、性别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分工中抽象地剥离出来了，而事实上正是这种分工为市场活动提供了社会系统的大量支持，包括低薪劳动力的弹性储备，不需付酬的家务劳动，以及一个社会欲望体系，这个体系把需求关系组织成有利于市场运作的"需要"形式。结果是，市场的成功，即市场体系的平滑运作，就被视为社会成功，即使这种结果加深了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分化或是加重了社会生活的普遍商品化。那些反对这一结果的人被认为行为动机不够理性，最好应该由市场机能加以矫正。市场做不到的事情也只是反映了现实的局限，这正是有待于经济学去扭转的。但是正如政治经济学所坚持的，为经济塑造行为和引领方向的并不是价格体系，而是更广阔的价值与权力体系，这正是经济体系得以生长的土壤。

形形色色的异端观点大都认为，经济学的根本缺陷源自于它对社会的理解并不充分。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消除无法从科学角度理解的经济现象并不会妨碍我们对经济的根本性理解。与主流经济学相异的观点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空洞无物的科学，它对复杂的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及文化实践并不理解，却还想要理解经济行为。经济学从个体开始，超越了时空界限；政治经济学的起点则是社会构建下的个体，与社会构建下的生产密切相关。

有人还要将这个批判引向更深的层面，正如贝尔(1981:47)所指出的："简而言之，问题不只是经济学理论*之内*是否出现了危机，而是经济学理论本身出现了危机。"根据这个观点，经济学理论出现危机的原因在于它对社会的理论认识不够充分。它认为社会只是所有个体的总和，认为人类的行为主要是理性的，认为信息能够自由流通，还认为市场能够最有效地分散权力，标志着人类的需求，记录着社会的需要。但是，除了这些认识不足之外，经济学理论*自身*的危机更为深重，原因就在于它的实证主

义和现代主义根源。

麦克劳斯基在《经济学的修辞》(1985)这本书中详细地批判了经济实证主义。他受过传统的经济学训练,担心许多经济学家是"跛足",因为他们所依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要求更多适用于宗教体系的东西:

> 他们的信仰包括科学主义、行为主义、操作主义、实证经济学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其他的量化狂热。在捍卫信仰的道路上,教条逐渐被强化为宗教仪式,并且造就了众多修女、主教与大主教式的人物。(p.4)

实证主义的信仰体系包括许多指令:预测和控制是科学的要点;只有通过观察得来的理论蕴涵才能通向真理;观察的界定标准是客观的、可重复的实验;惟有实验结果证实的虚假才可以作为判定理论为假的标准;等等。此外,实证主义推崇客观性,它将事实与价值分割开来,并且热衷于数学语言。根据麦克劳斯基的见解,这使得经济学家的头脑枯竭,他们"厌烦历史,睥睨其他的社会科学家,忽略了自己的文明,对于伦理鲜有思索,对于方法鲜有反省"(p.7)。经济学家的这种方法论取向,又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并驾齐驱。后者奉科学为金科玉律,却毫无历史观念。麦克劳斯基进一步指出,异端学者(包括主流之内的奥地利学派和主流之外的制度学派及马克思主义者)在检讨主流思想的实质性缺陷时,却忽视了它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假设上存在着更为根本的缺陷。

用麦克劳斯基的话说,这是对充满着规律束缚的方法论的盲目崇拜式的信奉,是对可观察事实的奴隶式的献身,这便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许多描述与解释所具有的丰富内涵都失去了。波帕(Popper)就以此为理由将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拒之门外。照这么说,既然次原子的主要构成无法观察,那么次原子物理学岂不也要被拒之门外?若是遵循这一规则,凯恩斯经济学也该被排斥,因为它的"深刻见解形成统计公式化的表达已经是20世纪50年代之初,也就是大量新生代经济学家已经信服它的论述十五年之后的事了"。麦克劳斯基同意杜威的看法,认为这表明"追求确定胜过了追求智慧"(p.30),他也同意博兰尼(Polanyi)的结论,博氏认为"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方法论来做,势必产生大量的低能"(p.17)。

诚然,麦克劳斯基被他自己的华美修辞带得太远。更重要的是,他的兴趣在于通过揭露经济学在哲学上的根本缺陷来消解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这反倒使他忽略了经济学这门学科与政治及经济权力体系之间的种

种联系。传统经济学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学家在研究与论述的规则上达成一致,更重要的是因为主流经济学所提供的信息、建议和政策更能强化资本主义的体制。把经济学的正统看作修辞体系是重要的,然而把这个学科置于整套的权力系统之内进行研究的重要性绝不低于前者。

除此之外,麦克劳斯基还想用对话或交流的认识论来取代实证主义。他明确地声称:"设定科学标准的是对话的修辞,而不是询问的逻辑。"(p.153)具体地说就是思想的标准不是由与外在实体的关系来决定,而是由符合文雅论述规则的重叠的对话来决定。在这方面,麦克劳斯基不禁让人联想起了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 1969a,1969b),他们都坚信修辞的力量可以导向关于真理的对话。用杜威的话反过来讲,他们这样做是基于一种想法,即要使追求智慧胜过追求确定。

对话取向的长处在于承认社会交流在知识形成过程中的价值。真理的构建不是仅限于用经验方法来研究可观察的事物。根据这一观点,人们通过相互交谈而形成的自觉的、重要的社会共识也能最终引向真理。这一取向的主要局限在于它过份地拔高了对话的地位,将它视为最重要的社会实践,从而将研究重点由非交谈性的社会实践转向了关于这些实践的讨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麦克劳斯基急于去除实证经济学认识论中的本质主义,但他用以取而代之的却是另一种修饰性的、对话的、交流形式的本质主义。此外,麦氏还延袭了罗蒂(Rorty)等人的研究模式,将谈话取向的研究对象仅限于知识分子。正如阿哈麦德(1992:2)所说:"'理论'已经被……看作是学术界专业人士的'对话'了。"结果是,包括左派文艺批评在内的理论将其他的不同声音都抛诸脑后,甚至连工人的呼声也未能幸免。而当初,左派正是靠为工人说话和与工人交流起家的。[42]

事实上,描述麦克劳斯基批评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以传播(communication)和信息(information)来打比方。对话观借用传播模式来强调共享与合作。合作和交流与信息寻求不同,这些模式与充斥主流经济学著作中的信息处理活动更是两码事。麦克劳斯基的观点也有一个主要问题,他反对占据了新古典主义著作中的对信息处理的迷信,但是他转向了另

---

[42] 阿哈麦德(1992:5))对存在于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与文学理论之间的鸿沟深表震惊:"假设从《每月评论》出版社的诞生开始算起,直到1975年,在这四分之一的世纪里,美国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产生了如此众多的重要著作——而在过去20年中,美国文学理论令人惊讶的特点就是毫不为之所动。"阿哈麦德还指出(p.320):"美国学术界的文化激进主义与土生土长的工人运动之间缺乏实践联系。"他举出的例子是布里弗曼(1974)提出的"垄断资本主义下工作的堕落"的问题。应该说,文化激进主义对政治经济学中从布里弗曼开始的大量劳动分析无动于衷。

一种本质主义，即转而去迷信传播交流。结果他虽然对经济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但他提出的认识论方法同样也是片面的。其实，传播与信息的构成是辩证的、不可分割的，任何只取其一的做法都是片面的，麦氏即是一例。正如达拉斯·斯密塞所说，传播与信息是一个过程的两面，通过相互构建面辩证地联系在一起。全面的认识论也包括传播与信息两个过程，既要有对话，也要有观察。对话再怎么富有成果，也不能替代严谨观察所得的经验。同样，信息寻求和处理观一头扎进数据的收集和组织中，因面很容易忽略现实的社会建构，包括我们对现实的评价。

全面的研究由信息处理和传播交流活动构成。它所使用的工具必须能够代表并解释社会实践和发言者的对话，*以及*发言者提及这些社会实践的不同方式。各种研究都由信息与传播的辩证关系构成，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不例外。

结　论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分析方法，视野广阔，取向丰富。本章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介绍，为具体考察传播政治经济学构建了基础。本章的开始以一系列的定义为切入点，说明了政治经济学如何由家务操持和社区管理等实际问题发展而来。界定政治经济学内涵的过程充满了各种争议：有人认为这门学科应该包含社会活动的全部领域；有人却热衷于追求一份科学证书，宁愿将经济学的范围缩小到仅限于可以用数学论证方法验证的命题。本章着重介绍了两个同样用于传播研究的概念。一个强调社会关系，尤其是控制资源生产、分配与交换的权力关系；另一个关注有关控制与生存的各种问题。

陈述并评价了这些定义之后，本章探讨了构成政治经济学取向的一些核心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社会变迁与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和社会实践。早在政治经济学的萌芽时期，18 世纪的苏格兰启蒙哲学家就已开始将这些特征体现在他们的研究之中。随着世界秩序的变化，同时也受其他学术思潮的冲击，这些特征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改变。

本章随后评述了政治经济学各主要思想流派的发展，并指出两种相互对峙的观点如何在初期推动了这门学科的进步。这两派学说一方是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建立的古典学派，另一方是有机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到了 19 世纪后半叶，这个分歧演变为逐渐取得正统地位的经

济学与异端学派之间的纷争。前者放弃了政治经济学兼容并蓄的特点，而代之以功利主义原则和实证方法；后者则发展成一支庞大的队伍，涵盖了保守派、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等多个学派，这些学派对后来被称为新古典主义取向的正统学说进行了广泛的批判。这个批判阵营是松散的，包括了个性鲜明的各个学派，内部充满了各种争论。近些年来，以女权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为特色的研究取向也加入到异端学派的行列中。

本章最后概括了政治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主要批判，同时从理论的和政治经济的角度评价了经济学的实质立论基础。它还介绍了这门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关于方法论的讨论引导我们进入了传播研究领域，在这里，信息—传播的辩证关系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新方向，这个方向将信息处理模式的分析基础和传播交流的修辞基础或者说对话基础结合在一起。下面一章将转入介绍政治经济学在传播研究中的发展。

第3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

本章将专门探讨如何利用各种政治经济学传统来进行传播研究。我们首先从界定传播的含义出发,进而探讨传播政治经济学崛起的社会背景及知识学术背景。然后本章还将通过对历史档案的利用及对四代学者的追述,探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及其核心人物。

从这样的历史评估中,本章得出一个主要结论,即主要包括马克思学说及制度研究取向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所产生的实际研究成果远远超出社会体制所给予的支持。尽管几个世代以来,进行此方面研究的人数不断增加,但大多数工作都是个体独立完成的。合作性研究工作通常是基于个体学者之间的共同兴趣,顶多有些微薄的机构赞助,多数情况下则面临高涨的反对声浪,因此很难说政治经济学研究已有所谓的研究核心。

本章的焦点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其主要关注领域、马克思学说与制度学派传统的不同侧重点,以及如何把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移用到传播研究之中。本章的结论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并揭示后续章节所阐述的该领域面临的核心挑战,包括认识论的问题,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的过程,以及来自政策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挑战。

传　播

任何一门学科都会面临**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挑战,本质主义倾向于将现实化简为学科的中心要素。第2章谈到政治经济学特征的时候,强调必须避免将社会现实化简为政治经济现象,因为政治经济不过是建构社会生活的诸多力量之一。我们很容易理解迫使政治经济学走向本质主义的压力。马克思的《资本论》、马歇尔的《原则》和凯恩斯的《普遍原理》为将社会现实化简为政治经济现象或干脆化简为经济逻辑提供了坚固的理论基础。然而,本书第1、第2章坚持反对这种倾向,建立了重要的认识论基础、理论基础以及实质论基础。留意于此,我便将政治经济学视为进入社会分析的门槛,也是通往社会领域的重要入口处,但并不认为所有研究取向都可以化简到政治经济学身上。

因此,避免传播本质论也具有同等重要性。然而,目前的学术气氛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倾向。譬如有人呼吁重新构造认识论,将引导科学三百年之久的分析方法转变为一系列基于传播交流的研究取向,其核心是修辞学及一系列论述规则的标准(Burke,1969a,1969b;McCloskey,1985;Rorty,1979)。从此观点出发,对话的修辞如同询问的逻辑,可作为科学的标准。另外,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使得有关传播内容构成(比如文本与论述)的组织性分析大受重视。结果,人们倾向于将认识论与社会分析化简为传播——即将认知行为与认知对象化简为论述,化简为对文本的解读。第2章所提到的麦克劳斯基的著作表明,这种取向为认清科学与经济学,包括其他知识形式的普遍要求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然而,这种力量会毁掉大多数研究者,即使他们十分有经验,能有效地将对话认识论与论述分析推而广之。本书既要展现这种观点的力量,也要警示它将造成一种新本质主义的危险,那将会使传播研究走向简化论者的道路。

此外,政治经济学为避免传播本质论提供了另一个理由。虽然该理由面临着挑战,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们即使在集中调查媒介的经济、政治以及其他物质结构的情况下,仍致力于将**媒介非中心化**(decenter the media),非中心化也就意味着将传播系统视为社会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基本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非中心化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可以从资本主义的组成——资本积累、雇佣劳动等开始探讨,将媒介置于由这些组成部分产生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框架之中。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媒

介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与教育、家庭、宗教及其他机构活动可以平行对待。这些因素在某些方面各有其独特之处，然而由于它们共同建构了资本主义，因此，无论是媒介还是其他任何机构活动在这方面都无例外可言。本章无意辩论这些因素的特征差异，而只是指出，由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将传播的研究议题置于广大的社会总体中，因此传播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在此得到特别关注 。

意识到传播研究中的本质主义问题之后，在此有必要简述一下传播的含义。我对传播概念的认识来自于一种普通关注，这种关注将社会过程及社会关系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因此***传播***的含义应该是***一种交换的社会过程，其产品或是社会关系的标志，或是它的具体表现***。[①] 广义而言，传播与社会互相建构而成。政治经济学与制度派分析研究的趋势是集中探讨传播是如何在社会中建构的，形成传播渠道形态的社会因素，以及通过这些渠道传播信息的范围。这种讨论有助于建立一个有关商业、国家以及其他结构势力如何影响传播实践的重要研究实体，再者，这也有助于将这些结构与传播实践置于资本主义、贸易以及国际分工的更宽广领域中。然面，我们同时也要清楚地意识到社会过程并非建立起传播实践便终止。传播不只是社会实践的效果表现，也非社会科学的所谓文化地形图——仅仅由经济、政治科学及社会学来解释的文化背景。[②] 正因为本质主义观点的存在，一般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尤其忽视传播及其带给世界的实质性改变，因此同等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思考传播实践如何建构社会。另外，只说政治经济是结构、制度和物质活动的王国，而传播则主宰着文化、意义及主体性，事情还远***没有***结束。政治经济和传播互相作用，自社会与文化实践中建构产生，两者都是交换过程，存有差异但都由共享的社会与文化实践决定。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本章主要谈及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体，着手考察一些推动这种研究传统发展的社会性因素。这种考察工作并非易事，因为所涉及的范畴很广，覆盖四代学者，面这些研究者分布在世界各地，有些并没有明确

---

① 这一论点来自斯密塞对传播与信息辩证关系的阐述。

② 我的观点来自梅西(1992)的著作，她将这种思想运用到空间及地理学领域。

指出自己带有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3] 然而，着眼于这种广泛的社会性因素有助于了解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详尽地叙述影响个体研究者兴趣发展的具体因素。

影响政治经济学取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报业、电子媒介及电信业从朴实的家族企业向20世纪产业界的主要产业的转变。这样的转变过程并非历史必然，也非线性的发展，一些主要媒介企业，如纽约时报公司，仍为家族所有。尽管如此，最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手段包括生产、行销、金融及会计诸方面的流程与技术已扩展到媒介业的各个方面。早期的一些政治经济学研究描述了大型传播企业的结构与实践，并且关注在如此大规模的企业中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丹尼利恩（Danielian，1939）对最大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的研究以及斯密塞（1957）对美国媒介业结构的研究都表明了此种研究趋势，后来的传播研究继承的正是这种传统（Hermen & Chomsky，1988），并且已经开始更为深入地研究跨各媒介业务部门，跨制造业，甚至涵盖了服务性行业的公司企业整合的趋势（Mattelart，1991；Schiller，1973，1984）。许多传播研究追寻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历史类型，比如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与雇佣劳动的产生；也追寻引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类型，比如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与分离了概念和实践的劳动过程的产生。造成这些追溯式传播研究的因素包括媒介业中对行会传统的坚持，媒介业商品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些是因为抗拒媒介商品化过程及来自行会工人的抵制而产生的），以及为推进市场行为而引进科技创新，等等。如今，在后福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争辩的背景下观察对媒介公司结构与过程的不同看法是很有趣的。举例来说，有些学者（Christopherson & Storper，1989）指出后福特主义意味着媒介结构的非中心化，以及媒介结构的弹性化与内容的多样化。而另外一些学者（Aksoy & Robins，1992）则反对后福特主义的论点，认为它们忽视了全球媒介集团的深层集中化趋势，这些大集团目前的实力已完全控制了资本积累的整个流程，因此无须掌控流程中的整体产业结构，以免承担过多风险。

政治经济学研究通常以考察企业的发展与广阔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关系作为探讨传播过程生产方面的开始。然面，大众消费经济的发展又推

---

③ 世代传承的一个明显范式始于达拉斯·斯密塞，他曾在伊利诺伊大学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他的学生托马斯·古贝克在伊利诺伊大学的传播研究所谋得职位，在那里他指导了珍妮特·瓦斯科关于电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瓦斯科毕业后在俄勒冈大学任职，并与研究生杰克·班克斯共事，后者毕业后在哈特福德大学开始了其学术生涯。

动政治经济学家研究价值认识的整个过程,其中包括社会关系与消费组织。他们通过分析消费的成长,探讨消费如何作为一种***结构上的***纠正来解决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又如何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反应来解决政治上的危机,而两者皆产生于北美与欧洲社会工人阶级的大众组织中(Ewen,1976)。大众报纸的发行,国家电信系统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广播电视的发展,皆混合成为造成大众消费形式的重要因素。但这给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来的,既是福音,又是挑战:一方面,大众消费与大众传播自始就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意味着传播政治经济学无须追溯早期发展的情况,只须研究分析20世纪某一主要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大众消费与大众传播的结合在概念上与政治经济学传统有着根本性差别。除了商业行为,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围绕着家庭组织展开的活动,而且也要面临使用一种新语言的挑战,该语言涉及那些以聆听、阅读、观赏以及购物方式参与积累过程的受众群。[④] 现今这些问题正被后福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辩所缠绕,因为它们对于弹性化和特殊化消费的重要意义所持的观点互相冲突(Harvey,1989)。如今政治经济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未来组织生产的趋势是将重心放在特定市场而非大众市场。而应用到消费层面上,后福特主义所持的弹性特殊化观点意味着要大大调整结构,为特定市场生产特定的或为消费者量身定做的商品。这个问题对传播研究十分重要,因为传播含义就蕴藏在生产线的每一个环节转变之中。要使生产线迎合顾客需求,将产品推销给顾客,并就顾客购买情况做出快速反应以进行新的生产决策,传播系统是至关重要的部分。最后,传播与信息交易的频道增值能力要求未来的生产过程应是制造特定的以及为顾客量身定做的媒介商品,以便迎合越来越细分化的受众市场。这种进展引导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对后福特主义的普及程度(后福特主义建构起一个新世代的转变方向吗?)做出反应,并对其广泛的意义(对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关系产生何种意义?)做出反应。

国家通过角色的扩张,成为传播的生产者、行销者、消费者以及监控者,这也促进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成长,而这种角色扩张,主要是迫于管理日益冲突的国内及国际产业的压力。我们可以从政府的情报、信息收集、宣传、广播及电信等系统的扩张中证实这一点。尤其要指出的是,军

---

④ 请再次考虑家政学提出的讽刺:家庭作为生产活动的基本单位,家务劳动作为新的积累过程已奋斗了两千年之久,这仅仅是消费吗?还是生产加消费?另外,经济活动基本循环的重组导致了"术语"上的困难。究竟分析的基本单位是什么?是阶级,性别分工的家庭,还是受众?这个"术语"上的困难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的争论,斯密塞著作所引发的关于"受众商品"的争论只是其中之一。

队、媒介、电信及电脑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几代政治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Mosco,1989a;Roach,1993a;Schiller,1969/1992;Smythe转引自Guback,Chapters 7－9,1993)。此外,国家的传播部门通过规范管理及制定政策来壮大自身,表现在调解商业间的竞争局面,对来自阶级、性别、种族以及社会运动各方面的斗争压力做出反应,并且协助资本主要势力部门制定长期政策。政治经济学重视国家在建构国家电信、广播以及信息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并评估以公众和市场为基础的经营策略(Garnham,1990;D. Schiller 1982;Smythe,1957)。早期以政治经济学取向研究传播的学者主要致力于支持为争取公共享用并控制传播系统而发起的社会运动。随后兴起的全球私有化趋势推动政治经济研究对此运动过程的工具性及结构性根源进行分析。近来,为纠正因私有化趋势而产生的不对等享用权及媒介内容变迁的市场压力,政治经济学又重新将兴趣放在开发一系列替代性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及社区的传播模式上(Murdock,1990a,1990b)。

商业与国家力量的壮大,推动了西方核心国家将其权势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从而造成动荡,也引发了政治经济研究对媒介帝国主义的议题进行辩论。这个议题在发达国家的学者那里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同时,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的学者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5] 此类研究之所以产生,原因大多在于二战结束后全球反殖民运动的迅速展开,其中一个例证就是不结盟运动。该组织由强调抛开冷战思维来制定发展策略的国家组成,它早在联合国之前就在自己的大会上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矫正全球财富分配不均的现状,随后又呼吁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目标直指媒介与信息系统中政治经济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现象。NWICO运动聚集了活跃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界的众多学者,他们或是进行基础研究(Nordenstreng & Varis,1974),或是进行政策分析(Somavia,1979,1981),还有对不结盟运动本身的评估,包括描述西方媒介如何企图阻挠与破坏此项运动(Preston等,1989)。这种将学术研究与政治活动相结合的广泛努力,展现了他们对葛兰西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理想的认同。20世纪80

---

⑤ 这方面的研究相当缜密地探讨了不同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其中具代表性的著作有席勒(1969,1993)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研究;阿特伍德与麦卡纳尼(Atwood & McAnany,1986)、伯尔特兰与福克斯·德·卡多那(Beltrán & Fox de Cardona,1980)、道夫曼与马特拉(Dorfman & Mattelart,1975)和弗雷里(Freire,1974)等对拉丁美洲的研究;斯密塞(1981)对加拿大的研究;亚伯拉罕(Ibrahim,1981)对非洲的研究;及特兰·范·丁赫(Tran van Dinh,1987)对亚洲的研究。由各国学者所共同努力完成的研究成果有莫拉那等人(1992)、诺顿斯特朗与席勒(Nordenstreng & Schiller,1979,1993)、苏斯曼与伦特(Sussmen & Lent,1991)编著的论文集。

年代由媒介全力支持的新保守主义政府拒绝实施联合国对此主题的文献说明，只是象征性地做出少许努力（UNESCO，1979）。[6] 然而，政治经济学家继续通过麦克布赖德圆桌会议强调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重要性，该组织的目标旨在反对媒介殖民现象并继续为建构这个新秩序做出贡献（Roach，1993a；Traber & Nordenstreng，1992）。

一般社会力量虽然并不全力研究政治经济学，但的确推动了它的发展，另外，有些重要的知识分子运动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每一代政治经济学家皆深深感到创建正统经济学之外的替代取向的必要性，而该替代取向正是制定媒介政策的根基所在。为了支持第2章所提到的主张，政治经济学家们拒绝接受不充分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综合学说，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取向尤其不适合对传播产业的分析，因为传播产业的大部分基本特征被新古典经济学视为例外的个案。大半个世纪以来，媒介产业高度集中在一个或少许几个大型公司手中，他们牢牢控制着媒介的生产及行销市场；更有甚者，除美国以外，大众媒介与电信网络往往由政府垄断管理。即使在美国，早期的电信及广播网络也受控于政府，而其中的邮政业务至今仍属政府拥有。再者，有关传播产业生产的产品本质是什么至今仍有异议。虽然广电新闻的播送由广告商赞助是一个典型的商品例子，但新闻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致使正统经济学取向也无法对其做出解释（举例而言，受众在获取广电新闻后，新闻并没消失）。另外，斯密塞在其发起的受众商品本质的辩论中指出，媒介产业同时操纵节目与受众市场，可问题是在传播产业中很难界定主要商品的本质，以致人们不得不考虑标准经济学取向之外的替代性取向。总之，许多评论指出，西方经济的许多领域不适合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式，而该不适应性在传播业中尤为突出。虽然传播业的解除管制（deregulate）与私有化（privatize）过程消除了有关传播业特殊性的一些争辩，但在得出结论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由于其中的不确定性过多，必须慎重对待。

为了寻求替代主流经济学之道，几代政治经济学家在正统传播政策之外开辟了替代取向。举例而言，达拉斯·斯密塞，该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一直致力于将学术分析、政策研究以及社会运动集为一体的研究事业，他于1937年进入美国农业部担任经济政策分析师，接着被派往劳工部任

[6] 反对国家主权概念的声浪不断高涨，这表现在一些主流的精英报纸的立场上，它们在当时支持回到殖民主义。举例而言，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1993），广泛流传的历史巨著《摩登时代》的作者，曾在《纽约时报》撰文："殖民主义复苏为期不远：让我们面对有些国家不适合自治的情况。"他指出"文明世界"应该恢复殖民托管的体系，来接管那些不适合自治的国家。

职，在此他与代表报业、邮政、电报业劳工利益的工会打交道。1943年他被联邦传播委员会任命为第一任首席经济学家，在此他提出了战争期间被延期的广播与电信的议题。进入学院之后，斯密塞的政策研究继续支持公共利益，诸如公共广播、公共控制卫星传播网、发展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以及全球传播系统非军事化等等。同样，年轻一代的政治经济学家，如赫伯特·席勒和卡利·诺顿斯特朗（Kaarle Nordenstreng）也为拉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传播政策的发展提供襄助。托马斯·古贝克，斯密塞的学生，则将政治经济学运用于全球电影产业，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致力于建立民主传播的顶峰时期从事有关电影产业的政策研究。威廉·梅洛迪，斯密塞的亲密同事，受制度政治经济学的影响，长期从事批判北美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并且在英国与澳大利亚成立了研究中心。他的学生罗宾·曼塞尔（Robin Mansell）在法国和英国的政策研究中心继续从事这项工作。尼古拉斯·加汉姆一直是英国传播业中的一名工会运动活跃分子，最近联合了格拉姆·默多克、彼得·戈尔丁、凯文·罗宾斯以及英国其他政治经济学家，对该国广播电视与电信系统解除管制与私有化进行批判。这些观点也同样存在于美国与加拿大许多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中，诸如奥斯卡·甘地、丹·希勒、珍妮特·瓦斯科、曼朱奈斯·潘达库尔、杰拉尔德·苏斯曼及作者本人。而新一代的学者更积极地将政治经济分析与政策研究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诸如杰克·班克斯、罗纳德·贝提格、爱琳·马奥尼、罗伯特·麦克切斯尼、柯林·罗奇及凯文·威尔逊。此外，以研究第三世界传播问题著称的决策活动家兼学者阿曼德·马特拉在20世纪80年代将其注意力转向欧洲传播政策的争鸣。以上只是一个简单的概述，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详尽分析有待下面叙述。此处重点在于指出，四代学者在一系列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引导下，努力介入对传播中的主要政策问题的研究。

除了对正统经济学及政策研究进行不懈的批判之外，政治经济学取向的发展对深层的知识关注点也做出了反应：第一代政治经济学家意欲回击在正统经济学中普遍适用的**行为主义者**（behaviorist）的典范，这种典范同样也存在于政治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之中。[⑦] 虽然行为主义仍然是

⑦ 这一观点来自我对达拉斯·斯密塞的专访（1991年12月），他对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取向在传播研究中的紧张关系感到惊讶。早在20世纪20年代读研究生时，他就曾涉及学术观点的主要分歧议题，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与文化分析曾共同批判行为主义、行为主义画地为牢，用实证观察法限制了研究范围，政治经济学与文化取向就此引发了对意义、辩证及批判等问题的研究。行为主义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对手，这可从我与赫伯特·席勒（1992年1月）、詹姆斯·哈洛伦（1992年4月）的访谈中得到证实。

当代政治经济学家的关注所在，但是，他们更加注重对各种文化研究的批判。

传播政治经济学以不赞成多种科学整合运动的知识背景为起点，反对将物理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中，其中包括反对用经验主义的方法来建立法则般的理论体系，致使其内涵成为可证伪的命题（falsifiable propositions）。这些命题可被不断发现的经验证明，以使其理论走向完善。基本上来说，似乎正是科学方法造就了物理学，那么，它应该同样可以建构一门社会的科学（Nagel，1957）。[⑧] 应用到社会科学中，这种实证调查方法被普遍称为**行为主义**（behaviorism），其研究范式遍布于心理学〔巴甫洛夫（Pavlov）与斯金纳（Skinner）的情境方法〕、社会学〔霍曼斯（Homans）对群体行为的分析〕以及政治科学〔克伊（Key）的民意研究〕。行为主义通过多种途径进入传播研究领域，其中著名的成果是拉扎斯菲尔德与坎特里尔（Lazarsfeld & Cantril）的研究，他们试图通过观察媒介化讯息所造成的行为反应创造出大众传播的社会科学。由于行为传播研究在历史上得到不少关注，所以在此不再赘述（Buxton，1994；Gitlin，1979；Morrison，1978）。我们要指出的是，第一代政治经济学者与他们的主要知识对手是何等不同。

早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从未反对进行经验性调查，[⑨] 只是与经验主义（empiricism）划清界线，反对将知识分子的活动化简为就观察到的行为制造出粗糙且可证伪的命题。他们的使命是代之以一个更广义的分析方法，它建立在理论与观察行为的辩证关系基础之上（我称之为交互式的构成）。另外，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在于将大众媒介化活动的理论置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中进行理解。政治经济学也提倡批判性研究，用批判性眼光检验经验上的发现，比如研究建立公共电视系统以推进民主化传播的必要性。经验的结果并非来自黑箱操作，也不是只忠于一派的说法，它们从理论派别之间的辩证关系中产生，面对广泛的政治利益团体发言。最后，政治经济学将研究者视为以调查方法介入社会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并想通过解释研究者与研究主题的关系，去除"随心所欲的知识分子"的印象。关于这种观点，斯密塞曾指出（1991 年 12 月访谈），它使政治经济学处于人类学中已发展成熟的解释学取向内，

⑧ 我用"似乎"二字，原因在于已有相当多的研究主体（Feyerabend，1988；Lakatos，1978；Latour，1987）提出这样的质疑：物理科学遵守科学方法的严格性，到底真诚到何种程度？

⑨ 达拉斯·斯密塞曾第一个完成了对商业电视节目的内容分析，以此来证实建立公共电视网的可行性，他的研究得到《时代》杂志的关注并得以刊登，他还筹划对流行电视节目"米老鼠俱乐部"进行内容分析，并向福特基金会提出资助申请（1991 年 12 月的访谈）。

特别是处于法兰克福学派所成就的批判文化研究中。本质上，第一代及第二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容纳了具体研究中的多样性，以便与文化研究**结盟**，共同对抗由行为主义提出的本质主义挑战。

第三代与第四代政治经济学继续与行为主义划清界线，然而，曾经为反对实证主义而与文化研究建立的亲密关系却最终破裂。的确，现代传播研究表明，过去曾结盟对抗知识正统的两派思想现已相互划清界线（"Colloquy",1995）。有关这种分歧的详情留待第7章阐述。然而，在此提及的主要目的是指出，了解当今政治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途径之一就是将其置于一个转变的背景之下，观察它是如何从与行为主义的对立（现今仍是如此），转向与文化研究分道扬镳。

当代政治经济学家格拉姆·默多克认为，文化研究主题应始于对文化的重新定义，摒弃将文化等同于体现着普遍审美观的精英实践的传统观念。文化应该与普通大众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其美学与社会原则形形色色，其中包括对既定文化与社会行为的反抗（Murdock,1989a,1989b;1992年4月访谈）。尽管文化研究已在学术上占据一席之地，它也完全是行为主义的对立面，但默多克等人对当代文化研究的趋势提出质疑。这些趋势包括：给主体性、地方性和特定性以近乎本质主义的地位；给予言论、概念活动或者说命名活动一种优先解释权；抵制那种整合一系列社会活动的解释性方案。政治经济学家认识到众多文化研究对此趋势或多或少表现出兴趣。他们一想起行为主义者对实证社会科学进行再解释的企图，就察觉到这种企图正渗透到文化研究的计划之中，相比起文化研究对整体性思想的公开反对，这是多大的讽刺。根据加汉姆（1990:1－2）的看法，这种趋势来自文学与电影的研究，进而扩展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中。对这种发展过程，他总结道：

> 它带有浪漫主义情怀，渴望摆脱决定人类物质与社会关系的枷锁，试图从被视为人类本质的异化状态走入一个无锚、无参照意义的世界，将欲望全然释放。

分歧的双方不只是政治经济学阵营言辞激烈，文化研究的支持者也一样。他们在抗拒政治经济研究取向时指责其为唯经济论、划一论，甚至是过时的马克思《资本论》的简单派生物（Baudrillad,1975）。此外，这种辩论热潮也不仅限于传播和文化研究领域，双方在任何学科范围内都展开

了交锋。[⑩]当然，除了这种相互批判的混战外，一些学者也在努力绕过这种分歧，用自己的语言去理解他派的观点（McZntyre，1992；Resnick & Wolff，1987）。人们可以在一些用文化研究观点进行的传播研究项目中注意到这一点（Berland，1992；Hall，1993）。最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开始饶有兴趣地探索不同观点之间的连结可能（Mattelart & Mattelart，1992；Murdock，1989a，1989b）。

以上的简要回顾主要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部分地是以回击一系列学术挑战来定义自己的。新古典经济学与政策研究一贯是政治经济研究的知识对立面，而且这种对立将持续下去。但是，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替代取向早已超出了经济与政策准则下的理论观点和实质立场，也超越了以行为与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的正统社会科学。传播政治经济学最初就与这一基础划清界线。如今，文化研究已代替行为主义成为当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知识参照点。[⑪] 这种学术浪潮的转变，展示出一个充满活力的舞台，在这里，许多观点沉浮于不断变化的全球政治经济学中，并且也受到其他知识浪潮的冲击。政治经济学目前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要更新自身的哲学根基，同时也应认识到自身拥有的坚固传统，从容迎接各种挑战观点。

本章将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进行回顾，它是我在1989年对北美批判学派的回顾的延续和深化（Mosco，1989a）。我意识到进行此类回顾并无理想之道，就按地区对这方面研究进行评估。另外一种分类法是按主题来划分，这虽然可以聚焦于实质内容，但容易忽略对该领域发展影响深远的地域性差别。[⑫] 为了避免把地区划分看成一种单调的分法，我也会提及专业协会及政府机构组织进行的国际性研究，它们实现了跨地区的学术交流。另外，首先要承认的是，代代相传的学术影响并没有完全

---

⑩ 历史上对语言学也出现过类似的分析：社会史学家布莱恩·帕尔默（Bryan Palmer，1990：5）在承认"语言学的发展并非完全恶性的"之后，又总结道："我所质疑的、所拒绝的、所反对的语言学转向，主要在于它使语言具体化、客观化为无法介入的论述，并将其置于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之外，进入替代人类基本结构与形态、使语言成为历史准绳的过程。"

⑪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包括几代学者及其研究。两者有时相适应，有时却不相适应，因此，如何区分两者关系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当这种不相适应造成巨大的历史差异时。举例而言，赫伯特·席勒属于传播研究的前两代政治学家，但他近来的研究（1993）却对文化研究提出挑战，并显示了在面临学术风貌的变化时可随时调整其研究立场的能力。

⑫ 举例而言：默多克（1978）在回应斯密塞的文章《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时指出，将受众作为商品进行行销的做法比较适合北美，因为那里以商业广播电视为主导形式。不管对这种交流的看法如何，它在各个地区随理论与传播实践的互相建构而表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不过，随着美国商业模式的推广，这些区域性差别可能会随之消失。有意思的是，戈尔丁与默多克（1991：20）在最近的研究中也提到受众商品的概念。

囿于地区的界限,例如,北美几位年轻学者就指出欧洲与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成果曾影响了他们的研究。

这种探讨同时也提醒我们深思米尔斯(Mills,1959:6)的告诫:"社会学的想像"需要依赖一种"捕捉历史与个人传记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关系"的敏感度。为了达到以上的目标,我的回顾是通过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人物进行访谈及讨论,将他们个人的生活、著作以及研究领域置于四代学者所建构的广阔历史背景之中而进行的。另一个强调个人意义的原因是:政治经济学取向的发展没有受到研究机构中心的资助,虽然它们本该把个别学者的力量集中起来。这造成一个不成文的法则,那就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总是以个人身份进行研究,若想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必须通过会议或研讨会的形式才行。[13]

北 美

北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始自达拉斯·斯密塞与赫伯特·席勒,这两位学者在这个领域中影响深远,并波及世界各地。[14]

达拉斯·斯密塞在美国开始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开设了第一门此类课程,引导年轻同仁及研究生从事这方面的重要研究。正如其他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一样,斯密塞接触到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力量以及相关问题,并深受影响。对他来说,这些影响主要来自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斯密塞特别指出三个转折性事件,它们使他的政治倾向由1928年投票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胡佛,转变为接受激进理念及激进政治行动。这三件事包括:观察国家警卫队与码头罢工工人之间的冲突;访问贫困的农场移民工人并据此制定了一个关于农业扩展项目的研究生计划;接触那些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反

[13] 不过也有些例外情况发生。譬如:斯密塞、瓦斯科、丹·席勒以及我本人曾汇聚坦普大学,并写作出许多重要著作(Mosco,1982;Mosco & Wasko,1983;D.Schiller,1982;Smythe,1981;Wasko,1982)。也正是此时,在瓦斯科的领导之下,"民主传播联盟"(UDC,Union for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宣布成立,该组织汇集了批判学者、媒介活动家及媒介从业人员,此外,早期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的托马斯·古贝克周围也聚集了一批研究生从事政治经济学及批判文化研究,他们包括瓦斯科、爱琳·米汉、詹尼弗·斯莱克(Jennifer Slack)及弗雷德·费耶斯(Fred Fejes),他们创办了业务通讯刊物《传播观点》。这一刊物可以说是"民主传播联盟"的先导者。

[14] 除非另有注明,本节中的资料均来自与斯密塞(1991年12月)及席勒(1992年1月)的访谈。

法西斯力量或与反法西斯力量并肩作战的人士。[15] 他总结道: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首先源自阶级斗争的实际经验,其次才是学术研究。

斯密塞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经济学,从广泛的各家学说观点中获益,当时正统经济学原则还允许这类非主流学说的存在。虽然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观点已取得一些定论,然而由于经济状况的极度恶化,马克思学说与制度经济学得到进一步重视,并成为当时研究生教育的重要课程。斯密塞所崇敬的学者奈特(M.M.Knight)是经济史与经济理论方面的权威人士,他将制度经济学家维布伦的学说以及马克思理论的美国版诠释收入经济学教材。另外,斯密塞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政府的报告与档案中,得到了有关政治经济状况的具体分析知识,其中包括政府针对19世纪90年代经济崩溃所举办的听证会记录以及交通建设文献,这些成为他撰写博士论文的有力依据。

如果说经济大萧条造就了斯密塞的思想,那么罗斯福新政则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斯密塞于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联邦政府农业部,后来又转到劳工部任职,在那里他与政治思想进步的公务员与工会分子建立了密切联系,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批判思想。斯密塞对媒介的研究就始于这份劳工部的工作,这期间他与媒介及电信业打交道,了解那里的劳工及工会活动。他观察到第一手的劳工斗争实况,当时为了支持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及西方联盟电报公司的劳工,在激进工会与偏向公司利益的工会之间展开了斗争。这些工作经验使他接触到传播产业中劳动过程变化的细节,比如那些广播与电话公司的接线员开始逐渐感到新科技和非技能化的挑战。

1943年斯密塞离开了劳工部,随后成为联邦传播委员会(FCC,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的首任经济学家。他一到委员会就提出了劳工关系的问题,并为费率听证会提供咨询。他也参与了无线电波频谱分配中最繁忙阶段的工作,因为当时业界强烈要求委员会处理无线电执照问题和调频(FM)频道分配问题,更重要的是电视频道分配问题迫在眉睫。斯密塞的这些经验为他未来的研究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他发现官方机构被商业利益所驱动,总是维护广播电视的私有权益。[16]

---

[15] 他支持反佛朗哥势力的立场使他成为美国政府认为的那种"草率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这一"标签"使斯密塞在50年代的研究工作受到限制。

[16] 在倾向于市场导向的委员影响下,联邦传播委员会投票保护最大的调幅(AM)广播电台业主的利益(他们"清晰的频道"可以在夜间时段覆盖半个美国),以对抗来自调频及公共广播事业倡导者的挑战。还有,该委员会在分配第一批电视频道时只限于商业利益集团,它们大多也正是广播事业的掌权者。

1948年斯密塞离开了联邦传播委员会，加入了由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创办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该研究所开设了第一个传播博士班，使许多学者在此相遇并为传播研究留下了各自的印迹。这些人包括传播心理学家查尔斯·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后来的乔治·格伯纳，短期访问学者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以及赫伯特·席勒。当时正处在冷战氛围中，传播研究对日益壮大的大众传媒极为敏感，斯密塞于是小心谨慎地开设了一门传播经济学的课程，之后才推出首门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斯密塞在这段时间里的主要贡献包括对建立公共广播电视必要性的研究、出版第一本关于电子媒介的政治经济学专著(1957)，以及着手对受众商品进行初期研究。[17]

然而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影响并未因为参议员本人的失势而消失，反而使美国大学内的学术气氛更受压抑。于是斯密塞决定返回他的故乡——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在此他进入里贾纳大学并开设传播研究的课程。斯密塞曾在伊利诺伊大学与赫伯特·席勒相识，当他离开后，席勒从经济系转入传播研究所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斯密塞的大弟子托马斯·古贝克在这里完成了对国际电影产业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并最终受聘于研究所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斯密塞则在里贾纳大学待了十年，与威廉·利温特(William Livant)共事，并发展了关于"受众为大众媒介的主要商品"的理论。1974年斯密塞进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西蒙弗雷泽大学，在此他与制度政治经济学者威廉·梅洛迪共事，集中精力研究电信政策(以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反托拉斯法案为主要研究对象)，写作受众商品的论文，并撰写他主要的学术论著《依附之路》(1981)，该书用辩证分析法揭示了加拿大依附发展问题中的垄断资本现象。在此期间，斯密塞四处访问，研究智利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联合阵线政府的改革以及东欧、英国、日本、中国的传播政策与实践。在西蒙弗雷泽大学，斯密塞的政治经济学与公共政策研究影响了一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学者，除了梅洛迪之外，还有罗伯特·巴比、潘达库尔、威廉·雷斯(William Leiss)、苏特·加利(Sut Jhally)、曼塞尔以及罗汉·萨曼拉奇瓦(Rohan Samarajiwa)。

斯密塞于1980年离开西蒙弗雷泽大学，进入坦普大学任教，在此他与珍妮特·瓦斯科(伊利诺伊大学托马斯·古贝克教授的学生)、丹·席勒及

[17] 斯密塞回忆道，他第一次发展此观点是在瓦萨尔学院的消费者联盟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中，那时是1951年。

笔者本人共事，其中爱琳·马奥尼、西尔维亚·肖拉(Sylvia Sholar)和罗莎琳德·布雷斯纳汉(Rosalind Bresneham)这三位学生也参加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经历了一系列访问日程安排之后，斯密塞最后回到了西蒙弗雷泽大学，并在那里逝世(1992年)。我们编写了一本纪念文集(Wasko等，1993)，书中见证了斯密塞对全世界四代政治经济学家的影响。

如斯密塞一样，赫伯特·席勒将其知识与政治态度归因于他对美国及全球政治经济形势转变的体验。席勒比斯密塞晚了半个世纪，他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进入高中及大学读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军，随后他加入纽约市立学院任教，为纽约市的工人阶级免费开设课程，他使课堂充满了政治气氛。尽管他的兴趣是在文学方面，但他最终决定研究经济学，因为这更可能找到工作，这是大萧条迫使他做出的选择。同许多经历了这场经济灾难的人一样，席勒深深觉察到西方政治经济学中必有根本性的错误。

另外，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在美军驻德托管政府工作的经验也对席勒产生了极大影响。后一种经验尤为重要，因为这让他观察到有关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将一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强行转变的第一手资料。[18]在自己所受的知识影响方面，席勒则强调美国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对该国经济结构及大萧条成因所做的研究。他认为这些翔实的政治经济研究，使他能够精确而又系统地体察到商业势力干涉政府的能力及它的坚固结构。

战争、谋生以及他本身对学术界感到的许多不确定性，使席勒的学术生涯推迟了。[19]十年间他作为短期讲师超负荷地工作。1960年，他以一篇关于战后救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获得纽约大学博士学位。随后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伊利诺伊大学的经济与商业研究所，在此他将兴趣投入到经济资源分配的研究上，并最终研究起作为自然资源的无线电波频谱的分配状况。虽然席勒在该校期间一直属于经济与商业研究

---

[18] 在此有必要摘引他的一段回忆："在德国，我见证了经济力量如何作为反共产主义的副产品而复活。我看到那些本应该是清除纳粹势力的举措全告失败。我看到德国工业重新建立卡特尔组织。最有印象的是，我看到每一种公开的障碍都是针对反对这些政策的左派政党的。我发现东西德国的分割是为了阻止西方社会转型的机会出现。以上这些政策的施行都带有相当高超的技巧与手腕。我个人相当佩服那些实施者。有证据显示，这些事情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由高层人物的阶级意识所引导的。"

[19] 席勒虽然因为"对商业有敌意"而受到指摘，但他仍于194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不过，他对该校的学术精英作风印象欠佳："在这里我体会到研究生教育完全不合适，甚至当时的教科书也离谱得让人惊讶不已，似乎只是保守派捏造出的一种脱水的、脱离现实的东西，更别提他们的理论了。"

所，但他也引起了传播研究所的注意，他与斯密塞相识并在后者离任之后接下了政治经济学课程。1969年出版的席勒专著《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得到了广泛关注，甚至引起了伊利诺伊大学保守势力的反攻，因为他们不喜欢席勒在书中阐述的观点及他个人反对越战的坚决立场。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成立一个非主流学院的意向的吸引，席勒于1970年离开了伊利诺伊。

在圣地亚哥期间，席勒完成了一系列著作来定义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些著作对世界范围的批判观点的兴起影响深远，它们一直将传播研究置于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之下。他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1973)首次提出对信息社会观念的强烈批判。他以大量文献说明了诸如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读者文摘》、《国家地理杂志》等组织是如何拥有广泛的政治与文化势力的，信息与文化产业中的企业合并与海外扩张是如何进行的。[20]他随后的著作《传播与文化主宰》(1976)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并考察了智利阿连德政府努力建立新型传播体制的情形。他与诺顿斯特期合编的《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1979)，是本专门讨论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中心论题的论文集。[21]

后来，席勒在他的两本书《天晓得》(1981)与《信息与经济危机》(1984)中又回到了信息控制的问题上。这两本书考察了信息与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运作的重大意义，第二本书尤其指出这个系统在解决资本积累危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在《文化，有限公司》(1989)一书中，席勒重新关注文化产业，提出学术规范的新趋势，特别是向文化研究的转变。[22] 他与小威廉·普里斯顿(William Preston Jr.)和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Herman)合作写成的《希望与愚昧》(1989)一书，记载了信息新秩序的兴衰过程。另外，他还与诺顿斯特朗第二次合作编著了《超越国家主权》(1993)。这两本书使他再次回到国际传播业转型的问题上，这是他长期的兴趣所在。席勒还与哈米德·莫拉那和乔治·格伯纳合作，编辑了一本由研究国际媒介的学者撰写

---

[20] 这本书出版的同年，丹尼尔·贝尔也出版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这本书为关于"信息社会"的辩论设定了议程。《当代心理学》杂志民意调查表明，席勒的著作备受读者欢迎，于是该刊编辑写了一个席勒认为相当具有煽动性的标题："民意调查是为支持现状而工作的娼妓。"

[21] 这本书相当值得注意，因为它是阿布莱克斯(Ablex)出版公司出版的第一本传播学论文集。该公司由梅尔文·沃格特(Melvin Voigt)任总编，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出版了许多有关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著作。

[22] 席勒解释说："这本书的主题并非只是学术界里的小争辩。"他对文化产业的分析需要他考虑到以下两种错误观点：一是认为文化的机制已不复存在；二是认为我们可以控制文化机制，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做出反应并超越这种机制。

的论文集,对海湾战争提出了全球性观点。[23]

席勒后来是活动家式学者的模范。除了以多种主要语言出版有关其研究成果的论著以外,他还在一些地区和国家以及世界性组织中发表有关文化与信息论题的演讲。他的这番努力是国际上呼吁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他曾是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的领袖人物,这个学术组织对国际研究取向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表现出强烈的认同。虽然由于新保守主义的极力干扰,原本席勒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成立非主流学院的愿望没能实现,但席勒向那里的学生传达了他的思想,这也影响到他同代及后代学者的传播研究工作。[24]

斯密塞与席勒一直为后代政治经济学家提供知识与政治的灵感,本节接下来将要指出他们研究成果的一些主题。政治经济学家一直将学科的一般兴趣建立在历史研究之上,这就列出一个中心议题,即资本主义进程中传播、信息及文化的估价问题。加利(1990)对广告、受众以及文化的理论观点做出批判性评估,从而延伸了斯密塞(1977)关于受众商品的主要观点。丹·席勒(1988)关注对信息的不同角度的思考,其中就包含估价过程。

专注历史研究的有斯图亚特·埃温(Stuart Ewen)的《意识的指导者》(1976),这本书详尽记载了广告业进程中大众消费的社会结构。此书再加上他的近作《消费影像》(1988),与布里弗曼(1974)对20世纪工人的社会结构分析享有同等重要的学术地位。两者都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大众生产与大众消费相互构成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其他的相关著作有丹·席勒(1981)和伊莉莎白·艾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1979)的论著,他们提出报业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尤其强调先建构商业用户市场继而转向大众消费市场的过程,这对化解19世纪后二十五年由于生产过剩的危机而造成的经济衰退与萧条是至关重要的。

---

[23] 《希望与愚昧》一书记载了以美国为首的保守势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所取得的胜利。这本书起先由教科文组织牵头出版,当时该组织十分支持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主张,但是在成稿之际,教科文组织正试图说服美国和英国重返该组织,因此拒绝出版此书,后来该书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但申明此书内容与教科文组织无关。

据诺顿斯特朗(1993:253)所说,这并不是教科文组织首次采取"反知识分子的压抑行动"。早在1973年该组织就将斯密塞排除在一组旨在制定教科文组织传播研究计划的专家名单之外,这发生在斯密塞发表了两篇批判国际主流传播政策及其对新科技的迷恋态度的文章之后。此外,教科文组织还拒绝把一篇原本委托席勒撰写的文章收入到1982年的一本文集中。最后,诺顿斯特朗指出教科文组织也未能遵守诺言,推行能深化其改革的大会决议《大众媒介宣言》。

[24] 这种巨大的影响可见诸席勒的纪念文集(Becker等,1986)。然而这本书也不能全面说明席勒的影响力,因为就在此书出版后,席勒仍继续其多产的研究写作生涯。

斯密塞的学生对国际电影产业发展的研究贡献卓著,托马斯·古贝克在此领域中居于领先地位。他在1969年完成的著作回顾了该产业自1940年以来的历史,其续作又研究了影片的商品化过程、电影产业资本分配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劳动的影响以及电影产业在广泛的资本主义服务经济中的作用(1987,1989,1991,以及1992年10月的访谈)。[㉓] 古贝克的学生珍妮特·瓦斯科(1982)继续此类研究并著书详述了电影产业与提供主要资金的金融机构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最近她开始关注新技术对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以及国际视听产业的整合趋势(Wasko,1994)。斯密塞的另一位学生潘达库尔(1990a)则记载了美国电影产业在加拿大影院确立霸权的历史,他们对电影产业历史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对生产与行销之间的辩证关系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在一切产业中,尤其在媒介产业中,这种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媒介产品很容易被复制,而且媒介公司,尤其是电影公司之所以成功,除了少数例外,都依赖于资本循环中对生产与行销这两个步骤的牢牢掌握。

广播电视与电信业的政治经济学历史研究非常关注政治势力中心与媒介势力中心的关系,这方面包括赫伯特·席勒对全球军事化电子媒介系统发展的研究(1969/1992,1981)以及斯密塞(1981)对遍布加拿大出版业、广播电视业和电信业的依附现象的演变的研究。后代学者对这一主题加以深化并重新研究,他们特别强调要注意政府机构与企业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包括对美国广播电视业的研究(Kellner,1990;Winston,1986),对美国电信业的研究(McChesney,1993;1982)以及对加拿大广播电视业(Raboy,1990)和电信业历史的研究(Babe,1990;Martin,1991)。在此,丹·席勒的研究特别重要,因为它指出,一种滋生于电信业的新势力正在发展之中,那就是组织严谨的大型企业,它们将推动产业权力结构的重大转变。雷博伊(Raboy)的著作对公共广播制度必然有利于政治民主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以大量文献说明了国家对公共系统的控制压抑了社区与市民社团的呼声。新一代学者继续研究美国(McChesney,1973)与加拿大(Coulter,1992)传播系统中企业与国家权力的历史演变。近来更有趣的研究趋势是从草根历史的角度考察传播权力,以凸显劳工组织与社会运动组织的地位。举例而言,蒙哥马利(Montgomery,1989)研究横跨政治领域的美国媒介改革运动的近代历史,麦克切斯尼(1992a)则研究建立工人广播电台的斗争史,温赛克(Winseck,1993)关注

㉓ 古贝克(1993)近来将斯密塞的研究成果编著成文集,有些文章还是首次刊登。

的是发达工业社会(尤其是加拿大)电信政策制定过程中劳动者介入的历史。

北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实质性主题——也是政治经济学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产权集中化。这包括公司的纵向整合使其在特定工业部门中控制越来越多的生产线,另外就是传播产业内部或外部的公司跨部门横向整合。将印刷业中的产权问题加以系统化研究的首推赫尔曼和乔姆斯基(Herman & Chomsky)的《制造共识》(1988)。[26] 他们观察了报业从有利于政治经济核心势力与组织把关人的角度对国际新闻进行的筛选编排,并以"大众媒介规模、产权、营利额的方向"为起点(p.3)开始研究。更明确地说,他们提供了美国大型媒介公司的财务资料、控制这些公司的集团财力情况以及连结公司董事会外来成员与非媒介公司的隶属关系。相关的把关权力包括媒介与广告业的关系、公司和政府调动新闻来源使其提供"亲官方"的言论以及反击媒介负面报道的能力。另一个新闻事业的研究者是贝迪凯恩(Bagdikian,1992),他提供了有关媒介集中化的类似分析,他认为,媒介集中化(包括新闻与娱乐业的不断整合越势)渐渐淡化了信息与广告内容的区别。[27] 虽然加拿大的研究常以美国媒介集中化对加拿大媒介的冲击为重点,但克莱蒙特(Clement,1977)为分析国内媒介集中体系做了大量基础研究,而汉尼根(Hannigan,1991)则将研究范围拓展到国内与国际媒介势力之间的整合问题。[28]

北美在电信业方面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特别关注商业集中化的问题。杜波夫(DuBoff,1984)指出,由于政府的支持,首先在电报业中产生了垄断,随着电话业的兴起(Babe,1990;Danielian,1939),电磁频谱的分配(Smythe & Melody,1985)以及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Mosco,1982;Mosco & Wasko,1988;Schiller,1982),这种垄断扩展到了各个行业。

电信传播研究如今面临的一大挑战是,目前市场向更多服务供应商开放,而不仅仅限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与加拿大的贝尔公司,我们应该如何思考这种变迁?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有三种不同的回应:一是考察产业结构的变迁,特别留意它与早期北美电信企业联盟的体制有何不同。

---

[26] 这本书非常重要,因为它细致入微地定义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的模式。他们创作了大量有关媒介的著作,而乔姆斯基则是世界知名学者与媒介活动家,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国家电影委员会曾以乔姆斯基丰富的生平事迹为题材,将此书的理念拍成电影和录像带,片名也叫《制造共识》。赫尔曼除了写作有关媒介的书籍外,同时也广泛地发表了有关企业集中化的文章。他还为其协助创办的评论性杂志《Z》与《时代的谎言》撰写文章。

[27] 贝迪凯恩的作品相当重要,因为它反映了职业记者在商业化冲击专业规范过程中的亲身经历,此类由职业作者写成的书籍不断出版。斯夸尔斯(Squires,1993)则提供了另一个亲身经历的相关著作。

[28] 同样的研究也见麦格德(Magder,1989)。

其次,政治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已从服务供应商转向商业用户与政府用户,指出两种势力的高度集中意味着无论存在何种竞争,电信事业的管理规则都将有利于他们达到高效而又符合成本效益的经营目的。最后,政治经济学家开始考察因结构变迁而出现的论述上的变化,具体地说,就是揭示统治性修辞发生变化的根源在于,管制下的垄断体制提供的“公共”服务已经转换到由市场竞争者提供的“以成本为基础”的服务了(Mosco,1989a;K.Wilson,1992)。

媒介集中化研究所面临的一项日益艰巨的任务就是考察媒介产业的逐步整合如何跨越了传统产业和技术分工的界限。当研究的对象是较为分离的实体如报业、广播电视、电影业及电信事业时,集中化现象是较易觉察的,但现今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例如时代—华纳公司就介入了以上的每一个事业。事实上,现今关于国际电子媒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owning,1990;Pendakur,1990a;Schiller,1989;Wasko,1994)已指出电影与录像带公司均在使用新科技来推动彼此整合的趋势,面这些公司试图从原来单一的产业生产扩展为多元化媒介商品的生产。整合是**结构转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这一较普遍过程中的一部分,政治经济学家正密切注意着它的走向,比如,通过**整合**(integration),像索尼、贝塔斯曼等大集团延伸了它们的直接产权控制;另外,一些大公司通过**分裂**(division)卖掉了它们的某些部门,而一些新型小公司填补了市场空白。后一种发展情况引起了学者的高度重视,他们从这种结构转型中读解出了后福特主义经济的兴起。他们认为大集团的权力被较小的公司所减弱,大公司也对自身进行革新以便不受阻于拖后腿的官僚作风。尽管已得出上述结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仍然要论述大型公司如何通过非中心化运作来赢利,尤其是如何将风险转移到小公司身上。因此,反对集中化趋势的结果却强化了大公司的地位(Mosco,1992)。瓦斯科(1984)是第一位解释这种现象对于我们思考并检测传播市场及媒介集中化的内在意义的学者。像IBM和希尔百货此类长期垄断市场的大公司的结构重组,究竟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质变革到所谓的后福特主义,或只是反映出资本主义体系另一轮回的发展,只是系统本身的动力与自我转换功能的推动,政治经济学内部会有相当长时间的争论。最近,麦克切斯尼(1992b)指出,研究媒介控制与产权的政治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最实质性的挑战也许是美国政治文化背景中正缺乏关于此议题的辩论。他进一步解释了此议题“不归属”一般性讨论的原因。缺乏广泛的文化背景的讨论使集中化议题的研究者根本无法掌握媒介的实际运作。

北美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另一个中心目标是:了解国家或政府与传播业的关系。其中的挑战是,如何在不偏向两个极端观点的情况下解释国家的作用。这两个极端观点一个认为国家是多元化社会压力所导致的独立仲裁者,另一个认为国家是资本的可靠武器及可使唤的工具。斯密塞早期的政治经济学与政策研究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他认识到国家始终处于调和各主要企业势力的利益与充当公共服务机构工具的矛盾状态之中,这个主题在丹尼利恩对AT&T公司的研究中(1939)已经提出过。[㉙]

席勒的著作《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1969/1992)指出,国家是传播服务的主要使用者。这一观点极具意义,因为大多数传播文献只是将国家定位于管制者和政策制定者。政治传播学的文献的确探讨过传播在政治选举及宣传中的作用,然而,除了赫尔曼与乔姆斯基的著作独创性地视宣传功能为政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之外,政治传播学研究忽略了对传播的分析,它或者只是就一个事件(如竞选活动)来谈宣传的作用,或者忽视了对社会机制做详细说明,只是把宣传当作是由社会机制交互构成的修辞倾向。经济学家出身的席勒开始视传播为一种资源,借这种洞察力,他进而开辟了一个以前被传播研究忽略了的分析领域: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尤其是军事部门,获得从军事采购合同中获利的主要集团巨头的资助,试图控制大量的无线电波频段,这些频段正是电子传播的主要工具。政府不仅是主要商业利益巨头获取传播资源的仲裁者,而且也是资源分配过程的操作者,政府确保自己拥有半数的频段,另外半数则分给军事或情报部门。席勒通过对频段及通讯卫星公司的分析,总结出国家作为一整套相互连结的结构,嵌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链条中,以致使它不仅仅是国家,更是***资本家的国家***。后代学者分别从军事(Mosco,1982:Chap.2;1989a:Chap.6;1993a)和商业企业(D.Schiller,1982)两方而阐述了国家的这种角色。

国家与资本的整合发展是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它引发了有关所谓国家相对自主性的一系列话题(Jessop,1990)。该议题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反映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尽管国家扮演成代表广大社会或公共利益的独立仲裁者,它依然得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因为对这些利益的看法存在争议,而且反对不受限制的积累的

㉙ 对这种矛盾状态的描述特别见诸斯密塞为支持公共广播制度及国有卫星通讯系统而撰写的著作中。

呼声不断高涨，因此国家无法简单地将积累等同于公共利益。[③] 从这一角度来看，马洪(Mahon)的研究十分有意义。她提出了一个新鲜的议题，她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将国家理论运用到对事物的管制中，其中包括对传播的管制。她认为，了解国家的起点在于准确界定国家"偏袒"的生产机制，而这种公认的复杂过程是

> 通过国家内部不平等结构的再现而产生的。这种结构反映了阶级内部及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通过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各种社会势力的利益以一种特殊方式结合起来——以主宰阶级的寡头霸权的长期政治利益为中心结合起来。(Mahon，1980：154)

马洪(1980：160)以加拿大广播电视与电信委员会为例指出，国家规范管理机构可被视为这种不平等结构再现的"特殊案例"：

> 管理机构的设立是为了削弱对霸权的威胁，而国家政治与行政机器的一般功能无法轻易遇到这种威胁，国家再现了一个"政治中立"的行政框架来进行谈判，达成这种特殊的妥协。

尽管如此，她在结论中提到，这种妥协只是试探性的，事实上，挑战力量所屈从的是所谓的"国家利益"，而这种形式的妥协更适合国家机器的运作。

北美的传播学者正着手从政治经济学观点对这些议题进行研究。举例来说，凯尔纳(Kellner，1990)考察了美国的电视业，认为其中包含备受冲突的霸权，这既体现在新闻与娱乐节目的内容中，*同时也*体现在国家管理和政策制定的体系中。他认为，新保守派以积累及统治合法性为由，成功地重新界定了国家在传播业中的作用。为达到目的，他们完全取消了支持公共视听领域的复杂的政策过程，代之以国家管理市场竞争的政策。虽然政治上初见成效，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因为根本的危机依旧存在。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自我矛盾在电信政策(Calabrese & Jung，1992；Mosco，1993b)、专利权(Bettig，1992)以及传播信息新技术方面(Gandy，

③ 主流立场近来不断关注国家利益的确认问题。罗伯特·瑞奇(Robert Reich，1991)提出了一个煽动性的问题："我们是'谁'?"这一问题得到广泛重视。他认为企业与政府之间相互勾结，使国家政策的界定问题难上加难。举例而言，美国政府是否依然保持其偏袒好莱坞的电影政策？这些政策的恩泽正施于诸如索尼公司及默多克媒介帝国等大集团身上。有意思的是，这种问题使我们反问道："这又有什么新鲜的?"阶级分化的社会早已不断面对着"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这不只是认同的问题，而是物质的得与失的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仍是人们可以共享国家的认同，但却不可以共享社会的财富与权力。***

1993)都一再被发现。卡拉布莱斯和尤恩开辟了电信业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天地,他们探讨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如何作用于农村居民及其生活中,并对围绕农民权利而展开的社会运动做出评估。这种研究取向很有趣地将议题置入一种重建乡村乌托邦的神话气氛,带给人一种"电子茅舍"的崭新形象。甘地的研究吸纳了安东尼·吉登斯(Antony Giddens)的观点,指出政治经济学中唯生产论的偏见,提出要容纳广阔的社会控制过程。在研究过程中,甘地对包括贝尼格(1986)在内的学者的著作做了政治性探讨,他指出,那些掌握了新技术的人也就有能力把个人信息与个人身份商品化,并能够进行控制与再造。

北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尤其注重把对国家与企业的分析置于国际舞台的背景下考察,这类研究主要从斯密塞与席勒创建的学术基础上发展起来,同时也借鉴了西欧及拉美学者的一些观点。关于后者我们将在下一节介绍。北美的研究大部分专注于了解全球权力结构如何介入媒体及电信业,产生什么影响,尤其是对全球贫穷国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文献记录中有一些外围讨论,主要是同传播发展论者争辩。发展论者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襄助发展的政策旗帜下扩张其媒介与信息机构的权力提供学术庇护。同时还有内部争论,尤其是关于媒介制作人、媒介讯息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展开的争议(Fejes,1981,Schiller,1993)。这些争议引发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媒介帝国主义的构成;它与一般霸权过程的关系;讯息控制的延伸和意义以及受众的接受活动与接受权力。

国际研究中一个更具有意义的议题就是战后传播业正由美国独霸转向世界性的传播秩序,它由跨国企业领导,受到它们各自政府的支持,在各大洲或全球范围内日益走向联合。[3] 这导致以下方面的研究:跨国媒介(Wasko,1994)与信息业(Dan Schiller,1994)的特征;贸易协定的要求(Mosco,1990b;Samerajiwa,1993);以及国际组织特征的转变(Mahoney,1988)。它们为处理结构转型造成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手段(另见Comor,1994)。马奥尼(Mahoney)提出,当今国家与跨国企业面临的难题是:它们的谋划者们需要协调全球策略与全球市场,但同时又无法创造出一个广大公民所能依靠的政治结构,也就是说,在没有全球政府的情况下,全球政策如何经营。

国际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和政府介人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有

---

[3] 赫伯特·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的修订版中(1992)特别回顾了国际传播的变迁,并将此议题视为该书的核心内容。

关。曾任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琳·罗奇(1993a,她也是阿曼德·马特拉的学生),运用批判的历史取向,结合阶级、民族、性别等方面来更新并拓展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辩论视野。她指出,新秩序运动的失败原因主要是教科文组织屈服于西方国家的压力。麦克菲尔(McPhail,1987)从加拿大政府的角度,对整个事件作了政治经济学概述,他发现英美两国施加的压力使联合国不得不处于一个更保守的位置。莫拉那(1997)关于中东、伦特(1985,1990)关于亚洲、阿特伍德与麦卡纳尼(1986)关于拉丁美洲的研究也都在北美学术基础和外部地区经验之间架设了桥梁,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

北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一直注意将全球传播议题置于变化着的国际分工背景下,苏斯曼和伦特(1991)的研究在该领域占有领先地位。他们召集国际上的有关学者,开始以批判的态度考察将媒介成长和国家发展联系起来的传统的传播发展模式,结果他们发现了这种模式及其修正模式(Rogers,1976)的错误所在:这些模式默认现存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该体系把发展界定为首先满足西方媒介信息公司、它们各自的政府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少数阶级的需求,一旦实施发展政策,即刻造成利益的不平等分配现象。所谓"发展"的有效目的,不过是要促成国际分工,以便支持跨国企业的灵活运作及控制能力,使资本、原材料及劳动力的成本效益最大化。完成这一过程的关键要靠传播与信息技术,因为它们提供了克服时空限制的手段,从面能顺畅地管理国际运作过程,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市场条件及时做出反应。另外,传播与信息技术还提供终端产品(传播信息内容与工具)和使企业最终产量增值的手段(特别参见Clement,1990)。除此之外,伦特和苏斯曼还发现,推动国际分工过程势必造成国家与周边势力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但更多的攻击是来自一些阶级与社会运动,它们直接承受着"发展"过程中的不良社会后果与经济后果。

虽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性主题专注于研究传播如何在权力体系内运作,但是研究者们并没有忽略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通过抵制、反抗以及努力,来创建反霸权的非主流结构,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数都考虑到阶级、性别及种族的社会关系,以便了解反抗的动力以及它与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的联系。有的研究以社会阶级作为重点,专注了解媒介及信息产业内有组织的工人反抗运动以及它与广大工人阶级的需求和关注点的关系所在(Douglas,1986;Lonidier,1992;Mosco & Wasko,1983;Waterman,1992;Winseck,1993)。

这种研究思路十分重要，因为它扫除了传播研究中的一个主要盲点。一般传播研究倾向于将传播主体视为***消费者***，将主体行动视为***休闲***活动，以区别于劳动者和工作活动。除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外，很少人会关注大众媒介与电信业中的劳动者，关注对大众媒介劳动者的一般性描述以及劳动者问题的报告。[32] 这使他们失去了了解劳动者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何等重要角色的机会，[33] 乃至形成一种误解，以为组织劳动者与工人阶级的抵抗运动是一种过时的徒劳。[34]

对社会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可以从性别入手，考察女性以何种特定方式对父权式传播信息结构做出反应。其中一个重要实例就是马了(Martin，1991)对电信业中"妇女的声音"所做的研究。她描绘了女性作为电话接线员介人工人队伍以及以电话使用者身份介入广泛的传播网络之后所造成的社会关系的改变。马丁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女性声音的产生经历了复杂的过程，涉及了分别存在于工业生产部门与家庭消费生活中的权力、斗争与反抗。(另见 Moyal，1989；Steeves，1987)

除了阶级与性别，北美政治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传播研究中的种族问题。一个较有意义的最新实例是研究历史上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考斯比秀(*The Cosby Show*)》中反映的种族与社会阶级关系的问题。在《启蒙的种族主义》(1992)一书中，加利和李维斯(Jhally & Lewis)回顾了有关电视娱乐片中描述种族形象的历史文献，评估对《考斯比秀》节目的各种反馈意见，然后分析说，这个节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节目中所描写的"安逸和富裕"容易被白人观众接受，尽管剧中全部演员都是黑人。虽然加利和李维斯对节目的文化背景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但他们也没有放弃对节目的生产与市场模式的分析，观察这种模式是如何限制节目中引人注目的少数民族形象的质与量。

对社会运动的研究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媒介与传播业中的反抗运动。吉特林(Gitlin，1980)的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他用反越战运动作实例，展现出在主要的政治斗争中媒介与社会力量如何互相作用。虽然大众媒介的矛盾本质为反对派留出了抗争余地，但也使反对派陷入了由他们的对手所控制的社会实践与论证实践中。简要地说，当反对派的领导者出现在

---

[32] 请见皮尤特(Puette，1992)对信息与娱乐媒介业中劳动者生活的回顾。

[33] 肖尔(Schor，1992)发现，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同，发达工业国家的平均工作时间一直在增加。

[34] 请见卢克(Luke，1989)提供的一个证明阶级与工人运动失败的典型案例。尽管20世纪80年代工人运动势力的衰败是不容争辩的事实(遭到新保守主义政府的疯狂攻击)，但这并不表明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已永远地消失。

镜头前时,他们冒着失去惟一的力量源泉——草根性的风险。布鲁克(Bruck,1992)考察了加拿大反对运动的报道内容,将此类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展示了媒介如何对反对派运动的社会实践和论证实践进行再处理、再组装及再配置,将运动重新建构在论证的活动中。而罗奇(1993b)特别以艾斯勒(Eisler)与科林斯(Collins)的女权主义—和平研究为例,分析这类研究是如何影响当代社会斗争的。

最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政治经济学家一直在考察各种围绕媒介自身的转变问题而组织的社会运动(Wasko & Mosco,1992)。海特和温斯坦(Haight & Weinstein,1981)为这方面研究提出了重要的分析基础。他们指出了媒介革新运动中的主要矛盾,这类运动同以市场为导向的广播电视政策对抗,以此来向电视意识形态提出挑战。海特与温斯坦及其他研究媒介革新运动的学者没有预见到20世纪80年代是属于保守派以及宗教基要主义者的,这些团体的攻击目标是媒介节目与媒介政策。关于这些过程与趋势,蒙哥马利(1989)在《黄金时段:众矢之的》中有详细记载。

英国与欧洲

从某种角度说,描绘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取向的发展要比欧洲来得容易。原因之一在于,在北美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可轻易确认斯密塞和席勒的卓著贡献,可以看到他们的研究如何深深地影响了第二、第三代遍布全球各地的政治经济学者。然而在欧洲,虽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知识、政策以及运动的研究非常有影响力,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中并没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詹姆斯·哈洛伦是英国传播研究发展的领导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他一直领导着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最近,正是在那儿,彼得·戈尔丁与格拉姆·默多克这两位学者的研究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设定了日程安排。另外,哈洛伦还任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主席近二十年,影响了全世界的传播研究的发展。[⑤] 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是一个专业组织,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其奋斗目标。尽管如此,哈洛伦不愿被归类为政治经济学者,他强调自己以及研究中心的研究属于批判社会学与社会心

⑤ 请见哈梅林克和里那(Hamelink & Linné,1992)献给哈洛伦的文集。

理学的研究范畴(1992年4月访谈)。他解释道:当初研究中心成立的宗旨只是为了回应1961年内政部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关心,协助评估电视对此问题的影响。虽然他承认政治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但其主要学术及研究兴趣仍在批判社会学的研究上。[36]哈洛伦将自己的研究取向与拉扎斯菲尔德、克莱珀(Klapper)、赖特(Wright)和卡茨(Katz)等人区分开,认为这些人的实证主义研究过于看重资料的收集,而轻视"提出正确的问题"。[37]

在哈洛伦任职期间,研究中心连续出版研究报告,其中默多克与戈尔丁的著作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最大。他们三人都认为,绝大部分有关社会问题的研究都是采用了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的观点。虽然问题涉及广泛,但重点集中在青年、家庭与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上,包括少数民族的社会关注与传播要求。事实上,默多克发现该研究中心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几乎没有获得任何资助,而多数资助都拨给了菲力普·哈利斯(Philip Harris)的新闻通讯社研究、彼得·哈特曼(Peter Hartmann)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研究以及默多克的广告业研究。当然,这些研究也结合了其他的研究取向一并进行,所有这些工作都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自1984年以后,该中心的研究报告都以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为主(centre,1991;1992年4月采访哈洛伦、默多克和戈尔了),研究中心的研究者所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几乎都是在没有资助的情况下完成的。据此,戈尔丁总结说:比起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与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领导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实在谈不上有所谓的莱斯特政治经济学派,它甚至比不上杰伊·布卢姆勒(Jay Blumler)和丹尼斯·麦奎尔(Dennis McQuail)在里兹大学所形成的政治传播研究学派。为建构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模型,一群个体研究者结合在一起制定了一个制度化的研究计划,他们包括默多克、戈尔丁、菲力普·艾略特(Philip Elliott)以及一些零散加入的学者。[38] 他们一致力求发展批判社

---

[36] 该研究中心1984年的计划书确认以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作为发展导向:"自中心创办以来,我们就认为大众传播是一个引人关注的研究领域,而非一门学科,因此好多门学科都可以用来了解这个领域。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尤其是前者,是本中心最主要的研究取向,但这并非意味着其他学科,诸如历史学、经济学、政治科学、法学和语言学的潜在贡献不被认可。"(centre,1984:8)

[37] 他在1981年的文章中直接批判实证主义:"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批判这种立场(实证主义)的首要宗旨,即所谓'科学'完全或主要以方法术语来认定,很少或根本不考虑理论、概念或相关实质议题的本质及其与广大社会的关系。"(Halloran,1981:23;另见1963,1978,1983)

[38] 戈尔了、默多克及施莱辛格(Schlesinger)曾出版了一本纪念菲力普·艾略特的文集(1986),艾略特是人类学家,为政治传播研究做出过巨大贡献,另外他还与戈尔丁合作出版过一本早期对媒介进行唯物主义分析的著作(Elliott & Golding,1972)。

会学的研究，而对政治经济学似乎没有特别的关注。

哈洛伦并非欧洲同代学者中惟一支持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的学者。举例来说，迪特尔·普罗科普（Dieter Prokop）的媒介政治经济学就是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出发来进行传播业的研究的（1973，1974，1983）。恩泽斯伯格（Enzensberger）的《媒介理论的构成》（1974）早就提出，要以强调阶级关系、冲突、矛盾及颠覆性的媒介理论来填补马克思理论对媒介论述的“空白”。虽然我们无法从与斯密塞同代的欧洲学者中寻找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脉胳，但这个脉络在席勒的同代人中依稀可见。尽管如此，这些欧洲学者对欧洲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力远不及斯密塞和席勒对北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力，下面我们将转面介绍一些衍生自政治经济学观点的研究。

长期以来，芬兰的卡拉·诺顿斯特朗一直领导着国际传播研究，并推动关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这一政治议题的辩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一直致力于批判西方传播研究中的实证主义与科技乌托邦理想（1968），最为显著的是他有关全球传播动力学的研究，他极力矫正大众媒介中的失衡现象，推动大众媒介的民主化（Nordenstreng，1984；Traber & Nordenstreng，1992）。他研究底子深厚，并且具备政治活动家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将大部分精力投人到了推动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运动中。诺顿斯特朗在组织世界各地的学者，包括政治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方面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他那敏捷的组织能力渗透到了世界每个地区。

诺顿斯特朗与席勒合编的国际传播研究论文集（1979，1993）强有力地影响着政治经济学，但是他与斯密塞、席勒又有所不同，人们很难确认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这并非因为他对政治经济学家所关心的主要理论不感兴趣，他也曾使用类似席勒与斯密塞的研究框架。例如，在最近一次旨在建构有关新秩序研究典范轮廓的论述（1993）中，诺顿斯特朗采用的是以现实主义的认识论、整体社会理论以及社会平等价值为中心的规范观点作为主线的研究方法。另外他还提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关子“解释学的解决办法”和“一些后现代流派”等议题，担心它们是否“走得太远，以致成为政治经济学典范的敌对势力”（1993:271）。尽管诺顿斯特朗如此坚定地认同政治经济学观点的价值与评论，但他对大众媒介与传播的经济方面的研究并未流露出浓厚兴趣。我们可以说，哈洛伦将兴趣聚焦于**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而诺顿斯特朗则聚焦于传播的**批判政治学**（critical politics），这主要反映在他的国际政治宣言中。这一研究根基使他长时间致力于政策研究与政治介人，他的治学风范也影响了不少

传播学者与活动家,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家。但这种影响力与斯密塞、席勒相比,仍显得不足,因为他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经济方面并没有长期兴趣,再加上他选择了复杂的政治议题进行研究,因此他在传播与文化的商品化、媒介商务等方面的建树相对要少得多。

随着欧洲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的持续发展,1974 至 1982 年间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理论与研究计划,极大地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在欧洲学术图谱上占据一席之地。北美与欧洲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主题和方法上呈平行发展,尽管有不同之处,但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而非基础立论的不同。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说,欧洲政治经济学采取了更为自觉的理论立场,主要著作有默多克与戈尔丁的《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1974)和《资本主义、传播与阶级关系》(1979);加汉姆的《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1979);阿曼德·马特拉为自己与赛斯·西格劳伯(Seth Siegelaub)合编的两卷本著作《传播与阶级斗争: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卷一)》(1979)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卷二)》(1983)所写的长长的导论。这些著作引人注目,因为它们的规划性立场对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39] 随后的一些研究,包括他们自己的研究也从未偏离原来的立场。[40] 最后要提到的是,政治经济学不断受到冷嘲热讽(主要指责它是“唯经济论”和“唯生产论”),这也表明这项工作没能获得它应该得到的、持续而良好的反应。

格拉姆·默多克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与社会学,之后,他运用这些知识背景来研究文化生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于苏塞克斯学院撰写过一篇论文,内容是关于精英艺术市场在纽约的崛起与在巴黎的衰败。他对大众文化及青年文化的兴趣使他进入莱斯特大学,二十年来他在那里进行了文化与传播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近来他离开了莱斯特大学,重又加入戈尔丁任教的拉夫伯勒大学,而戈尔丁也是在莱斯特大学度过大半学术事业生涯后来到这儿的。戈尔丁虽然学习过社会学,但他将兴趣放在传播社会政策的研究上。加汉姆带着从事过电影业的经验进入传播研究,他创办了《媒介、文化与社会》杂

---

[39] 这是欧洲发展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时期。除此之外,也有其他著作将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传播实践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de la Haye,1980;Hund & Kirchoff-Hund,1985;Prokop,1983)。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者群体,包括吉奥瓦尼·塞萨罗(Giovanni Cesareo)、罗伯托·格兰蒂(Roberto Grandi)及吉塞皮·里切利(Giuseppi Richeri)等人,他们的出版物《IKON》对北美与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西班牙,一群包括马德里学者恩里克·布斯塔蒙特(Enrique Bustamente)在内的学者,出版了期刊《Telos》,探讨传播与新技术的政治经济与政策分析的议题。

[40] 显然,这种结论不同于柯兰(Curan,1990)的观点,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戈尔丁与默多克目前的传播研究采用了“新修正论“立场。柯兰的观点将在本节后半部分探讨。

志,并在以前的伦敦中央工艺学院,现在的威斯敏斯特大学度过其学术生涯。[41]

比利时出生的阿曼德·马特拉,在卢汶大学获得法学与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巴黎大学文理学院获得社会学研究生学位。他先是在智利大学任教。1962年,美国暗中支持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的阿连德社会主义政府,从此,马特拉结束了在智利大学的学术生涯,开始致力于推进民主的传播运动。在拉美期间,他受当地区域研究课题的影响,协助进行当地的研究。因此他也有机会与斯密塞和席勒接触,因为他们正在研究美国媒介在这个地区的影响(见 Schiller,1976)。马特拉同时也受法国社会学家艾德格·莫林(Edgar Morin)关于法国"文化产业"研究取向的影响。离开智利大学后,他一直在法国雷恩大学任教。

虽然这些学者的早期研究观点各有不同,但他们共同的兴趣在于批判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不同的读解方式去了解传播、大众媒介以及文化实践。默多克与戈尔丁1974年的文章是一个奠基性的成果,因为它勾勒出媒介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概念图,被公认为"推动发展的一步",这类文献在英国也是首次出现。[42] 他们以英国的媒介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存在于出版业、报业、广播电视业、电影业与唱片业的结盟与集中化现象。除了提出业已被接受的媒介集中化趋势——整合与多元化经营之外,他们也关注当时仍是发展中的一个新议题,即英国媒介的国际化。最后,他们又关注到议题的更广泛内涵,包括对娱乐与信息的限制性选择。虽然他们较早就提出对大众媒介的商业势力进行系统分析,但为了得出更高质量的结论,他们将该议题放在更高的层次上来思考:

> 描述与解释媒介的商业利益,不是旨在假设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关系,而是旨在对媒介文化生产过程中的界限做一概述。但是文化生产也保持了一种真正的自主,它来自传统,来自职业意识形态,来自开明共识的真正包容性。(1974:226-227)[43]

---

[41] 加汉姆强调影响其研究发展的两个重要事件:首先是霍加特、莱维斯(Leavis)、汤普森(Thompson)和威廉斯所开创的英国文化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的传统,这引导他进入了文化业,他于20世纪60年代制作纪录片,并与威廉斯合作了一个电视节目;其次是他介入对英国电视节目发展方向及英国广播公司作用的辩论。

[42] 他们指出(1974:205)媒介"完全不被重视",不如教育研究。197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权力在英国》(Urry & Wakeford)的书中不仅没有论述媒介的章节,连索引中也未提及半个媒介术语。

[43] 有趣的是,这种警告出现在试图将媒介政治经济学置入广大理论框架的早期著作中。这表明此取向从开始就将"唯经济论"排除在外,近来的著作中也出现类似的警告,可见它们不是所谓的"新修正论"(Curran,1990),而是近二十年来一贯坚持的研究立场。

默多克与戈尔丁1979年的著作提出了一个更详尽的理论框架,试图将政治经济学取向放入广阔的批判理论框架中。这表明,对他们而言,过去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产业取向的批判性读解,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与其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紧密联系起来。举例而言,默多克与戈尔丁指出了霍克海默与马尔库塞在社会研究所的贡献,特别提到了阿多诺的音乐产业研究,作为回顾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取向的开始,他们总结道:

> 阿多诺坚持认为文化主宰过程植根于文化产业的经济动力学,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必要起点。(1979:18)

然而,他们坚持说"这仅是一个起点",并批评指出:"若只强调说,'文化工业'的资本主义基础必然导致符合主宰意识形态的文化形式,是远远不够的。"(p.18)[44] 加汉姆在同一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与后阿尔都塞主义倾向相比,他更赞同法兰克福学派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基本立场。加汉姆非常赞赏法兰克福学派,他认识到:"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日益明显地产业化,它被经济基础渗透,以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分崩溃,只剩下经济基础。"他的观点与另一种观点相冲突,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基础转变成另一种自主论述式的上层建筑。"(1979:130)这一观点如今正被文化研究所采纳。尽管如此,和默多克与戈尔丁一样,加汉姆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立场也提出了批评:

> 法兰克福原始立场的真正弱点,不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经济或经济基础的重要性,而在于他们未能充分思考他们所观察到的经济过程的矛盾本质,因此他们认为文化产业化是毫无问题的,也是无法阻挡的。(p.131)

马特拉立场鲜明地从反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出发,而没有将其研究取向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相联系,毫无疑问,这一分离部分地表露了法国传播研究的一些核心问题。法国媒介研究的主要学派几乎没有吸纳阿尔都塞和巴特(Barthes)等人的理论观点,而他们曾深深影响过伯明翰学派的斯图亚特·霍尔。20世纪80年代前,法国未曾翻译过哈贝马斯的著作,这也是导致缺乏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连的原因

[44] 默多克在访谈中(1992年4月)提到,与法兰克福学派传统有更直接联系的是迪特尔·普罗科普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

(Mattelart & Mattelart,1992)。尽管如此,正如他的英国同行那样,马特拉反对将权力视为单一的构成,认为权力本身有其根本性矛盾,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放弃采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研究取向。[45]

这种将传播研究植根于马克思传统理论上的兴趣,必然引导着这些学者及志同道合者接受媒介非中心化的观点。[46]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对资本主义分析的强调,包括对权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分析,对商品化与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对社会阶级分化与抗争的分析和对矛盾与反对运动的分析等。事实上,媒介非中心化大大提升了媒介研究,从原先孤立的、边际化的、没有理论化的研究地位升级到对广大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进行研究的根本地位。默多克与戈尔丁(1979)用媒介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的"双重真空"来描述这种现象,而媒介研究通常以陈列细目清单的方式介入社会学王国——如陈列媒介与阶级,媒介与青年人,媒介与妇女等等——形成一种松散连结的多元主义,从而导致被社会学理论撇开。

加汉姆(1979:123)赞同将传播置于广大的理论框架下,并强调将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置于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分析下进行,以"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为辅,对广泛的文化生产与再生产进行重要的、历史特定模式的分析"。加汉姆的研究兴趣大都来自阅读并参与重要的政策辩论的经历,这些辩论主要是有关英国大众媒介与电信的发展进程的。[47] 他的灵感也来自与雷蒙德·威廉斯的共事,后者期望为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民主的、斗争的与替代性的文化形式留出余地,以反对受市场利益的驱动,使大众依附于大众消费过程中(1993 年 11 月的访谈)。[48] 同样,马特拉(1979:36)也指出:"传播机器的运作功能决定讯息的精心制作与交换过程,这也可理解为生产与交换的一般机制,这种机制限制了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活动。"

---

[45] 他如此论述:"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最大误导之一是,它的关于主导意识形态机器功能的单一、垂直进行的概念,未能表明机器本身受制于阶级矛盾的现象,这种取向产生的具体效果是忽视了被统治阶级对统治意识形态的反抗和意识形态机器运作时内部失调的特征。"(Mattelart & Siegelaub,1979:29)

[46] 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同行。尽管如此,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塞斯·西格劳伯,他与马特拉在一些项目上密切合作,包括合编了两册《传播与阶级斗争》论文集,以及多册《马克思主义与大众媒介》的书目摘要文献。他还创办了大众媒介国际研究中心,指导国际通用出版社(International General)的业务,该出版社负责出版上述及其他批判媒介研究著作。西格劳伯所受的教育主要来自他作为一名政治运动者及手工劳动者的经验。

[47] 他的研究取向具体表现在他 1973 年出版的专题论文中(1978 年修订版),论文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英国电视的公共政策分析与政治经济分析。

[48] 加汉姆立刻强调说,传播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广泛流行的文化活动过程的一部分,比如说,它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民主运动的一个学术派别(1993 年 11 月的采访)。

这种对媒介非中心化过程的重视，在许多理论研究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强调，这些研究包括对资本、阶级、矛盾、冲突及反对派斗争的研究。对默多克与戈尔丁（1974）而言，资本分析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明确开端”。特别要指出的是，这意味着“承认大众媒介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生产与行销商品的工商业组织”（p. 205－206）。加汉姆对阿尔都塞/波兰扎斯（Poulantzas）所谓相对自主层次上的社会形成论提出挑战，强调应该“首先将大众媒体视为经济实体，它具有两重性：一是通过媒介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直接发挥生产剩余价值的经济作用；二是通过广告，在其他的商品生产部门中间接发挥创造剩余价值的作用”（p. 132）。由此可见，大众媒介已远远超越所谓相对自主性的地位，而“成为一种存在于具体社会体制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所赋予的商品特有形式中的紧密缠绕的关系”（p. 132）。加汉姆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最具洞察力的观点是，一种普遍的、抽象的利益驱动将一切经济活动化简为对交换价值的追求。马特拉认为《资本论》就是这个观点的“成熟之作”，他根据《资本论》描绘出特定的传播生产模式，包括：它首先是生产工具（传输信息的机器）；其次，它是工作方法（特殊类型的实践、规范等）；最后，它是生产关系（财产关系、传送与接收者的关系、分工、组织形式与实践）。

欧洲政治经济学家们认为，阶级关系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过程，而它正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心所在。这些关系主要涉及传播业经营者与广大资本家阶层的关系，媒介业巨头与媒介产品实际生产者（这种生产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形式）的关系[49]，以及接受过程中的动态关系，即人们如何接受、重组与抵制文化商品中承载的或强或弱的意义。

资本的力量不能避免资本估价的每一次行动中必然产生的矛盾，因此，虽然政治经济学家承认资本的力量可以将社会实践活动（包括传播活动）纳入交换价值的逻辑，但他们同时也反对认为文化生产与资本逻辑简单相关的对应理论。加汉姆总结了这种揭露资本逻辑“无矛盾”假象的趋势（1979:36）：

> 学者应该从一开始就否认“无矛盾”的观点，因为资本虽控制了文化生产的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商品必然会在其明确的内容中，或在文化占有模式中，支持主流意识形态。

---

[49] 默多克和戈尔丁（1979:18）对阿多诺关于资本主义对音乐产业的影响的著作大加赞誉，同时也指出他忽视了一个重要方面，即忽视了对“‘文化产业’所销售的商品的实际生产的具体活动”进行研究。

除此之外，加汉姆认为文化产品还具有“巨大的颠覆力量”，文化产品应被视为一种斗争产物，这种斗争存在于资本家与非资本家两大社会阵营之间，存在于两个阵营内部的不同阶级之间。举例来说，只要资本控制了大量再生产和行销渠道，书籍和电影等工艺产品就得符合资本逻辑。这样，工艺产品就为资本提供了多样性，也替他们承担了大部分风险。然而，这种生产形式同样也可以维护公共领域，维护企业集团和消费主义之外的公民权益，以对抗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

马特拉则将矛盾与冲突置于全球背景下，由此进一步展开研究。他早期研究中的观点后来被政治经济学家和传播学者广泛采用。除了了解传播权力的类型，他还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包括思考有关“二次帝国主义(Secondary Imperialism)”的问题，包括它在墨西哥、印度、埃及以及意大利等国表现出的复杂形态；考察文化帝国主义的各种社会实践(如体育、旅游等)；理解传播的生产与接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关系，把它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民族文化等方面进行定义。[50]

本节将进一步介绍英国与欧洲政治经济学传统下的主要研究，这并非有意赘述，而是试图确认与以上所提出的各种理论见解相关的重要研究流派。

许多研究显示了对历史分析的浓厚兴趣。柯兰(1979，1991)与斯帕克斯(1985；Sparks & Dahlgren，1991)从源远流长的英国报业史出发，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着重用阶级分析来对传播领域进行考察。[51] 柯兰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了阶级冲突的历史以及激进的工人阶级报纸的兴衰史，这些都曾是英国工党发展史上的核心内容。[52] 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1985)从非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对音乐作了历史学的解释，他把这种文化形式比作社会结构变迁的反映者与预言家。阿塔利对音乐的解释是综合性的，而非细节的探究，他确定出四种音乐发展的网络(牺牲的——前产业化音乐；再现的——音乐厅音乐；反复的——

---

[50] 这些理念出现在1979年的文集中，并在1983年的文集中得到进一步阐述。马特拉认为(Mattelart & Siegelaub，1979:56)，他的妻子米歇尔·马特拉(Michele Mattelart，1977)对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的差异提出了更清楚的界定：后者绝不是大众文化的正式替代物，而是“一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实践，是史前时代的终止，正如马克思所言，是由其他社会行动者实践出来的”。特别要指出的是，流行具体表现为人民的经验，他们“***从追求自由的运动中，使自己转变为文化经验中积极的主体***”。

[51] 正如汤普森的著作所展现的(E.P. Thompson，1963)，分析信息与流行媒介一直是英国社会史中相当有意义的论题。

[52] 我们发现有意思的是，赫尔曼与乔姆斯基(1988)在一本完全论述美国媒介的书中，却运用了柯兰对激进报纸的历史研究。

个人录音;创作的——自我传播的音乐),它们展现特定的历史时期,然后预测下一个时期。弗利奇(Flichy,1991)采用相同的整合方法,但更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面,他创立了通俗传播史,这个历史展现了北美和欧洲发展中的各种关系。

也许由于全欧洲电信系统的发展相当稳定,因此比起拥有明确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北美,它没有值得一提的历史记载。所谓稳定,我指的是一种国家垄断体系控制了电信设备及服务的生产与市场营销方面的运作。正如北美那样,欧洲电信系统也开始卷入到重大变革之中,这些在贝克尔(Becker,1989,1990)编著的论文集中得到集中反映。

欧洲对具体媒介的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内,发展得十分缓慢。比起北美,欧洲的大学并不热衷于传播、新闻以及同类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结果是,当印刷、广播及电信等媒体作为独立的产业部门各自发展的时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欧洲的研究数量都远比不上北美。尽管目前这种研究状况正在改变,但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媒介产业,也就是一种整合传统媒介行业的新媒介业,连强调具体媒介部门的政治经济学也开始十分注意起这种整合及全球化的趋势。在此,最好的例证要数马特拉的《广告国际化》(1991),书中阐述的正是欧洲广告业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并且论证了他一向坚持的观点:广告业目前已被整合到其他的媒介部门,同时,广告已从媒介流程中的商业插播形式转变成传播的基本方式,在公共空间中扮演重要角色。[53]

为了展开他的主题,马特拉记载了向美国媒介霸权挑战的欧洲、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广告公司的发展。这些挑战多数是由 WPP 广告公司(它购买了包括智威汤逊在内的许多公司)与萨奇和萨奇广告公司(它买下了奥美公司)领导发起,扭转了自 1899 年以来的趋势。当时美国公司智威汤逊在伦敦开设了第一个海外分公司,以后又不断开设了四十个海外分公司。这项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不只是在于它对横跨大西洋的商业较量进行了分析,更在于它指出了广告业如何在商业运作链中不断获得发展。除了购买刊登广告的空间,广告业还要进行市场调查、民意调查、收视收听率调查、咨询、设计、绘图、促销、直销(包括使用新科技的电子行销)、视听制作、录像带传播、广告赞助以及公关实践等等。广告公司与媒介公司携手,通过合并、联营、合资、策略联盟以及其他方式来扩展它的商业连

[53] 1987 年刊登在比利时商贸刊物上的一篇文章指出(Mattelart,1991:29),商业界对广告"新时代"的认知是:"广告不复存在,传播万岁!"

结，从而造成这一动态产业的结构性转变。这些转变必须依赖新科技的汇合，以便维持本产业在管理组织形式及部门转型中的能力，帮助公司持续地、细致地追踪了解顾客、供应商、竞争者及产品的动态。政府的政策必须毫无例外地支持这种发展，具体手段是：解除跨行业、跨部门的市场介入的限制；解除限制企业合并的规定；审查财务以抑制可疑的支付操作，如隐藏的折扣、高额的佣金、礼物、回扣等。

在多产的学术生涯中，马特拉总是极为小心地把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当代文化变迁联系到一起。对他而言，文化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国家或企业结构的问题，它们与人类公共空间成为私有商品的过程紧密相连——奥姆尼康公司的一位经理宣称，私有商品是"策略上的首要物质"(Mattelart，1991:17)——这使得公共空间可供传播业充分利用。尽管马特拉引用加塔利(Guattari)的资本主义主观性的理论强化了以上结论，[54]但他对这种看法仍不是很满意，他同意鲍迪尤(Bourdieu)的说法，认为文化是一种"自我防卫"的形式：

> 文化是自由思想的手段，如同武术一样，它被应用到其他领域中，使公民能够反抗针对他们的符号权力的滥用，无论这些滥用是商业性的、宣传性的或者说政治性的，还是宗教性的。(p.217)

由于马特拉并未将反抗资本主义主体的社会文化活动作为研究重点，因此他无法清楚地了解这种抗争的过程。结果是对这个复杂的、动态的产业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十分有力，但却无法清楚地认识产业的所有影响。

马特拉对广告的研究使他重新思考各种形式的政治经济学的多元性与物力论问题。他试图打破那种将传播业权力简单地与企业规模和公司集中化程序相联系的趋势。虽然在他的著作中并未明确表明，但马特拉显然试图在更大范围内研究体制结构，它们彼此之间的连结，以及资本主义传播业的权力动态关系。[55] 这些观点近来为欧洲媒介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所认识，并逐步得以推广(特别参见 Mignot-Lefèbvre，1993)。

阿克索和罗宾斯(Aksoy & Robins，1992)从更明确的理论角度，对电

---

[54] 根据加塔利所言："经过了不同形态、不同规模的专业介入后，资本主义的主体性已经成为一种形式，它能抢占任何企图阻碍或干扰资本主义发展的事物的立足之地。任何独具风格的事物都必须避开它，都必须服从它的设计，服从它指示的专业与特殊的框架。"(转引自 Mattelart，1991:217)

[55] 反思的主题在马特拉夫妇(1992)的著作中表现得更为普遍，而这种思考的前身出现在马特拉等人早期的著作中(Mattelart 等，1984)。

影业与录像带产业的结构转型的动态发展进行政治经济学解读。他们对后福特主义理论的观点提出质疑(Christopherson & Storper,1989;Piore & Sabel,1984),观察到如马特拉叙述的那类结构转型形式,但他们的结论却使学者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看法有了分歧。分裂的一端是福特主义,它认为,为达成大众消费而进行的大众生产体系由大型的整合企业领导,其市场主宰地位的稳定来自政府的支持,反过来说,体系的经济繁荣也确保了政治的稳定;分裂的另外一端是后福特主义,它认为,面对高度细分的市场对特定产品的需求,产业必须进行非集中化的改革,转变成一种由灵活的制造商、供应商和投资者组成的网络体系,至于国家,其角色功能应该由确保履行社会契约转向推动市场。克里斯托弗森和斯托普在电影业与录像带行业中发展了这一观点,他们发现,好莱坞以往曾受福特主义理论庇护的纵向整合型电影制片厂体系如今正随着企业策略、传播技术以及政府政策的转变而改变,成为后福特主义的组合形式;大小公司结合起来,根据人口统计差异以及区域差异用十字交叉法勾勒出广阔的市场范围,以便生产多样化的产品。他们认为独立制片商灵活而独特的能力确保了其产品的创新,其作用在全球视听市场中日益举足轻重。

阿克索和罗宾斯赞同马特拉及其他学者的观点,承认传播业中结构转型的重要性,但却认为后福特主义没有理由说这将造成新的产业分工。事实上他们发现,虽然不是所有大公司都能成功地通过协商完成结构转型,但它们一旦成功,其力量会更加强大。企业策略、科技转变以及扶持性的政府政策使得电影公司能更轻易地跨媒介、跨国界进行势力扩张,如同时代—华纳、索尼和新闻集团,好莱坞的主角们也正转变成纵向整合的全球媒介与信息大财团。他们引用瓦斯科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虽然“独立”制片公司的数量增加了,但它们却为大公司分担了极高的产品风险及人工成本,使大公司能继续控制重要的资金与行销渠道。阿克索和罗宾斯对好莱坞的转变做出以下结论:如今的好莱坞虽然更具分化性,也不再完全美国化,但同好莱坞的全盛时期比起来,它的一些大公司获取了更多的资源、市场和收益。他们进一步对简单地将工业模式应用到媒介领域的做法提出警告,因为媒介领域中包含了由多种形式的文化商品及其生产,特别是行销过程界定的特有的“逻辑”,这不是用简单的工业模式所能涵盖的。

许多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在米埃格(Miège,1987,1989)和他在格勒诺布尔大学的同事们的著作中都有体现。米埃格从马特拉和席勒的宏观政

治经济学出发,将研究兴趣放在了解不同文化产业的差异上。[56] 他承认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始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两位学者,但他认为他们的研究首先受限于文化产业中僵化的艺术创作概念,而且也未能提出文化产业结构中的反抗意识。米埃格试图通过把传播作为一种多样式的商品生产过程来考察,以纠正他们研究中的不足之处,特别是前一种不足。

米埃格集中研究了三类生产方式:(1)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即传统工艺生产中的雇佣手工艺者的生产方式;(2)资本主义的生产,即雇佣专门出卖劳动力赚取工资的劳动者来生产剩余价值;(3)间接生产性的文化劳动,将文化活动整合到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比如,购物中心的音乐演出。虽然他同意传播与其他生产方式一样面对价值的问题,但他认为再生产过程中还会有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对文化产业更为关键,因为许多文化产品简化了再生产的过程,以致将边际成本降低为零。尽管如此,许多文化产品仍需要依赖原始产品,如一场音乐会或一幅绘画,套用本雅明(Benjamin)的话说,它们提供了一种有力的价值光环。

为了进一步认识传播业中以技术为基准的分类方式,比如如何区分印刷、广播电视以及电话等,米埃格(1987)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标准,即他所称的产业活动中的"社会逻辑"。这些产业活动包括:文化商品的编辑工作,如书籍;演程制作,如广播电视;书面信息制作;实况转播的娱乐节目;以及电子信息的生产。根据"社会逻辑",这些活动可以总结成三种信息模式:***编辑的、流程的***和***书写的***信息模式,他用这三种模式来整理产业资料。米埃格的主要结论是,流程模式将成为西方传播业的主导形式,因为现有的经济制度有利于它的运作。在流程模式中,进行一系列再生产与再包装的可行性可以使受众比最初翻几番,再加上劳动成本的低廉,经营者可以迅速收回投人的巨额原始资金。

这样的分析深化了我们对传播业结构及其建构过程的认识,超越了通常广泛使用的叙述性的研究。这种分析因为将劳动和工作过程整合到生产与行销的技术过程中而变得特别有价值。米埃格提出的逻辑是社会性的,而不仅是技术性的,尽管如此,他自知(1989:44-45)无论自己的研究多么细致,政治经济学家仍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分析能提供的最终收获是什么?举例而言,席勒就批评说,米埃格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下

[56] 米埃格的著作介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与制度学派之间,偏向于政治经济学派。他与后者的相近之处是描述了把传播构建成为制度化活动的具体的组织实践。然而,他对传播作为商品生产,对这种组织实践与广泛社会总体的关系这两方面的研究显示了更大的兴趣。所以,说他的著作居于两派之间,偏向于政治经济学派,更为公平。

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差异。弗利奇认为,随着商务活动的标准化,文化产业的主要区别——估价的不确定性,也正在逐渐缩减。这种不确定性并非与生俱来。我们看到,历史上资本主义实践的不平衡发展过程,如今已延伸至文化产业中。米埃格却坚信文化产业中的"创作危机"是与生俱来的,而文化也天生具有界定分化的倾向,因此反抗活动在文化产业中比在其他产业中更容易产生。

虽然米埃格提到了反抗,但他对反抗的具体形式却没有太大兴趣。然而,欧洲的研究传统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反主流和非主流媒介进行研究。马特拉与西格劳伯(1983)将研究媒介与社会反抗的关系的成果编辑成书,内容既有对主要理论的论述,又有一系列国际实例。虽然工人阶级的反主流报纸的兴盛曾引起过学术界尤其是英国学术界的浓厚兴趣(Curran,1979;Sparks,1985),但如今的趋势更倾向于探究地方性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电子媒介的发展(Jankowski 等,1992)。后者的发展不仅是因为全欧洲的广播电视都在迅猛发展,更是因为广播电视业中国有垄断的放松,而原来,公共服务只是被界定为全国性节目,很少有地方性的非主流节目。垄断让位给非主流的商业运作,后者的兴趣主要在于贩卖商品。国家与社会运动也得到了同样的开放空间,它们在四处蔓延的商业化经营之外进行广播电视、有线电视的非主流建设。[57]

在北美的文献中人们可以找到有关性别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但在欧洲却很少发现,而盖拉佛(Gallagher,1980,1984,1985,1992)的论述是其中之一。她对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取向提出了总体的批判,进而绘制出大众媒介性别政治经济学的框架。这一研究的内容涉及女性在文化生产流程中的历史地位。自报业建立以来,而向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的阅读市场虽然十分活跃,但这种市场仍以各种隐含的方式将妇女置于从属地位。例如,她发现妇女在 19 世纪小说中所描述的社会关系中处于四重的从属地位。首先,女性小说家被接纳为艺术工作者的前提是不妨碍履行家务职责。其次,在印刷业中,妇女和童工一样被贬为非技能劳动者。再次,正是在家务方面对妇女的剥削才培养了中产阶级妇女的阅读能力,乃至偶尔的写作机会。最后,小说所充斥的内容,均在引导妇女成为消费者:全都是浪漫的、女性化的、家庭式的以及母爱型的内容。盖拉佛用这样的分析建立她的历史批判,将女性在文化

---

[57] 对于中欧与东欧有关媒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发展状况,请见斯泽克斯可(Szecsko,1986)。

产业中的结构性地位(除少数具有显赫地位的人物外,多数妇女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与文化产业对女性的各种描述结合起来。这种对性别与阶级关系所做的历史的、社会结构的、文化的整合分析为反思文化产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模式。虽然范迪克(van Dike,1991)在对种族主义与报业的研究中提到了社会结构的问题,但不幸的是,欧洲对于性别的研究仍然不如种族研究与阶级研究那样重视。范迪克的研究也只是将性别视为建议纳入的因素,其重点仍是对新闻论述进行系统的分析。

除了重新将文化产业进行概念化之外,欧洲政治经济学研究近几年特别积极地投入对电信以及电脑传播新技术的研究中,部分原因是微电子和太空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一系列更细小、更快速、更便宜的用于生产、行销及展示传播与信息产品的设备得以发明。欧洲政治经济学对这一领域的一个伟大贡献是,他们将这些技术变革置于电信与新技术的权力关系的广泛背景之下去思考,特别关注过去十年来,欧洲政府与商界在他们进军这一领域的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转变。在欧洲,各国的电信业过去都由国家垄断操纵,以平衡各种价格的竞争以及社会的需求。在英国开了先河之后,欧洲的电信系统如今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国有产业私有化的过程,设备与服务市场向国内竞争者开放。进一步慢慢地向国际竞争者开放,为了顺应这场转变,管理规范机构也正在建立。以上的走势发生在欧洲要比北美更有深远意义,因为北美早就将竞争与管理的转变引入国家系统之中,从而使系统成为私人拥有、政府管理。更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电信转型的发生正值欧洲大陆向跨国经济整合的方向迈进的时机。

政治经济学对技术专家治国论提出了批判,但它并没有忽视科技的发展,也没有忽视对极端的非理论描述性研究与抽象的经济模式进行批判,它主要通过批判技术专家治国论来强调社会结构的组成及结构转型的影响。哈梅林克(Hamelink,1983)较早地进行过基础研究,指出金融、银行与信息新产业的关系。近来,希尔斯(Hills,1986)就电信业中的政治性变迁做了一个比较分析,她选择三个有着不同历史背景的发达国家,将其变化中的政策环境与国家、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变迁相联系,来审视该国政治制度的变迁。她的研究持有一个欧洲特有的立论基础,就是强调新电信体制中劳工地位变迁的问题(另见 Costello 等,1989; Humphreys,1986)。希尔斯(及 Papathanassopoulos,1991)进一步的研究是将电信政策置于横跨欧洲及美国的传播技术政策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观察,她发现这些变化阻碍着民主化过程。希尔斯提出的“民主的鸿沟”概念是众多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基础主题。在对公共领域理论特别是哈贝马斯的著作

的批判阅读的基础上，加汉姆(1990)注意到电信业在重组中遵循严格的市场规范来满足消费者的市场需求，而不是满足公民的需求，这就造成对公众生活的威胁(另见 Becker，1989；Mansell，1993)。[58]

虽然大多数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献以批判的观点来看待科技，但也有人将研究兴趣放在开发使用新科技来推广民主利益的课题上。举例而言，马尔根(Mulgan，1991)从英国"新时代"运动的基本信念出发，支持运用新科技来瓦解权威，并在国家机器之外建立公共的非主流制度。事实上，在欧洲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传播与信息技术的基本分析占主导地位，其中多数是在围绕是否运用科技的争辩中进行的。不幸的是，这个研究领域相当容易成为互相攻击的战场。一方的学者不惜被贴上耻辱的勒德派(Luddite)标签，拒绝运用新科技。[59] 另一方的学者认为实现民主的关键就要靠传播与信息新技术。这两种观点都不足以展现对传播与信息新科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其中包括欧洲的研究。恩泽斯伯格(1974)的著作勾勒出了科技化民主的框架，马尔根引用他的观点来支持科技在公众控制下产生利益的看法，但他发现跨国企业网的反民主势力也在使用科技力量，从而变得更强有力，因此有必要重新界定"公众"与"控制"的含义。有学者在著作中同样敏锐地观察到，科技所带来的利益不只为"公众"所享用，反而更多地被商业与特权阶层所享用(Jöuet，1987)。[60]

用更批判的观点对传播与信息技术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韦伯斯特(Webster)和罗宾斯，他们的研究成果非常出色，令人惊叹。他们指出科技正被用来扩张跨国企业的控制力，从而加深了阶级分化和性别分工。他们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采用了一个煽动性的副标题"一个勒德派的分析"来强烈批判后福特主义对科技所做的过于赞同的解释。在此层而上，他们建议采用一种新福特主义的分析法，说明企业与国家如何使用电视传播新科技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与控制危机做出反应。就其实质而言，新科技产生的最大利益是帮助企业和政府继续维持它们的霸权

[58] 虽然加汉姆支持将公众阶层作为批判用的类别，但对哈贝马斯不加批判地全然接受这一术语与个人主义、父权与市场的历史联系的做法，也提出了批评。

[59] "勒德派"一词也已被误用。历史学家认为，它不是一种妄图制止科技发展的愚昧思想，而是聪明的劳工用"机器受损"等借口来防止工资削减或要求提高薪金的一种观念。在缺乏制度化的劳工管理过程中，勒德主义的做法是劳动者少有的自卫手段之一。

[60] 我们发现有趣的是，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对科技的支持率远比70年代高，在法国尤其如此。我们惟一可推测的原因是，这与法国由保守党执政转换成社会党执政有关，后者承诺要发展广为公众使用的技术(例如更新电话系统，发展微型电信等)。

地位,同时又可以不顾及社会契约的履行,这原本是它们在福特主义时期维持霸权所要付出的代价。不过,韦伯斯特和罗宾斯并没有让这种强有力的攻击观点流于讽刺。他们认识到,在向新福特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矛盾和各种形式的反抗。他们的勒德派观点与史实相符,认为阶级与社会运动的行动机构在面对技术变革时,应该维护阶级运动的利益,并运用劳动的技能来创造一个非主流的社会体制。这样的辩论也出现在其他的对新科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Becker,1988;Cesareo,1992)。

在结束对欧洲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回顾之前,有必要提出两个问题。其一是以上讨论过的制度学派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之间的关系;其二是“新修正主义”的问题。戈尔丁和默多克(1991:15)在最近一次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的陈述中,将他们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关注“媒介意义的建构与消费”的文化研究区分开来;同时,他们也将批判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媒介工业的经济组织的研究”区分开来。两位学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将兴趣放在了符号与经济的关系上,他们是批判性的,或者说是“在对社会秩序的理论化的细致了解下对传播和文化现象进行研究”(1991:15－16)。虽然在北美文献中可以发现一些制度学派研究的例子(Turow,1984),但研究媒介产业的制度化图解或经济组织形式的学术著作,欧洲相对要多得多。

有关媒介产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组织研究之间,并没有绝对明确的分界,交叉领域隐含着足够的模糊性,这值得所有评论者注意。[61] 然而,戈尔丁和默多克的观点是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定义远非“媒介产业的制度性图解”可涵盖,只有通过与组织研究相对比的方法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组织研究在对产业进行总体了解和叙述方面贡献显著。虽然大部分的组织研究著作是有关欧洲国内或泛欧洲的(Blumler & Nossiter,1991;Vedel & Luven,1993),但也有些关于国际发展的出众作品(Negrine & Papathanassopoulos,1990;Tunstall & Palmer,1991)。我们可以清楚地区分以上的研究著作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不同,因为这些学者的兴趣在于描述产业发展的现状与发展趋向。他们对政策与管理规范的发展的关心(即对国家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关心)是从正统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的;同样,他们对权力构成的隐性批判也是从主流

[61] 自我界定并没有特别的帮助。一部重要的*组织*分析的著作是《传播系统的政治经济学》(Dyson & Humphreys,1990)。

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的。然而,组织的或制度的取向对媒介业发展的理论化理解没有多大兴趣,它的研究者们没有将媒介业放入更广大的包括阶级与社会关系在内的资本主义整体范围内加以思考。他们也没有专门从道德评价的立场进行持续的批判,用戈尔丁和默多克(1991:18)的话说,道德标准强调的是"正义、平等及公共利益"。虽然组织研究和制度研究超越了对经济行为的传统的、狭隘的测量,但它们因为缺乏坚定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而停滞不前。这一点有助于理解米埃格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他专注于研究文化产业中的内在区分,这的确有别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但是,米埃格明确地表示,他的兴趣更多地在于了解这些区分与资本主义的基础过程如商品生产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这些区分所代表的社会反抗机率的关系。

近来,通过对大众传播研究状况包括政治经济研究传统进行反思(Curran,1990;Curran & Gurevitch,1991),有学者提出一个"新修正论"的建议。柯兰考虑到了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况,而且在提出观点时非常谨慎,但他仍认为,在传播研究这一范围广泛的学科里,"一场惊涛骇浪般的转变已经发生":

> 其中最重要也最具深远意义的转变就是激进传统中正在不断推进的多元主义主题的建构。尤其要指出的是,它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解释框架,重新认识受众的创造性与主动性,以及从政治的美学转变为通俗的美学。(Curran,1990:157 - 158)

虽然以上所言均属政治经济学关注的议题,但只有柯兰的"修正对媒介组织的解释"的观点将触角直刺政治经济学。柯兰指出,"社会阶级冲突模式的魅力的消失"受福柯(Foucault)学说的广泛影响,并导致"政治经济学从原先的立场上退却下来"。虽然大多数激进的大众传播研究派别都受到了影响,但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是第一个屈服的"(Curran,1990:142)。柯兰特别提到,在20世纪80年代,戈尔丁、默多克及他本人"均开始后退"。戈尔丁在解释小报对福利津贴领取者的攻击时,强调意识形态的控制及记者的个人价值观,而不是报业所有权;而默多克则将视线投向对新闻来源的分析以及对所有权与管理压力的论述,以此来解释1981年英国种族动乱事件。

除了对政治经济学观点提出批评外,柯兰还指出了一个合流的倾向。他指出多元主义学者正从强调记者个人自主性转向强调结构限制和权力

的议题，他们也与维护市场中立的传统派别分道扬镳，转而注意市场的缺陷与失败。他坚持认为多元主义学者与政治经济学家互相影响而发生转变，却并非完全合流在一起，因为他们在如何从理论上解释经济与政治权力这一问题上仍存有分歧，尽管如此，“介于两者之间的中性观点正以主导的角色出现”(Curran,1990)。

戈尔丁、默多克以及哈洛伦对柯兰的诠释提出质疑(1992年4月的访谈)，他们三人均认为柯兰的观点偏离了正题，因为他只是将政治经济学与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联系在一起，就像“非主流的、激进的文化主义取向是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联系在一起”一样(Curran,1990:139)。正如前面所述，三位学者坚持认为，莱斯特大学研究中心从未声明以政治经济学取向作为其发展方向，因此也无心与伯明翰推广文化研究的使命相攀比。虽然他们承认政治经济学研究是戈尔丁和默多克的主要兴趣，但与该中心的研究无关，研究中心原则上以社会的、社会文化的及社会问题导向的研究为主。这一点比较重要，因为柯兰认为“新修正论”暗中引导着该研究中心的发展方向，而该中心主要成员则认为这种现象根本不存在。

哈洛伦坚持认为，柯兰如果对该中心长期的学术活动有所了解——其实该中心长期致力于推动批判社会学研究而非政治经济学研究——那么他的分析会更进一步。政治经济学研究是戈尔丁和默多克等人的个人兴趣所在，并随着他们的离开而结束。戈尔丁和默多克根本不同意柯兰对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传播研究领域的诠释，默多克概括性地强调了他们的观点，那就是“柯兰所绘制的学术地图无法标示我的驻足领域”。两位学者特别指出，无论柯兰的“新修正论”说他们屈服也好，后退也好，都没有考虑到他们的研究范畴。事实上，他们一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观点为依据，结合意识形态批判、符号学、社会政策分析来关注传播活动的整体流程，包括生产、行销与接受。两位学者指出，除了早期对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之外，他们一直从事较大范围的问题的研究。戈尔丁特别注意对社会政策的考察，而默多克则专注于符号学及理论分析。他们认为，柯兰只是从他们早期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议题中断章取义，然后与今天研究的广泛问题作比较，于是得出他们在走回头路的结论。戈尔丁和默多克总结道，虽然他们目前的研究反映出新的政治问题与知识问题，但其中的观点一直和他们广泛的兴趣相符合，因此，即便他们关注撒切尔政府的社会福利意识形态与受众的接受情况，他们也可回到政治经

济学研究取向的基本原则上来(Golding & Murdock,1991)。[62] 总之,他们认为,柯兰把他们的近期研究等同于向莱斯特研究取向的回归,既误解了莱斯特大学的研究走向,更误解了政治经济学。

有关莱斯特大学、戈尔丁与默多克的研究以及"新修正论"的辩论虽然很重要,但是,其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学者们对政治经济学持有不同的认知概念。[63] 戈尔丁和默多克除了对社会阶级、商品流程、公司结构与国家保持一贯的兴趣之外,他们也一直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进行研究,坚持用一种批判的与道德哲学的方法了解广泛的社会整体。就此看来,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聚焦于公共传播的符号与经济层面的互动作用"(1991:15)。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是如此宽广,以致包括柯兰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他们的研究只是一般性的传播研究。虽然柯兰未对政治经济学提出明确的定义,但从他对该领域的评价中可以发现,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包含对经济所有权与管理控制的分析,以及它们对媒介内容的影响,因此这种研究视野是狭隘的。从他对默多克的批评中可见,他也认为对媒介资源的分析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面(Curran,1990:143),然而对媒介资源的分析却是多数媒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最强烈的政治经济学读解。[64] 将修正论运用到政治经济学时,有一个更宽泛的问题需要再次提出,那就是: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核心层面是由什么构成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非得去观察所谓的倒退或屈服,柯兰批判的原意是要反思出政治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并且确认这种取向与构成一般传播研究领域的取向有何不同。

不论人们对柯兰批判的反应如何,他所提出的观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从未有过的严肃辩论的机会。在此之前,人们

---

[62] 柯兰在谈到戈尔丁与默多克的近期研究时有两种看法:一方面他认为他们的研究只是"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再现";另一方面,他认为他们在竭力"脱离简化的工具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观",并且将"唯经济论"视为首要的压制与局限(Curran & Gurevitch,1991:10-11)。戈尔丁与默多克则坚持说,他们一直反对简单思维的政治经济学读解,并且认为唯经济论不过是"第一步"而已。在他们看来,柯兰的解释只是为了通俗地表现早期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向较灵活的实际上是修正主义者的学者的转变,但事实上这与现实情形并不相符。

[63] 在此无法对柯兰的理论做扩展评述,因为这需要对政治经济学和自由多元论的演变做翔实的分析。柯兰声称这两种观点虽然已经相互靠拢,但却没有完全合流。不过,我们仍可以想像自由多元主义者与戈尔丁、默多克持有相同的观点。举例而言,柯兰(1990:144)声称,从汤斯达尔(1981)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多元主义的焦点已从注重记者的个人自主转变到"媒介组织与权力中心的内在联系"上。尽管这只是表面上的投合,但柯兰的观点可从汤斯达尔本人的著作中得到证明。如果柯兰是于1977年而不是1981年考证汤斯达尔的著作,他会发现其《媒介即美国》一书带有结构性的观点而不是媒介工作者个人自主的观点,这比他后来的著作更明显。检验修正主义的理论并非易事,它需要对修正论的构成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还要了解原始观点的构成或概念立场的构成,而且还要了解介于原始观念与假设的修正观之间的历史进程。

[64] 举例而言,新闻资源的分析就是赫尔曼与乔姆斯基(1988)的政治经济学宣传模式中的主要研究项目。

对该领域的中心议题只开展过很少的实质性的、公开的意见交流。其中一例是加汉姆(1981)与《银幕》期刊编委就生产与再现关系的意见交流，另一例是对斯密塞提出的传播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所展开的辩论。柯兰的著作不仅仅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做了描述，它还提出该取向的核心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与马克思理论的关系，以及与形形色色的传播研究取向的关系。

"第三世界"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无论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体还是其研究的起源来说，第三世界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章结论部分首先从第三世界作为研究主体出发，进而展现第三世界学者及研究中心对研究所做的贡献。在此强调第三世界主体的原因在于其争论性的本质正是理解第三世界研究贡献的核心所在。

"第三世界"作为一个类别，其含义本身充满疑问。[65] 这一概念只是描述性的，而非理论化的，它只是指称那些发展程度低或发展中国家，以区别于那些紧紧依附于前苏联的第二世界国家。苏联共产主义的瓦解，消除了将第三世界区分于第二世界的需要，沿用这一概念只是更容易确定那些不属于核心发达国家的国家。但是这一简单的概念仍无法清楚定义所指称的对象，比如说，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既有韩国等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它们发展得相当富足；也有像索马里或海地这样的国家，它们经历着绝对的贫穷和边缘化，一点发展的迹象都未显现。尽管如此，"第三世界"仍可被用来指称那些高度发展的核心国家(如北美、西欧、日本、澳洲及新西兰)之外的国家。

阿哈麦德(1992)指出，"第三世界"作为带有理论色彩的术语，在界定全球政治经济学中的某一政治立场时很成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术语将民族主义放在首要位置，并带来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第三世界"的特色是代表了反抗的源泉和真正的非主流，它的根子是民族主义，它对现存的国家怀有民族主义的认同，而不是对特定的生产模式进行选择。结果，第三世界也意味着对现存阶级结构的认同，包括对这种

[65] 里夫斯(Reeves,1993)对这一地区的研究进行回顾时发现，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但它的使用价值足以使他的著作命名为《传播媒介与第三世界》。

结构的一切缺陷和畸形的认同。第三世界必然采取联盟形式。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国家只是以各自的民族精英所控制的国家权力作为保证而结盟在一起。这种勉强的和谐不是来自抵制主导生产模式的信念,民族主义只是相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与后结构主义的文学批判而言的另一种选择。从好的一方面说,民族主义是持不同目标的阶级力量抵抗的基础;从坏的一方面说,民族主义则代表民族买办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民族主义(包括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代替社会主义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的力量源泉时,它轻易地成为正在蓬勃推进的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的标靶。对这个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讨论。考虑到这个主体领域的冲突性本质,包括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冲突关系,在此我们只讨论第三世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贡献。

第三世界的研究也从对抗发达国家的力量出发,因为它是从一系列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形式的社会斗争中锤炼出来的。这些爆发在二战以后的运动被确认为反殖民的、国家解放的或社会主义的斗争运动,它们有助于学者及研究议题的产生。事实上,那些在革命活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人物本身就是骨干知识分子,如毛泽东、胡志明、阿米尔卡·卡布罗以及切·格瓦拉。这些解放运动的领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掌握传播手段包括控制广播电台及其他电子传媒手段以支持革命运动的重要性。知识分子领袖如阿尔及利亚的弗朗兹·费农(Frantz Fanon,1965)与拉丁美洲的保罗·弗雷里(Paulo Freire,1974),都特别著书强调大众媒介与教育作为革命运动工具的重要性。虽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等批判学派对传播、民意及意识形态众说纷纭,但他们的著作提供了一个经济分析的起点。经历了50年代及60年代初期“热战”的洗礼,第三世界研究从两个方面起飞。首先,他们批判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发展策略,认为这些发展策略是前殖民力量在反帝国主义斗争取得政治和军事胜利之后所发动的一种反攻。其次,第三世界提出一系列研究观点,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依附理论,这些理论建立了了解全球政治经济转型的框架体系。

所谓发展主义或现代化理论的取向也是在斗争中锤炼出来的。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认识到反法西斯主义胜利的光环并没持续多久,因为共产主义——西方所察觉的现象就是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正阻碍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为了扫清障碍,赢得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是击败共产主义,安抚第三世界,西方国家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运动。发展主义正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主要灵感。来自顶尖大学与研究中心的学术精英们结合成集团,制定了如何让资本主义赢

得第三世界的策略。在遭受第三世界学者及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同行们的一致批评之后，现代化理论很容易被视为替资本主义霸权辩解的借口。但这也许是一种误解。毫无疑问，现代化观点是捍卫美国形象的工具，它使人们相信美国作为一个非同凡响的世界性势力，试图帮助其他国家，包括那些被它军事占领的属地，使它们迈进现代化世界。然而，除此之外，现代化理论，尤其是作为一种传播理论，拥有一套复杂的工具，对变迁着的军事、政治及知识背景做出反应，以便建筑又一个霸权。

现代化理论兴起于二战以后，当时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面临着一个根本问题。西方各国面临着横跨非洲及亚洲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以及拉丁美洲的政治动乱，它们发现只有美国才能控制这些发展，才能将新的独立国家置于正在演化的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许多现代化理论被认为是古典社会学的发展模式的变体，这在通尼斯的著作中得到证明，他将传统与现代、都市与乡村、***礼俗社会与礼法社会***区分开来（Mattelart & Mattelart, 1992:171－172）。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它给人一种印象，即那些现代化理论学者是一群只会运用简化的、教科书式的社会学做研究的头脑单纯的社会科学家。其实，像勒纳、波尔及其他的现代化理论学者，不仅阅读了通尼斯的著作，也从他的世纪之交的观点来了解"现代化"概念的转变。

现代化理论意味着国际分工的重建，即将非西方国家纳入正在兴起的国际等级结构中。重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民族建构"，这是一个创造民族精英的过程，以民族主义有效地取代苏联及战后的中国所提出的非主流社会主义模式。在民族认同的旗帜下，这些精英阶层将结合其他社会势力，抵抗来自社会主义革命的挑战，这一挑战试图超越民族差异，把那些被排斥的阶级与社会阶层组织起来。尽管美国反复努力，试图做到这一切，但只通过军事手段是难以达到目的的，美国更无法在国内反对声浪下允许出台一个马歇尔计划帮助不发达国家。[66] 因此，除了军事与经济攻势外，美国利用了传播与情报的工具，也就是早在大战前就有人热衷发展的媒介与信息产业，这一产业从战争中得到了丰厚的利润。[67] 正如萨曼拉奇瓦（1985）与其他学者（Mattelart & Mattelart, 1992; Sussman & Lent,

---

[66] 对第三世界的资助计划如同马歇尔计划一样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即使受到关注，也会像肯尼迪总统对拉丁美洲的进步联盟的提案一样，其实际提供的资金与承诺的相差甚远。在此，我们必须注意到，马歇尔计划之所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承诺，主要在于美国商界急切地想要进入欧洲市场而不受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阻碍。

[67] 有关战争时期的情报活动与美国发展策略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已经产生（Samarajiwa, 1985; Sussman & Lent, 1991）。但是传播策略并不只是从对敌作战中锤炼出来的。事实上，调查与情报研究的显著发展，来自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被俘获的受众"的研究，这是由军方负责执行的（见 Stonffer, 1949）。

1991)在早期的著作中记述的那样,传播策略意味着运用心理战术的方法“来划清真正的朋友或敌人”(著名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所言),以对抗苏联。丹尼尔·勒纳的著作《精神作战》(1949)中已经形成了他后来的经典之作《传统社会的消逝》(1958)一书的模式,后者使用了大量的访谈来刻画那些支持或反对现代化的态度和价值观,他支持那些旨在建构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国际势力。后来,特别是在施拉姆(Schramm,1964)的著作中,现代化理论家们将大众媒介直接视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工具。事实上,媒介发展的水平已成为考察社会整体发展的晴雨表。罗杰斯(Rogers with Shoemaker,1971)从这个基础上展开,开始研究社会变革与革新的整体倾向,包括现代传播工具的引进。这一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对媒介技术与媒介讯息的普遍接受态度对广泛的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它包括改变家庭及更大结构的社会需求、创造市场经济的经济需求以及建立一个支持国家和地方领袖的阶层结构的政治需求。研究革新传播还有另一个目的,也就是要寻找可以接受包括西方大众媒介在内的西方生活方式的对象。

由现代化理论所激发的传播研究计划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它提供了大量的关于第三世界人群的行为、态度及价值观的资料,并且帮助大学成立了传播学项目及研究中心。提及拉丁美洲,麦卡纳尼(McAnany,1986:29)指出,这里的第一代与第二代的本土传播学者,都受过美国功能主义传统的训练,而该传统正是现代化理论的源头。在一个资源缺乏的地区,这意味着大多数学校、期刊及教科书都是由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和美国政府资助创建的。

尽管现代化理论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但是它在改善第三世界人民的实际经济状况方面却无能为力。于是现代化的处方与成就之间产生了鸿沟,而一批正在成长的批判主义者抓住了这一点,部分批评者通过剖析现代化理论,在研究大众媒介时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此现象在拉丁美洲尤为突出,这部分是因为这里是施行发展主义计划的主要地区。对美国而言,自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要与贫穷国家及社会动荡国家分享半球的一般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由于现代化计划带给拉美的“特殊待遇”,批判学术在拉美发展较早,如智利的马特拉、巴西的弗雷里、委内瑞拉的帕斯奎利(Pasquali,1967)及阿根廷的维隆(Veron,1987),[18] 他们是

[18] 安东尼奥·帕斯奎利与埃利斯·维隆的著作在北美并不知名。前者运用存在主义哲学来批判现代化理论的机械形式,他自称对传播没有丝毫兴趣,而更关注以信息与技术作为工具,为拉丁美洲构筑一个大众社会。维隆是一个受列维-斯特劳斯与巴特结构主义思想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批判意识形态,其中包括西方现代化理论。若想回顾拉丁美洲文化研究的发展史,请见阿兰·奥康纳(1991)。

第一批考察媒介发展计划成果的学者。在对教育、大众文化、新闻及电视的研究中，他们发现现代化计划的主要受益者是西方媒介公司，对拉美人民而言，现代化不是浪费他们的钱财，就是加深他们不平等与依附的现状。

自20世纪60年代末到整个70年代，批判研究发展成为一种横跨大众媒介的、以兴起的依附理论为重要基础的研究（Beltrán，1976）。1976年，随着墨西哥市的拉丁美洲研究所（ILET，Instituto Latinamericano de Estudios）的成立，当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得到空前发展。该研究所前身是一批学者的联合体，由费尔南多·里耶斯·马塔（Fernando Reyes Matta）、拉菲尔·伦卡格列罗（Rafael Roncagliolo）、赫伯特·席穆克勒（Herbert Schmucler）及迭哥·波塔勒斯（Diego Portales）领导。研究所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跨国工业，尤其是媒介公司的影响力。它的影响特别表现在国际政策议题的辩论上，这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克布赖德委员会的成员朱安·索马维亚（Juan Somavia）的著作中看到（Marques de Melo，1991：59－73）。根据伦卡格列罗（1986：79）的观点，该研究所的媒介研究论题中有三个中心问题：

1. 跨国运作过程中文化的地位是什么？文化过程中传播的地位又是什么？
2. 除了在国际层次上将需求同质化之外，跨国消费还包括什么？
3. “跨国文化”是否存在，或者说这只是行为的国际化形式？

这个概念模式将媒介放入文化生产与消费过程之中，而将消费放入跨国运作的一般过程之中，然后，它将跨国化、国际化与同质化的关系作为问题核心。[69] 除了记载媒介现代化计划给拉美人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外，研究所（ILET）与其他学者对发展出一个替代它的理论框架（一般指的是依附理论）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从中受益。

在其他传播研究中心里，1983年在秘鲁首都利马市成立的拉丁美洲研究中心（IPAL，Instituto for Latin America）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基地而闻名，在其创建者拉菲尔·伦卡格列罗的指引下，拉丁美洲的研究中心从两个方向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其作用日益举足轻重。拉丁美洲

[69] 该取向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使拉美媒介研究学者早早地了解到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仅重要，而且还存在很大问题。另外，跨国化、国际化与同质化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取向既非简单化的，也非机械化的。

研究中心超越了对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研究,将兴趣主要放在传播与信息新技术的社会关系上,并以此为核心对一种新的现代化理论展开辩论。这种新理论要求发展以市场导向为主的横跨第三世界的电信与远程传播体系。此外,该研究中心也对围绕大众文化及传播而组织起来的社会抵抗文化与非主流社会实践感兴趣。

在哈瓦那大学的恩里克·曼尼特(Enrique Manet)的领导之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古巴得到显著发展。曼尼特(1988)积极从事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研究,并通过对全拉美媒介系统的全面分析,发挥了其作为社会主义者在推进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中的领导作用。

依附理论有明确的理论基础(Amin, 1976; Baran, 1957; Cardoso & Faletto, 1979; Dos Santos, 1970; Emmanuel, 1972; Gunder Frank, 1969),但对其含义的争议仍很大,因此在简介其观点时务必小心。人们达成最一致的观点是:跨国企业以少数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为基础,受到各自国家的资助,通过设定资源、生产及劳动的市场交易条件,来控制核心之外的国家。通过控制交易条件及市场结构的方式,跨国资本建立了所属腹地的经济活动条件,包括该地区的发展。就好的一面来说,这造就了依附发展;就坏的一面来说,这变成了非发展型的发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批判依附理论的学者们尖锐地指出:依附取向只关注外部势力为其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设定条件,而对地方势力与当地生产关系,包括本土的阶级结构的影响却置若罔闻。

另一种依附取向则在辩论中转向文化领域。那些主要对媒介与文化感兴趣的学者考察了由跨国媒介公司和国家控制的生产、行销及接受的流程中的依附现象。这种研究不仅实际评估了现代化理论家如何实现其发展目标,同时也提出另一个解释,将现代化理论家所描述的实践放入更广泛的跨国权力与依附的范围中来理解,从而得出一个公认的功能性观察结果:现代化是造成非发展型发展的工具。

依附理论有广泛的影响力,但同时也受到广泛的批判。它被批判,是因为它只重视跨国企业在发展上的影响力,忽视对内部阶级与权力关系的分析。依附理论家做出了纠正:他们考察当地买办精英的作用及具体地区内富裕的半边缘国家的角色,因为二者在中心—腹地范围内扮演着重要角色。另外,对该理论的批判也指向它的唯经济论倾向,特别要指出的是,依附理论倾向以跨国资本逻辑为基础,国家似乎被这种资本完全控制,转变成只是管理积累过程的工具。对此批判的纠正是拓展依附取向的范畴,结合更为主动的对国家的读解。它使我们认识到跨国国家结构

的发展，例如欧共体（现在的欧盟）、七国集团等，它主要是缓和经济、政治与社会政策上的冲突，同时处理社会阶级、社会运动及利益团体的冲突。再者，依附理论为文化分析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这是第三世界批判传播研究的长期兴趣所在，但这种研究兴趣与依附理论的总体倾向即经济批判却有不合之处。对依附理论的批判特别为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从而能进一步考察整体政治经济流程和涉及到讯息接收与文化构成的过程与斗争（Mattelart，1986）；但是，对依附理论的批判也加强了不同派别的后结构主义对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攻击力度。后结构主义认为，谈论资本流程和政治经济过程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毫无价值，它坚持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错误地从互不相连的，至多是松散结合的地方实践中建构起社会的整体。后结构主义还认为，依附理论只是在创造一种变形的、整体化的论述，根本经不住社会与文化实践的考验（Featherstone，1990；Tomlinson，1991）。

拉美学者向来特别关注用政治经济学观点对媒介结构与实践进行具体研究，这些包括广告（Janus，1986）、国际新闻体制（Reyes Matta，1979）和电视（Beltrán & Fox de Cardona，1980）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及媒介在拉美政治风云变幻中的一般作用的研究（Fox，1988）。除了这些以霸权的明显发展为内容的研究外，拉美研究中还有考察社会反抗与流行文化建构的悠久传统（Mattelart，1986；Reyes Matta，1983；Simpson Grinberg，1981）。[70]

拉美学者近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专注于研究这样一种斗争，即反对通过电脑传播新技术进行的依附延伸。这些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展现了新科技如何成为商业活动进行半球整合的核心，又如何成为商业文化生产的核心。正如奥利维拉（Oliveira，1992）指出，协调一致性一直是南北美洲国家内及国家间贸易协定的核心目标，而电信业整合则是最根本的一步，原因在于电信业提供了商业活动的基本手段，从而促进了企业内部间及外部间的整合。另外，这些新科技的发展也强化了媒介的依附现象。对于那些声称民族精英及其媒介运作势力的不断壮大抵消了依附理论家指出的不良后果的说法，奥利维拉的回答是依附问题“仍然存在和盛行着”：

[70] 正如西格劳伯（1983：11）指出：“一个最‘流行的’误解是对流行文化的‘流行’的认知。西格劳伯认为流行的界定应该是由社会群体自己所构建的、满足自身需求的文化，而不是企业雇用工人，生产迎合市场的文化（如某本词典把流行歌曲定义为“一种专为即时的商业契机而写作的歌曲”）。

> 非发展型发展如同一个协作互动过程,涉及了依附型的工业化、大众媒介、国际广告业、输入的消费方式以及收入集中化现象等。媒介与广告……推动了这样一种消费气候,即使少数人收入增加,而多数人的收入则受到压制。

奥利维拉以对巴西的研究作为基础,提出这样的结论:国家媒介系统受控于与西方资本有密切关系的民族精英们,为获取技术,该系统依赖西方资本,并通过制作提倡消费价值观的节目来支持它,而事实上相当多的人无法达到他们所倡导的消费水准。虽然对巴西的电信及媒介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使法德尔和斯特劳布哈(Fadul & Straubhaar,1991)认定民族主义为一股进步势力,但他们也同意奥利维拉的观点,那就是美国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仍然是主要威胁,因为它们限定贸易结盟与协定只在拉丁美洲国家之间进行,而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则无法达成。

虽然拉美在发展及应用政治经济学上占据领导地位,但该取向的一些重要范式却来源于非洲与亚洲的具体地区。如同拉美一样,这两大洲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针对极端的社会需求和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的失败进行。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非洲,勒纳早期曾在此从事研究,并一直努力将发展取向用于传播(Head,1974,Wedell,1986)。非洲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领袖人物之一布封(S.T.Kwame Boafo,1991:103)将现状描述为:

> 为争取足够的食物、饮水、居所及衣物进行着显然很棘手的斗争;人口出生率持续上升;寿命低;婴儿死亡率高;还有持续的政治与经济冲突,这些造成数以百万计的政治与经济难民……

非洲在描动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运动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遭受了西方政府与媒介的密集攻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默博(Amadou Mahtar M'Bow)仍然在第三世界成员国的大力支持下,继续推动此运动。然西,正如布封指出的那样,运动的结果不仅显示出西方颠覆革新的强大力量,而且也暴露了第三世界完全出于国家主权考虑而造成的改革上的局限。除布封外,尤格鲍亚(Ugboajah)、尤克(Uche)从其他学者中脱颖西出,成为在非洲运用政治经济学研究传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研究涉及广泛,从流行文化(Uche,1986)到新科技(Ugboajah,1986),还包括媒介业的传统问题(Boafo & George,1992)。他们对殖民统治及新殖民媒介系统所造成的后果提出尖锐的批判,同时提出发展反抗的流行形式及介人政策领域的要求。尽管如此,人们仍可将他们的研究与早期传统研究区分开,后者以更

明确的社会主义立场,对媒介和发展进行研究(Ng'wanakilala,1981)。如今,社会主义立场在南非已显而易见,该国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已采用了《媒介宪章》(1992:41),其内容包括致力于现代化发展,但必须以民主化为前提,由全体公民充分平等地参与,这是任何国家策略的核心价值取向。尽管《媒介宪章》回避使用"阶级"一词而以"公民"代之,但它实质上仍在呼吁发展强大的公共媒介系统,由社区及劳动阶级控制,最大可能地为人们提供参与生产、行销与交换传播与信息的机会。

虽然也有人将依附模式应用到亚洲大背景下(Tang & Chan,1990),但传播与信息新科技才是亚洲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核心所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在新科技发展中保持突飞猛进的态势,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在运用这些新科技重建国际分工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前者使日本专注研究电脑传播的社会关系,并形成了大量的文献,这一研究主要植根于"信息社会(joho shakai)"与"信息化(johoka)"的观点上(Ito,1989)。该领域内许多研究起源于马克卢普(Machlup)、波拉特(Porat)、贝尔的早期著作。尽管松田米次(Masuda,1970,1981)的著作在西方更为知名,因为它是用英文出版的,然而,自 60 年代初起,对日本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影响更大的是梅竿(Umesao,1963)独树一帜地用日文发表的关于信息产业发展的著作。对西方读者来说,梅竿的研究观点是重要的,因为它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有机进化论立场吻合,〔伊东(Ito,1989:206)指出:"梅竿的理论让人想起斯宾塞。"〕这种观点也大量反映在贝尼格(1986)最近的著作中。虽然后来的研究淡化了有机的隐喻,但他的著作仍然反映出正统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理论观点。一个重要的例外是铃木莫里斯(Morris-Suzuki,1986,1988,1989)的著作,他批判性地研究电脑政治经济学、日本经济的发展以及利用电脑传播再造社会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后果等议题。铃本莫里斯的研究对于讨论第三世界的传播研究意义特别重大,因为他提供了重要的中介,有助于我们了解影响亚洲研究发展的第二大问题:研究电脑传播方式如何将亚洲的贫穷国家纳人国际分工的新秩序中。

应该承认,发展论的传播与研究主要集中于拉丁美洲,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亚洲。事实上,一个最重要的现代化理论大本营就是夏威夷的东西文化研究中心,它主要支持那些旨在推进美国与亚洲合作的传播研究计划。过去十年间,该研究中心汇集了一系列发展论学者,他们认为自己的发展计划成果已经在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实现,如新加坡、韩国、台湾及香港,这值得欢呼(Jussawalla,1986)。支持者们主要强调经济发展

水平与高科技部门(主要为传播业与信息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国家是发展论中重要的成功实例。铃木莫里斯与一些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约翰·伦特、伦尼·西格尔、麦克·特雷伯以及杰拉尔德·苏斯曼,对以上观点提出了批判。在批判过程中,他们也将亚洲的批判性研究介绍给西方学术界,而亚洲此类研究著作以往很少被发行。[7]伦特(1985,1990)写了大量关于亚洲媒介的著作,并将此地区的研究编辑成集,突出了批判性的学术特点。西格尔通过他的"太平洋研究中心"及其出版物《全球电子信息业务通讯》,论证了亚洲微电子工业的发展过程及其与美国的关系。特雷伯以设在伦敦的"世界基督教传播学会"为基地,通过《媒介发展》杂志来支持亚洲的批判研究。苏斯曼(1984,1991)广泛地论述了有关亚洲传播、信息及发展的问题。这些学者从亚洲批判研究的文献(包括当地期刊、杂志、报告、研究工作报告)出发,主要关注几个批判性焦点。亚洲国家的经济有实质性发展,但同时颇显脆弱,因为它们依赖着核心国家的一般经济状况,尤其依附于美国和日本两国对先进科技产品的需求。再者,即便这两个国家的需求量大,相对优势也很难保持,因为这需要对劳动力队伍加以广泛的控制,包括降低他们的工资,增加工作时间,只提供简陋的工作环境,进行严密监督以及限制工会发展。正如李(Lee,1988)和其他学者(另见 Heyzer,1986)所述,亚洲女性一直面临着最严厉的控制手段。另外,批评家们(Bello & Rosenfeld,1992:92 - 112)指出了农业、工业及微电子工业发展所带来的毁灭性经济后果,因为这种飞速的经济发展完全无视自然环境的保护。早期为新兴工业国欢呼胜利的声音,现已消失,因为核心国家的经济疲软大大降低了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再者,这个地区的劳动力队伍动荡不安,工人们以各种形式联合起来,要求提高工资并改善工作条件,这迫使重要的跨国企业寻找新场所进行低成本生产,并通过制造与装配流程的自动化来取代以前的廉价劳动力。

虽然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针对传播与信息技术,但对大众媒介进行研究的传统影响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印度,这里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影与录像带产业。印度大众媒介研究主要采纳英国和美国的传统观点,再加上印度自身的影响,形成了正统传播学的印度版本,其中包括对发展理论的普遍支持(Kumar,1989)。需要承认的是,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已开始挑战这种主流导向。来自印度的萨伊奈斯(P. Sainath,1992a,1992b)运用阶级分析来考察新闻的生产与扩散是如何受西方的影响及地

[7] 对亚洲新兴工业国的批判研究的回顾,见百洛和罗森费尔德(Bello & Rosenfeld,1992)。

方精英的调整的,对西方企图将印度纳人其贸易服务体系做了批判性的分析。而印度移民曼朱奈斯·潘达库尔(1990a,1990b,1991,1993)则利用他多国居住的便利(美国、加拿大和印度),对电影与录像带产业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提出类似依附形式的重建的论题。他强调文化产业在新殖民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像加拿大和印度这样的国家,拥有一些发展极佳的民族精英产业,但目前却面临着巨大危机。这些精英曾经为了谋取全球发展等级体系中的有利地位而不惜以牺牲极大的国家主权作为代价。如今他们而临着国际资本的挑战,而这一资本却不再需要他们的服务。另外,由于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及国家经济、政治及文化自主权的丧失,民族精英们也遭受到工人阶级及社会运动的攻击。

由于推行数年的发展策略几乎没有获得成功,再加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第三世界引起共鸣,发展论的捍卫者于是修正了他们原先的观点。这个发展论的修正版将对大众传播的热衷转向对传播与信息新科技的推崇,并且承认批判观点的普及性,从中吸纳部分观点来充实新发展论。早期现代化理论文献将都市化与大众媒介的发展混为一谈,主要强调发展大众媒介(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及电影)的基础建设。针对对以上建议和计划的批判,新发展论者将重心转移到新科技上,认为发展需要建设电信与电脑传播的基础设施。这一修正观点坚持商业引导现代化进程,并指出虽然任何一个项目都不容忽视,但目前为商业建设一个电信与电脑传播的先进基础比建构大众传播系统更为重要。新版的发展论观点要求建设一个最优良的数字化传播系统,使发展中国家经营的企业有充分机会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UN,ITU,1985)。

修正版发展论的第二个要点是承认批判性研究(包括本土批判研究在内)已经得到普遍的成功。根据对拉美与美国传播学者的观察结果以及引证分析拉美的传播学刊之后,查非(Chaffee,1990)等人得出结论:北美学者对批评学者的影响力的认识不够充分,尤其是对马特拉的拉美研究成果的影响认识不充分。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学者认为拉美学者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赖于他们所谓的"实证"学派的思想,从事着发展论的研究。然而持相反看法的学者却认为,拉美学者及学术期刊反映出政治经济学与符号学思想对他们的巨大影响。[72] 虽然查非等人(1990:1023)将以

---

[72] 调查的不利之处在于采用了罗杰斯违反常态建立起来的概念框架来分辨"实证的"与"批判的"研究。因为许多批判研究采用的方法,从社会科学的哲学观来看,就是实证方法,因此这个框架是无效的。实际上,"实证"的类别包括的是那些捍卫发展主义取向的领导者;而"批判"学派则包括那些该取向的反对者。

上情况归因于文化因素("葡萄牙及西班牙在此地的文化遗产与北美所继承的北欧传统相当不同"),但他们也承认,批判取向对于解释拉美的现实状况更为有用:

> 源于一种高度阶级分化的社会经济秩序的社会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流行于拉美,它们与此地区现实的吻合度,远比富裕的美国要高。(1990:1024)[73]

现代化理论承认批判学派的普及性,并做了一些自我调查,修正了一些正统观点,以赢回那些曾是它主要听众的第三世界学者。罗杰斯对修正的必要性有着惊人的先见之明。他于1976年开始做基础研究,承认发展论中科技取向的失败,因此他呼吁把地方化实践结合到现代化综合理论中。这种修正或者说增补的结果扩展了某些观点,而非从根本上进行变革。修正发展论的实质是继续输出西方科技,而将重点转移到电信产业上,即使不输出具体的西方节目,也会结合西方媒介模式。这种修正主义倾向的特点在于实施过程中对地方社会结构与文化实践有了更大的依赖性。以前的观点是,人们实现工业化之前必须接受西方价值观,而如今的观点则呼吁人们在接受西方价值观的同时,也结合本土文化与批判取向。实际上,它的结论就是:我们可以采纳保罗·弗雷里的方法,来兜售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近年来,一些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观点开始支持这一修正主义的立场,反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观点,即资本、阶级与国家是鼓动人们采取行动的核心力量,足以对社会与文化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后结构主义一旦达到极端,就会否定政治经济力量在影响人民的生活方面能产生出任何相关联的意义。后结构主义结合现代化理论学派,强调政治经济的力量已经削弱,因为在一个松散结合的、多元主体性的及日益随机解读的世界里,政治经济的力量已趋于消解。按照这种观点,实际上没有一张"地图"能将时代—华纳公司或松下企业与秘鲁或印尼的村庄连结起来。后结构主义认为,有人也许会谈到,在企业策划者和村庄长老的脑海里会主观性地制造出多种地图,但如果得出结论说,一个地图更为实用,那无疑是受到了历史主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总体论述等启蒙主义思维的毒害。

---

[73] 这等于承认"实证"取向没能做到它该做的事,即描述事实。而批判取向没有采用实证的定义,却准确完成实证方法应做的事情。在判断一个研究取向是否有价值时,有哪项标准比"更吻合现实生活"来得更重要呢?

这样的取向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论批判观点正相吻合，它特别强调核心资本的相对权力及权力使用对世界各地的影响。尽管如此，现代化理论与后结构主义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正将自己的方法论与政治立场推向危险的边缘。后结构主义无意去了解是否可以用传统的科学技术认识发展现代化的意义及需要现代化的原因。谈及这些问题的后结构主义者（Tomlinson，1991）喜欢采用马绍尔·伯曼（Marshall Berman，1988）在《所有固体必将气化》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现代性的惟一含义就是消除结构、固定不变、本质及意义本身。与马克斯·韦伯的“铁笼”社会学说法相呼应，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连结时代—华纳公司与村庄之间的关系不是权力系统，而是全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两者之间的磨擦碰撞带入一个未知也不可知的世界。

总述与挑战

传播政治经济学涵盖了广泛的知识领域，同时也面临无数的挑战。如果它不是一个团体的话，至少也是一种国际学者的集合体，学者们走到一起并不是因为单一的理论观点或问题，而是因为同一取向的学术活动。

我们不能说这种取向是由一个学者团体组成，因为多数研究成果都是个体学者通过非正式结合或参加诸如“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等学术会议而取得的。[24] 对专题的兴趣将政治经济学家跨领域或在领域内联系在一起，这些专题包括传播业的经营、国家的角色、企业与国家部门之间的联系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广泛的全球和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的关系。这些关注通常是用权力的语言建成框架，有的是体制的权力，也有的是阶级权力。另外，新的主题也开始出现，诸如生产、论述与接受的关联性；阶级权力与性别、种族的关系；跨传播业及传播业内结构变迁的意义；这种变迁对劳动与劳动过程的影响；私有、国有与公共传播之间的关系；等等。

这些范围广泛的关注十分重要，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政治经济学内

[24] 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支持它的许多研究分支，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小组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根据丹麦教授罗宾·奇斯曼（Robin Cheesman，1993年7月书信）的说法，这个小组成立于1976年在莱斯特大学召开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的年会上，命名为“唯物主义理论小组”，有25到30名成员，包括罗宾·奇斯曼、尼格拉斯·加汉姆、费尔南多·佩龙（Fernando Perrone）、罗克·法洛尼（Roque Farsone）、赫伯特·席勒、格拉姆·默多克、彼得·戈尔丁及珍妮特·瓦斯科。他们以政治经济学小组的名义于1980年在罗宾·奇斯曼与匈牙利的塔马·斯泽克斯可（Tama Szecsko）教授主持下召开会议，此后小组成员就固定于每年的年会中碰面。1987年匈牙利的佐顿·雅卡布（Zoltan Jakab）当选为主席，笔者于1990年至1994年任职主席，而现任主席是1994年当选的潘达库尔。

部共识与争论的内容。除此以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们共享着一种学术态度，或多或少算是这一取向的特色。首先，就算被批评为历史主义、变化的、虚幻的与简单的叙述，政治经济学家仍坚持历史的重要性，并强调分析必须采用历史的与同期的方法。其次，虽然系统化思考有其局限性，特别是从非历史的、脱离实体的功能主义形式的角度来看，局限性尤为突出，但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在社会各种力量中存在着社会整体，传播工具只会使整体性更为强化与复杂，因此政治经济学需要将传播放人广大的社会整体中去思考，而这个整体正是从全球政治经济中锤炼出来的。政治经济学而临的挑战是如何理解社会整体，但又不能回到修正主义的对应论中去，要做到不直接从社会中解读文化，也不直接从文化中解读社会。

再次，政治经济学家也一致认为，虽然道德化毫无疑问地支持某种特定的价值立场，因此应该回避，但是研究者仍须结合道德哲学层面的内容来思考，也就是从社会行动中了解道德立场的作用。同时他们认定，知识分子不仅仅代表一种超然的智慧，更代表着能进行道德判断的社会实体。作为社会知识分子的扮演者，研究者对不同的道德立场提出质疑并将这些问题纳人自己的研究分析之中。最后，政治经济学家还反对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一个学术团体的成员而已。他们接受葛兰西对有机知识分子的解释，被一种实践意识所鼓动，同时被一种由行动来解释世界的要求所鼓动。尽管如此，凭着他们致力于研究的美德，他们认识到，解释是一种社会行动的形式，虽然只是众多形式中的一种而已。他们反对将思想与行动、学术与政治分离的二分法，因此他们不是只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而是将研究视为推动社会转型的工具和方式。

通过这些方面的自我学术定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们走到了一起。正如前一章所强调的，其中会有许多不同的研究领域，包括对构成自我定位的方面的不同程度的强调。例如，每一个研究都采取不同的价值立场，有人致力于研究民主的传播，有人则专注于描绘现时的传播政治经济状况。因此这些差异只是强调的程度不同，相对的明确度不同。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差异所造成的不同的研究结果。此外，政治经济学中有形形色色的独立派别，分别探究应该选择何种取向作为研究分析的基础。举例来说，有两种不同的取向值得注意：一种专注于全球政治经济，比如强调跨国传播集团的权力；另一种观察媒介公司内部运作中资本逻辑的矛盾冲突，如生产过程中的冲突。另外，还有一些研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如有的坚持以社会阶级作为研究的核心；有的则强调整体政治经济学

中的性别分析或种族分析。再者,关于体制结构、文本与讯息接受中的社会关系的相对位置,仍然百家争鸣,众说纷纭。

这一系列的差异表明,这门学科涵盖了一系列不同的立场、兴趣、侧重点及对立关系。有人指出,在多样化的政治经济学之下掩盖着一种企图,即想要将政治经济学简化为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论,当它发展到极端时,唯经济决定论就取代了一切。这种指控存在两大问题:第一,它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的深度与广度,而实际上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证明自己早已远远地超越了正统经济学;第二,它没能真正了解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不是决定性的或最根本的,但当今天全世界大多数人都面临着经济剥削的严峻现实时,这种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下编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反思与更新

虽然政治经济学的多元性使它十分强大，但如同其他学术立场一样，它也面临许多挑战，以下各章将对此进行探讨。由于这些章节涉及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反思**（rethinking），因此界定它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由于世界政治和学术的巨变已经使这个术语蒙上了一层阴影，可能会妨碍我们对它的理解。

反思和**修正**（revision）与**否定**（repudiation）是有区别的。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提供的是较小的改善，如使用现在更为流行的语言或接纳敌对方的次要观点，这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面没有实际的改善。例如，修正主义者的现代化观点使用的言词是持续发展、权力分散，但不去挑战它自己的根本假设（如把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和私人控制传播工具）。而否定则抛弃了本取向的基本假设，目的是以截然不同的观点加以替代，或是以根本的方式加以转变。功能主义者对行为主义者的批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纵观 20 世纪 50 年代的社会科学，特别是在社会学方面，功能主义试图凭借某些胜利扫荡行为主义的传统，帕森斯考虑到主体性和意识的问题，试图以目标取向的行动理论取代英美心理学的物理主义模式。[1] 阿尔都塞的论述是另一

---

① 这在帕森斯的著作中表现得特别明显（Parsons, 1966; Parsons & Shils, 1951）。他提出行为的一般理论，提倡以控制论方式研究社会结构。后者在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 1957）的主要著作中有所反映，它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多数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传播与信息研究（Beniger, 1986）。有人认为，帕森斯和其他功能主义者的著作代表了保守主义者的选择，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对立，马克思主义则是它在学术结构上主要的替代取向。这一观点比较准确，然而片面，因为它忽略了功能主义与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及霍曼斯的行为主义社会学之间的对立。

个例子,他试图通过排除历史、人文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等要素完全改变马克思主义,虽然他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要素,但结果是他的做法更接近于否定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继承和改善它。

反思介于修正与否定之间,它既不是修正主义者进行的机会主义的修补,也不是因为"实际上的"否认而形成的转变。反思的起点是以批判的态度承认这一取向的核心原则及多元诠释。所谓批判,我指的是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取向和它的不同流派,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并将它们与另一些理论取向再做对照。第二,反思需要该取向具有必要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反省的能力,能够检查自身的根本的认识论和概念基础。第二点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尤为重要,因为它很少这样做。诚然,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它所处理的具体课题如媒介所有权的日益集中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以至于它很少去回顾自己的学术根基。这意味着政治经济学阵营的人恪守了实践的目标,也表明由于向外观望世界的趋势占据了最突出的地位,政治经济学很少向内检视,很少思考它在传播研究中凭借什么来占据核心位置,也很少思考它凭借什么来作为理解全球政治经济的重要工具。就此而言,反思意味着仔细审视既有成就,同时要批判地反省这些成就与本取向的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最后,反思意味着直接的对话,也就是与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或根本不同于政治经济学取向的思潮展开对话。反思并不是修饰旧的取向,这是修正主义的做法;也不是排斥原有立场的核心原则。更准确地说,反思的目的是促进自我反省,使人明白什么是这一取向的根本基础;同时对与其他取向进行的辩论产生影响,其最低效果是提醒那些主张其他取向的人,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具有重要意义。

认识论

由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趋势是向外观望,因此,它对自己的理论之理论或者说认识论没有多加关注。在陈述反思的根本性构成元素之前,有必要简要概括第 1 章讨论的认识论的要素。这里采用的取向以**现实主义**的认识论作为开始,认为现实是由感官观察和解释行为共同构成的。它避免了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极端,坚持只有通过经验和理论方法的结合,才有可能理解现实。另外,这个认识论观点采纳了***兼容并蓄***和***非简化论***的取向。这意味着,虽然它并不赞成知识的多元论,因为多元论认为任何诠释模式均属有效,但它仍然对众多诠释取向采取开放的态度,

并不认为所有的现实都可以简化为一个具体的因果力量。

我们的目的是要使认识论航向保持在相对论与本质论之间。前者的代表为罗蒂(Rorty,1979)的对话认识论,他把"准确的表现"解释成"帮助我们做任何想做的事"的事;后者则想把社会与文化实践简化为某种核心本质,而不管它是否是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我们避免提到因果关系,因为它会限制社会分析。[②] 使用"因果关系"这一术语,立刻就把我们的思考引入特定方向,使人想到一个事物(单一实体,或被视为一套实体的多个事物)直接对其他事物(单一整体或多个整体)产生影响,转换了其状态。这个术语使我们无法考虑事物的组成部分如何相互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的思考停留在固定的事物上,无法转到过程中;停留在它们的线性关系上,无法转入非线性关系。我也不愿意使用决定论的语言,因为这种语言更强烈地暗示说,一个不变的事物会改变其他的事物。使用决定论意味着设定限制的说法(Williams,1975)已被学者们接受,但在我们的精神上还留着传统物理学的印记,它以为无论通过因果关系还是设定限制,某些不变的整体会改变另一些整体。弗洛伊德提出了多重决定的概念,阿尔都塞的著作使它取得显著地位,这个概念标志着向语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种语言使我们把社会理解为每一个社会行动、过程和结构相互决定的结果。每一个行动、过程和结构都是社会领域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独的存在,这个领域包括许多矛盾、冲突和联合,因此每个部分也都包含着矛盾冲突的力量,彼此作用,相互影响。结果是,一个动态的社会领域不可以被简化为任何特定的元素,它应该由纷繁芜杂的结合与分裂构成。

认识论的这种解读方式拓宽了知识过程,它不再是简单的决定关系,而是多重的、动态的互动。然而,这么做的代价是转移了特征的要点,如使用决定论的术语,就要精确地决定如何认识某些结合与分裂,还要知道概念上与经验上的实体如何达到特定的结合。

泛化决定的语言有效地推进了我们的知识理论,这种理论满足了对传统决定论取向的批评。批评者指出,决定论把一个由动态的、复杂的、非线性的关系所构成的社会整体过于简化了,但这种批评并未完全取消决定论。这一推进很有用,但我们可以进一步考虑,是否可以完全抛弃决定论呢?这的确值得考虑,我们完全可以将决定论束之高阁而代之以其

---

② 我们很快还要加上一句:这个结论并不限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和哲学家(Resnick & Wolff,1987)认为,对于所有需要非线性和过程导向的思考,因果概念会限制解释的形式。

他提法。在其他提法中，**相互构成**(mutual constitution)有许多长处。***构成***这个术语使形成和界定过程的各种要素中的互动凸显出来，它强调的是社会领域中所有要素的***转变过程***。没有什么东西是已经形成或完全清楚界定了的，但我们仍然可以找出，在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有哪些特定的过程在运转，从而决定了构成过程及各要素关系的性质。比起"多重"，"相互"更为可取，它保留了"纷繁芜杂"的意思，但没有"多重"所表示的极端含义。

以这种观点看来，社会领域由许多***过程***组成，这些过程的内部要素之间共同构成各种关系。这些要素包括结构(如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可供社会科学分析的东西)、这些结构之中与之间的结合与分裂关系以及研究者为了解这些结构和关系所进行的思考、认识概述、概念框架和调查过程。我们所谓的研究成果是由研究过程的客体与主体共同建构而成的，具体而言，社会构成过程中就包括研究这一活跃过程。

我们的认识论更进一步被确定为***批判的***，因为知识的产生必须通过比较的过程，包括在可供选择的理论构想中比较，在一整套特定的理论构想的下一级构成之间比较，在相互构成知识实践的成分中比较。这些是理解这个世界和改变这个世界的保证。

本体论

与这个认识论取向相结合的本体论强调社会变迁、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这些与社会研究(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倾向不尽相同，后者关注于结构与制度。这也就是说，采取这个本体论的研究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变迁无所不在，而结构与制度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因此，找出过程的特征比将制度冠以特定的名称更可取。遵循这一原则，我提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框架，并找出三种进入***过程***。作为起步的过程是**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即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然后，分析进入**空间化**(spatialization)，即空间与时间的转化，或者说制度的延伸过程；最后进入**结构化**(structuration)，即社会能动力量形成结构的过程。通过这些过程强调社会变迁不是要以此取代结构与制度，这么做等于是以此种形式的本质主义代替彼种形式的本质主义。这些起点是为了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实质理论，这或许是理解社会领域的众多合理手段之中比较可取的一种。

理论参数

上述这些过程是***起点***，因为它们打开了分析之门，协助我们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架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任何本质的独特性，以至于其他所有社会过程或其他结构都可以简化成这三个过程，从而穷尽政治经济学在传播领域的应用。事实上，每种起点不仅有自己的结合点，也有分裂和脱链，同时也有对立和非此即彼的选择。最后，它们彼此相互构成，也与社会其他运作过程相互构成。虽然有许多过程可供选择，但笔者选定这三者，认为要发展基础宽广、兼容并蓄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它们应当最为可取。它们不仅能够处理传播政治经济学内部的问题，也能回应相邻学科（也就是政策研究和文化研究）提出的挑战。

商品化指的是将使用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多种方式延伸到传播产品、受众及劳动等社会领域，但令人失望的是，很少有学者注意对它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第4章强调的“商品化”过程刚好与奥非（Offe）所用的术语“非商品化”相反，后者强调的是公私生活中抗拒商品化的各种形式。***空间化***的过程包括全球化或是全球范围内传播产业的集团化，也包含产业的重新组合及它们在多个层面的整合，也就是马克思、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等人称之为空间与时间的转换的过程。空间化过程中也有分化和反对的力量，来自民族建构（或者说民族性）与公民身份的形成过程。最后，***结构化***是指结构由社会能动力量相互构成的过程，或者更加具体地说，即使结构就是构成过程所必须的媒介，它也还是由能动力量所形成。结构化的结果是围绕着相互联系又彼此对立的议题如阶级、性别、种族和社会运动等形成了一系列社会关系及权力过程。

我们先大致浏览、讨论一般的政治经济学文献，然后转入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反思，最后再移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邻近学科，也就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与**政策研究**（policy studies），从而结束本书。笔者的目的是通过考察发生在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的边界交锋来深化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并在这个过程中评估这些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取向的长处与短处。

第4章

商品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Marx,1976a:126)

路易斯·马林说，从经济学修辞中选取一段陈腐的叙述，然后把"市场"、"资本"或"利润"与"语言学的"、"符号的"或"有区别的"等限定语相联系，以便使其具有意义，这不是比喻，而是拙劣的模仿——换句话说，这个描述与分析的策略使术语和概念脱离了它们的生长土壤，使术语和概念游离了让它们产生意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像是把术语和概念放在不同的舞台上使用。

(Cot & Lautier,转引自
Mattelart & Mattelart,1992:16－17)

本章描述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的实质内容，出于以下原因，我们从商品与商品化开始。首先，商品化的过程描述了资本主义如何完成它的目标，即资本积累或者说价值通过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换而得以实现。其次，本章仿效马克思的做法，他在《资本论》

的开始也是讨论商品形式，他指出，正是通过“庞大的商品堆积”，资本主义才表现了自身，这是它最通常的具体表现。最后，从这个概念着手后，我们必须调整传播领域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概念平衡。如同本章所展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确讨论了商品与商品化的过程，然而它有一个偏向，即把大量注意力放在生产和分配商品的商业制度和商业结构以及规范这个过程的政府机关上。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纠正传播研究中的一个倾向，这种倾向过分关注分析内容和理解内容的不同方式，而不去分析产生传播产业结构的原因。这种纠正是必要的，但过于关注结构的缺陷等于是把内容分析全部让渡给了对政治经济学毫无兴趣或很少有兴趣的人。政治经济学不是不关注文本，它认为文本应当得到较多关注，但必须把它放在彻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来考察。

亚当·斯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分了产品的两种价值，一种价值来自对人类欲望或需求的满足，也就是使用价值；另一种是用来进行交换的价值，也就是交换价值。商品是特殊形式的产品，其生产主要围绕着交换过程而进行。***商品化是把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商品分析开始，因为他发现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最容易看到的形式，是它的最直接的表现。资本主义***表面上***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虽然这个表象并没有逃脱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注意，但他们却倾向于认定这个表象的形成是自然发生的，马克思的批判起点就从这里开始。古典主义者认为是“不证而明、自然天成的必然物”，马克思则指出：“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1976a:175)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关键之一，即影响后来所有政治经济学派的一个传统，正是发掘商品的表象究竟代表了什么，揭示凝聚在商品形式中的社会关系。加利的著作(1990)是传播研究文献中寥寥几部对商品形式进行持续性分析的著作之一，他指出，马克思对商品和使用价值采取了宽泛的视点。马克思认为(1976a:125)，商品的产生来自范围广泛的需求，包括生理的和文化的需求(“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商品的使用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界定。商品可以源自不同的社会需要——消除生理上的饥饿，符合或违背特定社会团体的地位规范。更进一步讲，马克思的观点与某些人的诠释相反，他认为使用价值不仅限于维持生计的需要，还延伸到社会建构的范畴。

有些人对此说法表示不满，他们认为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使道理更加模糊，而不是更加清楚。例如，萨赫林(Sahlins，1976：15)认为，马克思承认所有的价值都有社会属性，但倾向于***把使用价值视为自然天成***，

“由于强调了它们满足‘人类需求’的生物因素，却使得使用价值由社会决定的事实消失了”。鲍得里亚(1981)延伸了这一批评，他认为使用价值最终被排除在一系列的结构与符码之外，而正是这些结构与符码形成特定的交换价值。这个批评提醒我们，马克思的主要目标在于拷问资本，在把这个目标放在首位的前提下，他没有详细论述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其中包括使用价值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不过，文化批评反过来又圈定了政治经济学难以穿越的疆界，因为它的目的不只是要指出政治经济学观点的缺陷，还要代之以唯心论者的相对主义，认为价值就是符码所表现出的任何意义，同时又由于人类文化实践的多变性，价值简直等同于任何东西。政治经济学承认这种多变性，但认为使用价值的疆界会受到商品结构属性的制约(马克思的用语)或限制(威廉斯的用语)，使用价值从这些结构属性中获得存在的性质。按照鲁宾的概念，加利(1990)认为不妨使用“局部必然性”这个说法，以此说明马克思认识到“使用价值并非悬在半空”。也可以说，各种使用价值是多重决定和相互构成的，我们可以保留这样一种划分，一方面是社会建构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来自特定的社会安排(也就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市场)的价值。

剥去马克思所说的商品表象的“洋葱皮”，就可以揭示整个生产体系。商品化和传播的关系具有两个普遍的意义。第一，***传播过程和传播科技对经济学中的商品化的一般过程起了推动作用***。例如在制衣业中，传播渠道改进以后，特别是全球电脑和电信传播技术引进后，整个生产、分配和销售循环的信息就丰富多了，从而改进了库存控制，因而节省了空间，并且使生产者和销售商越来越有可能只储存顾客需要的货品。第二，***整个社会的商品化过程渗透到传播过程与传播制度中，使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深化和矛盾也对传播这种社会实践产生了影响***。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风起云涌的自由化与企业私有化趋势，对整个世界的公营与国营媒介和电信机构都造成了冲击。

我们的兴趣既然在于对传播作一般层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因此，从商品化的一般过程开始，探讨它与传播的关系是很有帮助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生产过程从资本家购买两种商品——***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开始。所有产品的销售所得应当大于原始投资，超过的部分被称为**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它可以用于投资，扩大资本积累。本质上，资本是通过生产和交换过程而增值的价值。马克思的理论把这个分析又推进了一步，它指出这些过程是***剥削的***过程，因为资本主义的扩张扫清了其他生产体系，使劳动力成为一种只具有商品地位的社会关系，或是成为一种与土地

和原材料并列的生产要素，并且被迫放弃对生产工具的控制。结果劳动者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但所得不足以补偿所出卖的劳动。然后，通过绝对的（延长劳动时间）和相对的（增强劳动密度）剥削过程，劳动力商品被复制，剩余价值的攫取被强化。剥削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必不可少的事物"，但剥削的程度取决于阶级斗争的情况。因此，其表象充斥了资本主义形象空间的商品，也是一套固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把资本与劳动力商品连结在为控制价值（它是通过生产与交换形式的）而进行的斗争中。[①]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使剥削的社会关系具体化了。它给予这些关系一种凝聚的形式，使它看起来是天生如此的。因此，表面上看起来，一部电脑也就是一个商品，有一套使用价值，有一个以价格为标志的特定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存在蒙蔽了我们的理解能力，使我们认为电脑不是国际分工的具体表现，不再是以阶级、性别、民族与空间范围等来划分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对**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研究中揭示了更深一层的蒙蔽。根据他的观点，商品不仅凝聚了社会关系，也包含了价值的斗争，商品呈现出一种生命状态，产生了自己的力量，凌驾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上。马克思（1976a：165）认为，这种情况曾经只存在于宗教领域：

> 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商品拜物教比宗教更有力量，因为商品是一种物质的具体展现，它对感官的诉求比宗教信仰更容易。[②] 若是这样看来，商品包含了双重的神秘化。首先，它把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自然化。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电脑，不是在生产线上展开的抗争。第二，商品被具体化了，也就是说，它有了自己的生命，能够对抗社会的王国并加以控制。

---

① 我的认识论排除了本质论，本质论会将表象简化为社会关系的本质。笔者回避本质的术语，把商品视为一种相互构成，一边是表象（如汽车、情景喜剧或新闻广播），另一边是使表象得以展现的社会关系。

② 有人可能对此有争议，认为这么说把实体与物质的力量不恰当地夸大了。不过，关于商品拜物教的争论也不必依赖商品比宗教信仰更为真实的说法。

第一点将商品视为生产过程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社会斗争后的社会产物；第二点完全切断了商品与生产过程的关系，把它置于自己的王国里来控制社会生活。电脑变成了超越于人的力量，也就是塑造、决定、约束、控制社会发展的力量。这种双重神秘化的结果是社会过程的产品有了自己存在的地位，有力量塑造社会生活。

商品化指的是把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即决定产品价值的标准由产品满足个人与社会需求的能力转变为产品能通过市场带来些什么的过程。政治经济学很少解析这个概念，部分地是由于它历来重视结构和实体，而不是过程与联系。不过，政治经济学在论及资本扩张的时候，还是涉及了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某些重要著作(Ewen，1988；H.Schiller，1981，1989)都涉及了市场机制的全球扩张、公共空间的私有化以及交换价值在人际生活中的扩充等现象。

这里的分析必须把商品化与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和实体化(objectification)区别开来，后二者经常与前者相联系。商业化过程的涵义比较狭隘，它特指在受众与广告商之间创造一种关系。例如，广播的商业化意味着增加广播广告，安排节目的时候考虑如何把受众交给广告商。由于市场不仅包括商业化，还包括劳动的商品化，因此我们将商品化视为涵义广泛的过程。实体化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它常常与商品化混合使用。例如，卢卡奇(1971)在论述物化的著作中，认为物化的过程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披上物的性质，从而取得了‘幻觉的实体性’”。商品化是这种过程的特殊形式，此时取得幻觉的实体性的“物”就是商品，也就是说，它成为一种在市场中实现价值的实体。虽然卢卡奇的论述非常仔细，他还是倾向于不区分商品化过程和物化过程，如今被认为持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那些人也有这样的偏向(Luke，1989)。持这种立场的人可以理解，他们“认为商品化已经彻底支配了文化的每一个领域”(Luke，1989：10)。不过，这样的看法会造成误解，不是使人误以为商品化已经征服了一切(因为商品化是一个非常整体化的过程)，就是反过来把这个概念连根拔起，使它脱离原来的意义，不再限定于市场交换的过程中，而是包含了非个性化和实体化的所有过程。诚然，后者让我们可以分析抗拒的形式，但代价是使商品化这个概念弹性太大，丧失了指出某种特定内涵的能力。正如马克思在仔细区分宗教和商品拜物教时所理解的那样，后者是特定历史发展造成的结果，而不仅是反人文主义的最新表现。我们不能一方面赞同马克思，另一方面又声称，在马克思的著作出版后，生产力的发展已达到另一个层次，以致商品化等同于实体化。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如果不

诉诸简化论和整体化的分析,我们就不可能采取这样的立场,保留商品化的最初意义。如果放弃了商品化的原始意义,我们也就无法辨别市场与非市场机制和过程的差异。

传播的商品形式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长处在于它向来强调结构形式的重要性,它一直致力于描述并分析影响传播商品的生产、分配与交换的结构形式,并主要考察国家如何规范这些结构。虽然政治经济学并未忽视商品本身和商品化的过程,但它仍然倾向于强调企业与国家的制度和结构。当政治经济学开始分析商品时,它倾向于关注作为商品的媒介内容,其次是媒介受众,对于传播业的劳动过程的分析却是数量少得惊人。强调前两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全球媒介公司日益显现出它的重要性,媒介内容的价值在快速增长。像时代—华纳这种紧密整合的跨国公司有能力生产多重形态的媒介产品,例如,最开始可能是在美国及海外剧院推出某部电影,大约在六个月之后,以录像带发行,过后不久安排它进入按片付费电视频道和收费有线电视,或许最后是在无线电视频道中播出(见表4-1)。尽管这些机构很重要,但强调它们的活动也意味着对大众媒介的商品形式关注不够,特别是对受众和劳动的商品化关注不够。

内容的商品化

政治经济学家思考传播的商品形式时往往以媒介的内容为起点。具体而言,他们认为传播的商品化过程涉及了讯息(或者是一份资料,或者是有体系的思想)如何被转化为可在市场买卖的产品。例如,报纸记者的工作是运用专业技能,生产虽然实用程度高低有别,但都具有使用价值的新闻。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闻生产的历史由许多过程组成,其中包括商品化,也就是使讲故事的人变为出卖劳动力(即撰稿能力)赚取工资的雇佣劳动者。资本将劳动力转化为新闻稿或专栏文章,和其他文稿及广告一起组合成整套的产品。资本把这套产品在市场中出售,如果成功,就赚取到剩余价值(利润),资本可以将利润用于扩充报纸的规模,或投资在其他任何可以带来更多资本的事业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这个过程实现了剩余价值,因为资本控制了生产工具(拥有印刷机、办公室等),使

资本能够从劳动者身上获取比付出的工资更多的东西。

表 4-1 商业化的过程(1983 与 1990 年)

1983 年的商业化阶段:	
开　　始	电影在美国电影院上映
开始后数周	电影在全世界电影院上映
开始 4 个月后	录像带在美国销售
开始 1 年后	电影进入美国收费电视频道
开始 1 年后(大约)	电影在美国电影院重新上映
开始 2 年后	电影在无线电视频道播放
开始 2 至 3 年后	在美国之外的电视频道播放
1990 年的商业化阶段:	
开　　始	电影在美国电影院上映(很多不是大制片商的电影)
开始后数周	电影在全世界其他电影院上映(很多不是大制片商的电影)
开始后 3 至 6 个月	录像带在美国销售
开始后 3 至 6 个月	电影进入美国按片付费电视频道(12 个月内可播放 15 至 18 次)
开始后 6 至 12 个月	录像带在世界其他地区销售
开始后 9 至 15 个月	电影进入美国收费电视频道
开始后 1 年	进入美国以外地区的有线及无线电视频道
开始后 30 个月	电影进入美国电视网播放(3 年内播放 2 次或 4 年内 3 次)
开始后 36 至 42 个月	进入美国电视节目供应公司
开始后 36 至 42 个月	在收费电视频道重播

资料来源:IDATE,1992:62.

剩余价值实现的程度取决于劳动者、消费者、资本市场等众多因素。就劳动者这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前者指延长劳动时间,但工资不变;后者指通过更加严格地控制劳动时间(包括工作测量标准的改变和调整监控系统以提高单位工作时间的产出),提高劳动强度。这种策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劳动者的反抗能力,而劳动者的反抗又取决于劳动者的组织力量和社会一般条件(如资方是否有能力使用新的工人和新的技术代替原来的劳动力)。

资本也试图控制消费者,其手段是采用一系列策略,最终取得"自然"的地位,成为理所当然的产品提供者。这些手段包括营造市场垄断地位或控制寡头垄断的协议,用广告塑造公司与产品形象,以及通过增加产品

的品种达到灵活经营的目的来克服市场需求决定的特定产品的变动，等等。和劳动者方面一样，剩余价值的实现依赖于消费者的抵抗能力，而消费者能否抵抗同样又取决于消费者组织的历史以及一般社会条件能否提供替代的产品与服务。最后，剩余价值能否实现还取决于资本市场的情况，特别是取决于资本的成本，因为有了资本才能替换劳动者并且扩张商品形式（例如，从报纸形态到收费的有线电视新闻频道）。

以上系统地勾勒了通过传播内容制造交换价值的过程，它把整个复杂的社会关系都纳入商品化的轨道中，其中涉及劳动者、消费者和资本。传播研究往往关注内容成为商品的问题，然后去辨认内容的商品性质和它的意义的关系。研究结果认为，传播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十分强大的商品，因为它除了能生产剩余价值外（由此者来，它与其他任何商品相同），还制造了符号和形象，其意义能够塑造人们的意识。大量研究证明了这个取向的价值及其结论，它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媒介主要是通过生产反映资本家利益的讯息，通过不断支持整个资本或特定阶级集团的利益来扩展商品生产的过程，这一过程充满了迂迴、矛盾或抗争（Herman & Chomsky，1988；Schiller，1973，1984，1989，1969/1992）。虽然政治经济学家大都同意这一结论，但某些学者（特别是加汉姆和斯密塞）提出了另一些研究方面。他们两人都认为，传播研究过于强调媒介产品的意义或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加汉姆从开始学术生涯以来，就一直以最猛烈的炮火轰击那些放弃经济学分析而采纳“自主的论述”的人。③不过，他也关注政治经济学中的另一种倾向，即采取加利所说的“传播的消费者模式”来研究讯息，研究讯息的意义和意识形态，但却没有充分地将大众媒介当成“经济实体来研究，媒介不仅是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经济角色，也是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角色，前者通过生产和交换形成，后者通过广告为其他商品生产部门运作”（Garnham，1979：132）。如用这种方式解读，大众媒介之所以十分重要，不仅因为它们是商品生产的直接场所，也是因为它扮演

---

③ 加汉姆在1979年出版了一篇较有影响的论文《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他写道：“因此，经济主义对社会存在的决定因素做出了及时又理性的回应，它关注的是在占统治地位的交换关系中的迫切的维持生计问题和再生产问题。被E.P.汤普森最近称为‘凑在一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却很容易忘掉这一点，原因是双重的，一是他们生存的物质条件通常不会窘迫，二是因为他们有罪恶感，意识到在剥削的主体关系中，他们和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处于对立地位。”（p.126）

在他最近出版的论文集《资本主义与传播》中，他首先攻击的就是“优先处理文本的倾向”（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因为这种倾向是不知所云的浪漫主义（一只“细菌”），这种取向“完全是为知识分子或文化工作者的意识形态设计的，因为它给了他们特殊的活动舞台：符号领域，同时也提供了进行廉价研究的机会，因为这种研究惟一需要的证据就是个别分析家未经证实的观点”。（Garnham，1990：1－2）

了一个即使是间接的，但仍然很重要的角色，其方式是通过广告媒介在经济体系的商品化过程中起作用。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不那么重要了，而是指意识形态的作用在生产过程中被彻底地整合了；而某些政治经济学者却简单地将生产过程视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或者如某些结构主义者及后结构主义者一样认为生产过程是自发的，是与意识形态分离的。

受众商品

因此，加汉姆指出了媒介商品化的两个方向：直接生产媒介产品和运用媒介广告完成整个经济的商品化过程。斯密塞(1997)所指出的媒介商品化的方向与此不同，他认为受众是大众媒介的主要商品。根据他的说法，大众媒介的构成过程，就是媒介公司生产受众，然后将他们移交给广告商的过程。媒介的节目编排是用来吸引受众的；这与以前小酒店为了吸引顾客饮酒而提供的“免费午餐”没有太大的差别。根据这个观点，受众劳动或受众的劳动力是大众媒介的主要产品。

斯密塞的分析在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引起了相当有意义的意见交流(Livant,1979;Murdock,1978;Smythe,1978)。这里不只是要回顾关于受众是否是商品、是否是劳动的讨论，类似的意见交流已有学者多次加以详细记录(Jhally,1990)，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斯密塞论点的更广泛的意义。[④] 斯密塞的观点原本可以增进我们对媒介商品化过程的理解，但是，在关于受众是否是凝结的劳动，受众是否是惟一的媒介商品的辩论中，这一点反而被忽略。他认为，这个过程形成三位一体，它把媒介、受众和广告商联结在一种有约束力的相互关系中。大众媒介的节目安排用来建构受众，广告商为取得受众而付钱给媒介公司，受众于是被转交给广告商。这种观点扩展了媒介商品化的空间，使商品化不仅包括媒介公司出版报纸、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电影等直接过程，而且把广告商或资本一般也包括进来。商品化的过程使媒介产业彻底纳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

④ 关于受众商品的辩论已不是很激烈，部分原因是反击这个论点的一个重要论证已经不再重要。默多克等人认为斯密塞的主张更适用于北美，同欧洲相比，北美的大众媒介大部分由广告商支配。这个观点并不为欧洲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所接受。米埃格(1989:30)指出，例如在文化产业中，明确区分私营部门和公营部门是不可能的，因为“公营部门不仅在文化市场的创造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直接出资提供了文化商品的生产条件”。此外，全球私营化浪潮与广告业的发展使北美的情况不再是例外。最后要提到的是，戈尔丁和默多克在1991年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中也持大众媒介生产受众商品的观点，而没有提及这场辩论。另外，斯密塞的观点既可以说是太激烈，也可以说是太软弱。斯密塞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回避了媒介内容，认为媒介生产的惟一的商品就是受众的劳动。不过，正如利温特所说，斯密塞一直都坚持讨论媒介讯息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这主要不是因为媒介产业制造了充满意识形态的产品，而是因为它为广告商生产了受众，***并且***是符合广告商需要的特定的人口学特征的受众。斯密塞试图通过证明商品化过程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媒介为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了受众，而不是生产了意识形态，来挽救唯物主义者对媒介的分析。

受众是否可以构成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劳动？这个观点具有建设性，但也颇有争议、让人怀疑。我们先将这种争论放在一边。不管怎么说，斯密塞使用的劳动过程的概念作为隐喻或类比是可取的，因为它提供了思考前面所说的"三位一体"的方法，同时又不至于陷人这种结构论述经常带来的机械论的思考之中。不管受众是否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工作"（这里指劳动价值理论的"工作"内涵），考虑受众活动和劳动过程的相似性是有益的，因为劳动过程是一种动态活动，它包括了劳资双方为争夺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的控制权而进行的妥协和对抗。所谓的大众社会理论家把受众称作"迟钝的大众"（Ortegay Gasset，1957），而另一种观点，如费斯克（1989）和安（1991）等多元论者的观点，则把受众称作媒介产品的共同创造者，他们从另一个极端来回应对大众社会的传统批评。与这两种观点相比，"受众劳动"的概念更为可取。后一种说法在指出媒介产品是共创或互创方面是正确的，***但***它忽略了这个创造是在资本控制的决策体系中进行的，资本控制了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决策过程的大部分细节。

资本形态多样，互相竞争，它必须积极地建构受众，正如它必须积极地建构劳动。即使它这么做了，在资本设定的社会领域的条件中，受众与劳动者还是会决定如何用自己的力量来建构自己。对受众来说，这意味着他是遵照资本想要的方式注意或收看节目，还是以相反的或其他方式解释节目，或者根本不看节目。对劳动过程的研究显示，人的工作反应有许多不同方式，从完全顺从到完全不工作都有可能。与一般劳动相同的还有，受众的力量的行使，即使不是全部，也大致在资本利益所设定的框架内进行。我们如果延伸这个类比，就会发现资本和受众在媒介接收方面的冲突推动了商业广播的扩张、广告时间的调整、测量及监控受众活动的过程中新技术的采用、按片与按频道收费电视的引进，等等；与此相反，受众开始使用非法的卫星接收机、解码器、录放机以及使用遥控器跳过广告片等等。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和人种论的合作空间相当大并且颇有成效。[5] 政治经济学对此领域

---

⑤　有人会质疑，在收看电视这样的东西时，哪里有什么抗争？毕竟收看电视大多与休闲和娱乐相提并论，而工作都是为了谋生。不过，媒介产业确实投入了可观的经费与技术开发监控系统，它们可以精确测量谁在收看，看多久，开发可以不受转台影响的广告以及可以与节目同时播出的广告。受众购买卫星天线解码器和精密的遥控器显示了这种斗争是相互的。

的研究已经开始，也有了相当重要的成果(Jhally,1990;Meehan,1984)，但它在这里有点进退两难，它无法决定受众活动是否只是像劳动，还是***就是***劳动。这个悬疑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受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攻击。这种攻击是为了捍卫唯物主义和劳动价值论，但却无意地全盘排斥了媒介分析领域(Lebowitz,1986)。加利(1990)则认为，这是具有正面意义的意见交流，值得讨论。例如，他反思了级差地租的概念。不过，总的说来，这场辩论肯定了斯密塞的论文的基本内容，指出了媒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盲点。考虑到媒介产业(从印刷业到电子信息服务)的增长规模和增长范围，我们很难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仍然将媒介的物质分析置于边缘。总之，这个主题仍然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挑战之一。

控制论的商品：内在的商品化

米汉(1984)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受众作为商品的问题，她的分析焦点是受众收视率的调查。由于“交换的不是信息，也不是受众，而是收视率”，因此她认为(p.223)，关于受众的数量、组成及媒介使用模型等资料的报告才是媒介系统的主要商品。米汉的研究对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若干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包括唯物主义的产业史(由 A.C. 尼尔森公司主导)和收视率统计的社会建构问题，其交换价值与它在真实世界所代表的受众特征，这些研究很少有类似之处。就本书要做的分析而言，她的工作特别有价值，因为她结合了其他领域的研究之后，指向了商品化过程日趋增长的**控制论**(cybernetic)本质。自从有了受众商品的辩论以来，争论者对媒介—广告商—受众三者关系中谁能够领受“真正的”商品圣杯投入较大心力，相比之下，对于***收视率才是商品***这个观点的兴趣减少了许多。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向到底是受众、受众劳动、受众注意力、受众购买力、受众时间还是收视率是真正的商品的问题上，结果商品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反而不太被注意。

商品化必然要运用测量手段来生产商品，并且要运用监控技术来追踪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过程。举个测量的例子：为卖给广告商而生产的广告片的长度及广告时间的总量要精确。监控的实例包括传统的商业统计、销售研究、资本的成本评估、薪金与福利研究、顾客调查以及较新的创新手法，如资料库的配对系统，它们记录每一笔信用卡和存款账户的使用，从中获得人口统计和态度方面的资料。这些做法都是商品化过程的一部分，因为它们生产的信息被用于商品的生产，如报纸或电视情景喜

剧。它们也具有控制论的性质,因为信息生产过程的结果是生产新的商品。就此而言,收视率是控制论意义上的商品,因为它们在促成商品生产的过程中也建构为商品。具体而言,收视率是电视节目商品化的重要元素,但它本身也是收视率调查业的核心产品。收视率调查服务很重要,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就是**媒介商品,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媒介商品化过程的进步,也就是控制论商品的发展。它们是这类商品家族的一部分,它们都起源于总体化的监督控制程序,它们运用了发达的传播和信息技术。[⑥]

从这方面讲,与那些通过自动收集的消费者购买行为的资料来生产并销售的商品相比,受众收视率即使不比它更重要,至少也和它一样重要。二者都是控制论意义上的商品,包含了第二轮的交换价值(这个价值取决于第一轮的交换价值)。一家行销这类商品的重要公司的总裁虽然分不清原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但他却认识到控制论商品的重要意义(DeSimone,1992)。控制论商品把商品化的过程

> 从产品的**本质**的价值转移到关于谁需要这个产品、谁提供这个产品和这个产品有什么效用等方面的信息的价值上。你用信用卡购买杂志,这是个简单的交易吗?不是这么简单。在你购买的时候,你是谁,你偏爱什么杂志等**信息**已经被电脑记录下来,这些信息的价值与卖这本杂志的利润不相上下。这类信息可以用多种方式加工包装,可以卖给别人。更重要的是,所有内部过程都因你的决定而受影响——从销售到购买到融资。今天,所有组织都离不开信息商务。

尽管来自信息产业中心的说法含有夸张成分,降低了可信度,但它提醒我们必须超越媒介来寻找商品。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强调商品化的过程,它将一连串的实践行为连结成螺旋状的交换价值,正如德西蒙(DeSimone)所说,这使得所有组织都纳入信息产业的轨道。正是在这一商品化的架构中,我们才能考察新的测量和监控技术如何扩展了媒介商品的生产。这些包括:按片付费的节目;"测人机器"与房间扫描器(用来

---

⑥ 毫无疑问,吉登斯的著作是很有价值的,它唤起我们对制度性监控体系的发展的注意。不过,他只将监视放在被"信息控制和社会监督"占据的制度王国内,而和资本主义分离,从而造成了失误。他将资本主义界定为主要是在"竞争劳动与产品市场的情境下的积累",但却没有认识到积累过程促进了监控系统的发展,这些系统反过来又对资本积累的扩张起了推动作用。吉登斯在谈到二者的互相渗透时很谨慎,他认为二者是分离的,就在他***将监控与民族国家的崛起联系在一起***时,积累和监控的界限得到了加强。民族国家的崛起当然建构了监控,但吉登斯放过了一个事实,即用来促进生产、分配和消费理性化的监控形式,原来就是商品化过程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且在商品化推动下,更加发展(主要参见 Giddens,1990:55-63)。甘地(1993)已对企业和国家的测量及监控形式作了彻底的分析。

监看人们选择的具体节目及收视时的注意力);还有所谓的“智能卡”(用以刺激收看电视的人购买产品)等等。综合运用上述手段就产生了新的产品,其形式是收视及购物报告,包括许多人口统计的细节特征(取自范围广泛的数据库)。但这些新产品并非彼此独立。它们是商品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一过程把它们放到了结构井然的等级组织之中。

我们可以说,控制论的商品主要是集约型商品化过程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是从特定领域的生产过程中提炼出来的直接产物。有线电视、按频道及按片付费电视等形式强化了节目的包装,使节目日益按需生产,与原始的广播形式大不相同。相比较而言,原先的广播型节目面对大量受众,特定性有限。而现在的媒介服务通过把越来越具体的节目类型和界定得越来越清晰的受众相联系,强化了商品化的过程。例如,占据了美国消费者杂志20%份额的时代—华纳公司杂志部发明了“目标选择”系统,这个系统使广告按需定做并且个人化,利用电脑控制的喷墨印刷和分别装订方式,制作针对个别订户的刊物(Wasko,1994)。莲花销售公司计划使用取自一家较大的信用卡机构的信息,生产并销售关于美国8,000万户家庭的各类资料。花旗银行已经宣布,打算将它拥有的2,200万信用卡用户的资料卖给各销售公司。甚至最传统的报纸也了解到出售顾客数据的价值。据报业观察家亚历克斯·S.琼斯(Alex S. Jones,1991)说:“美国人才开始恍然大悟。当他们打电话到报社体育热线打听比分或寄信换取免费的汽车修理券时,他们的资料很可能已进入了数据库,也许高尔夫球俱乐部或服装公司将来可拿来用于作广告。”因此,他的结论是:“私生活是潜在的宝库。”拥有最精密系统之一的《亚特兰大期刊与构成》广告部副总裁说:“这就是未来报业的一部分。”无论是用来记账还是受众调查,这些监视系统都强化了商品化过程,其方式是把由观众选择收集来的信息制造成畅销产品。电话公司的计价方式也有了改变,以前是所有通话均列入总的类目计价,每月支付定额可以无限制使用,现在则是采用特定的按次数或按使用时间付费,后者称为地方测量服务。同样,这个转变强化了商品化的过程,它提炼出信息商品的构成及套装组合,并运用技术收集可销售的有关交易参与者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科技的使用产生了传播联系。我们可以说,付费系统的一般类别,如信用卡和借方卡,也强化了交换过程,并创造出可销售的关于使用者的信息(Gandy,1993)。

控制论的商品:延伸的商品化

我们也能观察到,商品化扩张的过程使学术研究延伸到了以前因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原因很少或根本没有触及的领域。其中包括众多的信息和文化领域,它们已被传播研究(Garnham,1990;Shiller,1989)、地理学研究(Harvey,1989)、城市研究(Davis,1990)和文化研究(Davis,1986)所占据。这些研究描述了商品化过程如何延伸到制度领域,如公共教育、政府信息、媒介、文化和电信,这些研究领域中有一系列力量与动机互相抗争,但它们大都应该维持普遍享有的原则,并不考虑人的市场购买力。延伸的商品化有许多表现形式,这里我们无法逐一详细讨论。经济发展的衰退与政治权力的右倾造成公共信息机构资金的削减,像图书馆、公立学校都遇到了这一困难,这造成了人们以前想像不到的结果,如美国教室普遍引进了强制性的商业电视。我们也见证了公共信息、邮政、广播电视和电信系统私有化与商品化的浪潮,见证了新古典主义经济逻辑的"成本"计价的引入,这意味着拥有市场权力的利益集团开始控制一切。延伸的商品化也包括公共空间的转变,从公园到私有的购物中心都是如此,博物馆、体育活动和节日庆祝活动也越来越依赖商业赞助。越来越多的人穿着印有产品广告的服装,戴着广告饰品,使身体与身份也被商品化了。这些发展显示出商品化的过程已经延伸到了另外的空间与行为,这些空间与行为曾经是根据另一种社会逻辑即以普遍性、平等、社会参与及公民身份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虽然缺点历历可数,但却能扩大社会行动的基础;如今它们已被简化到市场逻辑,而权利被等同于市场力量了。

政治经济学派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证明了国家与企业强权延伸商品化的过程。我们本应更加强调但现在却略嫌不足的一点是,这个过程与**在*延伸点***发生的变化之间有什么联系。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对于理解商品化成功很有价值。国家与企业权力的运用过程减少了非商品化可以使用的资源、时间和空间,使得商品化被认为不是权力的过程,而是天然的秩序、是常识、是理所当然的,是社会生活的现实。这种关于霸权(hegemony)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讨论却没有走出重要的一步,使我们无法分清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边界。制度权力总是促进某种逻辑而消除其他可能性,建构霸权必须以此为核心。但是,制度权力与影响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多重关系的权力之间有何联系,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交换价值的扩张,不是简单地削弱使用价值或者说非商品价值,它同

时又利用这个价值提高自己的吸引力，并在此过程中，把使用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

克劳福德（Crawford，1992）汲取了森尼特（Sennett，1976）著作中的观点，以购物中心为例描述了这一过程的运作。已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展示了交通运输、土地使用、投资和其他结构政策都在制度权力的冲击下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购物模式得到重新调整，更进一步说，人们在购物中心的社会互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克劳福德对这类文献点到即止，她集中展示的是商品化过程在购物中心*里面*是怎样运作的。她举例说，商店的展示橱窗里布置了一间摩洛哥式的内室，里面放着一个普通的罐子。她认为这些摆设使罐子失去了原有内涵，转而披上了某种出人意料的、异国情调的，因而也就使人兴奋的色彩。正如她所说：

> 这个比附联想的逻辑，使非商品化的价值可以用来强化商品，同时也使这一过程反向进行——以前非商品化的东西变成市场的一部分。商品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原本就是不断地交换而无终止，一旦二者特性的交换进入了这个关系，联想就可以无限地发挥共鸣作用。（Crawford，1992：15）

克劳福德所谓的无限的共鸣其实是夸张了，这必然使控制论的过程变成无法控制的反馈。有许多过程，包括回忆我们自身与罐子的世俗经验，可以切断这个共鸣。还有，把这一过程描述为“零售的魔术”又使某些东西唯心化了，它其实应该是物质的使用与形象的联想共同构成的。无论如何，克劳福德提供了商品化过程的细致描述。政治经济学家们对于这个过程的总体结构已有很好的描述，克劳福德则提供了一种方法，使我们可以深化对这个过程的分析。

如果说克劳福德的例子是位于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边界的一次有益的扩展，那么另外两个倾向就不那么具有建设性了。由于这两点与商品化过程有直接关系，笔者在这里加以讨论，而不是留到第7章，虽然第7章就来自政治经济学边界的挑战作了总体论述。一种倾向是将商品化和普遍性的社会互惠混同起来。互惠是一种概括性的社会活动，人们因此而形成交换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人（Davis，1992；Schudson，1984）通常引用人类学文献关于礼物交换仪式的内容，如北太平洋沿岸某些美洲印第安人冬季互换礼物，他们认为，市场的建构与交换价值的发展更多地是深深植根于社会群体形成的总体过程中。根据这样的观点，商品化不是理

解社会领域的重要切入点，社会必然有交换，商品化只是众多表达形式之一。这个观点的价值在于使我们注意到层层仪式都与社会过程相连，对社会过程的构成起了作用（Davis，1992）。在政治经济学界，维布伦（1934）将这个观点推广运用到关于有闲阶级和工商业阶层的研究中，这是他作为一位人种志学者从人类学角度所作的值得赞赏的分析。但维布伦知道一般性质的仪式交换与它具体展现于商品化过程的形式并不相同，他也没有把二者混同。他认识到前者是唯心论的陷阱，它具有抽象的普遍性，在它看来，造成资本主义崛起的社会变革的动态过程，反而不如部落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共有的一般属性重要。维布伦可能会赞赏以下这个有力的讽刺：当前的学术界企图使交换失去特定的历史意义，他们通过论述资本主义社会里早已被根除的部落行为来消解变革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政治经济学承认商品化的过程涉及了仪式行为，这种仪式行为有助于加强或削弱社会联系。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对于正统经济学的一个主要批评就是指出它倾向于消除风俗习惯及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然而，政治经济学也不想掉入唯心主义的陷阱，它把分析焦点集中在权力上，这种权力包含在商品化的历史特定的内涵中，也包含在商品化过程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建构时所采取的形式中。[7]

另一种有问题的倾向与此相反，它主张商品化形式的普遍性，取消了从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和货物生产转换的传统联系，而以符号的生产及符号价值的霸权取而代之（Baudrillard，1981）。鲍得里亚与上述把商品化融入部落礼仪的取向相反，他提出“活跃的有丝分裂”说，在有丝分裂中实体和产生它的劳动过程在符号的自由流动的力量面前断裂并且消融了，所有的一切均被吸收到商品化的转换过程中。他下面这段话最为重要：

> 符号的超意识形态和符号能指的总体运作——这些概念被结构语言学、符号学、信息理论及控制论这些新兴的重要学科普遍认可——已经取代了政治经济学，它们才是当今体系的理论基础。（Baudrillard，1975：122）

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考察对于鲍得里亚立场进行的争论（见 Kellner，1989）。更有益的做法是评价鲍得里亚的论点对于具体的商品化过程有什么意义。乍看鲍得里亚似乎支持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商品以

[7] 关于对特定政治情境中的社会互惠的分析，见鲁辛斯基（Rucinski，1991）。

其无所不在的力量消除了一切异己，获得胜利。然而，政治经济学家对这个论点的两个基本方面提出了异议。第一，无论是出于现代主义者普遍混杂的修辞，还是来自后结构主义思维的必胜信念，商品化已经完成的论点都是片面的、本质论的，顺着这个逻辑只能得出宿命论，即在这个无所不包的过程之外再也不会有其他任何过程。[8] 它没有觉察到商品化过程的矛盾，也没有觉察到这个过程之外的非商品化过程。第二，商品的胜利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并不清楚，因为在鲍得里亚的分析中，商品这个术语的意义完全改变了。特别是在后来的著作中，鲍得里亚以创造符号价值的概括化社会过程取代了使用商品化的雇佣劳动把使用价值转变为交换价值的过程。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符号价值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服从于资本的需要，创造出一种等级高度分明的意义体系和地位身份体系，以巩固资本的权力。虽然鲍得里亚的观点也算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解读，但只能算是片面的解读，它忽略了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基本点——一个是人类的需要，它从使用价值中产生，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另一个是制度体系，它将使用价值转换成交换价值，以获取剩余价值，是资本观点的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我们再来看看维布伦。鲍得里亚承认他的影响，但把他对地位的分析作为社会组织的独立基础，而维布伦所认为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基础——即人类有其需求，但政治经济制度无法满足它——却不再是鲍得里亚的关注重点。商品化过程被简化成为符号的自由流通，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鲍得里亚对政治经济学概念工具的误用，这些工具本身也被简化为怎么说都可以的术语。这些脱胎于特殊历史情境的术语失去了它们的意义，鲍得里亚援用它们，只不过是把原来无足轻重的论点增加一些分量罢了。

劳动的商品化

劳动商品化的研究中发现了两种与传播研究有关的过程。第一，传播系统和传播技术的应用扩展了所有的劳动商品化的过程，其中包括传播产业的劳动商品化。传播手段使雇主提高了灵活性和控制能力。第二，正如政治经济学已经描述过的，这是一个双重的过程，劳动是在生产货物商品和劳务商品的过程中被商品化的。

---

⑧ 某些文化研究的著作的难题在于它们接受了鲍得里亚对商品化的论述，但又忽略了他的论点的逻辑推理，它们转向了社会力量，如新型社会运动，把它们看作是“独特的”反抗核心。

我们在考察货物的商品化时,往往忽略了劳动商品和在生产点上发生的过程。布里弗曼(1974)的著作直接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过程的转变,它从理论上要求结束这方面研究的边缘地位。[9] 布里弗曼指出,劳动是由**构思**(conception)和**执行**(execution)的统一体构成的,前者包括预测、想像与设计工作的能力,后者指的是实现它的能力。[10] 在商品化的过程中,资本将构思与执行**分离**开来,将技术与执行任务的原始能力**分离**开来。资本将构思能力**集中**在经营管理阶层身上,这个阶层可能是资本的一部分,也可能是资本利益的代表;另一方面,资本**重构**劳动过程,使之与生产点上的技术与权力的分配状况相一致。在发展到极端后,所谓的科学经营管理实务也应用到了劳动过程中,其先驱是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1] 布里弗曼验证了大规模产业兴起时的劳动转化过程,但他特别为人称道的是写出了第一本经得起检验的论著,证实了这个过程延伸进入服务性部门和信息部门的情况。布里弗曼的著作引发了大量的经验研究与理论争辩,后者主要集中于讨论是否需要对此过程中的对抗性质多作论述,是否需要对工会运动和工人的活跃的能动力量多作研究(Burawoy, 1979; Edwards, 1979)。这类研究构成了库恩所谓的"标准科学",它们完全是对布里弗曼的论述中所蕴含的问题和意识的扩充与阐述。这些研究包括勾勒生产点的抗争状况、抗争的历史,以及不同产业、职业、阶级、性别与种族的人如何体验劳动过程的转变。最近的研究,包括学术评估和商业出版物的报告都含有一种兴趣取向,即探讨传播工具在技术效率稳步改进的前提下,如何加强一般劳动过程的商品化(Ansberry, 1993; Berberoglu, 1993; Ehrbar, 1993; Zachary & Ortega, 1993)。

传播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学取向)中对媒介产业劳动过程变化的分析比应有的要少。原因有多个。尽管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由来以久,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文化产业十分关注,传播研究却倾向于将其研究对象置于消费领域,从面使研究焦点集中在受众与文本的关系的探讨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家相当关注制度机构对媒介生产的控制以及它们对受众的

---

[9] 布里弗曼的著作出版得正是时候,因为这时二战后的经济发展(就是福特主义时代的繁荣顶峰)刚好到了开始衰退的时候。恰好这时工厂与办公室应用整合计算机传播系统的速度也在加快。关于布里弗曼的著作与同时代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批评性对照,请见希拉德(Hillard, 1991)。

[10] 构思与执行的区别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说,人与蜜蜂的差别就在于人是二者的统一体。

[11] 在丽莲·吉尔布莱斯[Lilian Gilbreth,她的丈夫是泰勒的追随者,发展出了测量工作时间的单位,即"基本动作单位"(therblig,他的姓 Gilbreth 的回文。——译者注)]手中,泰勒主义化的过程也应用到了家庭中,以便"科学地"处理家庭事务。

影响程度(包括受众劳动的概念)。因此可以说,更多的目光直接投向了受众劳动,而不是媒介产业中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过程。另一个原因是,媒介产业仍然带有强烈的行业、专业及工匠的传统,虽然它的劳动过程已经转型。

媒介生产有个人创造的特点,这是媒介部门与许多同样具有工业生产特征的职业部门之间的差异,有些研究强调这个差异是可以理解的。作家写书,电影导演按自己的意思拍电影,明星造就了电影或电视节目等等,这个倾向有很牢固的基础,主要是因为媒介产业需要构思的程度相对要高。印刷工人及其工会在劳动大军中历来占有优势地位,主要原因也在这里。但是,只强调个人的创造使复杂的生产过程被忽视,而不论生产过程发展得多么不平衡,媒介产业部门与一般经济部门的劳动过程越来越相似了。

组织传播研究和社会学提供了关于媒介产业的官僚主义结构和生产过程的较好的见解。塔克曼(Tuchman,1978)、费什曼(Fishman,1980)和甘斯(Gans,1979)等人的著作考察了官僚主义控制的系统如何经营管理复杂的生产过程,特别是新闻生产过程。他们的研究指明了那些简化的机械流程,包括突发新闻如何报道,繁琐的分工,程式化的特写文章,这些都给本来可能是开放性的生产过程树立了样板。研究主体显示,新闻机构运用大量的组织计划和预先处理,通过机械流程来收集、整理并分发新闻与信息。这项研究对政治经济学很重要,它强调的是劳动过程,用丰富的经验性细节描述了有助于建构生产过程的社会—技术进程。然而,这类研究虽然涉及到政治和经济因素对新闻过程的影响,却没有把它们纳入理论中进行探讨,研究者们更喜欢以官僚机构和组织为基础建立理论框架,强调的是抽象的行政上的需要和职能。尽管这个取向赞成关注权力和利润,但它追随发端于马克斯·韦伯和罗伯特·米歇尔著作的一系列文献,更集中展示了官僚系统的结构性压力如何为文化产业的生产自圆其说,似乎权力和利润只是通过复杂的官僚机构控制下的经济体系才能起作用。

这些组织研究的文献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富有经验的详细资料,但是它依赖于唯心主义的基础,以一种行政本质主义来取代它觉察到的市场的经济本质主义。如韦伯所说,***行政手段***的决定性的影响大于生产工具。这个问题并不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因为它已经集中探讨了制度层次,分析了企业、国家及二者的关系。这些组织研究文献对政治经济学的挑战提醒我们应该立足于生产过程,强调政治和经济权力,尤其

是要关注劳动的商品化问题。这么做才能在制度分析和文本分析之间建立重要联系,保持政治经济学派的唯物主义长处。我们要做的不是用一种本质主义夺回另一种本质主义占据的阵地,而是要将媒介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商品化纳入理论中。

政治经济学文献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走了几步,特别是对传播与信息新技术的引进进行了检验。这项研究强调的是工作的转型,包括就业模式和媒介与电信业中劳动性质的变化。哈特(1990)对新闻史中缺少劳工方面的研究表示遗憾,他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学取向中采纳了新闻编辑室的文化史观,分析重点是新技术引进后如何完成布里弗曼所描述的过程。这方面的研究也见诸传播研究以外的先锋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他们研究了新闻编辑室的劳动过程(Zimbalist,1979)。[12]近来的某些著作特别探讨了新闻编辑室的劳动商品化现象,考察了新技术应用到本产业后造成的就业减少和编辑工作的调整,这包括电子排版或页面编码的实现,也包括电子新闻采集(ENG)引进后记者职业的转换(Russial,1989)。这些都是对劳动过程观点的具体运用,这个观点指出传播和信息技术的使用改变了构思活动的权力平衡,使权力从专业新闻工作者手中(他们对传播工具还有部分控制权)转移到控制技术系统的经理阶层手中。类似的研究也开始探讨电影业(Nielsen,1990)、广播业(Wasko,1983)、电信业(Mosco & Zureik,1987)和信息业(Kraft & Dubnoff,1986)中劳动过程的转型问题。

米埃格(1989)提出了此类研究中的一种新型分析,他指出,媒介产品的类型、企业控制的结构和劳动过程的性质之间存在着联系。他所说的第一类商品主要是电视接收机和录放像机等硬件,特征是生产过程简单,很少有创造性的或工艺性的劳动者介入。米埃格认为,这些媒介产品的生产会走向产业集中和劳动过程细分化,包括通过国际分工从低工资地区获得好处,那里的工人受制于专制制度,也没有工会组织。与这个类型相反,印刷艺术品和他称之为"视听作品"的第二类产品往往由艺术家独立完成,很难复制,所需的资本投入也相对较少。这个部门由小企业主导,大体上由生产者或劳动者控制。米埃格提出的第三类产品,也是最后一类,其生产过程充满斗争和冲突,因为它既容易复制,又必须投入某种程度的艺术贡献。这个部门中既有正在增长,但远未完全实现的资本垄

[12] 哈特把当前关于电子新闻生产技术引起的冲突放在一百多年来的斗争的情境中,他指出:"新闻编辑室如同工厂厂房,一直都是技术更新的实验室,也是经济与社会利益的战场。"他(1990:355)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来解释劳动被忽略的原因:"由于占有优越的历史条件,报业统治者的视点享有特权,新闻史因而忽略了工人阶级的问题和劳动实践的问题(反映了出版商敌视劳动者的态度)。"

断控制，又有广泛的劳动混合，它导致了劳方内部、资方内部以及劳资之间的紧张与冲突。

米埃格的分析十分重要，因为它更详细地解释了媒介产业中的劳动商品化，这个过程既是一般的政治经济学过程，也是受产品、产业结构、技术与非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三者之间的关系制约的过程。不过，他的分析仍然受到三个类型的概念方案的局限，其中第三类型有极丰富的多样性。我们也要注意，这种多样性正在消失，由于产业集中和劳动过程的理性化，高度商品化的第一类产品的特征正慢慢变成第三类产品的特征。而且，米埃格的方案认为不同产品类型的结构需求具有决定性的力量，这就排除了许多影响劳动过程的重要变量，如工会化程度及工会的战斗能力，还有国家规范或控制媒介部门的程度。尽管有这些缺点，米埃格的研究仍然是对媒介产业的劳动过程进行系统分析的开始。

关于国际分工和劳动者国际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有了起步。国际分工研究的压力来自要对生产进行合理解释，要对科技（尤其是电脑和电信传播科技）克服了商业所受的时空限制从而带来的机遇进行合理解释。下一章将探讨全球化问题，这里只是谈一下全球化对于劳动的重要意义。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只是后果之一：商业机构可以利用国际范围内工资、技术和其他重要因素的差别而获益。早期这方面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大多集中在硬件业（在东南亚）和资料输入（在加勒比海）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过程，西方公司被那里的低工资和专制统治所吸引（Mosco，1989b；Sussman，1984）。最近的研究又注意到一个新趋势，即资本逐渐在欠发达地区寻找工资较低又有熟练技能的劳动力，以开发软件等（Vijayan，1996）；同时，资本也在发达国家之间寻找劳动力，一个主要的例子是美国电影和录像带制作业在加拿大的投资在持续增长。[13]

传播业中的国际分工的发展激发了对劳动者国际主义的研究兴趣。具体而言，这里涉及到使用传播手段，包括新技术在内，以便在工人阶级与工会的利益中形成跨越国界的密切联系（Waterman，1990）。这里要再次指出的是，如同传播学领域中劳动商品化研究的其他方面，虽然劳动者国际主义的研究刚刚开始，但在政治经济学其他领域中，国际主义其实早就是一个分析核心了。

---

[13] 这些发展是接受投资的国家的政府采取明确政策的结果。不过在加拿大，这个发展似乎对当地生产没有什么正面影响（见 Salutin，1993）。

私人与公共生活中的替代性过程

批评政治经济学的人，包括那些反对在传播学研究中引进这个取向的人，不断地提出传播政治经济学有所谓的本质主义倾向。他们以多种方式提出论点，就传播研究来说，他们认为有人主张将所有的传播与文化实践简化为一个根本的政治经济现实，这个现实涵盖了所有的商品化过程。他们反对这一思想倾向。第2章和第3章已经提供了证据，论述这种批评有夸大之嫌。无论是普遍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还是它在传播领域中的运用，都包含了丰富的、多元的、广泛的研究内容，完全没有简化到某些类别，不应当被指责为过分简单化。不过，这个批评对于传播研究来说也有它的价值，其中之一是使传播政治经济学开始努力思考它的某些基本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原则。

作为自我反省和学科更新过程的一部分，本书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非本质主义的和批判的认识论，同时采取了强调社会过程与社会变迁的本体论立场。这个本体论立场体现在我们所选定的人手点上，它们既渗透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又构成了反主流和非主流的社会过程。因此，商品化是人手的立足点，而不是本质的立足点，从它出发可以检验传播业中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商品化改变了媒介内容，但没有使媒介内容简化为我们可以从商品化过程直接解释的单一形式。本章以商品化为开端建立了一个理论参照框架，同时也认识到所有过程的多重决定和相互建构。现在，本章将界定其他过程以及与它们相伴随的结构，它们构成了非主流的和反主流的实践活动。

这个领域中的一个更有价值的理论议题是奥非(Offe,1984)提出的“行政再商品化”过程中的国家角色问题。他认为，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新特点。对奥非来说，经过对经济的自由放任时期后，必然会跟随解除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或者说政治经济生活的“社会化”，以纠正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失败后带来的不稳定与冲突。解除商品化是指国家制定政策和规划来保障社会角色(包括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经济生存，包括那些无法参与商品化或没有能力这样做的人。然而，为防止这些人从商品化过程中“掉队”，国家必须增加转账支付或给予他们其他收入来源，但这种做法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而且，奥非又指出(1984:35-64)，这个过程不可能用政治手段维持，因为用政治规

范经济而又不从实质上政治化是根本不可能的。结果,奥非看到资本的回应,即**再商品化**(recommodification):

>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占统治地位的、也是惟一的策略就是通过政治手段创造条件来解决商品形式的问题,使合法的经济主体能够行使商品的职能。(Offe,1984:124)

具体而言,再商品化是要制定一套规划,强化劳动的市场价值,整合并集中跨国资本,同时允许那些经不起市场检验的人被排斥。然而他认为,这些都是局部胜利,因为国家仍在力图用非市场手段改革市场,因此,必须为排斥付出代价(虽然不是直接的),例如控制犯罪和扩建监狱。此外,正如对官僚制的批评(最早可追溯到马克斯·韦伯)所证明的,结果常常是非市场机制作为一种手段,最后成为自身的终结,破坏了再市场化的过程。这些批评引起的政府回应在20世纪90年代尤为明显,这等于是将市场原则运用于国家,期望国家能像一个市场企业,推进市场原则。这个问题奥非曾再三论证:虽然国家可以***看起来***像是市场企业,但仍有根本的限制,使它无法像企业那样***运作***,主要是因为国家无法直接从事积累活动。

奥非的论述得到其他人的呼应(见O'Conner,1987),这朝着纠正本质论(它主张简化的、决定论的社会进程)跨进了一大步。不过,奥非对替代性过程的认识非常消极,他把它界定为不是商品化的过程,或者是受某些限制如财政限制、官僚化或政治化的约束,因此他的探索不可能深入。[14]

私人生活中的社会过程

本章的剩余部分将考察当代的社会思潮和传播学的学术成果,指出学者们从不同的原因和理论立场出发提出的商品化的替代性过程。他们指出商品化虽然强大有力而且普遍存在,但并不是惟一的。情况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可以说替代性过程大都与使用价值有关,特别是与我们所谓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有关。私人生活特指面对面的互动过程,即哈贝马斯(1989)称之为"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领域,或者用现象社会学的

---

[14] 奥非(1984)也察觉到了这一局限,并提出了颇有启发性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必须扩大危机这个概念的内涵,不再只是从经济的角度理解危机的存在,而是应该将它纳入三个社会组织原则(家庭规范原则、商业计算原则和国家强制原则)中来考察。

说法,称为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建立在私人生活基础上的过程一般都是表达感情的,以认同感、友谊和亲属关系为中心,强调人与物(两者既是物质的又是符号的)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本身而不是因为市场价值。来自公共生活的过程与公民有关,它使人们聚集在一起交流思想,管理自己,对于哈贝马斯称为“体系”世界中的权力与金钱的组织或支持、或抵抗、或反对、或试图创造替代品。在私人领域中,商品化的核心替代过程是友谊的形成,在公共领域中则是公民身份的形成。

在考察商品化与公共私人生活中的社会过程的关系时,我们而临的挑战之一是要克服机械化的思维倾向。首先,有一种普遍的倾向是从私人与公共的二分法出发进行简化论述。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私人(private)”这个词担负着重任,它既用来描述人类经验中最秘密的部分,又被用来描述私营跨国商业体系的市场行为。[15] 这种观念负担如此之重,所以很容易崩溃。更为现实的是,它严重束缚了理解更为广泛的商品化内涵的能力。吉登斯(1991:153)“把私人看作是国家渗透的‘另一方而’”,当私人这一概念成为一种对非国家行动的默认选择时,我们无法考虑商品化与监视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无法把私人问题作为市场渗透的另一方面来考虑。但即使我们扩大框架把市场包括进来,也很容易在三个独立的、界限清晰的活动领域中来进行思考:家庭中的私人生活、国家中的公共生活、市场中的商品化。正如森尼特(Sennett,1976)所证实的,这种观点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存在着问题,现在更是如此。如今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与市场领域,这个界限已变得模糊,这实际上消除了把领域和客体进行区分的价值。人们越来越多地提出质疑,认为将它们看作玩加减游戏的物,一方增加了,另一方就减少,这样思考是否有价值。反之,按照我自己比较偏爱的本体论的策略,把它们当作互相建构的社会过程更有益处。这些过程形成的关系根据特殊的历史环境而有所不同。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机械论的倾向会使我们认为,例如,友谊的形成一定是在私人生活领域,公民身份的形成一定是在公共生活领域,等等。它还会使我们把友谊和公民身份等看作是直接与商品化相对立的、方向完全不同的向量。这种思考方式应该避免,因为各个过程之间的

---

[15] 这类讨论所面对的概念困境之一是私人领域的意义普遍混淆。有一种看法是把私人活动看作是国家领域外的所有活动。根据这种观点,在公民社会的许许多多概念当中,**人际生活**(在私人生活中)和**商业交易**(在私营部门中)都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我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应当区分人际的私人生活和私营部门,前者是这儿讨论的主体,后者则根本不同,它是有助于市场和商品化的。我们如果不使用“私营部门”这个词,那么,“商业的”、“市场”或“受众部门”也许会更合适。

关系更为复杂,也更为广泛。完全的对立只是不同过程的关系中许多可能的配置之一。

传播学研究的结构反映着社会科学的分工,它使私人生活中的过程和商品化之间的关系的概念化更为困难。就社会公共生活而言也一样,因为传播研究倾向于依照社会复杂性的不同层次来组织,把人际传播同组织传播、制度传播分离开来。虽然也有例外,但一般情况下人际传播就像微观社会学,通常只用来考察感情与亲密行为等现象。当我们离人际分析的层面越来越远,这些研究也就渐渐失去意义。等我们到达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从较高的社会复杂程度来定位传播学时,微观或人际层面的关怀几乎不见了。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最广泛的使命来说,这个情况意义重大,因为它限制了理论上的理解和社会实践。如果不与人际传播直接结合,政治经济学也就对经验领域、感情领域无法做出评论。人们在两个层面上的经验往往存在着巨大落差。一方面,人们感受到制度层面的权力运作(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核心);另一方面,人们也感受到自己的日常存在,这种经验是发生在小群体之间的一系列互动,以文字、影像为媒介,也以人们自己为媒介。如果政治经济学对后者不加以研究,那么,它就对人们的行动的后果无法做出评判。

多年来,对于制度研究与个人研究的结合的关注已经引起大量的理论反省,而同时,我们观察到有一种持续的努力要开辟新的领域,因为社会科学论述身份(包括政治身份与自我身份)的著作在不断增加(Giddens, 1991; Hall, 1989b; Meyrowitz, 1985; Sichterman, 1986; Turkel, 1984)。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霍尔(1986b: 12)观察到的一种趋势,即"以前让我们的社会身份保持稳定的社会集合体——阶级、种族、性别、民族等稳定的集体——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因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而遭到破坏"。女权主义的兴起,特别是女权主义为打破社会思想中父权制造成的个人与政治的分离提供了政治上和知识上的驱动力,使它扮演了领导角色,促进了这些过程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新建构的可能。

关于这类文献提出的议题,还有相当大的余地可供争论。例如,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霍尔是正确的,他引起人们注意主体身份的不稳定;而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已经证实,***资本主义一直都在破坏身份的稳定***,同时,对于教育、收入、权力和一般的生活机会而言,阶级、种族和性别在目前的影响和以前的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这个批评使我们想起潘什克斯(Pêcheux)的警告,即要避免对主体的自恋。但我们也不能转移注意

力，仍然要探讨私人生活，同时拒绝商品本质主义。吉登斯最近的著作很有启发性，他对他所谓的个人化与商品化经验之间对抗关系的分析尤其如此(1991:196－201)。不过，他敏锐地觉察到自己的缺点："我并没有详细地解析资本主义生产对现代社会生活造成的冲击。"虽然有这个缺点，他还是清晰地认识到商品化的力量已经延伸到私人生活之中。吉登斯在这里明确地引用了鲍曼(Bauman，1989)的著作，提及了传播学者席勒和斯密塞。他对这一过程的简短概述指出了"不断重塑日常生活情境"的主要途径。这也延伸到了大众媒介中，其中包括提倡自我治疗的小型产业，它们通过书籍、录像带等试图对抗商品化，"但它们却早就以预先包装好的关于如何生活得更好的理论进行销售，这样它们就陷入了自己原本口口声声反对的过程"(Giddens，1991：198－199)。然而，吉登斯也指出了发源于私人生活的抵抗可以存在，其中包括形成自我身份和某种意义上的社会身份的过程，虽然这些身份在道德和美学价值上是暂时的、矛盾而难以结合的(特别是相对于以文字和影像为媒介的自然的确定物而言，更是如此)。

政治经济学更强调私人经验和商品化经验的分化，这有别于吉登斯的理论。吉登斯在一本论述身份的书的结尾也论及了这一分化，把它列为四大"自我磨难"中的最后一个，他的论点是有力的，但也是边缘化的。这么做的原因可以理解。吉登斯想创造出自我和身份的语言，它们以自身为依据参与知识的和存在的规划：解释私人生活的情境，并"为丰富而圆满的生活提供必要的道德源泉"(1991:9)。尽管我们需要这样一种语言，但它对于政治经济学家而言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同样是自我论，拉什(Lasch)和贝尔采用了保守的观点，吉登斯则提供了一个自由派版本。自我受到社会和制度力量的冲击，没有力量做出成功的反击。保守派会使我们凭借传统强化自我，自由派则要赋予自我的现代语言某种合理性，并且使用这种语言创造出一种更开放的道德和美学生活——这种生活实质上与哈贝马斯的思想一脉相承，即更具交流性。正如奥康纳尖锐指出的，对于政治经济学家来说，问题在于这两种自我理论是"意识形态的"：

> 它们一个向后看，另一个将一切看成自然天成。它们忽略的问题是，***在工资和商品形式普遍化的时代，什么是具体的资本主义人格危机***？

这不是吉登斯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因为他选择将私人生活置于"现代晚期"中,而不是放在资本主义中进行考察。不管怎么说,吉登斯为思索私人生活提供了一套概念工具,而在大多数政治经济学的思考架构中正缺乏这些。[16]

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目标就是要批判地使用这些工具,思考资本主义制度中私人生活与商品化的特殊经历之间的关系,以及私人生活与自我和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得政治经济学可以讨论一种充满冲突的领域,私人生活中的道德、性欲、美学过程在此领域内与来自反复出现危机的另一个冲突领域的商品化相结合——这样一来,正是私人的、无序的商品化为私人生活又增添了一个危机。再进一步说,我们不仅可以把危机描绘出来,还可以确定抵抗的着力点,奥康纳(1987:181 - 182)是这么说的:

> 就是在危机的瞬间,才有可能转换成社会个性。……在这一瞬间,人们可以使内部斗争外部化,或者说,知道和感觉到自己与别人在忍受同样的痛苦,他们把受苦当作社会过程,通过社会和政治的斗争使它外部化。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考虑抵抗时面临着两个问题:这个抵抗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又是怎么表达的?第6章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探讨了身份与结构的结合点:社会阶级(Aronowitz,1992)、种族(Sivanandan,1990)、性别(Connell,1987)和一系列的社会抵抗运动(Bruck,1992;Luke,1989),这些社会运动跨越了以上提及的类别,强调了核心的社会议题以及在创造反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媒介时的具体的媒介体现。一些媒介分析家提出了分析受众抵抗的充分理由(Ang,1991;Fiske,1989),他们也提出了关于媒介讯息影响的差别及它们引起的各种反应等重要问题。但是,正如批评家们指出的(Schiller,1989),这种取向往往把社会的和政治的抵抗归因于对电视节目的意义或价值有不同见解。同样重要的是,这个说法使受众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不恰当地与阶级、种族和性别平起平坐。这部分地是由于社会阶级的概念被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简化为一个地位序列,这在费斯克的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传统社会类别的弱化提高了受众分析的位置。如前所述,传播研究长久以来有研究消费的偏爱,因此受众受到

---

[16]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提出了他的理论,但康奈尔(1987:201)和其他学者指出,这种理论的基础是,危机是在压力下自然诱发的,即性欲的本能达到压力的上限,从而诱发了社会危机。

这么多的注意并不奇怪。但当学者们试图把受众从刺激思考的修辞转换为重要的社会类别时,问题就产生了。像受众劳动一样,受众抵抗的说法把受众与核心社会意义的概念相提并论,抬高了受众的地位,这么做的代价是,抵抗与劳动这两者的特殊有力的涵义被冲淡了。

公共生活中的社会过程

社会学理论和传播研究都把公共生活当作一种抗拒商品化的形式和替代性的社会实践。[17] 哈贝马斯论述公共领域的著作特别重要,因为它批判地诘难了这个理念,并且提供了概念工具,有助于重新整理关于公共生活和公民身份的历史辩论。他的著作吸引了传播学者的注意,部分原因是他得出结论说,传播,或者说"理想的言论环境",为成功的公共领域提供了基础。他也总结说,当前的商品化的大众媒介以及消费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普遍扩张是造成公共领域衰落的根源。在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观念的众多批评中,与本章最有关联的是,他的公共领域中男性、资产阶级和白人压倒一切,因此,很难说这个领域是民主的或公共的。[18]

对批评的回应有几次转折。有些人宁愿完全抛弃这个概念,认为它太过妥协和简化。用德里达(见 Keenan,1993)的话说,公共意见简直成了虚拟幻影,实在令人失望。有些人希望挽救公共领域观并为它注人新的生命,他们加人了女性的公共领域(Peiss,1991)和无产阶级的公共领域(Negt & Kluge,1972);还有一些人试图批判地改善这一概念,强调公共领域是一整套原则,包括民主、平等、参与和公民身份,它引导我们走向不同于商品化实践的道路。后一种努力在传播研究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在那些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学者的研究中尤其如此(Garnham,1986;Murdock,1990a;Sparks & Dahlgren,1991)。[19] 这类著作研究了如何利用报业、电信和电子媒介以及规范与政策体系来创造对立的空间,发展公共领域。传播研究也对**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这个概念感兴趣,这个词渗透在规范传播产业的法律中。[20] 这个概念得到广泛的讨论,有人批评它

---

[17] 我同意基恩(Keane,1984)的说法,他宁愿选取"公共生活"这个术语,而不是"公共领域",原因是,"公共生活"的说法避免了把公共描述为一种特殊的空间。我倾向于把公共生活当成一整套过程,它能够改善两种根本的民主,即平等与参与。

[18] 这些批评者中比较宽容的人承认,哈贝马斯想描述的是公共领域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展现,他的著作的副标题就是:"对资产阶级社会范畴的探索。"(Fraser,1993;另见 Peters,1993)

[19] 龚拉那(1990)从伊斯兰教思想出发来批判西方市民社会的概念,他的观点也可用来对公共领域进行批判。

[20] 例如,《美国电信法案》是负责管理广播和电信的法令,其中提出规范要"符合公众的利益、便利与需要"。

的含义模糊不清，尤其是与市场这个较能清晰检验的概念相比，更是如此。但公共利益在法律中继续存在，虽然商品化的过程已经削弱了它的色彩。[21] 它在研究中也继续存在，作为公共领域观念的延伸，它超越了商业利益和消费主义（Melody，1990）。

这场关于公共领域的争论无疑是当前社会思潮中一股十分重要的知识流向（Peters，1993）。部分原因在于它构成了广泛的运动，力图开拓社会生活中有别于市场和商品化过程的替代性方向。但它也是恼人的辩论，因为公共领域就像一把大伞，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定义与立场。有人认为，公共领域既反对市场，又反对国家；又有人认为，公共领域是与市场或国家联盟的。[22] 公共领域可以包含市民社会，也可以被市民社会所包含，或者二者完全相同，不同理论背景的人对此各有说法。公共领域可以占据物理空间、制度空间，或是网络空间。它能够涵盖的社会行为也是包罗万象，可以是重要公共议题的辩论，也可以是逛街购物或制作音乐录像带等。公共领域包含了如此宽泛的意义和立场，这让人同意最近提出的一种说法（Robbins，1993），即公共领域是一个"幻影"，或者，好听点说，是"幻影汇集"——就像神话中的希腊辩论场。虽然对公共领域的批评是有益的，但如果把这些批评的思想勉强收集起来以取代公共领域观，也是不足以服人的。正如罗宾斯所说（1993：x），公共领域思想是一个强大的"论证武器"，如果没有它，我们等于是在"武装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社会斗争：

> 如果"幻影公众"这个词仍能使我们感到吃惊和迷惘，如果我们仍有些不情愿看到公众最后在空气中消散，原因可能不是残留的虔诚，而是害怕失去了它就无法行动。

问题是如何探讨公共领域到底是*什么*？或者，既然流行的说法是把它当成领域，那么，它在***哪里***？我认为，后面这个疑难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个概念的关键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就倾向于把它当成一个实体，占据一块能具体指明的空间，无论是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网络空间，或者只是

---

[21] 例如，安东尼·史密斯（1989：12）认为："消费主义的修辞已经一个领域接着一个领域地夺取了公共利益的阵地。"他认为这个过程将导致公共利益的重新定义："新的公共利益是一种经济利益：我们都能从一种竞争的、更新的经济中获益，并且，我们从政府介入来解放市场中获益的程度要高于从社会继续实行福利主义中获益的程度。"事实上这个观点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东西。亚当·斯密早就把公共利益和公共财富同市场的扩展联系在一起。

[22] 例如，赫伯特·席勒（1989）对国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但他又指出，政府经营的公共机构例如公共图书馆和公共教育都有它们的价值，同时也经受着商业主义的冲击。另一方面的例子是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1993），他提出充分理由，认为市场是强制规范形式的对立力量。

“幻影汇集”。捍卫公共领域的人好像是在保卫领土，抵抗一心要征服它的强有力的、怀有敌意的侵略者。这个类比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和公共领域是怎样形成对立的。但它也有不利的一面，它让我们把市场和公共领域看成占有特定空间的实体，但我们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指出这样的实体在哪里。由于这个困难，仅仅关于公共领域之内有什么、之外又有什么就造成了立场的千变万化。“公共”这个术语就够不确定的了，但和“领域”的不确定性相比，它的问题还算少些，尽管我们用尽各种方法来确定领域的特定含义，其中仍然存在严重问题。

如果不能把公共领域看成一块领地，我们也就不该转而说它只是幻影。我们应该***把公共的内涵界定为实行民主的一系列社会过程，也就是促进整个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过程中的平等和最大可能的参与***，从而避免唯心主义的幻影论，又避免了将公共领域作为具体空间来捍卫的伪唯物主义。这些过程与私人生活的核心过程截然不同，私人生活过程改善的是人际间的亲密关系；它们也与市场过程完全不同，生产过程促进的是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用过程来思考的价值在于，虽然某些制度的形式和空间可能会带来较大程度的平等与参与，但用过程来界定便不会因此排除其他任何结构性体现或结构性位置。我们最好将结构看作斗争领域，无论是国家、市场，还是其他企图远离国家与市场的社会结构(如社会运动)都是斗争领域，商品化过程与社会平等和参与的过程在这里进行抗争。身份的斗争，比如消费者身份和公民身份之间的斗争，无处不在。默多克(1993:527)得出结论说，它是“现代体验中的一个核心矛盾”。

运用公共过程的说法来进行思考会比较困难，如果换用清晰的制度与结构就会给人具体的感受，相比之下，公共过程观便像一种唯心主义的抽象概念。此外，结构与制度还为研究提供了路线图，这张图尽管需要时常修订，但毕竟提供了向导，使我们从一个地点到达下一个地点，决定走哪条路，避开哪条路。不过，制度与结构也会造成一种安全的错觉。现在有一种观点很流行，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即使没有完全投身市场，成为除了民主形式外简直一无是处的官僚机构，也已经在做无望的妥协了，虽然人们一度将国家当作挽救商品化的根源。结果，反商品化和非商品化的媒介形式和文化形式必须到国家之外去寻找，必须到与国家和市场都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去寻找。抨击国家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关于寻找未被污染的空间也有很多可谈，奥夫德海德(Aufderheide,1992:53)称之为“‘自由空间’里的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人们在此讨论并按自己的结论

行动”。根据对自由程度的界定,也就是自由空间在吸收多少污染后会质变为市场空间或国家空间,我们把传播的自由空间划分为传统形式和新的形式,前者包括非主流的报纸和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同国家控制的广播电视相对立),后者如公共享有的有线电视频道和开放了一个电子聚会场所的计算机网络。问题是它们虽然被看作自由空间的具体表现,但从重要方面来说,它们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空间。非主流报纸可能是最自由的,但依照不同国家的做法,它可能会使用政府的邮政津贴或直接从政府手中得到资助,它也会利用市场机构的支持,包括订费、广告、商业化劳动过程和发行网络。同样,依据不同国家的法律,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机构的财政主要依靠使用者付费、政府资助或商业广告,这些机构的主要经营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他们为证明自己的能力通常需要取得政治领域或市场领域的成功。公共享有的有线电视频道可能提供多元的内容,但它们也受到限制,只有那些付得起订费的人才能使用(1996 年,只有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家庭是有线电视的订户),并且,根据法律,它们受到有线电视经营公司和国家管理者的监督。互动的计算机网络尤其受市场和阶级因素的限制。要使用电脑网络必须使用电脑和电信设备,使用的人或者具备支付通讯费用的能力,或者像大学教授一样享有优待,他们的费用或由国家支付,或由大学承担(大学接受国家可观的资助),或由想要在新型传播中打开市场的公司承担。

强调这些媒介提供了主要的反主流和非主流的传播形式十分重要。不过,在把它们看作自由空间时,我们可能会忽略一个重要方面,即不平等的再现结构和围绕着阶级、性别、种族形成的不平等的等级结构又会通过什么方式被复制渗透到这些媒介形式中。[23] 此外,这也使得发生在国家和市场内抵抗商品化的斗争没有得到注意。这正是席勒(1989)、戈尔丁和米德尔顿(1982)以及埃温(1988)等人的成果要告诉我们的。席勒和戈尔丁认为,国家行为的中心领域存着冲突,他们论述了这一领域中的媒介、传播和信息等议题,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和社会福利系统等方面。此外,席勒关于商业言论的研究和埃温对风格时尚的研究都描述了在市场的最深处商品化过程的抗争性。首要的一点是,这些研究是从人们的生活经验着手的,而人们在学校、购物中心、社会服务机构

---

[23] 这个概念上的失误在新社会运动的研究文献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在这些文献中发现了一种倾向,即认定新社会运动是自由空间的一部分,既不受国家污染,也不受市场污染,虽然这后一点表达得不太明确。这些分析都谈及或实质地提到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是这些运动的自由空间。对此的批判性分析请见伍德(1990)。

和工作场合每天都面临着对立性过程的冲击，远远超过他们在非主流媒介和计算机网络中受到的冲击。而且，这些研究所揭示的一个核心要点是：市场、国家和公众从真正意义上讲是无处不在的，并没有固定的坐标。这种情况让人想到，我们要寻找的，不是自由空间，不是要在特权阶级中或在新社会运动中找到理想的社会形式，虽然它们或许展现了特别有力或较为纯粹的社会对立。

这鼓励我们思考社会过程，思考社会行动中的那些向量，它们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中形成了不同的关系。公共领域被更有效地概念化，成为一系列由社会代理机构以公民身份构筑出来的过程，为的是促进平等与参与，即民主的核心。这些过程只相对于社会领域而存在，这个领域的主要入手点即商品化使它有了模式和最初的外形，同时，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商品化与社会过程互动使社会领域内的关系被不断重构。说它是一个社会领域，这是从商品化的角度出发的，也是从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相互建构的角度出发的。我们称公共媒介是公共的，不是因为它占据了完全分离的空间，相对自由地存在于市场的考虑之外，而是因为它由特定形式的过程构成，这个过程坚持民主胜于商品化。假如它不这么做，**公共媒介**这个说法也就毫无价值。

本章已经指出，商品化是重新思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入手点。商品化为社会领域设定了模式，但只能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过程的互相建构中才能设定。下一章讨论第二个入手点，主要是空间化这个克服时空限制的过程。

第 5 章
空间化

>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能克服所有的空间障碍，这也就是"用时间消灭空间"。但马克思（和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这种消灭只能通过制造新的、固定的、相对无法流动的空间结构来完成，而如今这已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标**。如哈维所说，"消除空间必先组织空间"。
>
> （Lash & Urry，1987：85）

> 地区的新的动态……往往会围绕着不分地区的权力和毫无权力的地区之间的矛盾而形成，不分地区的权力依赖的是传播的流通，而毫无权力的地区只能在历史特定的领土基础上运作自己的传播符号。
>
> （Castells & Henderson，1987：7）

商品化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或者说切入点，这样，它开启了一个分析的领域，其中包括源自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许多过程，这些过程彼此联系，又同商品化相联系。商品化是一个起点，但不是惟一的起点。本章将讨论空间化这个切入点，这个词来自社会理论家亨利·勒菲弗（Henri Lefebvre，1979），指的是***克服社会生活中空间和时间限制的过程***。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来说，空间化之所以具有特

殊的意义,原因有两个。第一,传播过程和传播技术在空间化过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贯穿了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第二,出于同样的原因,空间化在传播产业中尤其重要。

对空间化的研究兴趣正越来越普遍,而社会科学家,包括政治经济学家是最早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的。对斯密、李嘉图以及其他古典主义理论家来说,如何测量土地和劳动时间的价值这一问题和市场的空间扩张与劳动分工的关系一样,都是重要的课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接近空间化的观念,他在《大纲》里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说成是"以时间消灭空间"。这指的是资本利用并改进运输和传播工具,减少了用于在两地间移动货品、人和信息的时间,因而空间距离作为资本扩张的限制的重要性也降低了。在对这个主题有所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家中,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1972)可以说最突出,他不断努力,试图在媒介形式、时间与空间、权力结构之间建立联系。最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Lash & Urry,1987)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资本不是消灭了空间,而是转变了空间,重新建构了人、货品和讯息之间的空间关系,并在这个过程中变革了自己。[1]

对许多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空间化"这个术语所援用的概念和观点也越来越重要。例如,吉登斯(1990)曾使用**时间—空间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这一术语,探索时间—空间依赖关系的减弱,并建议集中分析作为弹性资源的时间和空间的增长。哈维(1989)所说的**时间—空间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与此相似,虽然这个说法更强调政治经济学含义。例如国际银行业务系统每天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处理大约一兆美元的资金流动,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卡斯特斯(1989:348)则提醒我们注意,相对于他所谓的**流动的空间**(the space of flows),物理空间的重要性已经降低:

> 这是权力组织的功能性逻辑的行为表现,这些组织运作于交换的不对称网络中,它们在实现自己的根本目标时,并不依赖于任何具体地方的特征。

卡斯特斯提供了一个积极的空间内涵。梅西(1992)指出,传统的空

---

[1] 我们不该苛求马克思所说的*消灭*空间。实际上他承认(转引自《大纲》,de la Haye,1980:156)这意味着资本投入的注意力有了转移,开始指向不同的空间,特别是新的市场:"运输和传播设备的发展为资本创造了许多机会,反过来说,这也使得资本必须为越来越远的市场而工作,简单地说——为世界市场而工作。"最近的批评(Lash & Urry,1987)也追随马克思的观点,描述了这种空间效应的转移和多重性。

间概念是性别化的，它指的是一种没有时间的状态，而卡斯特斯把空间看作是“时间的切片，大地母亲变化的能力依赖于时间的动力”。此外，卡斯特斯(1989:348)把传播置于空间化过程的中心，因为传播维持了分化与整合的动态平衡：

> 新的产业空间和服务型经济，围绕着它们的信息搜集活动来组织自身的运作，它们将不同的职能与完全不同的空间相联系，使它们各自执行任务，整个过程又通过传播系统整合起来。

最后，他的空间观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保留了一个不同的权力意识，而某些全球化的概念往往强调互相依赖的网络，权力的意识被冲淡了。梅西(1992)说得更清楚，她用联系的观点来解说空间，认为空间包括许多动态的社会关系，组成一种“权力几何体”。他们的著作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如果把空间化视为理解权力几何体与构成空间(特别是传播流动的空间)的过程之间关系的手段，会从中获益匪浅。

传播与集中：空间作为制度的延伸

一般说来，空间化研究探讨的是组织活动的地理延伸和制度延伸，而传播政治经济学所论述的空间化特别研究了***传播业中企业权力的制度延伸***。这个延伸主要表现在媒介公司规模的增长上，无论是从财产、营业收入、利润、雇员人数还是从股票价值上计算都是如此。政治经济学还特别考察了不同形式的***企业集中***。虽然企业规模的增长与集中是当代传播业的核心特征，但对这些发展的社会后果的关注也不少见，例如，一百多年前，巴尔扎克就批评查尔斯·哈瓦斯垄断了法国电缆服务权，因而造成信息来源的减少。

最简单的集中形式就是一家媒介公司购买另一家同行公司的控股权。[②]《纽约时报》购买《波士顿环球报》就是这个基本形式的最佳例证。对集中类型的传统研究把它分为**横向**(horizontal)和**纵向**(vertical)两种。不过，这两个词虽然被广泛使用，但在传播研究中它们的概念、界定和运用并没有一致的见解，强调这一点很重要。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

---

② 控股和主要股权的定义差别很大，有人认为在股权很分散的公司取得2%的股权就算拥有主要股份，也有人认为只有拥有51%或更多的股权才算控股。后者可以让一个公司掌握多数股票，并因此控制董事会。

媒介集中的研究还不完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媒介产业影响研究课题造成的，它使我们更多地研究怎样销售产品，而不是研究媒介集中的状态与内涵。缺少概念上的共识也是因为这个产业的变化实在太快。产业结构、技术、服务的变化，以及国家政策、法规(通常大大落后于这些变化)的变化，使得很难为概括媒介集中提供普遍认可的语言。

考虑到术语上的限制后，我们就可以来看关于媒介集中的几种主要思考方式。横向集中指的是一家媒介公司购买另一家媒介公司的主要股份，后者可能并不直接与前者的行业相关，或者其主要资金来源根本与媒介无关。[3] 第一种情况或者说跨媒介集中的典型例子是一家传统的媒介行业公司(比如说报纸)购买了一家较现代化的媒介公司(如广播电台或电视台)。这是一种传统产业(如报纸)面临新媒介形式竞争时维持赢利的方法，鲁伯特·默多克新闻集团购买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就是例证。在第二种情况，当媒介公司转向与媒介产业完全无关的公司或媒介公司被非媒介产业公司所吞并时，横向集中也会发生。前者如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美国全国电视网(NBC)的母公司——购买赫茨出租汽车公司。被非媒介公司接收的例子有通用电气公司(GEC)——一家电子公司，也是主要承揽国防业务的公司——购买美国无线电公司，虽然通用电气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就是RCA最初的拥有者。还有，意大利芬尼维斯特(Fininvest)集团的首脑西维奥·贝鲁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在1994年初利用他所控制的媒介协助他成为右翼联盟的主席，进而赢得了全国大选的胜利，这又是由非媒介产业建立媒介帝国的明显例证之一：这家由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起家的公司(Cantieri Riuniti Milanesi)分别在大众媒介业和金融服务业建立了七个部门。[4] 这种水平形式的集中造成了**联合大企业**所有权的产生和扩张，这种联合是不同产业的公司合并的产物。

纵向整合指的是在相同的产业生产线上多家公司的集中，使一家公司能够控制整个生产过程。MCA这家好莱坞重要制片商购买了奥迪盎

---

③ “不直接相关”这句话很重要，这不只是定义问题，因为如果购买一家相关的公司，将降低某一个市场(如果涉及买卖的两家公司在同一个市场里经营)或更多市场(如果两家公司在不同的市场里经营)竞争的程度。反之，人们也可能认为购买相关的公司更有可能提高市场效率，因为这能使买方公司的经营更加理性化。

④ 在20世纪80年代顶峰的时候，芬尼维斯特帝国蔓延至包括房地产、出版、旅游休闲、金融服务、零售与广播电视在内的众多产业，其中大部分产业资本积累迅速，资金大都依赖借贷。90年代初意大利经济发展减缓，这家公司陷入了困境。1994年，芬尼维斯特卖掉13亿美元的资产用于还债。1994年1月，贝鲁斯科尼辞去芬尼维斯特总裁的职务以便参与右翼政党联盟，争取当时即将开始的全国普选选票。由于他在直接卷入意大利政局后仍然掌握媒介行业，因此受到批评。最后要提到的是，1995年5月，默多克新闻集团出资28亿美元想购买芬尼维斯特的三家意大利全国电视网的51%的股权，这也是媒介产业变动浪潮的例证。

多剧院后，就控制了一家重要的电影发行公司。这也称作向前的整合，因为它使一家公司在实现价值的循环上前进了一步。还有向后的纵向结合，如《纽约时报》购买魁北克的造纸厂从而扩展了公司的生产过程。一家公司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机会，纵向整合能使其经营更理性化，从而取得竞争的利益，当然这也取决于这家公司是否能足够有效地管理生产阶段的流程。如果电视网拥有了节目制作公司，那么它就能够保证以较低的价格得到节目。与此相同，拥有电话线路的公司如果兼卖电话器材设备，或者电影公司控制了电影院，它们就会获利更多。

这些形式的整合是控制不确定因素的重要手段，如果一家公司只依赖外部市场来完成生产周期，必然会遇到各种不确定。商业史学家们早就认识到整合过程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不管我们称它是财团资本主义、经营资本主义、组织资本主义，还是垄断资本主义。例如，钱德勒(Chandler，1977)详细描述了许多整合成功的公司的经营策略，如杜邦、通用汽车和西尔斯，它们都成功地支配了各自的产业数十年。钱德勒认为，这些公司成功的因素在于它们采用的经营策略能让本公司不受许多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左右，比如在生产周期中存在许多强有力的竞争者所导致的不确定。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个受到保护的环境中创造了许多市场，使相同生产线上的分工有所竞争。通用汽车公司成功而其他公司失败，一部分原因是它的横向整合和纵向整合保护它不受竞争的伤害，***同时***，也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内部市场，使得旗下的奥斯摩比、庞帝克、雪佛龙和卡迪拉克等不同的车厂各自以独立的生产线来完成各自的增长目标。在这家高度整合同时又多层分工的企业集团中，执行董事会既是经理又是银行家，他们负责评估各公司经营是否成功，并据此调动资源(见图 5-1)。[5] 根据钱德勒的说法，组建这个结构的公司会从内部市场的竞争中获益良多，其重要意义不亚于它降低了外在敌意竞争的不确定性。钱德勒和其他商业史学家(见 Brunn & Leinbach，1991；Pred，1966；Yates，1989)也指出，传播与信息技术和运输系统一样都是这些过程的核心，因为它们提供了工具，让经营管理者能够控制整合的程度和形式。对一家整合的、多层分工的企业财团来说，其成功来自能及时评估各部分的相关成效，比如，哪个部分的投资回报最好？为什么？因此其内部必然流通着多种信息，需要快速有效的传播系统来管理其运行

---

⑤ 钱德勒对照了两类公司，一类是成功的，它运用了多层分工的准市场功能，另一类是不那么成功的公司(如福特)，尽管它的整合程度也很高。按他的观点，后者忽略了内部市场的机能，保留了功能性的企业结构，根据传统的财务、销售、生产和会计来划分内部部门，排除了财团内部各公司的竞争，或者说使内部竞争很难产生。

(Chandler,1977,尤其参见第6章;另见 Malone & Rockart,1991)。

a)功能的

董事会和主管经理

生产 人事 销售 研究 财务

b)多层分工的

董事会和主管经理

分公司(生产A产品) 分公司(生产B产品) 分公司(生产C产品)

c)控股公司

母公司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d)地区/产品

董事会和主管经理

地区1 地区2 地区3

产品A 产品B 产品A 产品B 产品A 产品B

图5-1 企业集团结构类型(Chapman & Walker,1987:115)

在媒介产业中,时代—华纳公司是建立多层分工的先驱,它处理畅销小说——罗伯特·詹姆斯·沃勒(Robert James Waller)的《廊桥遗梦》的手法证明了这种组织形式的价值。华纳图书公司出版了这部小说,截止到1973年7月,共售出250万册。时代—华纳属下的亚特兰大唱片公司灌制了根据这部小说创作的歌曲唱片,由作者本人演唱,同时制作了音乐录像带。时代—华纳公司所属的杂志报道评析了这部小说和唱片(亚特兰大公司一共签下了五张),并刊登广告。公司还为时代—华纳有线电视网制作了一个短小节目,其中由这位作家作为流行歌手来促销自己的作品,并提供800这一电话号码以便电话订购(Cox,1993)。[6] 到1996年,华纳

⑥ 虽然并没有特殊的考虑,但美国主要电视购物频道QVC以高价购买派拉蒙传播公司的理由之一是,QVC已经证明自己有独特的能力能卖掉几乎任何消费品,包括书在内。在播放家庭购物节目的30分钟内,QVC公司卖出了15,000册小说。1993年,派拉蒙以5.53亿美元从垂死的马克斯韦尔(Maxwell)媒介帝国购买了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于是控制了十二家左右的出版商,包括西蒙和舒斯特(Simon & Schuster)、普伦蒂斯·霍尔(Prentice Hall)、试金石(Touchstone)、斯克里布纳(Scribner)和口袋书(Pocket Books)图书公司(Mehegan,1994)。但公司出售之前,要先进行重组。在1994年初,派拉蒙出版公司宣布,这家合并的公司将从总共10,000名员工中裁减1,100人,并精简某些专门单位,如已有35年历史的图书馆部门(Cox,1994)。

兄弟公司又把它拍成畅销电影和录像带。

二次大战后**多国经营**(multinational)企业的加速增长是媒介产业的另一种发展形式,它日益引起传播学者的关注。如史密斯(Smith,1991)和汤斯达尔(1977)曾证明的,跨国媒介企业像大众媒介一样源远流长。在19世纪,新闻的生产和发行在很大程度上被三家国际性的新闻联合企业——美国的路透社、法国的哈瓦斯社和德国的沃尔夫社所控制,它们把世界分为若干垄断地区,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竞争。[7] 这个趋势在近几十年又有扩展,传播公司继续寻求新的产品市场、低成本劳动力和政府监督规范最少的地区。媒介产业对跨国化的一般过程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媒介直接通过广告,但却间接地以媒介的各种形式引起人们对特定媒介产品之外的一般商品的注意。再者,传播手段(包括新科技如传播卫星和高负载电缆)使各公司能以成本利用率更高、更容易的方式(涉及传播产业的大部分)同时跨越多个国界而高效运作。一些大的跨国媒介公司仍然在某个确定的国家保留了基地,然而,这些公司越来越能够运用其产品、销售、劳动力和财务的多国范围,超越其国家基地的法律、规范、文化和金融的限制。

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安东尼·史密斯(1991)称之为"巨兽"的时代—华纳、三菱、贝塔斯曼、新闻集团、芬尼维斯特、哈谢特、迪斯尼和索尼等集团的兴起。这些媒介公司通过控制生产、发行与放映来完成纵向整合;它们的横向整合跨越了一系列的媒介产品,包括软件与硬件;它们还通过国际分工,能够灵活、符合成本效益地使用劳动力、资本、研究与发展成果,进行全球整合。它们的经济权力非常集中。不过,类似这种超级整合财团的形式并不是企业应付全球重组的惟一方式,也不能算是最有效的方式。我们不必成为罗伯特·马克斯韦尔的帝国崩溃后养老金被削减的员工,或是成为期待着一美元能有几分进帐的小股东,又或者是不知能否从庞大债务中抽身的时代—华纳的投资人,也能了解这些情况。这些高度整合的联合大企业从内部竞争中获益,同时又收缩了外部市场的力量。但这样做也要付出代价。时代—华纳的合并造成了100多亿美元的债务,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帝国建立在80亿美元的短期贷款上。联合大企业形式有巨大的灵活性,但它可能会导致官僚主义,阻碍创新部门的活力,例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在70年代,IBM在80年代都出现过这个问题。

---

⑦ 赫伯特·席勒(1976:26-29)提醒我们,在当年世界范围的报业卡特尔垄断下,美国最为不满,它要求不该用规模和财产来决定谁可以控制信息的生产与发行,而几十年后世界上的众多穷国反而得向美国提出同样的要求。

表5-1 世界二十五大影视公司(以销售额排列)

位次	公司	国家	1991年影视销售总额(以百万美元为单位)
1	时代—华纳(Time Warner)	美国	7,391
2	索尼(Sony)	日本	5,702.6
3	大都会/ABC(Capital Cites/ABC)	美国	4,329.7
4	日本广播协会(NHK)	日本	4,039.8
5	三菱(Matsushita)*	日本	3,951
6	德国电视一台(ARD)	德国	3,730.4
7	宝丽金(PolyGram)	荷兰	3,379.7
8	芬尼维斯特(Fininvest)	意大利	3,331
9	富士产经(Fujisankei)	日本	3,259
10	英国广播公司(BBC)	英国	3,237.6
11	贝塔斯曼(Bertelsmann)	德国	3,159
12	意大利广播电视台(RAI)	意大利	3,125
13	通用电气/NBC(General Electric/NBC)	美国	3,121
14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美国	3,035
15	新闻集团(News Corp.)	澳大利亚	2,750.6
16	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	美国	2,593.7
17	百代(Thorn EMI)	英国	2,497.5
18	派拉蒙(Paramount)	美国	2,380.2
19	东京广播公司(Tokyo Broadcasting System)	日本	1,581
20	朝日全国广播公司(Ashai National Broadcasting)	日本	1,570
21	日本电视网(Nippon Television Network)	日本	1,544
22	特纳广播公司(TBS)	美国	1,433.9
23	维亚康姆公司(Viacom)	美国	1,370
24	公共广播系统(PBS)	美国	1,320
25	卢森堡电视公司(CLT)	卢森堡	1,305

* 三菱 1990(估算)= MCA1990 + JVC 娱乐公司,1990/1.
 三菱 1991:25% + MCA 的 80%.
资料来源:IDATE,1992:6.

由于国内基地的重要性降低,有些人开始考虑,这对跨国公司的利益和国家主权控制它们的能力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罗伯特·瑞奇(1991:8)问道:

> 那么我们是谁?……本国公司的获利和投资者的成功都未必能改善大多数本国公民的生活水平。这些公司正在同他们的国家断绝

关系。[⑧]

有些人对这一观点提出异议，他们发现，跨国公司的经济权力几何体被曲解为是有利于跨国公司母国的工人和消费者的(Thurow，1992)。另外一些人认为，国家继续保持着规范其司法管辖范围内所有公司的权力，无论这些公司挂的是哪个国家的国旗，因此，一个由强大的主权国家和强大的跨国公司共同组成的世界是存在的(Strange，1988)。瑞奇的观点虽然有待商榷，但他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目的在于保护"本国"公司的政策，到底为谁服务？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它们虽然是跨国公司，但至少是*我们的*跨国公司，他们担心近半数的好莱坞大公司被外国控制的后果，而不关心凭什么说剩下的公司还是美国的。或者说，为什么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允许"我们的"影片出口协会进入外国市场营业时，不必受到反垄断法的监督？[⑨] 还有，美国电信政策制定者担心自己的电信制造业市场落入北方电信公司之手。这虽是一家"加拿大的"公司，总部却设在美国，也在美国雇佣较多的劳动力。美国人也很少质疑 IBM 的民族身份，虽然它的一半收入得自美国之外的国家；它也绝不会怀疑，美国科技(Ameritech)这家利用其地域垄断地位购买新西兰电话系统和德国电话黄页出版公司的企业，到底什么地方是"美国的"？虽然如此，许多公司*的确*不愿放弃本国的根基，因为它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它通过优惠的法律、规范和投资政策的形式，成为这些公司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的坚实后盾。由于本国政府的优惠政策，日本的三菱、美国的时代—华纳和加拿大的北方电信才能在向国际市场扩张时少担许多风险。瑞奇提出的问题"我们是谁"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些公司是否在本国留有根基，因为如果从有利于社会的观点来看，问题不在于根基在哪里，而是这些公司是否无论在哪里都能创造就业机会，生产社会有用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它们的商业

⑧ 瑞奇(1991：166)以媒介产业来反驳时代—华纳的说法，后者宣称联合大企业的产生"将使美国更好地迎接外国媒介公司"："相对于这个国家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包括 20 世纪福克斯、福克斯广播电视网、《电视周刊》、哈珀和罗出版社(Harper & Row)〕、德国的贝塔斯曼媒介帝国〔包括 RCA 唱片公司和班顿(Bantam)，《双日刊》和戴尔(Dell)〕、法国的哈谢特〔包括《妇女节》和格罗列尔(Grolier)百科全书〕以及索尼(CBS 唱片公司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得到的好处而言，为什么说这种合并对美国特别有利，仍然是不可理解的。美国的作家、编辑、导演、音乐家和电影放映师都参与到全球媒介公司中，外国的人员也一样。"

⑨ 瓦斯科(1994)指出，好莱坞是一个"三层的社会"。顶端是是大的电影制片厂：派拉蒙、20 世纪福克斯、华纳、环球(Universal)、迪斯尼和哥伦比亚。其中有三家的产权不是美国的。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拥有福克斯，日本电子企业三菱拥有环球，索尼拥有哥伦比亚。第二级她称之为"介于小/大之间"的制片厂包括米高梅/联合(MGM/UA)、爱浪(Orion)、卡罗科(Carolco)及新院线(New Line Cinemo)。最小的公司组成第三级，一般称之为独立制片商，不过，这么称呼并不很准确。

行为是否受到规范,以符合公共利益?

表5-2 国际唱片业的市场集中度(1990/1)

公 司	营业额(百万美元)	市场占有率
索尼音乐	3,274	20.60
时代—华纳	2,931	18.50
宝丽金	2,884	18.20
贝塔斯曼	2,219	14.00
百代[1]	1,814	11.40
日本胜利公司[2]	815	5.10
MCA	764	4.80
维京	567	3.60
其他(估计)	600	3.80
总计	15,868	100.00

(1)百代1991年收购了维京。
(2)日本胜利公司与MCA的营业额为1989年的数字。
资料来源:IDATE,1992:31.

政治经济学家对集中的各种形式都有兴趣。不过,我们最主要的兴趣在于*所有权*,它是媒介集中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主要是因为所有权的集中限制了生产者和发行者的多样性,因而会限制传播和信息的流通。所以,历来对纵向的、横向的和跨国的集中形式的多样性研究往往从讨论产权集中的后果开始。不过,怎样测量集中的程度,怎样评估其重要性,却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康潘(Compaine)等人(1982)认为有两种方法,一

种是传统的反垄断定义，以市场占有率为标准；另一种采取较宽泛的概念，以公司规模和市场中产品的多样性为标准。前者通常用于规范与法律行为中，据此原则，已经发展出许多方式来测量市场竞争程度。[10] 这个取向以市场为焦点，确定这个市场开放程度多大时具有产品（如电视节目或报纸）的多样性。不过，这里的分析单位是公司，其所有权必须与市场中其他公司的所有权不同。例如，在报纸市场中，默多克新闻集团拥有的日报与甘乃特集团的日报被视为竞争对手；但如果两家都是甘乃特集团的报纸，就不是竞争对手。虽然这里强调的是市场，但检验集中度的单位仍然是公司。

表 5-3　1992 年世界十大娱乐公司（以营业额计）

公　司	国家	营业额（百万美元）
时代—华纳	美国	7,957
索尼	日本	5,775
三菱	日本	4,709
飞利浦	荷兰	3,700
迪斯尼	美国	3,115
派拉蒙传播	美国	2,657
百代	英国	2,463
贝塔斯曼	德国	2,219
富士产经	日本	2,100
新闻集团	澳大利亚	1,858

另一种衡量集中度的标准比较宽泛（Wasko，1984，1994），它仍然考虑到市场，但将注意力转移到所有权的集中度上，所有权集中后，企业就可以使用在***一系列市场***中运作的资源。另外，它把分析的焦点从纯粹的产品多样性转移到***差异性***上。例如，如果根据这个标准，时代—华纳的子公司曼哈顿有线电视在市场上的力量其实远比它表面上的占有率高。这家公司是纽约市地区有线电视的供应者，它能采用母公司的各种资源，从产品、财务到政治游说力量等等。因此，曼哈顿有线公司与完全没有这些背景的公司根本不同。然而，如果只进行特定的市场分析，它就与其他没有母公司联系的独立公司一样了。另外，这个较宽泛的集中形式的分析使

---

⑩ 美国政府使用集中指数表示市场的寡头垄断控制程度。比如，贺分达—贺许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指的是同一市场中，所有公司市场占有率的平方和。若是一个市场中有两家规模相同的公司，则 HHI 值是 5000。美国政府将 HHI 值低于 1000 者界定为不集中，1000—1800 则是“灰色地带”，超过 1800 则是高度集中（见 Levy & Setzer，1984：209）。

表5-4　美国五十大使用传播资源的公司(1994)

1994年排序	1993年排序	公　司	1993年营业额(百万美元)
1	1	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 Corp.)	135,696
2	3	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	108,448
3	2	埃克森石油公司(Exxon Corp.)	97,825
4	8	沃尔—玛特超市公司(Wal-Mart Stores Inc.)	67,345
5	4	大西洋电报电话公司(AT&T)	67,156
6	5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	62,716
7	7	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	59,827
8	6	美孚石油公司(Mobil Corp.)	56,576
9	9	西尔斯百货公司(Sears Roebuck & Co.)	50,838
10	10	飞利浦·莫里斯公司(Philip Morris Co. Inc.)	50,621
11	15	克莱斯勒公司(Chrysler Corp.)	42,260
12	11	凯玛特公司(KMart Corp.)	34,353
13	14	德士古公司(Texaco)	33,245
14	13	杜邦公司(CI DuPont de Nemours & Co.)	32,732
15	12	雪佛龙公司(Chevron Corp.)	32,123
16	18	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 Co.)	30,433
17	16	西特公司(Citicorp.)	28,868
18	17	波音公司(Boeing Co.)	25,438
19	20	美国石油公司(Amoco Corp.)	25,336
20	22	百事公司(Pepsico Inc.)	25,021
21	23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 Corp.)	22,762
22	21	克鲁格公司(Kroger Co.)	22,384
23	25	康纳格拉公司(Conagra Inc.)	21,519
24	28	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21,155
25	24	联合科技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 Corp.)	21,081
26	39	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 Co.)	20,317
27	NR	全州公司(Allstate Corp.)	20,228
28	27	通用电话和电子设备公司(GTE Corp.)	19,748
29	29	JC潘尼公司(JC Penney Co.)	19,578
30	33	戴顿·哈德逊公司(Dayton Hudson Corp.)	19,233
31	30	美国商业公司(American Stores Corp.)	18,763
32	32	西格玛公司(Cigna Corp.)	18,402
33	31	道化学公司(Dow Chemical Co.)	18,060
34	38	联合快递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 of America Inc.)	17,782
35	NR	大西洋里奇费尔德公司(Atlantic Richfield Co.)	17,189
36	35	埃特纳人寿与伤亡保险公司(Aetna Life & Casualty Co.)	17,118
37	41	萨蒙兄弟公司(Salomon Bros. Inc.)	17,107
38	53	摩托罗拉公司(Motorola Inc.)	16,963
39	51	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 & Co. Inc.)	16,588
40	26	伊士曼·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 Co.)	16,364
41	37	施乐公司(Xerox Corp.)	16,193
42	196	USX公司(USX Corp.)	16,137
43	45	联邦国民抵押协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n.)	16,053
44	62	超级价值商业公司(Super Value Stores Inc.)	15,937
45	44	南方贝尔公司(Bellsouth Corp.)	15,880
46	46	AMR公司(AMR Corp.)	15,701
47	128	普里斯·卡斯特科公司(Price/Costco Co.)	15,476
48	43	安全之路公司(Safeway Inc.)	15,215
49	40	纳贝斯克公司(RJR Nabisco Inc.)	15,104
50	54	萨拉·李公司(Sara Lee Corp.)	14,580

资料来源:*Information Week*, October 10, 1994:38.

我们的注意力不再单纯局限于市场中渠道的数量问题上，而是转移到各个频道提供的内容的多样性上。根据这个观点，在一个特定的市场里，尽管只有一家公司垄断有线电视的所有权，但它同时在许多不同的频道中提供了许多不同的意见；而另一个特定的市场中虽然有所有权不同的许多报纸，但其观点大致相同，两种情况比较，还是前者的集中度小。这种宽泛观点的支持者承认测量这些集中形式是有困难的，但他们认为较狭隘的观念只集中在市场占有率指数的建立上，只能提供一种机械式的、不够稳定的集中度温度计。[1] 此外，他们还指出狭隘观念的一个缺陷，即没有探讨如何扩大最广泛范围的信息和意见的享用权，而这一点正是集中化分析的政策目标之一。

麦克劳林及安东诺夫(McLaughling with Antonoff,1986)把传播技术和服务的变迁放在整个经济变化的背景中加以考察，重新提出一份传播产业的空间图。在他们的图中，一个轴线的两端是产品与服务，另一个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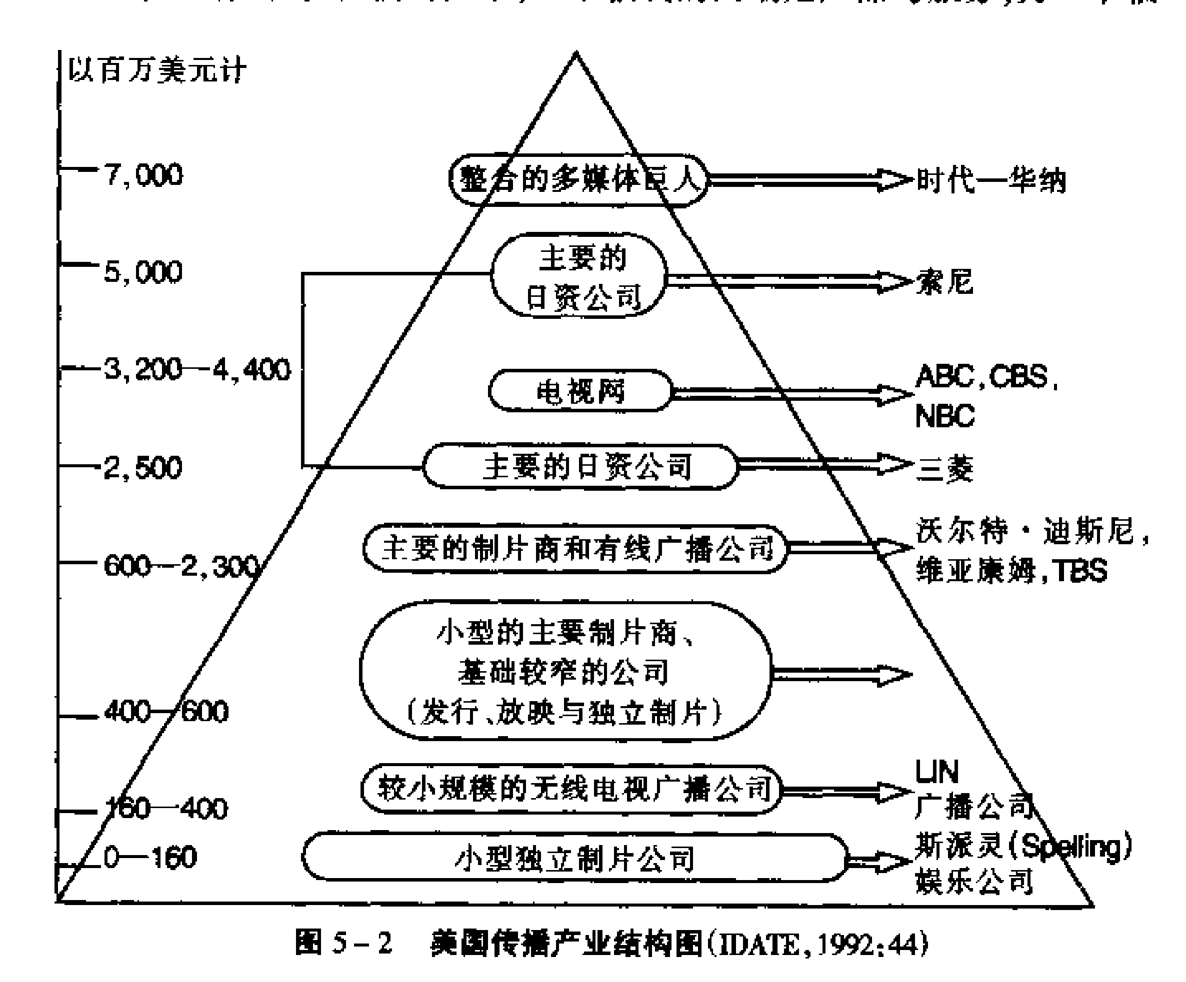


图 5-2　**美国传播产业结构图**(IDATE,1992:44)

---

[1] 正统经济学不愿意对较宽泛的多样性观点多做研究，不管它有什么价值。它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它无法实际地进行测量。它们倾向于将竞争者的数量和节目的多样性等同看待，又将节目预算的大小与产品的品质等同看待(Owen & Wildman,1992:146)。

线的两端是形式(渠道)和内容(文本),他们画了一系列的图来表示信息产业的变化(见图5-3~5-6)。他们的历史概述表明,成长的主要区域是图的中心,在这里产品与服务、渠道和文本汇合了。伯特(Burt,1992)采取了更具野心的取向,他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制作出美国经济的拓扑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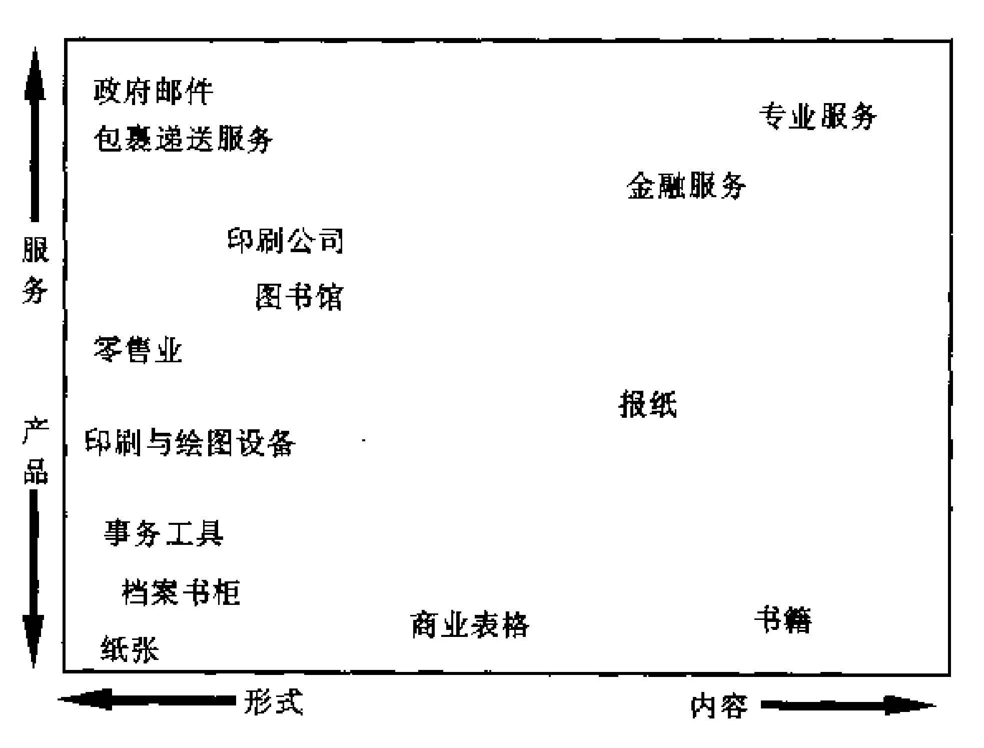


图5-3 1790年的信息商务(McLaughlin with Antonoff,198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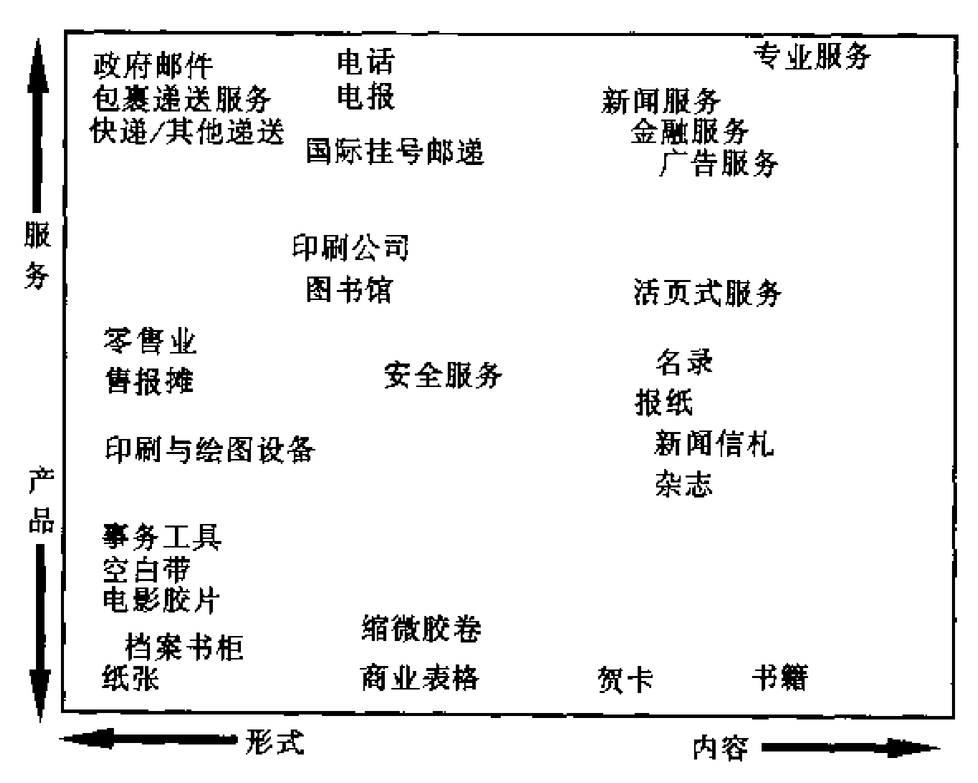


图5-4 1880年的信息服务(McLaughlin with Antonoff,198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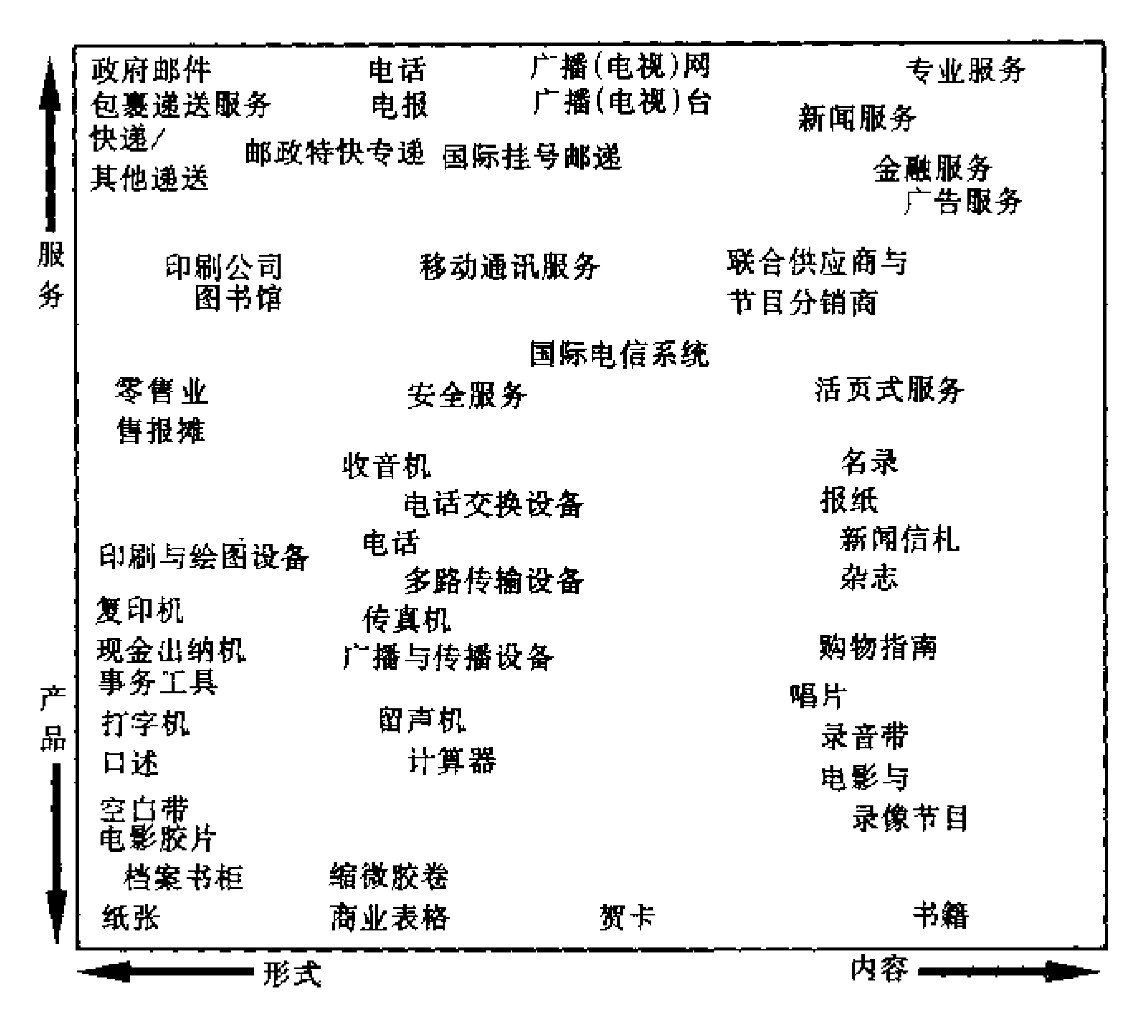


图 5-5　1930 年的信息商备(McLaughlin with Antonoff,1986:20)

他主要通过强调产品的有机和无机成分以及使用的科技是新是旧来试图确定商业活动的集合(见图 5-7)。有意思的是,伯特的主要结论之一(p.88)是,根据《美国当前商务调查》的输入—输出表格而制作完成的这张图自 1960 年以来一直相当稳定,惟一的例外是“图的底部出现不稳定的缺口,原因是过去二十年来,有关器材、计算机及传播设备等市场的各种交易有了变化”。

不过,这些有关集中的观点虽然或宽泛或狭隘,但主要的焦点都在所有权上,都把所有权当作最主要的测量标准。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宽泛的观点也对**企业董事会**进行了分析。这个取向不是要考察谁拥有媒介,而是要画出负责经营这些公司的主要人士的关系图。虽然管理公司董事会的法律因地而异,但大多数公司履行董事会职责的形式都是一样的:一是选任最高的管理阶层,包括任命最高执行主管;二是决定主要的预算案,如资本支出与削减,后者包括建造或关闭厂房和办公室等。理论上董事会由股东选出,但实际上通常是董事会自行决定本身的组成。董事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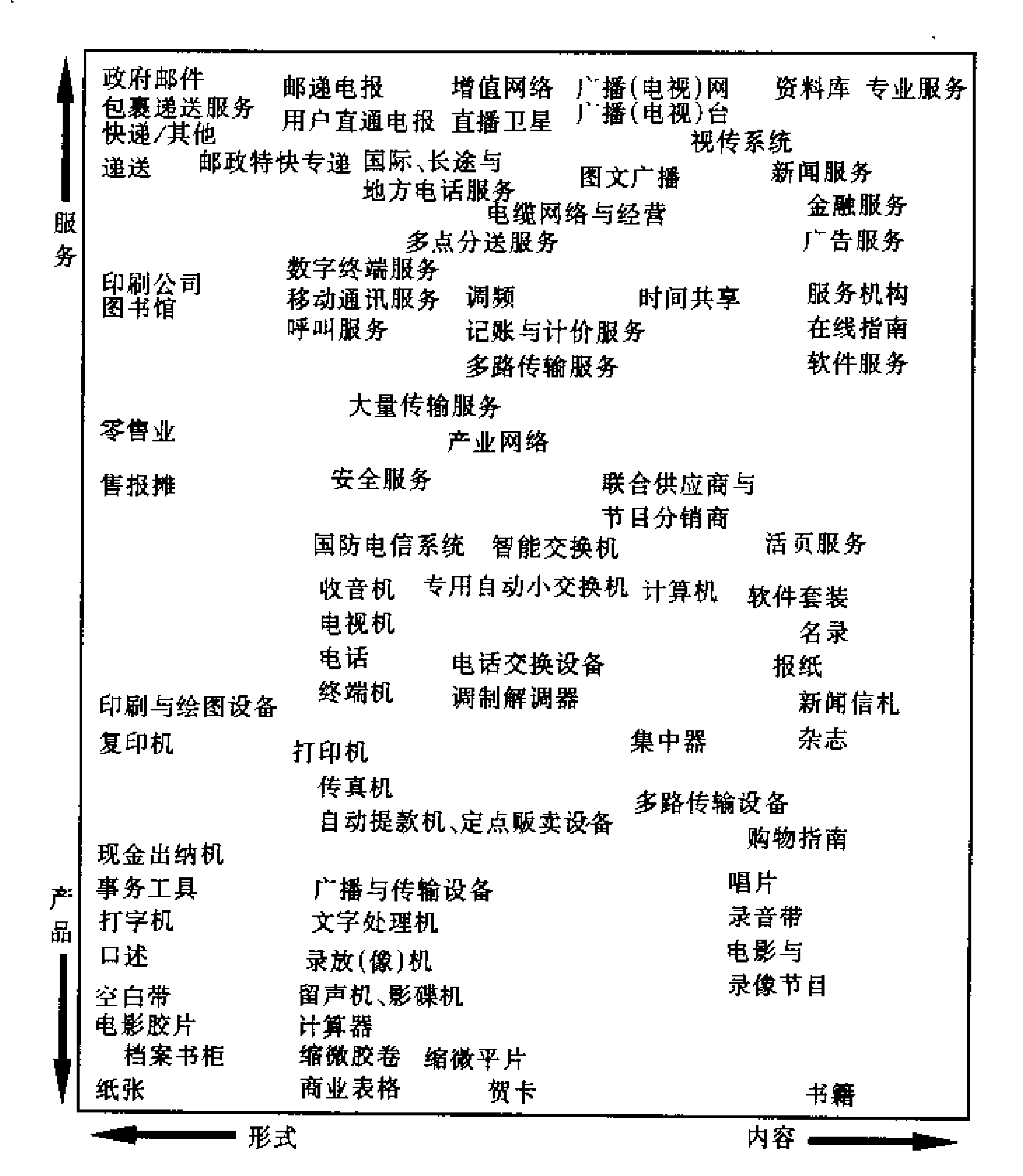


图 5-6 当前的信息商务(McLaughlin with Antonoff,1986:4)

大小与公司的规模及经营的多样性程度有关,通常有十五至五十位成员。董事会主要分为*内部*成员(通常就是本公司经营管理阶层的一些人)与*外部*董事(通常是其他公司的执行主管,也可能包括市民社团的象征性代表)。例如,时代—华纳1991年的董事会有35位成员,其中23位是公司的执行主管;外部董事主要是金融或其他产业公司的主管,包括施乐公司的董事长和IBM的执行委员会主席(Dun's Marketing Services,1991)。[12]

---

[12] 除了各公司的年度报告和《邓氏指南》之外,《标准及普耳公司名录》也是非常好的关于公司董事的资料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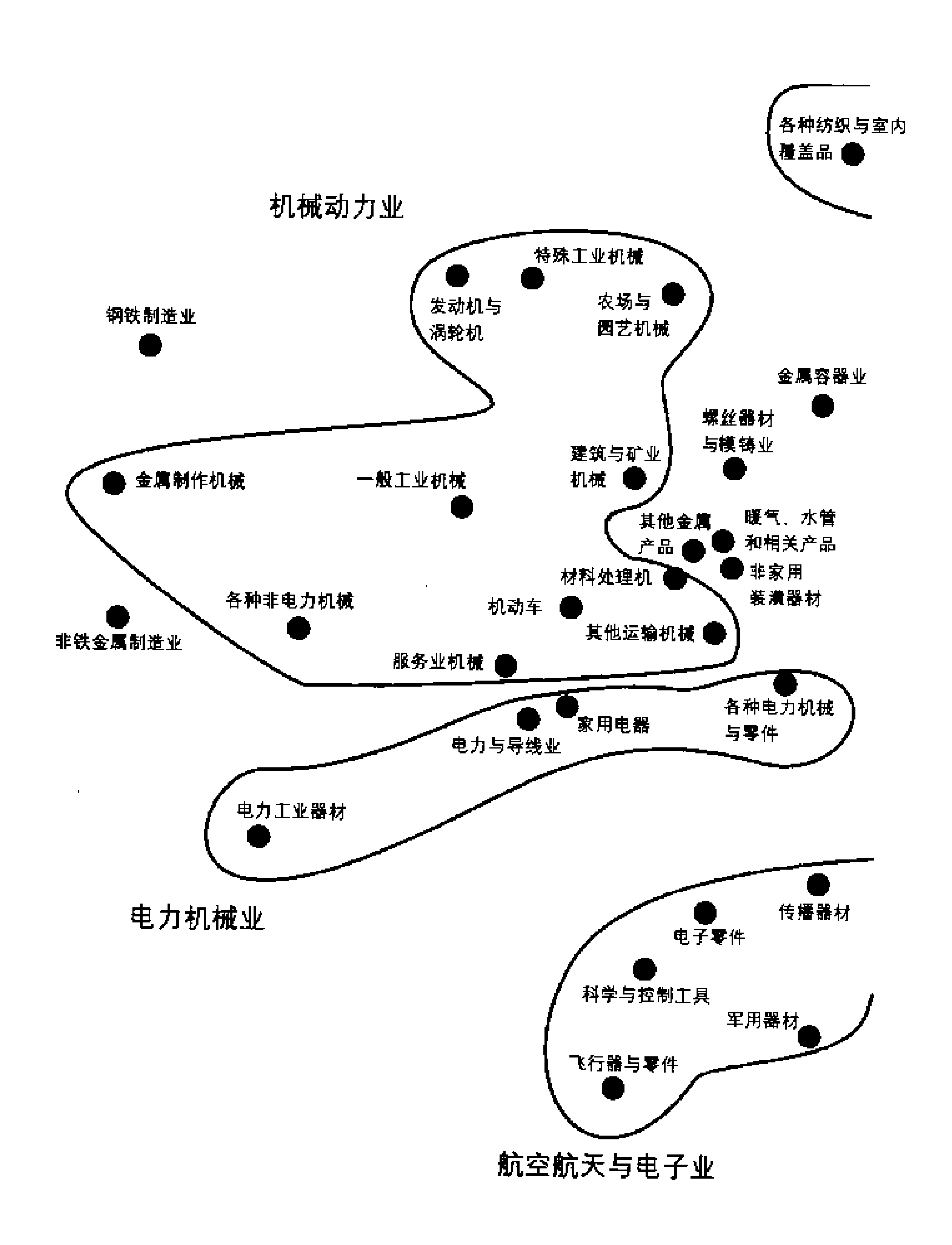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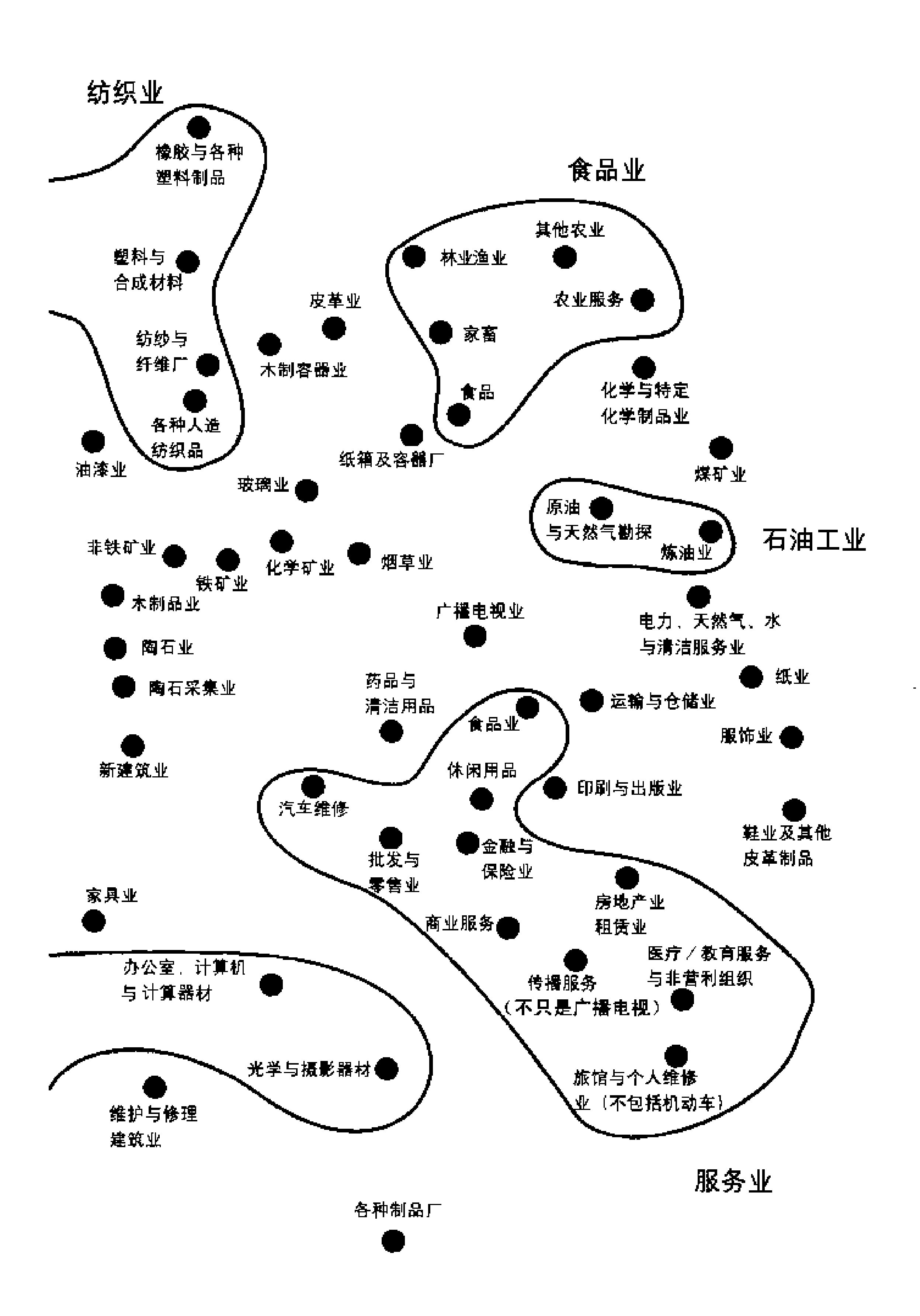


图 5-7 美国经济的拓扑图(Burt,1992:86-87)



纺织业
橡胶与各种
塑料制品
食品业
其他农业
林业渔业
塑料与
合成材料
农业服务
皮革业
家畜
纺纱与
纤维厂
木制容器业
化学与特定
化学制品业
食品
各种人造
纺织品
油漆业
纸箱及容器厂
煤矿业
玻璃业
原油
与天然气勘探
石油工业
炼油业
非铁矿业
化学矿业
烟草业
铁矿业
木制品业
广播电视业
电力、天然气、水
与清洁服务业
陶石业
陶石采集业
纸业
药品与
清洁用品
运输与仓储业
食品业
服饰业
新建筑业
休闲用品
印刷与出版业
汽车维修
鞋业及其他
皮革制品
金融与
保险业
批发与
零售业
家具业
房地产业
租赁业
商业服务
医疗/教育服务
与非营利组织
办公室、计算机
与计算器材
传播服务
(不只是广播电视)
光学与摄影器材
旅馆与个人维修
业(不包括机动车)
维护与修理
建筑业
服务业
各种制品厂

图5-7 (续)

对企业董事会的研究考察了董事会成员与共同的信托责任之间的联系。分析家们把连结形态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的***连结，两家公司由同一个人产生联系，此人既是这家公司的主管，又是那家公司的董事；另一种是***间接的***连结，两家公司之间产生联系是因为双方都有第三家公司的董事。IBM 与施乐都与时代—华纳有直接联系，他们都有代表出席时代—华纳的董事会，共同分担时代—华纳的责任。IBM 和施乐也有间接的联系，因为二者都有人担任时代—华纳的董事。因此，媒介集中通过在相同的市场竞争中分担了相同的责任而得以延伸。对公司董事会的分析运用了共同的统计手段、网络分析与矩阵代数，发展出了若干严格的标准(Burt，1992；Scott，1991)。这类分析的核心论点是董事会结构的重叠为相关公司的代表提供了密切合作的机会和责任，而这些公司有些本来应该是相互竞争的(Coulter，1992)。

社会科学家(Clement，1975，1977；Domhoff，1978，1990；Useem，1984)举出资料证明，在董事会之外的其他地方也为精英集团提供了互相影响与共谋的机会。这些地方包括私人俱乐部、协会与专业组织，它们是阶级权力网的交叉点。不过，董事会和这些场所不同，因为成员们在这里负有法律的信托责任。时代—华纳的董事会为施乐的戴维·卡恩斯和 IBM 的约翰·奥佩尔提供的机会不只是聚会和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他们与董事会其他成员一样都负有法律责任，为时代—华纳的利益而行动，根据强调间接连结的重要性的观点看来，他们也为对方公司的利益考虑。通过这样的过程，集中具有了这样的特征，即相关公司的合作与计划既是机会也是责任，彼此的区别变小了，竞争也缓和了。这个过程由许多日常的接触与互动构成，给集中一种***霸权***性质，运用这种权力的人，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拥有这个权力。

最近，有些研究在分析集中时有了新的方向，它们不仅深刻了解所有权，更把目光投向企业集团的互动形式，探讨它们在并没有真正合并的情况下如何建立了有力的联系。这些形式包括一系列的"合作协议"，包括为了特定计划如媒介联合制片或为了共同开发新技术而采取***企业伙伴关系***或***策略联盟***。[13] 它们也包括**销售协定**(merchandising arrangements)，它

---

[13] 波格瑞(Pogorel，1991：104)认为，开发信息与传播新科技(NICT)时采取策略联盟很有价值。他指出："最近几年来'联盟'形式的扩展是 NICT 偏爱'外部化'的例证，这表明在市场与分级系统之间有结合形式的存在，也证实了 NICT 的影响可以找到自发的、具有想像力的回答。一方是分层系统(不断扩展，长久存在)，另一方是不断变动的市场(随机的，瞬间的交易不断发生)，但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各种结合方式。"

瑞奇讨论了许多策略联盟的类型，包括独立利润中心、资产分派、合资、授权与纯经纪业。

把媒介公司同销售和市场开发公司联系起来。[14] 这些实践行为对企业来说并不新鲜，对媒介公司而言也是如此，但在近些年来它们越来越普遍。这部分地是因为空间化的过程使公司在一个特定时期（如一个计划的持续时间）里能够重新建构内部操作和外部关系，从而不会由于组织上的原因导致协议中断，而以前曾发生这种情况。无论这一计划是否成功，公司都能够重新构成，完成其主要的业务活动。而且，参与的公司能够既合作又竞争。

在理解这些发展趋势时我们要注意一点，即用来描述这些趋势的用语（例如"协同作用"）之所以产生，不仅是为了做分析之用，还具有公关价值。因此，像策略联盟或协同作用等术语有修辞的作用，也负载了不同的涵义。[15] 按照字面上的纯粹意思，策略联盟指在没有所有权变化或相互投资的情况下，使两家或更多的公司或公司的特定部门走到一起来完成某个或多个计划。联盟可能会牵涉到新公司的创立，虽然这并不是每次联盟都必需的。媒介联合制片协定就是纯粹策略联盟形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经济压力允许并通常能够造成较低生产成本的诱导下，联盟形式有了较大的发展，已经成为欧洲录像业和电影业生产的主导形式。[16] 国际化联盟也对一度自成一家的美国制片业产生重大影响。例如，1991年，时代—华纳的电影公司与欧洲最大的私人广播电视公司之一 Canal + 签订合约共同制作了二十部电影，第一部作品就是票房大获成功的《刺杀肯尼迪》。在这个例子中，华纳与 Canal + 订立合约联合制作一个特定产品（二十部电影），这并不包括股权的交换，也没有在此之外附带任何协定。这类活动也使传播新技术领域中产生了合作，例如，两家竞争激烈的厂商 IBM 与苹果电脑也形成了策略联盟，共同开发新一代的元件，如超强个人电脑系统。

有些时候，这些有限合同式的协议会以新公司的形态出现，这使得联盟成为更具实质性的东西。最近几年来，这个形式最重要的例子是，时代—华纳（世界上最大的娱乐公司，同时也拥有最大的有线电视系统之一）、电信传播公司（最大的有线电视公司）和微软公司（世界最大的电脑软件

---

[14] 如瓦斯科（1994）所说，销售协定是对版权商品进行制造与销售的机械性行为。授权则是一种法律途径，拥有版权商标的人或公司有权从使用该商标名称、相似物或形象的人或公司那里获得回报。

[15] 席勒（1993）认为，"协同作用"是一个鲜亮的字眼，它掩盖了企业对消费形象与产品的完全控制。瓦斯科（1994）汲取了米汉的"文化基金"的概念，认为"文化协同作用"是这些公司创造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重叠。

[16] 据斯特弗（Strover，1993）所说，1991年英国制作的54部电影中，21部是联合制作，另有7部完全是外国制作。法国与45个国家签有联合制作协定，1991年有近半数法国电影采用了合制的方式。

公司)结成联盟,以设定新一代互动节目分配的标准,使它主要由有线电视系统来完成。这个联盟最后具体化为一家联合控股公司,名为"软电缆(Cablesoft)",它负责执行这个联盟,创立这一系统。另一个例子是,两家最大的电信公司即美国的AT&T和日本的NTT,加上三家消费电子厂商索尼、三菱与飞利浦,再加上苹果电脑和摩托罗拉筹组了"通用魔术(General Magic)"公司,目的是结合不同的电子信息通道和电子传播的技术来创造智能的、互动的产品。高清晰度电视系统的开发也让全球的竞争者们聚集在一起,结成通俗报纸所谓的全球厂商的"盛大联盟",其中包括AT&T、通用电气、飞利浦、实力(Zenith)、汤普森以及其他厂商。以上所举,就是电信公司、有线电视公司、娱乐集团和计算机公司进行联盟的比较重要的例子,它们试图利用各自占有的市场位置与专业技能,制造大受欢迎的技术集中的特定产品。这些例子值得注意,不仅因为它们跨越了不同的技术部门,也因为它们让原来竞争激烈的厂商走到了一起。

"策略联盟"这个术语也可用于另一种情况,即一个公司购买另一公司的若干股份,但未必是控股。近来,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AT&T在1992年宣布它将购买麦高移动通信公司三分之一的股票,金额是37.3亿美元,目的是重新进入美国的地方电话服务市场。1993年美国西部电信公司同意购买时代—华纳附属的一家娱乐公司的四分之一股份,共花费25亿美元。英国电信宣布购买MCI传播公司20%的股份,价值43亿美元。并不是所有计划中的交易都能成功。比如1993年,地区性贝尔公司的其中一个即大西洋贝尔宣布它计划要收购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公司电信传播公司(它拥有1,300万订户,并且拥有特纳广播公司和有线家庭购物频道的股份),涉及的金额是120亿美元,还不包括96亿美元的债务。这是美国传播业历史上计划进行的最大的兼并案例,但并不成功。不过在此之后,电话公司太平洋贝尔(Nynex)与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维亚康姆以12亿美元成功合并,南方贝尔与电视购物公司QVC以15亿美元资产合并,西南贝尔与有线电视公司考克斯(Cox)以16亿美元完成合并。

最近这一媒介兼并与联盟的浪潮的主要原因是各家公司都想从软件与硬件系统的整合中获益,借此控制生产、分配和放映或展示的主要环节。特别是这些公司都想在娱乐与信息网(美其名曰"信息高速公路")的重建过程中成为必不可少的参与者。例如,1995年时代—华纳同意支付75亿美元收购它还没有买进的另外约80%的特纳广播电视集团的股份。西屋(Westinghouse)公司以54亿美元购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而迪斯尼公司则花费190亿美元买下大都会/ABC集团。这些例子及其他的兼

并案把垄断的幽灵又召唤了出来，并达到了新的高峰，以至于到最后可能只有一家或少数几家整合成型的集团会根本地控制传播、信息与娱乐的生产和流通。[17]另一方面，也有人质疑，真有足够的家庭需求证明这些涉及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是合理的吗？这些新兼并成功的公司真能够将不同的部门放在适当的位置以顺利行使其功能，完成经营吗？[18]

企业权力网络也可能通过销售协定而构成，各家公司通过这个方式结合，共同销售特定的媒介产品，如故事片或体育明星。这些协定并不是广告活动向传播产业的扩张，比如，并不是在放事片或录像带中夹带具体产品的广告，也不是用与电影无关的产品来促销具体的影片。在订立协议时，媒介公司授权另一家公司使用它们的媒介产品的名字，后者再用这个名字生产注册商标的产品。比如环球影业公司和制片人斯皮尔伯格通过耗费巨资而获票房成功的《侏罗纪公园》这部电影创造了一个商品网络，结果有一千多种商品以这部电影的名字作为注册商标。这既包括和麦当劳快餐店[19]、选择连锁旅馆（Choice Hotels）和任天堂的合作，也包括授权生产唇膏、泡沫澡、恐龙蛋糖果以及床单等许许多多东西。[20]

体育运动是所有销售协定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部门。运动员通过与协会及大型广告/经理顾问公司签订一系列的合同约定，运用在各种媒介上精心营造出来的形象，创造了获利丰厚的行业。1992年它的全部产值是121亿美元（Wasko & Philips, 1993）。共有12名体育明星赚钱超过500万美元，其中前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赚得最多，共有2,500万美元。乔丹签约的公司包括耐克、桂格麦片、高托雷德（Gotorade）、威尔逊体育器材、

[17] 担心这一趋势的人创立了非营利团体的联盟，其领导人之一，媒介教育中心的杰弗里·切斯特（Jeffrey Chester）说："除非公众强烈抗议，使它成为流行的话题，否则我们无法阻止这些媒介垄断者控制我们回家的路。"（转引自Aufderheide, 1994:21）

[18] AT&T的贝尔实验室的执行主管罗伯特·赖其（Robert Lucky）说出了怀疑者的心声："这些商务活动根本不是在全球网络上，而是在私人网络上进行的。每家大公司都有自己的专用网络，这里才是通信最为繁忙的地方。大约有95%的通话在这些小岛上进行。"如果要建立真正的全球网络，"你必须为千千万万人设置网络，而这些人只不过占所有通话量的5%"。（Wright, 1990:93）

[19] 与麦当劳的合作引出了一些问题：销售协定会对媒介内容产生什么影响？麦当劳签订了《蝙蝠侠续集》的促销协定，但很多人都指出，该片十分血腥、充满暴力，不是麦当劳应售的产品。后来再签订《侏罗纪公园》的搭售协定之前，麦当劳就要求先了解更多内容再签约。MCA于是合作，提供故事剧本让麦当劳公司主管过目，麦当劳最后决定只选择成人套餐作为搭售，而放弃了青少年"快乐餐点"的促销。（King, 1993）

赞助与媒介产品的内容之间的关系很难确定。不过，观察一下米歇尔·克赖顿（Michael Crichton）的小说原作结尾到了屏幕上的重大变化之一即公园的创造者亿万富翁形象的改变，是很有意思的。克赖顿笔下令人不快的资本家遇到暴力的结局，在电影里改为一位善良的老人领悟了贪婪的教训，没有遭到自己创造的恐龙的报复。

[20] 思考跨产业联盟的扩展时，我们会不可避免地注意到这些错综复杂的联盟到底生产了什么产品。1992年，日本三菱集团参加了一个跨国联盟，成立了3DO公司以生产新一代家庭互动娱乐节目，三菱公司主要为它开发数字硬件。当时三菱公司已拥有拍摄《侏罗纪公园》的MCA制片厂，因此它为3DO系统制作了《侏罗纪公园》的软件。三菱又在全日本2,400家经销店内的每一部标有"松下"商标的待售的电视机中，播放这部电影的预告片。

萨拉·李、雪佛龙、通用米尔斯(General Mills)、麦当劳等,还有一些较小的公司。除了这些直接联系之外,乔丹装满了转播他比赛的电视网的钱箱(主要是一家全国广播电视网和一家全国卫星"超级台"),他也装满了他所属的全美篮球联盟和他的雇主芝加哥公牛队的金库。[21]

策略联盟的纯粹形式涉及到签订合同、协调合作,但却不涉及全部或部分的所有权合并,可以说开辟了企业实务的新天地。但在传播产业史上,由联盟而形成一个新的实体或是导致其中一方进入另一方的情况,也并不新鲜。联盟跨越产业部门或产业技术的现象也不奇怪。策略联盟创造了电子媒介史上最强大的公司之一:美国无线电集团(RCA)。RCA在20世纪20年代成立,它是电子媒介早期发展中的主要企业基于策略联盟关系而组成的,这些企业包括:AT&T、西屋、通用电子和联合水果公司(这个公司曾投资大笔资金设置无线电通讯网络,以联络它在美国及拉丁美洲的营运)。60年代,AT&T、RCA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又形成策略联盟,创立了美国通信卫星公司(简称Comsat),这一机构负责创建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卫星系统。以上这些例子绝非例外,传播产业不同部门的主导公司各自在传播技术的相同或不同领域中创造了联盟的成功案例。

RCA和Comsat的例子清楚地提醒了我们,资本主义的动态过程历来如此,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地方。正如弗农(Vernon,1992:16)所说,今天的联盟与当年彼此竞争的炼油商和经销商(如沙特阿拉伯的ARAMCO、秘鲁的南秘鲁铜业公司和几内亚的HALCO)联合拥有油田和矿山的做法,在功能上并没有太大差异。变化,包括商业界结构的变迁,一直在持续。不过,当前重新建构的浪潮中有几个方面显示出它与既定的模式有些差别。首先,可以说它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都在加速进行。企业集团重新建构的步伐,正式与非正式地结合与分离的过程都在加快速度,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弗农(1992:16)认为,这是当前与过去联盟模式的主要区别:

> 随着科技迅速进步和市场的不断变化,任何既定产业联盟中参与者的利益都可能变得相对不稳定:这些公司不断地撤出和重组联盟,以便适应迅速变化的策略需求。

---

[21] 网络连结的多重性,为许多有关单位创造了和谐共处的机会,但这也使使用产品(在这里指运动员的形象)的权力更有可能产生破坏性的冲突。比如,乔丹与NBA关于球衣的争议用了一年才解决,结果是NBA保留了控制乔丹形象的权力。

再者，通过这类活动进行空间集结时面对的限制少了很多。从前的联盟很少跨越国界，如今的跨国联盟，无论是纯粹的联盟形式（如合资制作和签约协定一起推动某项计划），还是种种形式的所有权联合（包括创立新公司、一家公司进入另一家公司，或者是完全的合并），都十分平常。

除了这些之外，国家的角色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们会在后面用更多篇幅讨论这个主题，但在这里需要先强调一下国家活动的显著变化。国家的作用因地因时而异，但通常都在传播产业的结构转变过程中占有非同一般的位置。这是因为传播产业和其他的经济部门不同，它曾经完全由国家拥有，或者说，即使它不完全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也通过国家预算的分配、政策的监控及规范的过程与广泛的国家职能紧密结合。回到 RCA 的例子，大公司进行策略联盟创立 RCA，其中有美国政府的全程参与，因为新公司对于政府的广播所有权是一个挑战，公司得以成功组建的交换条件是允许政府介入董事会和管理层。同样，联盟组建 Comsat 时也满足了美国政府的具体要求，否则 Comsat 就面临完全国有化的威胁，结果新公司不仅要受政府规范，还要允许政府代表参加董事会。诚然，国家拥有传播设备并提供传播服务的事例仍然存在，在电信与广播电视部门中尤其如此，但在世界许多地方，国家的这种角色已经在改变。而且，虽然国家在跨国联盟（如对合资制片协定进行规范）中仍然扮演特定角色，但这也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在国内还是跨国情况下，相关公司直接协商的例子更为典型。现在国家还是会介入，评估是否有反垄断的情形或牵涉到贸易关系，但现在国家采取的做法更可能是鼓励这类协定，而不是规范它们或入股参与。在以前，策略联盟的出现一度是国家政策***选择工具***的结果，如今则是企业集团的政策使然，它们联合伙伴向新领域扩张，希望能集中技术，分担风险。

此外，当今联盟的形式越来越显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即最主要的传播资源***使用者***也被拉入联盟组织中。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正如联合水果公司参与 RCA 联盟所显示的，这在传播史上早有先例。然而，最近几年来各种策略联盟所涉及的用户特别包括了银行、投资公司和其他大型传播消费企业，这说明以前偶然的务实作风现在已经是成熟的标准。由于深刻认识到传播和信息技术对于自己发展与控制的重要性，业务范围在传播产业之外的公司开始运用个体的力量或者联合起来，引导传播产业的发展方向，创建高质量而低成本的网络与服务，以求符合自身的利益。传播产业的空间化过程涉及了越来越多的大型用户，这表明重要的权力转移已经发生，传播产业的中心有了许多新的参与者，传统的生产和分销

硬件与服务的公司也加入其中。主导这类新的参与者的是金融服务部门，也包括越来越多的传统工业企业（如通用汽车公司）、零售商（如西尔斯）以及资源公司，如水力发电厂和整合能源公司，它们的传统业务是将能源流通的空间纳入特定结构，如今则把这种功能用于经营传播流动的空间。除了重要的权力转移以外，空间化过程也重构了传播产业的版图。它以前偏向高度分化，其界限与其余的经济部门很容易分清楚，现在则是越来越消除分化或整合于更大的经济部门，结果是各部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难区分。迅速发展的商业活动有私人资料网络、家庭录像服务和即时库存控制系统，它们把传统的服务消费部门变成主要的生产者。实质上，传统的产品类型以及与之相伴的法律、规范、政策机构都正在解体。美国公司与日本公司的差别何在？电话公司、有线电视公司与电脑公司的差别何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如何区别？随着我们向全球化***电子服务市场***的接近，所有的这些差异都正在消失。[22]

这些发展是更广泛的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公司采取***新的组织结构***，这个结构具有两种能力，一方面掌握资源，另一方面又能灵活地应对变化的市场。经济地理学家戴维·哈维（1989：147）认为，这种形式的重新结构"依赖于劳动过程、劳动市场、产品及消费类型等方面的灵活性"。这产生了"完全新型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新方式、新的市场，最重要的是，它使商业的、技术的和组织的革新得到强化"。最后，哈维把这个变化造成的情况称作"时间—空间压缩"——决策所需要的时间缩短了，运输与传播成本的下降使公司能够在更宽广、更多样的空间推广决策。有时，经济的重新建构会产生更大的企业集团，但这并不是成功的主要条件。更重要的是，企业必须使自己的结构更灵活，这样才能够快速转化成新的形式，满足变化中的需求。

总之，我们在反思政治经济学时应该认识到，虽然企业的规模和集中化很重要，但它们只是理解传播产业转型的起点。全球性的重新建构提供了机遇，使控制形式扩展到更为灵活的其他形式。最主要的条件是，资方要控制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中的核心环节（拥有全部的产权只是许多形式之一），同时要保持灵活性以应对市场与技术的变化。

企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变化使某些分析家对于产业所占据的空间的重新划定提出了不同的诠释。策略联盟和其他形式的企业连结有了很大

---

[22] 或许由于媒介公司在新的现实面前感到迷惘，因此它们也就倾向于坚持旧的分类，这也造成媒介公司之间的激烈斗争。

发展，它们不要求所有权的改变，甚至不需要重大的投资，这使我们必须反思传统的对集中问题的研究。公司规模和市场控制仍然是集中的重要指标，但企业集团的重新建构也产生了新的集中形式，它们以生产者、供应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紧密联系网为基础。索亚(Soja，1989：185)认为：

> 附加在企业所有权集中之上的是一种更依赖科技的整合，它把各种分化的产业活动、研究活动与服务活动整合起来，在不断扩展的生产空间体系中重新分配资本与劳动，其中决定资本动向的行政权力中心互相联结，决定资本在各平行的分支机构、子公司、转包的公司和专门的公营或私营服务部门之间如何投入。……这些生产体系的空间范围已经具有全球性，但同时也具有强大的城市化效应，它们在本地把许多新的产业聚合在一起。……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分散，另一方面是再集中。

除了企业集团的重新建构外，产业活动的空间类型的变化也促使我们反思产业集中的问题。特别要指出的是，与原先预测的相反，电信的发展并不一定促使商务活动分散化，而是使商务活动集中在纽约、伦敦、东京和其他国际大都市，这为思考空间聚合作为商业活动的一种主要形式提供了依据。经济重构与空间聚合是人们对地理学兴趣复苏的核心要点。虽然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注意到了这些发展，但它们对地理学的影响最为突出。地理学现在处理的是位于政治经济学核心的问题，包括空间结构与资本积累、阶级、性别以及种族的关系(特别参见 Castells，1989；Harvey，1989；Massey，1984；Sassen，1991；Thrift，1987)。

空间化研究指出，分析媒介集中要开拓新的思路。空间聚合和所有权聚合一样，都是商务集中的重要形式。空间聚合也就是使各种公司走到一起，生产者、供应者、消费者通过密集网络相互依赖，从地理上看，它们既汇集在全球性大都市中，又通过电子传播方式分散到全球。它展现了经济权力集中化的重要形式，但这些公司的产权是否有联系都无损此形式的存在意义。这个发展对于传播与信息产业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是生产服务部门的核心，而正是这个部门主要负责今天的空间聚合。传播与信息过程以及传播与信息产业对全球政治经济中的经济重构做出了根本性贡献，这个经济重构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在商务的空间聚合中产生了经济权力的集中。

空间聚合研究和较传统的媒介集中化研究有一个共同点，二者都想

在动态经济中考察动态的产业方式。诚然，所有权的研究一直偏重于对产业内部的企业权力和它在社会领域中的扩展做出概述。不过，虽然这两类研究都对国家感兴趣，但都认为国家或者是对企业权力的反作用，或者是对交叉压力的回应(Mosco,1995)。

国　家

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认定，当代的国家机器不仅对企业及产业结构的变迁做出了反应，而且还对科技和服务的变迁做出了反应。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有证据认定，国家机器不只是做出反应，而且还以积极的法律、规范和政策指导促进了这些变迁的发生。事实上，我们也有足够的证据证实下面的结论：政治经济学如果更加强调*政治*，必然会从中受益，这会使人们注意到国家作为***构成的***角色，而不只是注意国家面对传播产业的反应角色。这种正确的认识很难达成，因为国家在传播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多来自政策制定者的论述，在他们的修辞架构下，国家角色就只能流于狭隘了。这个倾向可以理解，因为熟谙法律、规范和政策过程并能掌握它们的不同语言是有困难的。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问题是，必须在不丧失物质实践意义的前提下完成从政策行动的认知到政治经济学认知的转变，以便解释国家的角色，并将国家—媒介关系放置在更宽广的政治经济学构架中。

现在有这样一种倾向，认为空间化是经济或技术驱动的过程，企业界在电脑传播系统的协助下克服了时间与距离的限制，侵蚀了民族国家主导的根本政治过程。另一方面，**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过程又被当成是占有政治空间的东西，它支持或反抗经济规则。这个观点是实质性的。比如有些人提出，经济逻辑呼吁欧洲的统一。但这个观点过于简单化了，空间化与民族建构都是政治经济过程。空间化涉及到许多方面，既包括当前全球经济的生产逻辑，又包括使经济决策的控制权集中在某些人或集团身上的权力逻辑，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家、区域与地区的政治决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欧洲的情况与北美和亚洲相同，国家间形成的联盟既受到资本积累的经济驱动，又受到空间控制的政治驱动的影响，这个空间正是资本积累流动的空间。事实上，对经济和政治的划分只是分析上的，它造成的混淆与迷惑多于它的启示(Wood,1981)。与此相同，民族建构也不只是政府机构、工会或政治运动等所领导的、只想借此维持或

者获得权力的政治过程。它也是一个经济过程，它的理论根据就是，要达成经济目标应有相应的政治组织加以配合。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它克服了这个倾向，强调我们不该扭曲复杂的社会过程，不该把这个过程简单划分为经济的和政治的。

此外，在与空间化过程的不稳定关系中运作的力量不只有民族的单位，强调这一点也很重要。如上所述，民族主义之中还有民族主义。再者，如同全球化过程一样，民族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它一直充满了各种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包括支持民族国家或反对它。所有民族主义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认同以下理念：以**本土**(local)对抗空间化逻辑。

这个问题以及对它进行探讨的意义，在**规范**(regulation)这个概念中展露无遗。论述传播业规范问题的文献非常多，虽然其中有些不同观点，但我们发现，这些文献一直坚持规范是政府对市场问题的反应这一观点。关于政府为什么会有反应的解释有很多，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有人说这是自然垄断状态的存在，有人说这是产业界对政治机器施加的压力，也有人说是来自市民团体的公共利益的压力推动等等。对这个问题的界定确实有意义，但每种定义都倾向于把规范当成政府对其所认识到的问题的反应，结果，政策制定者与学术分析家在重新考察产业规范时往往只检验政府的实践，辩论的问题是需要更多还是更少的规范。因此，关于国家在传播产业中的角色的辩论经常变成在规范与解除规范之间的选择。

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充分反映民族建构角色的政治经济学对此问题的看法颇为不同。政治经济学把整个社会领域(包括产业活动的类型)视为一种规范形式。[23] 例如，社会领域主要受产业决策的影响，而不是受国家介入的影响，这可以说是具有一种***市场规范***形式的特征，它和***国家规范***相对立，后者指的是国家扮演了影响社会领域的主要角色。[24]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关于是否解除规范的政策辩论往好里说也是不真诚的，因为解除规范根本不是规范的替代性选择。其实，这场辩论可以归结为在一堆形式中进行选择，它们强调的是市场、国家或者两者之外的其他利益形式。消除政府的规范并不是解除规范，而更可能的是扩展市场规范。

---

[23] 被称为“规范学派”的学者们在这方面起着领导作用，虽然其他政治经济学取向也提出了这个论述。据这个学派的主将之一里皮耶兹(Lipietz，1988)所说，规范是在特定的社会领域中对矛盾倾向的调整。参见本书第2章第58—59页。

[24] 由于市场结构不同，在市场形式中存在不同形态的调节。调节形式的两端分别是垄断调节与完全竞争调节。一般传播部门中所谓的“扩大的竞争”实际上是指一个或更多新公司加入进来，使调节形式从垄断转到双头垄断或寡头垄断。这几乎不能称为“扩大的竞争”，因此而认定政策上应该减少政府监督，也让人无法信服。

政治经济学没有陷入语言陷阱，它集中评估不同规范形式（比如市场和国家）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功过。为了思考解除规范这一概念所掩盖的国家的建构角色，重新评估规范十分必要。它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研究走出了新的一步，也就是要研究国家如何积极主动地建构规范的形式。不过，在这里必须非常小心，有关这些术语及核心概念的内涵，各方意见至今尚未达成一致。[25]

当前的国家建构活动起自空间化和商品化，我们可以从描述它的四个过程着手分析。第一个是**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也就是国家的规范形式取消了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及相关标准（如普及性），而采取市场标准，建立市场规范。[26] 公共的和私人的部门组织中都会发生商业化现象，但发生在前者中的商业化现象更具重要意义，因为它可能是公共部门通向私有化的一步。在传播部门，这意味着即使在国有和公有的广播电视和电信公司中，也都要更加强调市场机能与赢利。具体而言，这使得对受众规模和广告收入更为强调。制作节目就要预料外销国际市场的可能性，也要想到这个节目与其他赢利媒介的联系。在电信业，商业化意味着建立并组织网络和服务，服务的对象偏向于能够带来更多收益的顾客（特别是商业用户），但这些标准将使网络建设侧重于在国际大都市之间建立全球性网络，而不是把网络延伸到乡村和缺乏服务的地区。商业化使国家传播管制机关把电信等获利活动同邮政等服务性活动分开，而服务性活动是由宪法或其他法律授权国家管理的。为商业化辩护的人声称，商业化并不否定公共服务的目标，它甚至有可能更好地达成公共服务的目标，如普及服务（Noam，1987）。反对商业化的人则认为，商业化是转化传播流通空间的手段，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这必然有利于某个使用者阶级而不利于其他阶级，只有依赖经济的"垂滴"才能克服阶级分化（Castells，1989）。

自由化（liberalization）指国家介入来增加市场参与者数量的过程，典型的做法是引进竞争，或减少引进竞争者的困难，使更多具有竞争力的传播服务提供者进入市场。这通常等于是在国家垄断或私人垄断的市场中

---

[25] 不管我们对于这些论述的内容有何感受，都会立刻想到其中的巨大落差，即一边是极其精确的产业运作经济模式，另一边是极其不精确的政治分析。

[26] 更具体而言，这等于是重新定义公共利益，把它等同于市场的完善。例如，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的法规都限制了电视广告的数量，因为过分的商业化会危及传播法所要求的"公共利益"的原则。在80年代这些限制被解除了。1993年7月，联邦传播委员会裁决说，公共利益要求有线电视公司在本地频道播出家庭购物网——一个全天候的广告与购物频道——即使这意味着挤掉某些有线电视的原有节目也在所不惜。

引进一个私营竞争者。自由化和商业化不同,对于传播产业来说,商业化就是使所有的商业实践都符合商业标准,无论是否有竞争存在;自由化的具体目标则在于提高市场竞争程度。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国家都已经改革了传播产业,在原有的广播和电视服务中引进了私营竞争者。支持者认为自由化使价格降低,服务扩展,通常加快了革新的过程(Owen & Wildman,1992)。批评者则反驳说,这只是以私人寡占的规范形式取代了国家的规范,结果它的价格、服务与创新都只能有利于垄断卡特尔的利益和优势顾客的利益(Mosco,1989a)。

第三,**私有化**(privatization)是国家介入而卖掉国有企业(如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或国营电话公司)的过程。私有化有多种形式,根据出售的国营股份比率、外国企业所有权允许的程度、如果是分期付款的话期限的长度以及国家在私有化之后是否采取特殊形式继续介入该产业(典型的做法是设置规范机关)来确定。这个过程的加速运行有几个原因,其中包括:意识形态上认定私人控制经济活动较为优越的政党大选获胜而执掌政权;国营产业卖出后,尽管只能进账一次,但对国库仍然是一笔新的收人;跨国商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政府组织的压力。支持者认为,私有化是必要的,因为如果只有商业化,最多只是跨出市场控制的第一步。批评者主要认为私有化将造成完全的市场规范模式不再受到挑战,因为另一个可供选择的主要模式已经没有了;企业出售给外国公司后国家主权将会丧失,随之而来的是本国利益对国家政策控制权的丧失。

最后,国家本身也在创造自己的团队协定或策略联盟,从而进人了不同程度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这包括地区贸易联盟(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贸易附加(如金融、政治和社会条件)"协定(如欧洲联盟),以及已经制度化的计划组织(如七国集团)。全球化也造成了特殊的国家组织,如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虽然它们在全球政治经济过程中并不是新角色,但近来在处理发达国家与世界上其他发展程度的国家(包括欠发达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地位日渐重要。

这个过程在传播领域中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传播网络的跨国化有赖于国与国之间不同程度的协调。我们再次指出,对于传播业来说这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60年代成立的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就是许多政府协商电报政策的产物。近年来,各国之间建立的新协定使最富有的国家能够对全球传播政策施加的控制更为严密。这些发展带来了国际政策制定领域的显著变化,其中包括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最主要的支持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

的下降，也包括国际电信联盟对大型私营电信公司的开放。这些组织或者力量削弱，或者进行转型以适应新的权力平衡，这种转型几乎将世界各国平等代表的原则抛弃无遗。这也造成了短期的、功能型的、科技型的聚会与谋划场所的发展，它们使得国家和企业的决策者们能够走到一起，在正式的、公开的传统场所之外来协商科技、服务与定价等事务。代表大商务用户和政府用户的协会如国际用户团体（International Users' Group，INTUG）的崛起，就为这类活动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

商业化、自由化、私有化与国际化是一些较重要的例子，它们说明了国家的构成角色。更重要的是，它们显示了政治经济学取向的价值，因为它的起点就是产业界与国家共同建构了调节与规范的形式。这既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资本的需求和利益，也显示了同一时期反抗力量的性质。这并不是说产业界和国家*同等地*塑造了传播结构与实践，正如我们不会认为产业内部的各种力量彼此相当。历史实践使政治经济学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产业界和国家都是推动传播发展的主要力量，二者的关系是相互建构的，又是多变的。再者，政治经济学反对只集中分析政治或者经济。产业界和国家都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它们对于建立管理产业界与社会领域（包括与产业界息息相关的对立力量）的规范形式尤为重要。最后，积极活跃的国家并不能保证自己一定成功。事实上，传播领域内参与者数量的绝对增长，以及为处理这种增长而专门设置的弹性机制，导致了协调与控制等重大问题的出现，使人们根本无法保证国家活动能否成功。部分原因是，近来国家活动虽然有所扩展，但对资本积累过程的直接参与却没有增加，反而还有所减少。这使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国家一方面要处理资本短期特定利益的多重性，另一方面却不能全面参与资本积累的过程。其结果正如很多保守主义者多年来所批评的：国家往往追随官僚主义的逻辑，通过组织形式使自己永远存在，这等于是拖延，因此削弱了积累过程。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削减国家的规模，但这又产生了协调问题。只有当社会主义思维仍在政治辩论议程之内（虽然也许是边缘化的）的社会中，才会探讨一种替代性选择，即国家应该更有力地直接参与积累过程。

全球化

对于当今空间化过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也就是人们广泛谈论的全

球化的话题，以上结论具有重要意义。如弗格森(Ferguson，1992)所述，全球化不是一个容易考察的术语，因为它同文化同质、地球、世界范围的媒介民主和世界新秩序一样，已经被神化。[27]尽管有困难，我们还是应该讨论全球化的问题，因为它与流行的社会变迁的观点产生了共鸣，只要除去神话色彩，它就能展示更广泛的空间化运动过程的一个方面。尤其要指出的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指的是资本的空间聚集，它由跨国产业与国家主导，转换了资源与商品(包括传播与信息)的流动空间。结果是传播与信息地理学发生了实质的转变，某些空间及其关系得到了强调。例如，纽约——伦敦——东京轴线划定了传播与信息服务的版图，它的延伸产生了第二层连结，包括法兰克福、巴黎、洛杉矶等，这样一层层地形成了全球联系的网络。如同任何地图一样，它也不可能画得绝对精确(Hall，1992)。在这个网络中，纽约的连结并没有延伸到整个城市，只是包括了金融服务中心曼哈顿下城和传播与娱乐企业集团总部所在的曼哈顿中城，它又延伸到了新泽西、康涅狄格和纽约郊区的部分地区，这是AT&T、IBM 以及电信设施中心如电信港(Teleport)的所在地。纽约及其邻近地区的大部分会从这种活动中受益，但这只是间接的。全球化是转化这些空间的过程，而不是神话般地消灭它们。传播与信息技术能够扩展主要轴心和人们进行联系的场所，但在这个过程中轴心的重要性被强化了，因为位于中心的人，不但能够使用多种形式的科技，也可以与主要的人和组织联系，而这些人与组织拥有建构网络流通的权力(Sassen，1991)。这个结论支持了雷蒙德·威廉斯在 1983 年的推断(p. 197)，也就是“现在情况十分明显，就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而言，古典的欧洲形式的民族国家，既可以说是太大，也可以说太小，无法符合现实的社会目标”。全球性大都市与地城集而的兴起异常突出，而民族国家对于全球性都市所需要的个人与信息权力的集中来说显得太大，对于管理大陆集团来说又显得太小。这些转型造就了控制全球化的等级体系，使“全球化”这个术语带上了神秘的光环。

如果有人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过程，他也就为全球化的神话做了贡献。这个神话来自人们心底。虽然他们表而上可能会接受一种观点，即空间

---

[27] 她的论述很有说服力。她指出，我们有必要抛弃一个神话，即全球化不但是转化了时间与空间，甚至是克服了它们：“商务、组织、信息与人的流动不会使时间和空间不再相干，相反，它强调的是这些领域的经验已经变得层次更多而不是更少，更加相互关联，也更复杂。对于那些萍踪无定、疲于奔命、四处奔走的人来说，要能够在三个或四个时区‘活生生地生活’(家庭、朋友、工作)，就必须具备新的处理能力，才能克服空间不再确定而时间必须重新计算的感官世界——一个‘没有时间的时间’与‘没有空间的空间’的世界。”(Ferguson，1992：79)

和时间一样也是动态发展的，我们所绘制的物理空间或政治空间，或者说人类传播流动空间的地图，是一直变化着的，但他们内心深处可能会拒绝这一观点（Massey，1992）。选择"空间化"这个术语是要指明持续的空间变化的过程，地理学已经探讨了绝对空间、时间—空间、成本空间、社会空间等等一系列的构成（Abler 等，1971）。目前通行的全球化过程指的是空间变迁的当前类型。那些大权在握的人或组织能够支配政治经济资源，从而更充分地运用时空资源，能够转变空间的流通使之符合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能力的扩张是神话的开始。吉登斯（1990：53）指出，这是"时间—空间延伸"的无限制扩张，它"提供了重新划分时间与空间的精确手段"。虽然政治经济学家可能会赞成吉登斯的分析，因为他捕捉到了空间化的精神，但政治经济学并不认为空间化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它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入手，指出后者是如何根据阶级、种族、性别等界限来分配和集中权力，从而完成重新划分空间区域的过程的。

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和社会主义

全球化神话也建立在对空间化的简化论观点的基础上。空间已经转换，因此需要重新绘制地图来解释空间的流动，但支持者们往往漏掉了其他相关的过程，包括反对过程。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将当代资本主义视为***只是***发达社会的一套明确关系，而没有把它看作是所有国家之内和之间的一整套或连贯或断裂的***等级分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这个倾向可以理解，因为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具有掌播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权力。[28] 但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消除不同形式的阶级、帝国主义和民族。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这些因素甚至比以前更为重要。再者，虽然"实际存在着的"社会主义世界几乎没有存在过，但社会主义的原则，也就是以民主的方式控制生产、分配、交换和使用在许多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运动中仍然存在。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继续与"不均衡发展"这个被人广为误用的术语一起存在。[29]

因此，我们眼前的版图不仅仅是因为空间的流动而重新绘制。由于

---

[28] 举个例子，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1989：160－161），在苏联解体之前，非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的电影中就有 80%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德国。

[29] 关于"不均衡发展"的许多不同用法，麦金太尔（McIntyre，1992）做了很有意思的回顾，他力图以非本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维重构这个术语的内涵。

民族主义的复苏,世界地图上因增加了许多国家而必须有所改动。其中有许多是苏联解体造成的,还有部分是民族、氏族和种族动乱的牺牲品。还有,如魁北克人、阿塞拜疆人、波斯尼亚人的例子,在民族主义之中还有民族主义。有一个过程——最好的提法是"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仍然十分引人注目,尽管空间化的力量已经使自然的疆界对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实务似乎不再重要。媒介毫无疑问地被卷人这个民族建构的过程中(Schlesinger,1991)。[③] 新民族的主要规划之一——也是人们促进和提高国家地位的规划之一——是开发民族性的媒介、电信和信息系统。企图创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国际运动的基础是建立地位较低的国家之间的联盟,它们无力控制自身的传播系统,无力影响自己在流动空间转型中的地位,也无力建立自己的国家传播政策。这个运动最大的反抗就是各国运用国家权力的杠杆并进行联合,创造大众的民主控制程序和公民身份,超越西方控制的市场。智利的联合阵线和尼加拉瓜的桑定(Sandinista)政府都是对抗跨国资本的民族主义的典范,但后来都在美国主导的军事、经济与政治的核心强权的攻击下而溃败。如今,虽然美国的传播产品享有较人的贸易顺差,但它还是非常关注世界传播市场中任何扩展某种程度的民族或地区独立性的努力,包括版权拥有者称之为盗版的行为。

但空间化与民族建构的关系十分复杂。后者的过程可能受到商品化和空间化的深刻影响,例如本国或跨国商业界发现,创立反映民族关怀的媒介具有市场潜能。例如,欧洲联盟在建立可以和强大的美国电视公司对抗的传媒机构的同时,也为本国的垄断厂商加强自己的市场力量提供了方便的传播媒介(Papathanassopoulos,1990)。再者,民族主义本身的政治经济意义及重要性并不清晰,如阿哈麦德(1992:11)所述,民族主义不是"某种不可分的实体,并不总是具有进步性,也不总是在后退":

> 民族主义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总是取决于各国的阶级力量与社会政治实务的组合状态,它组织了权力集团,其中任何具体的民族主义诉求总是会产生具体的历史效应。(另见 Greenfeld,1992)

二战之后,民族主义运动中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开始对抗资本主义,企图寻找社会主义方案以取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基础。结果,

③ "民族化(nationalization)"可能是更合适的术语,但一般这个词被认为就是国家接管某种经济活动,所以这里仍然使用"民族建构"。

民族主义呼吁世人营造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继而呼吁建立新的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其目的是想要对抗市场机能,创造出民族的、民主的替代性方案。然而,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如此明确,因为在第三世界也总是有阶级分化的问题。一般说来,政府的公职人员与不成熟的商业团体仍然与先前的殖民强权有所联系,这就使他们的民族主义通常比较保守,更具有为自己谋利的倾向。在西方政府、企业界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援助以及其他资本工具的协调下,这些阶层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取得了更大的发言权,到90年代则占据了第三世界。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失去了社会主义的大部分特征,它们所采纳的形式是团结民族,在本地创造成功的而方资本主义形式。这种形式也许在文化层面上保留了反抗的身份意识,但这个文化层面却包含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之中。反对的政治越来越意味着在两种方案之间进行选择,一是成功地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另一个是边缘化或被排除在外。人们只可能会选择前者,即使这个选择(在第三世界国家这十分典型)使得任何成功的果实都集中在阶级阶梯的顶端。关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案和土地、工业、传播和文化方面权力的重新分配完全消失了。反帝国主义一度是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规划,由低层阶级的大众运动来完成,如今被重新界定为

> 一种发展主义者的鸿图,它必须通过较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国家与较强大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展开合作性竞争而实现。(Ahmad,1992:293)

这等于是使大众的社会运动臣服于各国政府,面后者压制革命活动的能力又增加了自身的筹码,从面更能与发达资本主义的权力中心进行妥协。

这在传播产业中造成的后果十分重要。它意味着为创造世界信息与传据新秩序而进行的全球运动在衰退,甚至被迫放弃,各国或各区域转而自行与全球的媒介强权协商彼此的关系。具体而言,有些国家(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将资源投入到建立电信和信息系统的基础设施上,希望这能使他们在最短时间内在全球网络中占据一个优势位置。另外一些国家,如墨西哥,则放弃了面家对电信产业的控制权,转而依赖外国资本,希望自己能扮演区域媒介生产与分配的强权角色(主要是电影与录像带节目方面)。无论这些国家与主要强权取得了什么样的协商结果,它反映的

是一种过滤了社会主义内涵的民族主义。

不过,虽然承认这些发展情况非常重要,但只有顽固的实证主义者才会因为在当前局势中很难找到实际的例子就完全放弃原则。因此说,理清社会主义原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也很重要。但这相当困难,这不只是因为资本主义必胜的信念。虽然当代的学术界认为民族主义具有复杂的属性,但大多数论述没有细心研究民族主义如何会具有进步性,又如何会流于反动,他们更在意的似乎在于揭穿民族主义理念,指责它的本体论身份只是一种***起源的神话***。批判民族主义的主要立足点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批评民族主义忽略了资本主义、阶级与性别;但***后结构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它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批判相同,只是把它们当作总结的论述。具体而言,后结构主义企图消除这类总体性思考的方法,揭示文本的假象,它认为文本支持了这些叙述、神话和论述的结构。虽然近年来批评者认为后结构主义带有反动的思维模式,它拒绝历史,随之也逃脱了外界对它的材料、叙事以及政治规划理念的批判,然而后结构主义在学术知识领域还是占有一席之地。它也有益于传播研究,包括对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性评估,还呼吁微观研究考察受众如何接受媒介文本(Ang,1991;Tomlinson,1991)。施莱辛格(1991:149)称赞后结构主义思维提醒了政治经济学避免简化,但他又指出,它的代价太大而收获很小,因为它并没有"提供一个格外有意义的观测点,我们还是无法考察大的文化集体如何构成其身份认同"。然而,这里的问题是,后结构主义的哲学立论基础根本不认为任何大的文化集体会与身份构成什么关系。[31]要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对那些被当作整体叙述和物质实践而抛弃了的核心要素持开放容纳的态度,对构成了政治经济分析的核心要素持开放容纳的态度。这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被改写的民族主义历史的再认识,如阿哈麦德(1992:11)所说,"只有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坚定的、辩证的对立面,而这种辩证性只能来自社会主义"。

这很难办到,因为社会主义历来都被等同于民族国家,而现在除了少数例外,这些国家再也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然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质的区别并不是根据民族国家的空间差异而产生,而是根据在同一空间中竞争的、不同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而产生。蔡斯-邓恩(Chase-Dunn,

[31] 从哲学立场反对政治经济学及宏观社会学取向和在这个取向中使用人种论的方法还有所不同。人种论研究并没有任何内在的反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事实上,最近已经有研究(Pendakur,1993)试图整合政治经济学与人种论的研究。这与后结构主义所引发的研究并不相同,后结构主义运用人种论来造成社会整体的分散,认为社会分析有不可言喻的主体,而考察社会类别(如阶级)毫无意义,因为这些只是论述的建构产物。

1989:30)特别指出：

> 社会主义是一种生产模式，它使投资决策与分配按照集体使用价值的逻辑来完成，因此，社会主义运动重新将非商品化的关系引入资本主义关系的裂隙。

同一个机构在同一个空间可能同时运作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程。蔡斯－邓恩引用了工会的例子，指出即使它们进行斗争只是为了限制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同样可能促进机械主义。同样，我们可以举出公共广播电视系统的例子，即使它接受了商业化的形式，也可以完善这一系统。对社会主义的批判也需要这样的观点，这并不是为资本主义的必胜信念服务，而是要认识到活生生的民主性，包括参与和平等、公民身份、互助合作以及集体参与政治规划，这鼓舞了从印度支那半岛到尼加拉瓜的如火如荼的斗争，它们反对的可不只是整体性的论述，而是整体性的帝国主义和阶级统治的军事、经济、政治强权。

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民族主义是一种区域对抗的形式，它强调建筑在空间认同上的抵抗，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使空间的差异日趋理性化与同质化，因此破坏了民族主义的空间认同基础。虽然这种民族主义可能减缓全球化的过程，也可能通过迫使跨国行动者回应国家和民族的课题来塑造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已经有所成功，但它仍然不足以阻挡全球化，因为它忽略了空间和商品的关系，或者正规地说，它忽略了商品化和空间化的相互建构。结果是，民族主义往往接受本地的控制，无论这是否加深了商品化。社会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大都指出，虽然商品化也许无法破坏民族主义，也无法消灭空间，但它却将民族主义转化为一系列为了控制空间而同资本展开的斗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不能承认空间化的建构力量，于是拒绝了民族主义的力量对商品化过程的支持，这种支持体现为一种地方控制的形式，它放弃了促成非商品化或使用价值实务的机会。商品化与空间化的相互构建具体展现了政治的和理论的后果，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结构化过程时再作探讨。

第 6 章

结构化

科技评估署发现，在美国的传播业基层结构中发生的变化，可能会使一个差距加大，即能够策略性地运用信息和传播设施的群体与不能这样做的群体之间，差距将会加大。甚至，最有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人，恰恰是那些传播新科技被认为能改善他们生存境遇的人：穷人，教育程度低的人，与技术隔绝的人，以及挣扎着生存的小企业。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1990）

在过去的十年里，因商业与军事目的而引发的、关于所谓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或"信息社会"的争论，业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斗争的主要领域。而这些斗争反过来又提供了理由和动力，使政治性的批判传播研究得以设立浩大议程。……然而，对于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权力—知识方面即性别政治，理论本身和它所做出的经验评估却不置一词。

（Jansen, 1989: 196）

本章讨论结构化的过程。关于这个论题，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

著作中(1984)已有最杰出的论述。他试图用自己的结构化理论弥合这样的裂痕:有些理论突出结构,而另一些则强调行为和能动力量。例如,在涂尔干、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等人的著作中建立了结构主义理论,而行为理论则跨越社会学各派,代表人物包括韦伯以及现象学理论家如舒尔茨(Schütz)和伽达默尔(Gadamer)。

吉登斯认为,为了达成这种弥合,结构具有二元性,它既包括强制规则,又包括能动资源。结构不再是给社会生活套上样板的僵硬框架,它既制定行为,又为行为所重构。就此而言,结构与行为互相连结在不断变迁的社会生活模式之中。因此,结构化所描述的是一个***过程,结构在这一过程中由人类能动行为来组建,而它又提供了组建所需的"媒介"本身***。社会生活由结构与能动力量共同构成。正如吉登斯自己所说,结构化对于社会学思想来说并不是新概念。它无疑正是马克思历史著作中的核心元素,最突出地体现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在这一文章中阐述了他的名言:人民创造历史,但却是在自己无法决定的条件下创造的。

结构化理论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是对社会变革的强调。这里所说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过程,它描述了结构如何被人的能动行为创造和再创造,而人类又如何以结构为媒介来行动。功能主义者、制度论者和结构主义者倾向于将结构看成是已经完全成形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他们的思想受到批评,而结构化的概念则是对此做出的回应和纠正。功能主义者的观点对于理解结构的运作有重要贡献,但他们对结构形成过程的认识并不充分,对社会行为和人类能动力量的认识也如此。正如霍布斯班(Hobsbawn,1973:280)所述:

> 结构模式只认识到系统的维持,这是不够的,它应当反映出稳定和冲突这两种要素同时存在。这样一个二元的(辩证的)模式从建立到运用都相当困难,因为实践中由于偏爱或时势的关系,人们倾向于将结构模式或解释为稳定的功能运作,或解释为一次变革;其实结构模式之所以有趣,就在于它二者兼具。

本章试以结构化理论观照商品化和空间化的进程,以此来提升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内涵。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政治经济学分析偏向于强调结构,尤其是结构中商界与政府的作用,而结构化通过对能动力量、社会关系、社会过程和社会实践等理念的关注与包容,平衡了这种偏向。同

时，参照加汉姆(1990)等人的思想，我们应抛弃这样一种极端的认识，即认为对能动力量的分析可以在没有结构的情况下完成。实际上正是结构提供了能动力量运作所需的媒介。由此，政治经济学在对拉克劳和莫非(Laclau & Mouffe)的结论"社会性没有单一本质"表示赞同的同时，也对他们的论证提出了异议，比如下面这段论证：

> 为了能使我们在这个连贯的、有机组合的领域站稳脚跟，一开始我们就得放弃把"社会"概念看作是各种社会过程的基础性整体。我们必须把社会的开放性看作是构成的基础或存在的"对单一本质的否定"，而各种"社会秩序"试图统一存在差异的领域也是徒劳的。……所谓"社会"特有的缝合余地是不存在的，因为社会性并没有单一本质。(Laclau & Mouffe，1985：95－96)

结构化理论面向社会生活，直指有目标、有反应的人类行动，同时并不放弃去理解所谓的权力的"缝合"，正是它构成了社会行动。

正如汤普森(1989)指出的，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太强调能动力量，而把结构的概念限制为一套***运行规则***和一个***资源库***，个体从中各取所需。汤普森的批评不再详述，我们要指出的是：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的主要概念(他受到批评的另一个原因是同时提出了好几个概念)并未细究***权力***，常常对社会分析的批判取向袖手旁观(另见 Bernstein，1989)。吉登斯所说的运行规则不胜枚举，如汤普森(1989：63)所罗列的"道德规则、交通规则、政府组织规则、语法规则、礼仪规则、足球规则"等等。吉登斯无疑知道自己涉足过广造成混乱，但他并未做出令批评家满意的更正，也没有提出明确的***社会***规则。也许是因为一旦明确界定，他将难以建立***超历史***的理论，难以树立反马克思的立场(Giddens，1981)。同样，吉登斯的"资源"一说也包罗万象，毫无秩序，从福利机构的咨询服务到芝加哥商品交流中心的期货买卖都属于此范畴。这也是因为，一旦按照确定的形式安排资源，就会使其中某一种(如权力)获得比其他种类重要得多的地位。这便使理论从解读一般社会生活转向对众多社会表象之一进行特殊的解读，也许是从历史出发的特殊解读。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化理念倒是更愿意接受这种历史性的特殊读解，因此顺理成章地，它在接受吉登斯关于结构和行为二元论的一般观点的同时，给予了***权力***更大的分量，也吸收了社会分析的***批判***取向。

这个焦点从实质论和方法论上深化了政治经济学的权力分析。如前

几章所述，政治经济学对构成权力生产、分配与使用的商品、制度、实践及社会影响诸要素进行了持续的分析，对社会研究包括对传播实践的解释都有重大贡献。为完成对权力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运用了适合大规模分析和宏观分析的概念与方法。例如，这些概念与方法使它能检视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是如何通过兼并、购买、劳动实务以及借贷来积蓄力量，扩大媒介和信息商品的生产，并进而左右政府的规范管理政策的。运用这类方法时，政治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是传媒集团的营业收入、组织结构、雇佣情况等总的数据，同时也对它们向政府机关（如规范管理机构）提交的资料极感兴趣。

结构化理论中贯穿着对能动力量的强调，它通过考察能动力量如何在结构的、互动的、微观的权力层次上运作，扩展了权力的概念。例如，时代—华纳董事会面对如此众多的宏观压力，如何制定出优先的议事日程，从而决定进入此特定市场而不是另一个，购买此公司而不是另一个，投资于此项新技术而不是另一项？这些决定似乎只是客观评估规范行为的底线，实际上评估的底线就是宏观压力平衡的结果。而客观评估同时也掩盖了一系列微观的权力斗争，这些斗争源于具体的决策者和董事们的切身利益，评估的组织工作就是一场夺取符号资源控制权的斗争。对权力进行分析时，有些学者只从经济上着手，他们对权力的认识只不过刚刚入门（Tinker，1985）。要深入研究，就要在政治经济学家们所受的训练之外，配备一些不同的研究工具，包括民族志、民族方法学、参与观察法及其他观察社会实践的方法——这些社会实践对于特定的行动者而言，恰恰组成了权力的含义（Pendakur，1993）。

这里的重点不仅是**社会性**，也有微观性。当前关于能动力量的观念中存在着问题，其中之一是易诱导人们将个体引入社会分析之中。再没有比这更远离结构化内涵（包括吉登斯的结构化概念）的了。能动力量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学概念，它指的是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其行为源于其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母体（包括阶级、种族和性别）。然而，尽管结构化理论认为能动力量是社会性的而非个体性的，它也认识到个体化这个社会过程的重要意义。“个体化”的概念主要来自波兰扎斯（Poulantzas，1978），指的是社会角色的重新界定（尤指劳资双方），他们被界定为这样的个人主体：其利益与独特的人权、表达权、选举权及消费权息息相关。个体的行动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却随阶级统治而定，使个体彼此分离，使个体与其社会认同分离，也与那些掌握着权力实行个体化的人分离。结构化过程中的一个核心冲突就存在于社会性与个体性之间。因此，从结

构化入手，可以考察结构和能动力量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相互建构；从它出发又可以拓展权力概念；以结构化为杠杆还可以了解在政治经济学中社会关系所采用的形式。

当政治经济学将目光投向能动力量、过程和社会实践时，它倾向于聚焦在***社会阶级***上。我们有理由把阶级的结构化作为核心起点来理解社会生活，因为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了阶级分化在持续，这足以支持我们的立场。然而，结构化仍有其他一些方面，包括性别、种族和基于公共议题的社会运动（如环保主义），它们与阶级分析互相补充又互相冲突，共同构建了传播社会关系的众多方面。

从结构化理论这一应用点出发，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社会"：能动力量共同塑造了阶级、性别、种族与社会运动等关系，从而引发了结构化活动，其总和体就是社会。根据这一观点，社会的存在，即使不能说是天衣无缝的整体，至少也可以说，在它的领域内各式各样的过程交织形成了可识别的社会关系。聚焦在阶级、性别、种族和社会运动等关系上，并不意味着惟有这些关系是本质性的，而其他所有方面均可忽略；相反，这里的阐述表明，阶级、性别、种族、社会运动等是通向结构化分析的核心途径，这些种类的价值纯粹是名义上的，社会领域不只是这些种类标明的一个主体序列。社会阶级是实在的，它既是社会关系，又是分析的工具。结构化过程中还产生了**霸权**。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包括各个方面，从宇宙观、伦理观直到社会实践，每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理念，互相征服和冲突着，而由统治阶级灌输的、大多数人认为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世界观，就成了霸权。霸权是一个既存网络，由意义和价值共同构成，这些意义和价值是杜撰的，但是被当作实践来体验，从而在大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了。

本章展示了如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运用阶级、性别、种族和霸权等术语，也对它们进行了具体分析，目的在于扭转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阶级等不过是媒介影响下群体种类的名目。本章将它们作为描述***传播实践中的社会关系***的方法加以考察，包括它们是如何组织起使它们得以产生的能动个体的。各结构化过程中都存在着矛盾冲突，从中媒介完全展现了它的主流、非主流和反主流的组织形式。

社会阶级

在社会学的众多领域当中，阶级分析是人们驻足较多的一个。[①] 威廉斯（Williams，1976）一开始对阶级概念进行分析时就认识到，这是一个“有明显困难”的课题，无论是它内涵范围的确定，还是它对于社会分界的具体应用，都是如此。这个词的拉丁原文是“*classis*”，指的是罗马人中按财产划分的等级；16 世纪它出现在英语中，意指按名利虚荣（vanity）划分的不同门第，这个说法为维布伦所赞同。这个概念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在于它的意思极为概括，可以指动植物的种群，也可以指人类的集合体，并没有特定的社会性含义。工业革命伊始，现代的阶级划分标准（如下层阶级、中产阶级、上层阶级及工人阶级）就逐步取代了原有的标准，比如等级，我们也日益认识到，归属于哪个社会阶层不单是继承而来，更是自己造就的。

当前的争论大多围绕社会阶级的分类观、联系观与形成观展开（Miliband，1989）。社会阶级的**分类观**（categorial）的意思是对某一类人群进行界定，以他们的财产和/或收入来衡量其经济地位，进而判断其社会地位。[②] **联系观**（relational）则认为，人群基于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关系而形成了社会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讲，阶级不是依附于个人或群体的某种位置，而是一种关系，例如存在于劳资双方之间的以是否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为基础的关系。根据这种观点，离开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就不复存在；反之亦然。“阶级”也就具体化为连结与区分二者的纽带。最后是**形成观**（formational）。如威廉斯所述（1976：58），阶级是“一种***形成***；意指在历史因素的作用下，人们逐渐发展了对自身处境的自觉认识，并随之发展了维护或改善这种处境的组织”。根据这种观点，阶级的存在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自己的阶级位置并据此采取行动，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为**自己***形成***了一个阶级，而不是自己***拥有***了一个阶级。

虽然有如上区分，但这三种关于阶级的思考方式仍有相当多的重合

---

① 关于各种论争的综述，参见吉登斯和海尔德（Giddens & Held，1982）。

② 这个传统主要来自马克斯·韦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存在唯经济论的倾向，便通过扩展阶级分类标准，纳入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通常的等级观念）等因素来纠正它。

之处。例如,社会历史学家E.P.汤普森的大部分著作(1963)是同时采用社会阶级的联系观和形成观的。另外,关于这些区分的具体方面也有长期的争论。什么是阶级分类的标准——收入、财富、权力、地位还是这些因素的组合?是什么规定了阶级关系——生产资料、再生产资料还是国家工具?究竟是什么造成了阶级的自觉意识——个体的觉醒、社会传播还是有组织的反抗?关于这些问题,关于不同立场能否相容存在着广泛的分歧,这标志着目前对社会阶级仍有激烈的争论。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阶级研究主要是从分类观的角度出发,揭示阶级权力的重要意义。这些研究展示了媒介精英们如何创造和再造他们对传播事务的控制权,分析了媒介精英们的阶级成分及他们内部的融合与分化。早期的研究包括米尔斯(1956)对美国媒介与娱乐界精英的研究和克莱蒙特(1975)对加拿大媒介精英的评估。而近期越来越多的著作将目光投向了北美之外(Tunstall & Palmer,1991),投向了因大众媒介与信息传播新科技的结合而日益发展壮大的阶级统治网(Mattelart,1991)。其次,有些研究对媒介资本家与其他精英阶层间的密集联系网进行了考察,这个联系网是通过董事会、商业协会、公益组织及私人俱乐部之中的广泛来往交织而成的(Dreier,1982;Herman & Chomsky,1988;H.Schiller,1981)。最后,有些研究集中考察了阶级统治在政策制定和规范工作中发挥作用的过程(Coulter,1992;Mosco,1982:Chap.2;Rideout,1993;D.Schiller,1981)。

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精英统治的结构和过程。政治经济学还注意到了这种统治对阶级结构的其他部分的影响,例如,它讨论了阶级结构中传播资源享用权的分配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在今天之所以显得尤为重要,有几个相关联的原因。在过去十五年里,奉行新保守主义的政府采取紧缩开支的政策,并把这种政策向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宣扬(美其名曰"结构调整"的手段),它们对高收入阶层减税,同时削减了社会服务、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开支,从而加深了阶级分化。推动公共机构(包括公共传播服务体系)向商业化、自由化、私营化转变的压力,使这种紧缩政策显得更为重要,正是因为这些政策,在决定包括传播业在内的服务性行业的使用权分配上,市场力量起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最后我们注意到,用户付费方式精细化的趋势也出现在传播体系中,例如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的付费方式有按月付费、按频道付费,逐渐发展起来的还有按片付费。这些都促进了传播等级体系的形成,我们的付费能力越来越成为决定性因素。

戈尔丁和默多克(1991:28－29)引用奥本海默的资料(Oppenheim，1990)证实了英国的收入差距正日益加大。报酬最高的五分之一男性从业者的收入增长幅度比最低的五分之一多了42%。同处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家庭之间，差距也在拉大，结果是，1977—1987年间，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税后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的比重从6.4%降到5.1%，而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却从40%升至45%。阶级分化对传播的影响可以从戈尔丁对收入(传统的也是最起码的阶级界定标准)与是否拥有电话、电视和家用电脑的关系的分析中看到。[③] 正如数据显示，收入不同的群体，拥有这类传播物品的状况也必然不同。

在美国，情况是一致的。据国会预算署宣布，1977—1989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的税前收入增长了77%，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家庭的税前收入增长了29%，第二个五分之一的家庭的税前收入的增长幅度为9%，接下来的五分之一家庭的税前收入增长了4%，同时，第四个和最底层的五分之一家庭的税前收入却分别下降了1%和9%。根据1992年美国统计局的数据，在经过收入分配较为稳定的五十年之后，最富有的五分之一群体的收入开始增长，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70年的40.9%升至1990年的44.3%，而中间的五分之一群体的收入则从17.6%降至16.6%，次穷的五分之一群体的收入从12.2%降至10.8%，而最穷的五分之一群体的收入比重从5.5%降至4.6%。貌似先进的税收体系也不能阻止最富有者将大部分的税后收入装进口袋。在这期间，税后收入的增长中有60%被1%的最富有家庭纳入囊中，另有34%被余下的20%的富有家庭瓜分，而底层80%的家庭只好分享剩下的6%的收入增长量。回到1959年，美国工资最高的4%的人口的收入，同最低的35%的人口的所得相当；到了1989年，差距已经扩大，这4%的人口的收入相当于51%的底层劳动者的收入之和(Bartlett & Steele，1992：ix)。[④]阶级分化加大的情况在加拿大也有发生，部分原因是美国已有先例，部分原因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加拿大政府与它的南部邻邦一样采取了新保守主义政策。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会对这种分化起缓冲作用，但它却不断受到商

③ 收入通常指的是工资、酬金、租金、利息和分红等。财产固然是显示阶级地位的更好的指标，但因为牵涉了所有家庭资产的价值(包括房产、汽车、股票、证券等)，除了有测算的问题外，其数据也不像收入那样能进行系统的收集，因此很难加以分析。

④ 近期的数据表明，美国的贫困状况越来越普遍，分布地点也越来越集中。统计局的报告说，1992年又是一个贫困人口增长的年份，贫困人口的数字已达到3,690万，占总人口的14.5%。此外，1990年住在贫民区(贫困住户超过40%的地区)的人口也升至1,040万，而1980年和1970年分别只有560万和370万。(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3)

界和政界的阻挠。[5]这些社会的阶级特点在媒介的分享和使用中会有所反映,例如,在收入和拥有家用电脑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6]

表6-1 美国媒介普及率(1989年)

特 征	总人口(千人)	电视收视率与覆盖率(%)	电视黄金时段收视率与覆盖率(%)	有线电视收视率与覆盖率(%)	收音机收听率与覆盖率(%)	报纸阅读率与覆盖率(%)
性别						
男	85,035	91.8	75.1	50.7	87.1	85.7
女	93,246	91.6	77.7	45.3	83.6	84.6
种族						
白人	154,028	91.2	75.9	50.2	85.4	86.5
黑人	19,599	95.5	80.3	32.7	84.5	78.8
其他	4,653	93.2	79.7	34.6	85.0	66.3
西班牙语系	10,301	91.0	74.7	38.9	90.8	76.7
教育						
高中以下	45,389	91.8	75.9	36.7	75.2	71.9
高中	69,392	91.8	77.8	49.7	86.7	86.6
大学肄业	32,228	91.5	74.5	54.8	90.5	91.6
大学	31,271	91.4	76.3	53.0	91.3	94.2
就业						
全职	101,695	90.8	75.8	51.8	91.1	87.7
半职	11,602	89.9	72.6	50.4	90.3	88.1
无业	64,984	93.4	78.2	41.3	75.2	80.5
家庭收入(美元)						
低于10,000	19,644	91.6	74.4	27.4	70.9	66.6
10,000—19,999	31,564	94.2	79.4	38.0	80.5	79.3
20,000—29,999	32,361	91.7	77.0	47.5	84.2	84.8
30,000—34,999	16,105	93.3	78.6	49.1	89.1	87.1
35,000—39,999	14,391	91.5	77.5	55.7	88.9	89.4
40,000—49,999	24,001	90.6	75.2	54.4	90.8	90.8
50,000或以上	40,215	89.8	74.2	58.8	90.7	93.1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0:550.

---

⑤ 根据1991年的《加拿大统计》报告,只有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占了家庭总收入的40%;而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只占6.4%,与上年持平。政府调查到的贫困人数又增加了40万,达到了423万,占总人口的16%,高于1990年的14.6%和1989年的13.6%。(Canada, Statistics Canada, 1993)

⑥ 克鲁格(Krueger,转引自 Nasar, 1992b)研究了电脑使用与报酬差别的关系。他的结论是,在其他方面都相同的情况下,使用电脑的劳动者获得的报酬比不使用者获得的报酬要高出10—30%。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使用电脑者多为白人、女性及教育程度高的人,与此对照,不使用者多为黑人、男性和未读完高中者。另外,皮勒和威曼(Piller & Weiman, 1992)认为,在贫困区与富裕区的学校中的电脑使用情况也有不同。后者多使用电脑来做创造性的开发,如多媒体演示;前者则着眼于训练机械性工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电脑并不是革新的工具,相反,它使贫富两极的教育体系得到了强化。"

表 6－2　英国传播设备拥有率(1989 年)

一周收入(英镑)	电话拥有率(%)	录放机拥有率(%)	家用电脑拥有率(%)
46— 60	64.3	13.9	0.8
81—100	73.9	25.9	6.2
126—150	83.9	42.6	6.9
151—175	83.9	55.4	11.2
176—200	87.2	65.5	14.1
226—250	96.2	75.4	25.8
276—325	96.2	80.5	29.4
376—450	98.6	85.2	33.1
450 以上	99.7	77.7	34.3
所有家庭	86.2	56.6	16.6

资料来源:Golding and Murdock,1991:29.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传播政策的变化也证实了阶级权力的强大。这反映在非商业性的电子媒介的发展中,如政府对公共广播的资助削减了。公共广播系统的节目虽然屡遭争议,却反映了公众关心的事务,它把受众当作国民,而不仅是消费者。国家资助的削减使它只能更依赖企业的支持,市场的力量在相当大程度上被引进并起作用了,公共广播已播出了第一个真正的广告。随着对企业和社团捐助的依赖性的增大,公共广播系统的节目开始为那些出钱者阶层的兴趣所左右。而对于商业电子媒介,美国政府已经取消了对广告时段长度的法规限制。结果是,在 1993 年,两家主要的家庭购物频道——QVC("品质、价值与方便")和家庭购物网——合并成为最大的传播网之一,成为电视界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它的成功,就靠不受限制地在一整天的节目时段中只展销商品而不播出其他节目。政府还取消了"公正"的规定,虽然以前这个规定执行起来尺度很宽,但毕竟对广播从业者施加了压力,使他们提供对公共议题的均衡报道。现在,电台不仅爱怎么报道就怎么报道,而且爱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而不再被迫报道某一议题。除此之外,政府也放松了关于产权集中的法规,这甚至使得地方性垄断势力(如电话公司、有线电视特许专营区等)很容易就获得一个垄断市场所能负担的最高价位。

由于不再要求电视节目中新闻与信息节目必须达到一定的量,无线广播电视纷纷削减新闻,也削减了诸如总统选举等政治事件的报道,并几

表6-3 美国家庭使用媒介的情况(1992年)

家庭收入(美元)	总人口(千人)	电视收视率与覆盖率(%)	电视黄金时段收视率与覆盖率(%)	有线电视收视率与覆盖率(%)	收音机收听率与覆盖率(%)	报纸阅读率与覆盖率(%)
低于10,000	20,273	93.7	82.7	41.8	77.4	64.9
10,000—19,999	29,823	95.2	84.2	45.1	79.1	73.8
20,000—29,999	30,266	94.1	81.5	52.6	82.5	82.2
30,000—34,999	14,976	94.8	83.6	58.9	87.9	85.7
35,000—39,999	13,113	92.2	78.3	63.1	89.3	89.8
40,000—49,999	22,008	94.0	81.2	64.0	91.1	90.5
50,000或以上	54,703	91.7	78.1	69.9	91.6	92.8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3:561.

乎不再制作公共题材的纪录片,这使得传播新闻与信息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CNN、C-Span和其他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肩上。但是,主要是由于收费过高,并且有线电视公司也不愿意在低收入地区铺设线路,到1996年只有三分之二的美国家庭是有线电视的订户。[7] 结果是,在美国,相当多的家庭被传播新闻与信息的主要电子媒介拒之门外。一方面,政府实际上取消了关于地方垄断专营的收费规范,另一方面,有线电视市场日益集中到两家超大集团——时代—华纳和电信集团——手中,这两方面的结合引起了人们强烈的抗议,以至于在1992年,政府又不得不对有线电视的基本收费进行某些监督。[8]

在电话业,阶级权力的作用简直就是从地方家庭订户那里搜刮数十亿美元,从而在企业集团成员之间重新分配。这要归咎于一系列的政府决策,它们使电信体系运营的成本被转嫁到了地方用户和小企业身上(Ramirez,1991)。[9] 实际上,成本负担问题反映了这样的决策:让家庭用户自己掏钱来支付电信基础设施(所谓的电子信息高速公路)和开发新项目的费用。这些新项目并没有明显的需求,却被说成是对未来电信业的

---

⑦ 按照公用事业公司的规定,电话公司必须在合理、合法的收费下向全体消费者提供服务。这些关于收费的法规在大多数公共利益维护者眼中是无力的,但它毕竟比如今有线电视公司所要遵守的法规强得多。近几年来,由于大多数有线电视收费法规被取消,这个方面已出现了大问题。

⑧ 但是,这些约束非常无力,仍有大约30%的用户付费偏高。结果是,1994年联邦传播委员会修改了有线电视收费政策,将基本的收费标准降低7%左右。然而,1996年《传播法》的修订则要求逐步取消大多数有线电视收费法规。

⑨ 美国消费者协会在1991年12月的报告中指出,自1984年AT&T公司解散以来,占有垄断市场的各贝尔公司已经从消费者那儿多收了大约300亿美元。

表 6-4 1992 年美国电话普及率(%)

特 征	全部种族	白人	黑人	西班牙人后裔
全体	93.9	95.3	83.8	86.6
家长年龄				
16—24	82.0	85.3	63.1	78.0
25—54	93.2	94.7	82.9	85.8
55—59	96.2	97.0	91.2	91.3
60—64	96.6	97.6	90.1	92.2
65—699	95.9	97.1	85.8	90.3
70 岁以上(含 70 岁)	97.6	98.3	92.0	95.4
家庭人数(人)				
1	91.9	93.8	80.1	79.6
2—3	95.3	96.5	86.2	88.5
4—5	93.5	95.0	83.3	87.2
6 人以上(含 6 人)	90.6	91.8	85.2	86.6
劳动力状态				
总人口	94.7	95.9	86.5	88.5
就业	96.0	96.8	89.8	90.2
无业	88.5	90.0	82.8	85.9
无劳动能力者	93.4	95.1	82.8	86.0
收入(美元)				
低于 5,000	71.7	76.0	63.0	66.9
5,000—7,499	83.7	85.9	76.7	72.8
7,500—9,999	88.3	90.4	79.3	78.4
10,000—12,499	90.0	91.0	83.5	81.2
12,500—14,999	91.2	92.3	85.4	84.1
15,000—17,499	93.2	94.3	86.4	87.3
17,500—19,999	95.6	96.4	89.7	91.6
20,000—24,999	97.2	97.8	91.5	96.0
25,000—29,999	98.2	98.4	96.9	96.1
30,000—34,999	98.6	99.2	95.7	96.7
35,000—39,999	99.0	99.3	96.4	96.0
40,000—49,999	99.5	99.5	98.9	99.1
50,000—74,999	99.4	99.4	98.7	100.0
75,000 或以上	99.4	99.5	95.3	99.1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3:563.

运作必不可少。[10] 虽然许多政策分析家宣称,大众电话服务网已经"大功告成",但美国低收入家庭中仍然有20%的家庭没有电话(其中包括黑人和拉美裔家庭总数的15%),他们不会同意这个说法;同样不会同意的还有居住在乡村的家庭,国会科技评估署的报告(1991)已指出了这一点(关于英国的情况,可参见 Hepworth & Robins,1988)。人们眼看着电话账单的数字日益飞涨,便向政府施加压力,于是有趣的事发生了:就在全美国已经达成共识,认为传统福利政策并不能向最需要的人提供服务的时候,联邦传播委员会和各州的立法与管理者们却开始着手实施全国性的福利电话计划。这种福利电话美其名曰"链接工程"和"生命线路工程",它将为电话的安装和每月话费提供补助,申请者需通过各州自定的补助标准的审查,这等于是联邦与各州原有政策的修补。举例来说,1991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可以申请"链接工程",但必须是接受四种福利补贴之一者,收入还得符合电话公司的标准。俄勒冈的居民可以申请"链接"和"生命线路"中的一个,但也得是食物券的领取者,还要通过本州的收入审查(U.S.,FCC,1991)。电话福利计划是一个典型,展示了所有福利计划的共同特点:对资格的层层审查,严格的监督,官僚主义,登记不足——截至1991年1月,只有3%的人向"链接工程"登记,32%的人向"生命线路工程"登记。福利计划的最大后果就是造就了一个永久性的"福利阶层",在经济上和心理上,他们都永远得不到机遇,也永远得不到享用的权利。

类似的发展状况也发生在电子服务市场领域。在"节约纸张进行办公"的名义下,美国联邦政府削减了资料收集工作;还为了商业用途将某些资料私有化了,而这些资料本应免费供公众使用,公众也为它们的收集工作付过钱了;政府还将许多信息转移到网上资料库里,于是只有那些在电脑上花得起钱的人才有机会使用它们。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双年度报告《数量减少,使用者减少:美国政府资料情况报告》(1988:Preface),目前的趋势是:"对政府活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最大限度依靠私人部门散发政府信息;通过向用户收费来收回成本。可能的结果是,目前政府信息资料商业化和私有化的步伐将会加快。"该协会还报告说,美国的公共图

[10] 对这类决策的支持意见也很普遍,因为很多人误以为价格就应当随着成本的上升而增长。实际上,除了成本因素,这种价格的增长还意味着取消了长途电话用户对地方用户的补贴。这个观点也遭到两方面的反对。一种观点(Oettinger,1988a)认为,从经济上没有办法找到最佳定价程序,因为关键概念的界定都是很主观的,(例如何为地方内线?)所以,只能从政治上找。按奥廷格的观点,产业势力在利益均衡原则下确定价格,而所谓基于成本的定价,不过是将之合理化的童话。另一种观点(Aufderheide,1987;Denious,1986;Melody,1984)认为,补助其实是地方用户给予长途用户的,例如,为了长途用户所必需的基础线路和设施建设,地方用户付出了与自己的使用不成比例的钱,这就是明证。

书馆系统正处于大萧条时期以来的最差境况中(*The New York Times*, July 8, 1991:A1)。按该协会副会长的说法,图书馆员和其他人都担心付费服务的政策“会偏离图书馆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为了筹集急需的资金,图书馆提供某些收费服务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可能影响到它的根本宗旨的实现:向一切人提供信息与资料,不分贫富、有无支付能力(De Witt, 1993)。最后要谈到的是,美国的公共学校体系如今也面临严重的“瓶颈”,以至于1.2万所学校不得不要求他们的学生(几乎占全美12—17岁年龄段青少年的一半)观看“第一频道”——由商业赞助的新闻摘要节目,以换取他们急需的图像教学技术。[11]

阶级权力也影响到了当代工作场合。众多研究已经指出,大规模服务性部门已分化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用祖波夫(1988)的话来说,训练有素的人使用信息技术来使自己的工作充满信息、丰富多彩;而更多的人不过是照管自动工作的机器而已。对工作场合的阶级权力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悠久,在19世纪,大部分争论集中在马克思“工作中劳心与劳力分离”这个主要论断上,在今天,这方面的研究因布里夫曼(1974)的著作而重新活跃起来。

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传播业工作场合,阶级权力是如何通过对体力劳动的瓦解和对其他工作者的监视控制来起作用的。今天,没有任何行业逃得了结构重组的命运,虽然制造业的情形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也未能使服务业部门避免重蹈覆辙:这个被称为20世纪80年代“繁荣发动机”的部门,也在经历着缓慢的增长和大规模的转型。传播业在服务性行业中位居核心,正感受著失业和结构重组带来的冲击(Nasar, 1992a; Zachary & Ortega, 1993)。

这些年来,印刷出版业也一直经受着科技浪潮的冲击,而电脑控制生产的方法一经引人,对所有工种——包括蓝领与白领——的影响仍是史无前例的。在蓝领工人中,电脑排版已经排除了打字员和排版员的工作,页面编辑系统则将页面设计编排的任务大都转到编辑那儿,编辑们发现他们用在改稿上的时间少了,而得多花时间学习怎么把稿件组织成版面。科技发展也在广播电视新闻业中造成裁员,便携式和自动化的设备缩减了报道队伍的人数。特技在这虽也有影响。例如,BBC之所以能裁减它

[11] 过于关注传播科技及电脑使用能力等问题,会使人忽视美国的文盲率问题。根据教育部1993年的研究(U.S., Congress, Senate, Subcommittee on Education, Arts and Humanities, 1995)美国1.91亿成年人中有9,000万人连最起码的英文熟练程度都达不到。

的演播室摄制组，是因为他们发明了自动化的虚拟演播室，这个虚拟演播室能展现四倍于实景的影像，其中那些昂贵的道具(雕刻着 BBC 徽章的水晶)是虚拟出来的，仅仅存在于包含了虚拟演播室软件的光盘中(Drohan，1993)。

如同印刷新闻界的同行，制作电视新闻的记者编辑现在也要做以前由技术人员和图像艺术处理人员完成的工作。他们能在单独的电脑屏幕上调出活动影像和图片进行处理，还能在旁边留出空白来写稿，这样，原来制作一条新闻可能需要三个人，现在一个人就够了。业内刊物已经预见到这种“桌面影像系统”将极大地减少电视新闻制作的工作量。较大的几家电视网都大量裁减了它们的花费高昂的驻外机构，现在更依靠独立的国际新闻制作公司，如世界电视新闻公司和维斯新闻社。除了将风险转移之外，这种精简的结构重组还使制作公司只需靠一小批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就能完成工作，从而避免了大制作队伍带来的人开销，包括组织工会的花费。

自动化也极大地减少了电信传播业的雇佣人数。由电脑系统来处理长途业务、查号业务及其他服务，使电话接线员的数量在 10 年里下降了 20%(见表 6－5)。类似系统也缩减了电话维修人员、工程人员和办事员的人数(Moody，1993)。[12] 尼尔森(1990)和瓦斯科(1994)都证明了科技浪潮对电影业的冲击，一系列新技术在每个工种中都引起了结构的重组，并裁减了影片放映员、实验室技师、换片员及其他种类的工作人员。

阶级权力在当代工作场所中表现为更加严密的*控制*。公司通过员工工作时使用的电话和电脑来测量他们的工作时间(每分钟接听的电话数、每小时键人的次数、每班次扫描的货物数等等)和工作表现(休息的次数与时间)。(Clement，1992； U.S.，Congress，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1987)一旦科技使某项工作可以操作、可以推向市场、可以控制，就会产生强大的测量和监督的欲望。虽然一提到这个问题就不免会联想起“老大哥”式的独裁统治，但在很多情况下，那种铁腕式的非理性驱动力在这儿并不存在。从某些层面上说，这是权力的一种新形态，它不是直接强制，而是旁敲侧击，内涵几近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82)所说的身体政治的毛细血管休系。监管被看作是正常的企业行为在竞争环境中的延伸物。举个例子，WTA 航空公司对其订票代理员进行监管，每周、每月都分发电脑测量报告卡，上面有电话使用时间和主管对测量结果的

[12] 加林查等人的报告(1994)称，1994 年 1 月全美被解雇者中有 41%是电信业职工。

评估。一位公司高级主管如是说:“我想我们与其他企业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我们相信使我们的代理员保持一定的工作水平是有可能的。我们要让顾客确信,他们的钱来得不易,花得也不冤枉。”(Kilborn,1990:8)

表6-5 1992年4月美国电信业裁员人数一览表(包括已宣布的与计划中的裁员)

公司	裁员人数
IBM	35,000
AT&T	26,000
GTE	20,000
Nynex	17,000
美国科技	11,000
太平洋电信	10,000
南方贝尔	10,000
美国西部电信	9,000
苹果	2,500
西南贝尔	1,500
AST Research	1,000
康柏	1,000
总计	144,000

资料来源:Andrews,1994:D1; Mandel,1994:26.

以上所做的分析很重要。我们从阶级概念出发,对传播活动的社会生产、社会分配和社会消费有了大量了解,并从这些分析中得到了验证。这些分析是从社会阶级***分类观***的角度出发的,主要的兴趣在于判定阶级位置,描述相关的行为类型,包括描述阶级种类的再创造。其中阶级被强调为一种结构,阶级的形成过程被看作是一个再创造的问题。这些研究对自由多元论者的观点做了重要批判。自由多元论者忽视甚至否认阶级结构的存在,而把媒介的生产、分配与消费看作是民主化市场的自然成果。按他们的观点,市场也是需要做某些调整的;但由于他们是以个体(一个人或一个企业)作为分析单位,这些调整等于是改善市场服务于个体的功能,而非减轻根本性的阶级分化。

阶级分析的分类观对自由多元论提出了有力的批判,但是如果再注意以下三点,它的批判会更加有力:首先,在分析中加入***联系观***和***形成观***;其次,将社会阶级与结构化过程中的其他入手点联系起来,包括***性别***、***种族***和***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组织力量,反抗阶级权力及其他不合理现象);最

后，把它与**霸权**的结构，或者说社会的"常识构成"结合起来。

分类观界定阶级时，以特定阶级类别所包含的要素即财富或收入为标准；而联系观则寻找阶级类别之间的关联。根据联系观，社会阶级不是由它包含或欠缺什么来确定，而是取决于它和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没有劳动阶级，也就没有统治阶级，反之亦然。使阶级成为阶级的，正是使阶级之间发生联系的东西，如对生产资料、再生产资料、传播工具等的占有和控制。这种关系可以分为几种假想的类型：**协调型**，阶级整合，互相接受；**分裂型**，阶级之间相互排斥；**冲突型**或者说**斗争型**，阶级关系处于拉锯战中。

在实际研究中，分类观和联系观会有部分重合，这是因为一谈到阶级类别，就不能不谈到区分各种类别的阶级关系，反之亦然。因此，即使完全是对传播业精英阶层进行的研究，也会涉及到他们对劳动者和消费者造成的影响。同样，联系观也会涉及到不同阶级关系所连结或区分的阶级类别。在实践中，这两种观点虽然只是在程度或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具有重要意义。在政治经济学中强调分类的观点，结果之一就是凸现了资源对于阶级的重要意义。上层阶级拥有资源，也就拥有了阶级权力；而这恰恰是底层阶级所缺乏的。这个发现意义重大，但不够完整。决定阶级关系性质的资源分配方式对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涵义，有的阶级试图打破这种方式，有的则努力维持。

同具重要意义的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即根据缺少的东西也可以界定阶级。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缺少对生产资料、再生产资料和分配资料的控制，也就会缺少财富、收入及各种机会，承认这一点很重要。就传播活动而言，缺少对传播工具、大众传媒、电信等的享用机会会造成严重后果，这一点有待我们举例证实。分类观尽管重要，在此也只限于表达这样的结论：低等阶级缺乏能带来权力的资源。一些社会学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把阶级结构看作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阶级序列（上上层、上层、中上层，以此类推），沿着这个序列阶梯往下，阶级所占有的资源也一层层减少。在传播学中，费斯克（1989）最有名的是他专门针对文化资源提出了阶级序列观。他的观点拓展了阶级结构的范畴，也认识到阶级分类界限的模糊不清，但是，对于阶级分类观和联系观之间的真正差异，他所做的，混淆远大于澄清。社会联系观拒绝把阶级类别仅仅看作是真实阶级序列上的人工标签，因此它也拒绝取消阶级分类；它坚持要理清阶级类别间的现实联系，并采纳阶级**形成观**。

阶级形成在结构化理论中是一个核心概念，因为正是在阶级形成的

过程中,阶级结构充当了社会能动力量塑造阶级的媒介。从这个有利角度出发,阶级成了活跃的社会形成过程,这个过程既运用阶级结构的资源,又受其所限。因此,阶级不只是一个相对而言有没有资源(包括传播资源)的类别,它更是一系列变化中的社会关系,变化的原因在于社会能动力量的活动,这种活动运用的正是社会关系的结构,反过来又受到它的限制。与关注类别、结构、社会再生产的观点相比,形成观不那么机械,因为它既把社会阶级看作是社会生活的核心物质力量,又把它看作是社会阶级各方进行社会活动的产物。[13]

由于对分类观的强调,在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分析中联系观和形成观的研究并不多见。这是可以理解的。阶级权力加深了人们的"异化"感。如布尔蒂耶所说,在"权威语言的力量"之下,从属阶级只能

> 不断被迫接受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并把他人的看法和评价谨记心中;他们总是对自己产生陌生感,他们不再是自我评价的主体,也不再是自我信念的核心。(转引自 Mattelart,1983:19)

我们在马特拉的传播研究中发现了形成观的肇始。他认为这是寻求"失落的典范",寻求从属阶级构成自己的方式,这个方式一方面是他们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他们对自身需求和兴趣产生的自觉认识。马特拉(1983)知道要超越分类观是很困难的,因此他选择在西方之外,在西方工人基层传播的传统之外研究大众媒介的使用和流行文化的实践。通过这种方式,他指出了西方之外的人群如何创造他们自己的传播方式,发展他们自己的传播语言,形成他们自己的常识和一般霸权。他们的霸权与统治阶级的霸权平行发展,并不一致,但也为社会行动(包括阶级斗争)提供了独立的基础。政治经济学面对形成观进行的改进只能算是试探性的,虽然已有一批研究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文献开始更直接地介入这个领域(例如:Bekken,1990;McChesney,1992a;Ross,1991;Waterman,1990)。这是一个开始,工人阶级不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或者用罗斯的话来说,也不只是"创造性的接受者,而是大众文化的活跃缔造者"(Ross,1991:336)。我们迫切需要对反主流和非主流的阶级运动加以考察:在拉美、亚非与东欧,大众媒介的创作是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在西方,非主流媒介则提供了有别于资本家霸权的工会会员的、庶民大众的和

---

[13] 凯茨等(1982)提供了社会阶级形成观的绝好范式。

社会主义者的"常识"。这项工作可不是进行浪漫的欢呼,它的要点是——至少是——对历史创造活动的制约条件进行完善的研究分析,以此为参照,验证阶级如何进行自我构成,又如何创造历史。

性　别

政治经济学从社会阶级入手来考察结构化的过程。上一节指出社会阶级分类观的价值,描述了它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同时也指出了在此基础上,如何参考阶级联系观与形成观。阶级概念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中许多研究的基础,向联系观和形成观的转变深化了阶级的内涵,强化了我们的研究。阶级的课题非常重要,但要对结构化进行分析,还需要加入一些同等重要的概念。

社会阶级是通往政治经济学的必经之路,但不是结构化研究的充分条件,至少它没有包括性别问题。用詹森(1989)的话说,在性别问题上存在着"全社会的有组织的沉默"。[14] 如第3章所述,政治经济学在这个议题上还不是像其他理论那样保持了完全的沉默,它典型的做法是把性别作为社会阶级关系的一个方面进行研究。例如,政治经济学在研究信息技术与国际分工时,描述了女性工人在微电子工业中所面对的双重压榨:她们拿着最低微的工资,又忍受着最残酷的工作条件。然而,尽管政治经济学在性别问题上做出了积极的姿态,它还是没有尽可能地将它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Connell,1987)。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这个缺陷,例如,戈尔丁和默多克(1991:30)就对这个领域做出评价,呼吁政治经济学研究关注妇女与媒介的问题:

> 我们需要继续探索人们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与其传播活动的关系。在寻求答案时,记住这一点很重要:"生产"同付费工作不是一回事,它还包括家政劳动。女人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采购、清洁、做饭和养育子女等"影子工作",这对她们与大众媒介的关系产生了根本影响。

将性别纳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会使它得到完善。但是,尽

[14] 詹森特别指出,在信息新技术的研究中没有注意到性别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参见弗里森(Friesen,1992)、雷科(Rakow,1988)和范祖能(van Zoonen,1992)。

管已有关注，尽管这个概念体系的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我们观察到，这方面的努力还是很少。这项工作本来早该完成，这么说是因为关于性别和大众传播的著作近年来已有显著增长（Lent，1991）。接下来我们将从一系列角度出发，试述这个任务应当如何完成。

一个明显的任务是，我们应当考虑性别研究的各种取向，评估它们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相容程度。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的目标不是为性别（或干脆说为女性）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寻找一席之地，这种"寻求女性位置"的观点恰恰是症结所在。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更应当是寻求一种最佳方式，将性别问题理论化，然后纳入政治经济学分析，即寻求达成理论上的共识，即使不能达成，也要找到框架之间能配合的概念和研究地带。德尔文（Dervin，1987）、盖拉佛（1992）、詹森（1989）、马丁（1991）、莫约尔（1989）、罗奇（1993a）等人已经做出努力，试图把各研究取向相互连结。另外，直率的女权主义学术研究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它从对女权主义的特定关怀出发，开始思考女权主义与其他研究取向之间的关联（Dervin，1987；Kramarae，1989：157－160；van Zoonen，1991）。

在诸多性别理论中，与政治经济学取向最能达成一致的是那些强调社会性而不是生理性或心理性的理论。我们根据它们与政治经济学取向结合的紧密程度把它们排列如下：首先，结合最紧密的是那些***以社会阶级作为入手点***的理论，例如从阶级开始考察性别与权力的关系；其次是那些关注***社会再生产***中的性别问题的理论；最后是那些聚焦于***性别与阶级双重性***的理论，即研究父权与资本主义互构的理论。

从社会阶级出发的性别理论强调的是生产体系，并把性别置于其中进行分析。例如，它考察国际分工（无论是按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还是新福特主义定义的国际分工）如何划分了劳动者的三六九等，而把女性置于最底层的非熟练的、依赖性较强的弹性工人后备军中。传播学的阶级分析同样也考察了媒介、信息的生产与分配所涉及的行业中的劳动者等级，在整个阶级分化的体系中考察突出存在的性别分工（Gallagher，1985，1992；Martin，1991）。在传播体系中，媒介享用机会的多寡取决于所属阶级，阶级分析法将性别关系纳入这个传播体系，来考察媒介分享在性别问题上的影响。例如，在贫困人口中享用媒介的机会很少，而性别权力体系又使女性在贫困阶层中地位更低，因此也就使她们更加远离了享用媒介、电信及信息科技的机会。

社会再生产理论推动政治经济学向性别分析进一步迈进。它使我们关注的中心从媒介的生产，或者就媒介使用而言，从受众的生产，转向了

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具体而言，这意味着焦点从工作场所转移到了家庭。家庭是性别分析擅长的领域，但政治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社会再生产理论敦促我们考察资本主义和阶级结构的再生产同社会关系在家庭中的再生产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这个角度出发，媒介通过女性的活动使生产力的能量得到补充，使人们同消费网络联系起来，从而使家庭与生产—消费体系紧密相联，而每一次媒介和信息技术的浪潮，也都使这个消费网络得到强化。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需求、兴趣与欲望，成为娱乐与信息节目的源泉，从而成为推动消费的直接或间接的车轮，于是生产与消费的循环最终完成。

社会再生产理论中长期存在着明显的功能主义。大部分学者都承认，反抗的倾向与形式之间具有矛盾性，资本主义与性别权力并没有必然联系。例如，亚当·斯密、马克思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认识到，资本主义对性别问题(同样还有种族及民族问题)的影响是正反两方面的。甚至就在阶级权力划分了劳动者的三六九等，将女性摒除在外，最好也不过置于边缘的同时，它也消解了许多束缚人类创造力的传统行为。虽然资本主义继续为女性就业划出隔离区，但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也放松了对女性的束缚，使她们获得了受教育、就业及其他社会行为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权利。同样，传播体系在为女性套上消费枷锁的同时，也为她们提供了打破传统角色、行为和价值观的武器。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来说明，资本主义是发展的和矛盾的。正如马克思再次证明的，资本主义在一系列社会关系中都制造了矛盾，例如阶级与性别。资本主义运用阶级权力，力图建造自己理想中的生产与消费的社会关系，但它不能保证这个理想一定实现，这主要是因为，参与其中的人们，不管怎样被扭曲和塑造，他们都具有内省的能力，能按照自己的需求和兴趣采取社会行动。他们认识到传统纽带断裂所带来的机遇，因此积极参与到纽带再造的过程中去。结果是，再生产过程受到了挑战，反资本主义的力量成倍地增长，但也分散开来。阶级和性别都成为反抗的基础，有时它们也统一行动，例如，清一色女性的电话接线员们在电信工会内部组织了女性核心小组，为争取较高的报酬和较好的工作条件进行了斗争。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女性运动内部也存在争论，对斗争重点的争论显示了阶级与性别团结之间的分歧。这种争论反映了在广阔社会中表现得更激烈的矛盾冲突。相对而言，争论的一方强调阶级分化，例如，他们认为首先应当使贫困人口获得更多的传播手段的控制权与享用权，以克服阶级间的不平等；另一方则强调性别分工，例如他们要求在媒介企业中为女性开放主管级职位来达到

平衡。[15] 社会再生产遭到了反抗,但如何去反抗,其中也存在着斗争。

在性别问题上,除了从阶级入手的研究取向和强调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取向,还有一类观点把性别和阶级看*作独立的*类别,认为二者都为社会权力关系提供了基石。从这个立场出发(Hartman,1979),社会**既**是女权主义的,即性别分工的;**又**是资本主义的,即阶级分化的。性别和阶级在社会领域中独立共处,有时互相作用,有时互相建构。盖拉佛(1985,1992)和史蒂夫斯(Steeves,1989)在传播学研究中都阐明了类似立场。史蒂夫斯建立了一个"全球性别问题"的议事日程,指出了父权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互相独立与互相连结。她提到的问题包括:跨国公司如何成了父权与资本主义的共同工具;广告与提出阶级、性别形象观念的社论性和娱乐性节目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性在媒介组织和媒介生产过程中的在场与缺席,等等。她在结论中讨论了对于阶级分化和性别分工如何抗争,以及信息与传播新科技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16] 这个研究取向建立在父权与资本主义双重性的基础上,有利之处在于,它的研究领域比较开阔,使我们不至于在关注一个方面的同时忽视另一个方面,这在资本主义父权研究和父权式资本主义研究中体现得很明显。这个取向面临的难题是所有双重性理论都同样面临着的,例如,如何确定立足领域的特征:父权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二者之中谁是形容词,谁又是名词;又如何确定二者相互作用的性质。另外它还面临一个问题:在没有阶级或性别作为入手点的情况下,该怎样研究二者相互建构的过程?

这三种取向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有关性别问题的思路。它们的长处是相同的:它们运用起来比较简单,可以用于研究传播学中具体的结构化问题,包括媒介享用权的问题、媒介组织中的权力掌握问题、政策决定过程的参与权问题,等等。它们的缺点也是共同的:它们都很少注意社会形成的过程,尤其很少注意人们在大众媒介、社会阶级及性取向选择(如异性恋还是同性恋)的影响下,怎样积极地形成自己的性别。

形成观关注的是性别身份的产生过程。这种性别身份是在社会结构、传播手段、传播产物与能动个体(个体在社会关系中以社会性身份行动)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举个例子,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之间的关

---

[15] 关于女性在大众传媒中职务问题的综述,参见克里顿(Creedon,1993)。

[16] 在另一篇论文中(1987),史蒂夫斯对自由的、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做出了批判性的评价。她认为,自由派的偏向在于"只面向白人、异性恋、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女性发言",激进派(包括结构主义者)过于偏重文本,而忽略了对广泛社会的关注。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是最有希望的,它能够讨论女性经济地位与文化地位之间的联系,即阶级与性别的相互建构。

系人手来考察性别的形成：1.媒介制度，它处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2.电视媒介；3.电视节目；4.受众个体如何理解节目并据此采取行动，这里的个体，有着特定然而变化着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他从媒介中获得的体验，是一种“媒介化”了的体验。这一类分析很少见，部分原因在于它要求研究者的眼界跨越学科界限，从政治经济学一直跨越到文化分析，这的确很难得。最为接近的要算是社会历史的研究了，但是在这里，形成观的任务让位给了对特定历史时期进行具体理解的目的（Peiss，1986）。[17]形成观认为，“社会再生产”一词在描述形成过程时太过简单也太过模糊，它隐含着一个“复制式”的社会发展理论，在文本与社会经验之间主观划定了一条联系的直线。文化分析学者们在这里的进展是提出了文本的多义性，他们指出，从广义上理解，文本包括了媒介产物的整个范畴。但他们还是流于简单化了，也就是说，他们一直忽视媒介产物同它的生产分配制度之间的关系，也忽视了能动个体身上深深的社会性烙印。还有，制度和社会角色的概念不只是为文本和能动个体提供的语境，它们还直指文化研究中制度和社会类别方面的盲区，在齐心协力的形成过程中，它们全程参与。一批关于大众传播科技的社会历史学著作，已经开始纪实性地描述这个复杂的过程，如道格拉斯（1987）讨论了业余无线电爱好对男子气概养成的影响，以此研究科技与性别的交互作用；斯皮戈（Spigel，1989）和阿特曼（Altman，1989）则研究电视与女性气质的关系；还有马丁（1991），这位学者研究了电话对性别和社会阶级的影响，等等。

种　族

为了将性别问题理论化并纳入阶级分析的领域中，我们已经从多个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这为我们更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工作开拓了美好前景。更新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将比传统意义上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容纳更广阔、更深入的社会经验。然而，无论分开来讲还是合起来讲，阶级和性别都未能穷尽理解结构化过程所必需的概念类别，这样讲的部分原

[17] 阿莫特和马赛伊（Amott & Matthaei，1991：6）的研究就是例子。他们指出：“性别、种族—民族和阶级的等级体系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继承而来的，因此，离开历史的观点也就无法充分把握它们。”但他们也认识到，历史也会压制他们所谓的“解放的知识”：“我们能运用不同历史时期的解放的知识，来进行解放的实践，从而掌握我们的共同命运吗？……我们能超越历史，寻求一个全新的、更具可能性的解决方案吗？”（p.356）关于女权主义新闻史学的综述，则请参见奈施密斯（Nesmith，1991）。

因在于它们都没有为讨论种族权力留出足够的余地。

1903年,美国黑人民族主义学者杜伯伊斯(W.E.B. Du Bois)说:"20世纪的问题,是肤色界限的问题。"[13]他认为,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都划有肤色界限,这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分化源泉。这里的分化,既包括国家内部的社会分化,也包括国家之间的分化,即白人统治的富国、强国与世界上其余的弱国、依附国之间的分化。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传播学研究通过考察媒介和信息科技在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广泛地研究了帝国主义问题,但是,传播学将世界的意义扩展为阶级分化的、性别分工的(如对国际分工中女性问题的研究,这一研究虽然少见但不是没有),却没有将它理解为种族分化的。其实,不用非得去注意南非的情况就可以知道,种族分化正是当代全球政治经济大势的多层体系中的主要方面之一。种族既是社会类别概念又是社会关系概念,它对国家和全球资源享用权(包括传播业、媒介和信息技术的享用权)的分散与集中,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种族分类观类似于阶级和性别分类观,它探讨了种族分化在传播业中造成的享用权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方面包括:传播公司的产权和控制权(Tabor,1911);在媒介、信息传播科技业中的任职权(Honig,1984;Sivanandan,1989);传播手段和信息工具的使用权(例子参见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1991年关于电信业使用情况的数据);以及对少数民族的各种看法的媒介表达权(MacDonald,1983;Silk & Silk,1990;Staples & Jones,1985;van Dijk,1991;Wilson & Gutiérrez,1985)。塔博(1991:612)证实了美国广播电视业对种族歧视的纵容由来已久,他举出大量例子来证明广播电视的管理机构——联邦传播委员会对电视业中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采取了纵容态度,例如:

>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白人中的一批超级种族歧视者经营着密西西比一家代号为"WLBT"的杰克逊电视台。每当该台转播的电视网节目中出现非裔美国人,屏幕就被故障信号覆盖,字幕显示"抱歉,线路故障"。宗教界人士和当地群众纷纷聚会,声讨杰克逊电视

[13] 席万那登(1990:13)重述了杜伯伊斯的话,并指出,下面这段论述对于我们的研究具有永久性的核心意义,同社会阶级界限研究也有极密切的联系:"今天,肤色界限是财产界限,也是权力界限。我们是非白种人,我们也就是穷人,是没有权力的人。是资本主义造成这种联系,又是帝国主义使这种联系永无休止。除了一些有成就的黑人精英,非白种人世界里的大多数人都是穷人,又不掌握能改变自己处境的权力。是帝国主义造成了这种命运。因此说,不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就不可能与种族歧视作斗争;不为工人阶级而战斗,就不可能为黑人而战斗。"

台抹杀少数民族权利的行径。然而，联邦传播委员会不顾他们的抗议，仍然有条件地给该台续发了执照。

联邦法院推翻了这一决定，但联邦传播委员会不顾法院判决，还是向该台续发了三年期的营业执照，直至联邦上诉法庭最终裁决联邦传播委员会必须吊销发给 WLBT 的执照（*United Church of Christ v. FCC*, F.2d 543, 549 - 50[D.C.Cir, 1969]）。虽然早在1968年，联邦传播委员会就已经接受了在广播电视业中反就业歧视的法规，但直到1989年才有了第一例该委员会对有照电视台的就业歧视行为的控诉案。实际上，有数据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80年代早期，美国广播电视业中黑人占据的职位比例确实下降了（Honig, 1984:861）。

从全球来看，国际分工的等级体系中不仅包括阶级和性别的因素，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概念，那就是种族。日益以微电子产业和信息产业为界形成的技术和管理人员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背景下也形成了国际分工，在这个过程中，种族也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因素（Sivanandan, 1989）。[19]

种族分化现象在传播工具享用权的分配中也持续存在。许多分析家宣称，因为已有92%的美国家庭安上了电话，大众电话服务差不多已经完成了。然而，根据联邦传播委员会自己的数据，还有大约20%的黑人家庭和拉美裔（西班牙语系）家庭中没有基本的电话设施（U.S., FCC, 1991）。向贫困的黑人和拉美裔家庭扩展电话服务遭到失败，这使联邦政府感受到了政治压力，因此它开始实施电话业中的第一个全国性社会福利计划（见本书第217页）。最后要提到的是，众多研究（Downing, 1988; Jhally & Lewis, 1992; Staples & Jones, 1985; UNESCO, 1983）已经表明，媒介所反映的少数民族形象和角色模式仍十分狭隘。

享用权的种族分化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问题之一。如古特莱茨（Gutiérrez, 1990）所说，传播网排斥了少数民族，就等于排斥了扩展消费市场的大好机会。同样的结论对于阶级和性别也适用。资本主义在市场结构中的一个主要失误就是，在新的讯息和形象可能对旧的主流视听空间产生冲击时，它对于吸纳新人群还是保留旧基础，选择了后者而放弃了

---

[19] 在对种族和变化的国际分工（部分受新信息科技的影响）进行分析的研究领域中，席万那登是一个领导人物；除此之外，他在为唯物主义者的分析辩护时，立场也非常强硬（1990:47）："但是，'当代商品'对于'贫困社会'中的贫困人口，除了标明他们无法拥有它们之外，又能发出什么'社会信号'？它除了指出哪些人拥有而不愿献出，哪些人没有而必须得到之外，又能创造出什么'意义'与'能量'？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人'无论钱再少，也符合以拥有物表明自己身份的规则'，除了那些在滑铁卢大桥下用纸板箱表明自己无家可归身份的人之外，还能有谁呢？"

前者。

在种族与媒介问题上,分类观证实了种族对媒介享用权的各种形式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运用社会联系观和形成观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Barlow, 1989; Dates & Barlow, 1993; Silk & Silk, 1990; Wilson & Gutiérrez,1985)。这两类研究告诉我们,要理解种族在媒介中的结构化,就不能不考虑它的运作方式,包括为获得少数民族在大众媒介中的任职权所进行的斗争;反映少数民族生存状况的非主流媒介的创建;为改变大众媒介中少数民族信息和娱乐节目的内容而施加的压力,等等。同性别领域一样,在种族领域中最有趣的工作也是社会史的研究。萨克斯顿(Saxton,1990)研究了美国白人种族主义的历史,指出了那些经济杠杆,例如奴隶贸易和存在隔离区的职业市场;也指出了那些文化武器,并对民族自卑感和大众娱乐(如由白人扮演黑人的滑稽团说唱演出)进行了学术分析。正是这些经济、文化的因素再造了一系列种族(以及阶级)关系。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白人种族主义具体表现的范畴,它们是一系列社会实务,在种族冲突以及更广阔的政治经济变迁的背景中不断被检验、被挑战、被修正、被整形,这些社会实务自身也就带有了社会冲突的烙印。例如,传统的黑人说唱主义使种族主义得以强化,但是如今它成了社会讽刺力量,尽管小心翼翼,却直接对种族主义展开了攻击。像林肯、马克·吐温、尤金·德布兹这些身份各异的大人物,在萨克斯顿看来,“更多地是白人种族统治中的合作者而非反对派……虽然他们使我们对人性的可能性刮目相看”。另外,在白人种族主义构成和再造的每个阶段,反对派力量都积累了浩繁的反种族主义文献(如非裔美国人中的废奴主义者),极大地动摇了种族主义存在的核心前提。上述讨论都加强了席万那登(1990:3)对于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论断:

> 我认为,把殖民主义看作是单向的,看作是强加于你的东西,看作是把你打翻在地的东西,看作是强大得使你无法招架的东西,是不正确的。总会有一种抵抗力在某处产生,它来自你自己的文化,你的语言,你的宗教。这种抵抗力起初采取的形式,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反抗——反抗一切有违你本性的事物。

社会运动

阶级、性别与种族共同构成了整个结构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要

进行完整分析,按说还应当包括世代和其他过程,这样做的危险是容易掉进多元综合体的陷阱里,导致对各个社会类别的研究平均用力。政治经济学从阶级出发,把它作为一个分类的、联系的、形成的概念,考察它如何与性别、种族一起相伴形成。这个研究取向很有价值,但也隐含着另外的风险,使人容易对这些概念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及如何合为一体产生机械论的认识。哈拉威(Haraway,1991:129)从女权主义学说的角度出发,指出了将阶级、性别、种族三者联系起来的艰难性,号召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几何学:

> 似乎很少有女权主义学说把种族、性/性别和阶级放在一起分析,虽然这正是各种肤色的作者们在著作前言中所表达的美好意愿。对女权主义学者而言,研究性/性别体系有充足的理由,而研究种族/性别体系的理由也同样充足,这两者可不是同一**种类**的分析。何况还有阶级呢?种种迹象表明,建立一个涵纳"不同要素"的理论已是大势所趋,这个理论的几何学、典范和逻辑要冲破二元论、辩证法和各种自然/文化模式的藩篱。否则,三个要素总会化简为两个,很快又会变成一个,站在前列孤立无援。更别说纳入四个要素了。这些在政治上至关重要。

哈拉威的观点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很重要,这么说只是因为她质疑了各种本质论,包括阶级本质论、性别本质论以及种族本质论。但她的悲观情绪也表现在她对一些非本质论研究的论述中,这是不应该的。比如我们现在进行的讨论,从人手点出发,进行多重测定,就避免了本质论。虽然本书对于考察阶级、性别、种族等社会关系的研究更为乐观,但也相信,对一般政治经济学框架内的另一些形成方式进行考察,也是非常有益的。两个可能的研究焦点是***社会运动***和***霸权***社会关系。

围绕社会运动进行的分析,通过关注社会力量和社会行动,具有了超越传统社会类别的有利之处。社会运动使不同身份的人走到一起,或多或少地为了一个具体的兴趣联合起来,以反对既定的统治关系,寻求它的变革。社会运动能使同一阶级地位的人走到一起,如工会主义者、穷人、商界精英;也能使人们因为性别问题联合起来,如女权主义运动;还能使种族问题在这儿起作用,如美国人权运动与黑人权力运动。除此之外,社会运动还能调动以其他身份分类的人群,如年龄、国籍等。然而,社会运动之所以成功,通常是因为它们能够超越特定的身份类别,以一种具体的

利益或目标将身份各异的人团结在一起。

最近几年，以所追求的共同利益或共同目标来取得认同的社会运动引起了大量关注。它们不排除对社会类别的关注（女权主义运动可能是最强大的社会类别运动），但主要认同特定目标的一致。这些“新社会运动”中包括声势浩大的环保运动、和平运动、健康方面（尤其是反艾滋病）的运动、性方面（同性恋解放）的运动等等，它们团结了跨越传统社会类别的人群，为关注非传统社会类别打下了基础。

新旧社会运动之间的界限并非铁板一块，但许多学者却花费了大量精力去辩论哪一个在政治上更优越。一些人认为，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得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另一些人则反对这个立场，他们认为，一种后福特主义或后现代意义上的信息经济已经消解了阶级等类别的重要意义，社会运动更应该在一个普遍的目标宗旨之下把身份各异的人团结在一起，例如全球生态问题。旧的社会运动观的侧重点，正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社会类别，而那些呼吁注意力转向新运动的观点，则侧重文化意义上的认同，包括各种媒介（如电视、摇滚音乐会、嗜好杂志等等）的力量如何形成了新的文化链条，又如何使其中一些文化链条发展成为全面的社会运动。不幸的是，虽然关于新型社会运动的研究文献已经开拓了新的基础，但是*打破*旧基础占去了太多的注意力，以至于共同的基础得不到重视，新旧社会运动联盟所凝聚起来的政治潜能也因此得不到重视。无疑，对生态、和平、性别以及性的关注，为20世纪后期较重要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基础，然而，如某些学者所言（Luke，1989），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再是阶级分化的了，更不意味着劳动不再是重要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组织中的力量，同样也不意味着工会主义已经毫无政治意义了。除了关注政治活动的过程，社会运动观的可取之处尤其在于它抛弃了对新旧社会运动分类先行的错误观念。

社会运动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尤其重要，因为它已经影响到了传播的手段和内容。所有社会运动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组织对内和对外传播的问题，并因此发展自已的传播战略和传播政策。其中最突出的议题包括：***民主化***如何才能成为组织内部传播的准则；社会运动对外传播采取的主流形式的范围；一项运动采用媒介行动的特殊化与专业化程度，等等。吉特林（1980）的著作在这里特别重要，他指出，社会运动的媒介政策不应当与它的根本宗旨有所抵触。美国学生的反战运动就是在允许它的领导人成为媒介人物之后失掉了民主的精神支柱。对于围绕媒介生产和媒介政策进行的社会运动，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本身也做出了贡献。世

界范围内的非主流媒介运动已经向主流的媒介形态、媒介技术、媒介传播的形象与讯息提出挑战。这个运动包括人力密集的扫盲运动,街头剧场,非主流报纸、录像带和电影制作,卡通运动,公共有线电视计划,非主流电脑网络,录像带盗版,电脑黑客,等等。它们向既定的媒介形式挑战的方式又有所不同。一些方式,如古巴、尼加拉瓜等国的扫盲运动,除了政治意义和实际必要性之外,还对技术密集型的传播与教育形式提出了质疑(Mattelart,1986)。此外,录像带盗版和电脑黑客等则向传播工具控制权的集中化提出了挑战(Balka,1991;Hafner & Markoff,1991;Rheingold,1993;U.S.,Congress, Senate Commitee on the Judiciary,1991)。还有一些方式,如非主流报纸和公共广播有线电视,提供了与主流根本不同的讯息和形象(Goldberg,1990;Jankowski 等,1992;Pizzigati & Solowey,1992;Ryan,1991)。

社会运动的另一个成果是有组织地向统治性媒介政策提出挑战。围绕"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而组织的运动针对媒介决策的主要形式,尤其是针对西方跨国公司控制主要传媒生产与分配的状况所做出的国际性的努力,可以说是最具有重要意义的(Traber & Nordenstreng,1992)。在麦克布赖德圆桌会议中,在为争取将传播权纳入国际组织承认的基本人权所做出的努力中,这个运动今天仍在继续着。

还有大量社会运动针对的是国内及地方性的政策制定过程,其中包括力图促进执照颁发、电波分配、产业结构及媒介内容的民主化。在美国,这类运动尤其强大。在电报和电话业的发展上,斗争十分密集,它们由工会和乡村政治团体领导,要求将电报、电话业公有化,至少也要遵循公共邮政服务的旧例,在电信业发展中保障社会控制(Duboff,1984;Stone,1991)。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也有类似的斗争,以新兴组织如工会和教育界同仁会作为先锋,力图促进公共广播电视的发展,同时要求对商业频道加以强硬的法规管理(McChesney,1993)。

人权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为广播电视改革运动注入了活力。前者通过法庭裁决,为代表普通公众利益的社团赢得了合法地位,而在此之前,联邦传播委员会这个联邦的管理者认为,这类社团的存在对于它的权力是一种妨害,因而拒绝承认。女权主义团体加入了她们的人权伙伴的阵营,对既存的实际雇佣状况和有辱人格的节目展开攻击(Creedon,1993)。在这些左翼运动的鼓动下,右翼也组织了自己强大的媒介运动,攻击那些他们认为有违道德的节目(Montgomery,1989)。如今,互动媒介引起了广泛兴趣,尤其是美国政府制定政策,要发展全国"信息高速公

路”，更是引起一片沸腾，这又给强调公共利益的媒介革新运动注入了新生命。1993年，六十多个非营利性的消费者、劳动者和人权团体联合在一起，宣布成立“电信传播政策圆桌会议”。这些团体中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美国图书馆协会、美国公共电视台协会、媒介教育中心、美国消费者协会、社会责任电脑专家会、拉尔夫·纳德尔(Ralph Nader)的公众社，等等。他们联合起来发出倡议，要求实现信息基础设施的普遍享用、传播活动的自由化、政策制定的民主化以及对个人隐私权的保障等权利。

霸　　权

霸权，即在社会中制造常识和“理所当然”的现实的过程，提供了结构化过程的另一个方面。这个概念在西方学术界获得显著地位主要是通过葛兰西的著作，他以霸权为核心特征建构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以理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轮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社会的控制，更多地是建立在**同意**(consent)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身体的压制上。霸权的概念定位于**意识形态**(ideology)和**价值观**(values)两者之间。意识形态主要指的是对社会现实进行蓄意扭曲或错误再现来发展特定利益，维护权力体系；而价值观则是一些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联系着社会上身份、阶层各异的人群。霸权不同于价值观，它是因一定政治目的而形成的；但它也不同于意识形态，它并不反映对形象和讯息所做的工具性扭曲。霸权是形象和信息持续成形的过程，它绘制了一幅常识的“地图”，上面标着社会的、文化的坐标，指定着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足以充分说服大多数人。因此说，霸权比意识形态更有力，它不是单单依靠阶级权力强加于人，而是在社会中，从社会关系交织成的动态的权力几何体中**有机地**生长出来的。

可以说，最有力的霸权观，就是认为霸权可以自己生长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中已经存在一系列文化与社会的实践、观念和解释，这是自然发生的而不是由社会构成的***既成事实***。这些实践、观念和解释被当作本质要素，存在于自我形成的过程中，存在于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发展中，也存在于自我与社会在社会—历史经验的认知地图上进行定位之时。所谓的***传统***，在霸权构成过程中是一个有力的武器，自然主义的光环给予了霸权观念跨越历史的性质。霍布斯班(1983:1)试图驱散这个光环，他描述了“杜撰的传统”，并指出，诸如英国君主制中的繁文缛节，看上去“年代

久远，联系着无法追忆的过去”，实际上也是杜撰的。这些礼仪不过是：

> 一系列实践行为，它们通常具有明显的或默守的规则，具有仪式或象征的性质，力求通过反复来向公众灌输特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种反复就自动暗示了它的历史继承性。

传统使人们植根于神话般的过去，又使这种神话无须经过现实的验证，从而给了它穿越历史的力量。杜撰传统是制造霸权的核心社会过程之一，而制造霸权的另一个方面，却是在传统之外寻求自己的生命，即波兰扎斯(1978)所说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个体化指的是，资本主义将集体的类别与身份转化为个人主体的类别与身份，从而消解了阶级、性别、种族及其他形式的能量集合体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女性和黑人就这样被瓦解为一个个单独的主体了。

霸权具体表现在人们广泛接受的一系列实际观念中，这些观念诸如：市场是生产型经济的支柱；投票选举是实行民主的主要手段；新闻的客观性就是在一个议题上展现两种观点；等等(Goldman & Rajagopal，1991)。它们以及其他的霸权观念(自由市场、自由选举、自由报业、信息自由流通等)既不是政治上中立的价值观，也不是由上而下实施控制的意识形态工具。它们从组成阶级、性别、种族等层次体系的社会关系中发展出来，构成了日常生活的通用常识。

葛兰西的霸权分析不可避免地与他的政治计划相联系。他想要重新引导反对资本主义、要求发展民主社会主义的运动，使它摆脱以革命行动、直接军事进攻和先驱领导为核心的政治策略。按照他的策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要求发展反主流的和非主流的霸权，使它构成日常生活中新的通用常识，在经过斗争和“立场之战”后，取代资本主义霸权，成为公众的本来态度。葛兰西的不同寻常之处不在于他用文化策略去**取代**政治策略，而在于他拓宽了革命政治行动的内涵，使之包括了文化和语言领域内的社会斗争。

霸权观念的力量如此强大，它怎么可能实现葛兰西所说的转型呢？一旦认识到主流霸权所具有的动态发展力量，更使我们对这个任务能否完成感到气馁。随着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主流霸权总会呈现出新的形态，比如：它从国家霸权扩展为各大洲乃至全球性的霸权集而；它将以往的反主流观念(如形式上的男女平等)纳人了自己的统治格局；它还重新发展了一些观念，例如关于社会福利和私人慈善事业的观念(Golding

等,1986)。

尽管主流霸权的力量甚至使有的人想像到了“历史的终结”(Fukuyama,1992),但我们也能有力地论证这样的观点:霸权并非不可攻克的壁垒。的确,霸权甚至比意识形态更强大,因为它的基础是同意,而不是压制。但是获得同意需要极高代价,要有广泛而持续不断的形成过程,要让人们自愿接受统治阶级的观点并认为这理所当然。霸权的力量与资本的逻辑不同,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也不同,与体现在天然统治权中的价值观也不同,它是从社会关系中来的,需要各阶级、各性别、各种族以及各个层次体系的人群达成一致。一旦获得一致,“同意”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控制方式,但**争取**同意的过程中就有可能潜存着反抗和非主流常识。因此,虽然霸权是社会关系得以结构化的核心手段,但霸权并不能保证社会关系的再造仍按原来的轨道进行。霸权要经过一番抗争才能实现,这个过程虽然置于马洪(1980)所谓的“不平等的再现结构”之中,但已经给反主流的和非主流的霸权留出了充分的余地。

政治经济学的两个主要任务是确定主流霸权不稳定性的根源和对反主流与非主流霸权所采取的各种形式进行评估。前一个任务中包括找出常识与现存经验之间的差距。资产阶级霸权的一个核心缺陷就是,它要使人们达成这样的共识,即资本主义能带来普遍的物质丰裕,但人们面临的现实却是:贫穷。即使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带也是如此。许多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人不同意以下的结论,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制造了贫穷。他们中有的人提出了**贫穷文化**(culture of poverty)的解释,认为各阶级都拥有自己的文化和社会实践行为,如果不是因为穷人中存在一种“贫穷文化”,他们的价值观、工作习惯、家庭与性行为以及金钱观存在着问题,那么资本主义标榜的高效生产和平等分配早就实现了。贫穷文化论的极端发展,就成了种族主义的学术光环,它认为,黑人、拉美裔和印第安裔只有克服了他们的社会倾向和文化倾向,才有可能走向发展。

另一个大受欢迎的辩护理论是“**垂滴说**(trickle-down)”,按这种说法,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本来只有利于富人的经济体系和经济政策必然会向下“垂滴”,使整个阶级结构都能获益。这实际上是一个普通辩护理论的变种。这个理论建立在短期—长期差异观上,它宣称,在只有短期效果时(一项决策只对某个团体有利),长期的效果将会达到均衡。康潘(1986)援用垂滴说来为目前的信息与传播资源的分配制度辩护,他对科技史的读解使他得出结论:就长期来看,资源享用权终将会在阶级分化及其他社会分化的群体间达到平衡。

与这些方式不同,主流霸权自我保护的方式是:自嘲。它摆出一付超然的姿态,表示自己对常识与现存经验之间的落差知之甚详。正如米勒(1988)等人证实的,电视就是这种自嘲的最佳工具,它通过愤世嫉俗的叙事者或叙事线索使受众得到安慰,一提到常识与经验的落差,它的反应是:早就知道啦,它的确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没人想向我们隐瞒啊"。最后要提到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是:不直接保护,而是通过大量有吸引力的娱乐和信息节目转移观众的视线,进行间接防护。这种娱乐与信息节目大部分是与常识—经验落差无关的,它暗示观众:想些别的事更好,或者最好干脆什么都别想。

威廉斯(1980)发展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提出了文化和媒介实践中的**反主流**(oppositional)和**非主流**(alternative)霸权观念。这两种霸权形式都要求新型的知识领袖与既定传统和革命传统有所不同,要求他能抛弃分析与政治实践中的分裂,抛弃理念与技术的分裂,抛弃思与行的分裂。对葛兰西来说,这些领袖品质正是组成整体的"有机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的,他们因此能够发展反主流和非主流的霸权。反主流霸权采用信息传播、戏剧、滑稽喜剧等已有悠久传统的形式(Buhle,1987),它攻击主流霸权的弱点,撕下了掩盖其矛盾的光环。这些进行反抗的文化实践不一定意味着非主流霸权,但它们的成功使非主流霸权的产生更加容易。非主流霸权,或直言不讳或暗藏玄机,采取的形式也有所不同。它描述了认识社会生活的不同方式,并向人们指出,思考这种认识差异并通过行动促使它实现,不仅是值得的,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样,霸权概念建立了广阔的组织原则和组织过程的基础,提出了理解结构化的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与前一种(从阶级、性别、种族、社会运动的构建过程来思考)有所重叠,互为补充,又互相独立。

结　论

我们从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三个过程入手,讨论了反思与更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不同方式,现在到了该得出结论的时候了。我们的讨论拓宽了从政治经济学层面思考传播学的基础,但我们向外关注时,却止步于政治经济学的邻近领域。下一章是本书的结论,我们将超越邻近领域,走向与政治经济学接壤,但却属于不同学术地带的那些学科。它尤其要接受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来自政策科学,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或者说实

证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来自文化研究。决不能说这是有关观点的最终总结,它更是一次尝试,试图确定有益的交流区域,使传播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在反思和更新之际得到更多的学习。

第 7 章

挑战边界:文化研究与政策研究

应不应该对人文科学、人类科学之中的既存分歧进行更广泛的重组,使之重新界定、重新协调成新的状态?在一种由于某些原因而凝滞(实际上是被钳制)的大气候中,这是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们能够做到,也必须做到的是公开地澄清那些主要的、优先的知识课题。

(Williams,1981b:65-66)

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的奇特合流。这两种倾向:一种是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超级理性主义,一种是后结构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理性选择派的抽象概念是典型的分析哲学,它自诩非常巧妙地摆脱了历史进程的不确定性波动,在这一点上它耐人寻味地与来自相反阵营的非理性主义者的"历史消解"主张达成了一致。二者被推上了脱离历史之锚的政治学孤舟,博弈论的选择加上后现代的偶然性,构成了政治唯意志论的矛盾统一体,其中雄辩和演讲成了历史变革的推动力量。它们同时还被推向犬儒主义的失败论,认为任何激进的变革计划都注定要走向失败。

(Wood,1989:88)

引言:界限

以上三章将视线投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内部,通过评估这个学科的核心问题和核心观点,指出了如何对它进行反思和更新。更新的任务也要求我们把目光投向这个学科之外,去考察它和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应当承认,描述学术界全貌的方式不计其数,政治经济学可以同社会学进行比较,也可以同政治科学、经济学相比较来研究。考虑到我们所确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我们在定位该学科时,一方面要把它与文化研究对比,另一方面要把它和政策研究对比,这是最为实用的。我们已经认识到,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认识科学,学科间的界限都是难以确定的,因此我们在本章做出结论时,将会把政策研究和文化研究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两个不同取向,它们提供了与政治经济学不同的思考方式。本章不会冒昧去对它们进行全方位的评论,实际上,这两个领域的文献中自有出色的概述、分析和批判。本章旨在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分别与二者展开对话,以期丰富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和更新的研究过程。除了这个主要目标,本章也从文化研究和政策研究内部及两者之间出发,指出其长处与缺点,这是对这两个取向进行不断反思的过程中的基本组成部分。①

多年以来,学者们已经确定了传播学内部分支的主要界限,包括行为学派与规范学派的区别,行政管理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区别。最近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之间的区别又引起了大量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文化研究在过去三十年中得到了充分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传播学研究,对各个研究取向(包括政治经济学)的假设、方法和结论都提出了根本质疑(During,1993a;Grossberg,1991;Grossberg 等,1992;Johnson,1987)。另外,传播学研究既然往往植根于大学中的艺术与人文学科,它理所当然要同文化研究进行对话。因此,为了在传播学研究中确立不可动摇的政治经济学取向,迎接文化研究的挑战势在必然。

然而,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一方面要不打折扣地与文化研究进行系统对话,另一方面要对自己与政策研究的关系作批判性的评估,二者同等

① 在此之前格罗斯伯格(Grossberg,1991:155)已经指出:"要点不是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虽然这种选择在所难免),而是对两者联盟与合作的新形式进行界定。"

重要。对于后者,虽然传播学者们的关注已有显著增长,但系统性的反思仍未做出。对政策研究进行定位的方式有多种,本章特别把它看作是多元政治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统一体,它的目标不仅是解释行为,它还怀着对规范的兴趣,要对行为的政策方针进行评估并提出建议。这多元化的一翼已经占据了政治科学和公共政策研究的主流。最近,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他们的核心假设、类别和理论,转移了政策研究的重心。结果是,标着公共选择理论或实证政治经济学等各种名称的研究取向,现在已经在政策研究的核心地带占据了重要位置,几位这方面的学者也因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蜚声国际,其中有一位,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就致力于研究传播政策的核心课题。

文化研究是基础广泛的知识运动,它集中研究文本中的意义的构成,而文本的概念很宽泛,几乎包括了社会传播的各种形式。② 文化研究从多个方面发展而来,其中一方面的驱动力来自反对学术正统的力量,这种学术正统特指按学科经典著作来组织知识的观念,例如在英国文学研究中的学术正统。③文化研究现在也有许多流派和分支,从内到外,纷扰不息。④从一开始,文化研究就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在英国文本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文化被视作与社会关系紧密相连,围绕着阶级、性别、种族,特别是围绕着它们的不对称与对抗关系展开。马克思主义关注权力,尤其关注界定了需求和利益并使之实现的权力,这对文化研究也产生了影响,例如,在汤普森(1963)和威利斯(1977)的著作中,就首先考虑文化在阶级关系中的建构作用。马克思主义关注所产生的影响也反映在性别问题的研究中,伯明翰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就据此提出了研究计划(CCCS, Women's Sutdies Group, 1978)。最后要提到的是,还有一种观点在霍尔(1980,1982,1989b)等人的著作中尤为突出,他们认为文化既不是独立

② 参见伯吉斯(Burgess,1990),他运用实例讲述了文化研究如何影响了传统地理学发展的核心议程,并指出,这是每个学科几乎都要重复的发展之路。

③ 文化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否认这个研究领域是一个学术科目,因为它本身就致力于对学科基础进行质疑,尤其反对知识教条化的倾向。用约翰逊(1987:38)的话说:"文化研究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制造有用知识的炼金过程,一旦将文化研究整理成典籍,就等于中止了炼金的化学反应。"威廉斯(1981b:53)也指出,文化研究的知识源头,正是对英国文学研究中经典著作的质疑:"这里的顺序,首先是限定在已出版的文本中,其次,范围缩小到被认为是'有想像力'的著作,最后才是小心谨慎地批判确定的少数'经典'文本。随之进行的是另一个更强劲的专门化过程:不是'文学',而是特指'英国文学'。"

④ 举个例子:朗(Long,1989:427)观察到英国文化研究中的女权主义核心问题在美国学术界被消解的倾向,对此提出批评:"我被这个国家(美国)的这种方式震惊了。在对英国文化研究进行总结和概述时,女权主义学者的地位被置于边缘,这是一种排斥。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文化研究中的女权主义在被美国女权主义学者援用后,可以说恰好为美国的文化研究保持批判姿态提供了最佳机会,这是因为她们同广泛的社会运动相联系,也是由于她们在学院里表现出了这方面的特质。"

的,又非外力所能决定,它应当被看作是社会差异、社会斗争和社会冲突的领域。实际上,研究者已经指出,英美文化研究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采取了更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普遍的政治立场。美国文化研究虽然分支众多,但可以说,它更倾向于从社会与政治多元论中汲取灵感,把权力视作广泛扩散物;又从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社会学中汲取灵感,集中研究文化实践如何在社会生活中维持秩序,保障协调;它还从社会心理学中的符号互动论汲取灵感,运用仪式和戏剧的语言来考察符号社区的生产与再生产(Carey,1979)。美国的文化研究因其"肯定性"而独树一帜,这主要是指它对美国文化的全貌(特别是文化的受众)作了非政治性的、肯定的评估(Budd等,1990)。⑤

文化研究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更新工作在几个方面有所助益。它领导着对实证主义的广泛批评,强调知识的主体构成和社会构成。从雷蒙德·威廉斯(1961)和理查德·霍加特(1957)的著作开始,文化研究将文学批评从对经典文著的分析推向了对日常生活的分析。⑥具有特殊意义的是,这些作者力图拓展文化分析的实质性内涵,他们的前提是,文化是普通日常生活的产物,由全体社会角色共同创造,而不是只由特权精英们创造。另外,虽然历经冲突和重心转移,文化研究仍坚持的一点是,社会也是经过性别和民族的分化与认同而构成的,正如它是由社会阶级所构成的一样。⑦

政治经济学能从这些新的开端中获益,反过来,它同样有助于文化研究的再思考。甚至就在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取向接受了主体性,并体现出更广阔的包容性时,它还是坚持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坚持历史研究的价值,坚持从具体的社会整体来进行思考,坚持道德上的义务,坚持要克服社会研究和社会实践间的差距。因此,它同潘什克斯称为"主体的自恋"的文化研究倾向划清了界线,因为这个倾向拒绝以历史实践和社会整体作为思考的依据。政治经济学也同采用专业化语言的文化研究倾向划清

---

⑤ 布德等人认为美国文化研究有五大致命缺陷:"首先,它高估了受众在接受时的自由度。其次,它简直无视政治经济学所分析的受众的商品化性质。第三,它无法区分大众广告与专业性媒介。第四,它将积极的接受与政治上的积极行动混为一谈。最后,它把偶然发生的对立亚文化中的进步读解当成了普遍情况(Budd等,1990:169)。"这些批评是社会学内部政治经济学派与诠释学派世纪大辩论的延续。加里吉(Garragee,1990)回顾了这场辩论在格德纳和吉登斯等人著作中的最新展现,并在传播研究中加以借鉴。关于各种受众研究流派的描述,请见林德洛夫(Lindlof,1991)。

⑥ 威廉斯(Williams,1981b:65)坚持把这个转变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它反对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特殊化,使之成为独立的价值源泉;它坚持认为,文学的活跃变化,应当同发生了的和正在发生根本性冲突的历史进程相联系。"

⑦ 费斯克(1989)肯定了把社会根本冲突由阶级扩展至一系列类别的社会学传统,他提出了一系列"主体性地位",包括自我、性别、年龄群、家庭、阶级、民族和氏族。

了界线,因为它有违文化研究应当为构建社会的普通人所享用的初衷。最后,政治经济学还同热衷于考察消费的社会“生产”而拒绝研究劳动者和劳动过程的倾向划清了界线,因为它造成的后果是否认劳动者在当代社会变革运动中有任何价值(Luke,1989)。

政治经济学也从政策科学的发展中获益。政策科学的研讨范围很广。它有两个重心,它们在各自的轨道上围绕了一系列研究取向,与之相辅相成。一个核心把分析重点放在以**国家**为首的政治分析上,另一个偏重**经济**,目的是在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推行所谓的新古典主义(Posner,1992;Stigler,1988)。传统地来看,政治经济学试图从特定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态来“读解”国家等上层建筑,因此,它能从对国家构成角色的严谨研究中获益。另外,政治经济学和政策科学都对分析社会整体感兴趣,以期推进社会改革。然而,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与政策科学的多元政治分析倾向划清了界线,这种倾向把国家视作独立仲裁者,认为它使广泛的社会力量达到了平衡,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主宰全局。政治经济学则坚持认为,资本具有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以及商品化过程是社会分析的必要起点。政治经济学还抛弃了政策科学中把社会整体分析和引导社会改革的价值观建立在个人主义和市场理性之上的倾向。用加汉姆评论威廉斯(1988:124)的话来说,政治经济学坚持“过程中的社会整体观”,坚持从阶级形成这样的社会过程入手,以社区和公共生活反对市场,反对再造阶级强权的理性观念。

他山之石: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拓展了认识论,使它超越了实证主义和本质论,容纳了社会建构论的知识观点,这在前几章已有讨论,在此不再进一步阐述。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建构论一旦到达极端——后结构主义的著作就是当之无愧的极端之作——它就会陷人相对主义,很少承认(如果还承认的话)分析成经验的确定性。

就其本质来看,与文化研究最为接近的对文化的看法是把它当作一种普遍的、日常生活中的产物,被广泛地生产、分配和消费着。因此,文化不再限定于那些由精英创作的、多年来被尊为文化经典的作品。这个观点为正规的批判分析打开了娱乐和信息媒介的整个范畴,包括了电视情景喜剧、大发行量的通俗小报、滑稽浪漫故事、好莱坞大片等等。更具重

要意义的是，文化研究把大量生产和分配的素材同大众文化、大众作品区别开来，后者是在相对民主的条件下（强调广泛参与和平等）为争取民主的目标而创作和流传的。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文化研究反倒经常用一些术语把自己弄得很学院化，换句话说，比较难以接近。它的术语在文化分析与文化工作者和消费者之间制造了不该有的隔阂，而这些人本来最有可能从这些分析中受益。我们当然不否认学术研究中概念精细化的必要性，对运用复杂理论术语的要求也无可厚非，然而，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某些文化研究著作是如此地难以接近，如此地限制在专业学术读者范围内，以至于任何民主化的梦想和鼓舞力都不可弥补地丧失了。⑧当然这毕竟不是核心问题，除了这一美中不足之处，文化研究倒是提醒了政治经济学关于研究实质的问题。普通人追求着生活的意义，即使他们面对的制度化和象征化的世界完全不是他们所创造的，而是更多地展现了非他们所能控制的异化的力量，他们也仍在努力追求。这种追求的需要、目标、抗争、失败与成功，正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实质所在，也是传播分析的根基所在。

文化研究的另一个贡献是扩展了批判工作，使它超越了阶级分析，包括了女权主义和那些新型社会运动（例如和平运动和环保运动）所激发的研究。它还提醒政治经济学，虽然社会阶级是核心的分化界限，或者从本书的观点来看是一个起点，但是，构筑了结构化进程的是各种互相重叠的层次体系。虽然文化研究的极端观点认为，当代生活中的政治就是找寻特定的身份认同，并为这种瓦解了反对派政治的认识而欢呼，这一点为政治经济学所不取，但文化研究进一步认识到，社会能动力量的多重形式充溢着潜能，每种形式都带来了主体性和自觉意识，这一点可以说对政治实

---

⑧ 请思考哈佛大学研究非洲—美洲问题的教授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 1989: 44 - 45）的一段话。他通过回顾自己在课堂上尝试操作经典时的痛苦经历，考察了形式文化分析的失误，即它们的“异化策略”。这一段话较长，但值得引用：“我最初有一次是在学院的优等生研究班上讲课，面对一小批听众。我所犯的错误，永远也不会再犯第二次。那时我刚从研究生院毕业，还沉浸在当代文学理论那些神秘莫测的术语中。我打算对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关于奴隶的叙述进行一次干脆利索的结构主义分析，追踪其错综复杂的‘二元对立’的游戏。一切都有条不紊地作了图解说明，确定了形式，并分析出来。这是我最好的一次结构主义分析，简直像我最好的礼拜服一样层次分明：笔挺的白衬衫，锃亮的黑鞋子。你肯定从未见过那么迷醉的听众。在酣畅的分析之后，我讲完了；当然，也请听众提问。‘喂，老兄，’坐在最后排的一个年轻人打破了本来令人安心的沉默，‘我们就想知道，到底布克·T. 华盛顿是不是一位汤姆大叔？’”

后来，盖茨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比我的讲述有趣得多”。它提出了文体的政治问题，关于一个人为另一个人讲话为的是什么，关于怎样区分合作与微妙的颠覆。总之，盖茨醒悟了：“在他们讲述的传统和我们所评论的他们的讲述之间，存在着正在扩张的裂痕。”他意识到了文本和生成文本的经验之间存在着的差距。

践生死攸关,却也很少被政治经济学分析所关注。[9]政治经济学专心研究文化被生产和构成的多重方式,把它看作商品化过程中动态规律的产物。文化研究对此提醒说,这个研究还应当包括"资本家及其他社会关系在现存语言和交谈规则中造成的间接影响,尤其是阶级斗争和性别斗争的影响,它们都造成了不同的社会符号和信号"(Johnson,1987:55)。文化研究隐隐约约地认识到,仅靠资本逻辑分析得出结论,或单单以阶级分化为中心来组织抗争,都将是徒劳。然而不幸的是,当文化研究转而寻求社会几何体和抵抗运动的新形式时,它的行动过于草率、简单化,除了几个重要的例外,大部分文化研究都彻底抛弃了旧有形式。而这些建立在阶级尤其是雇佣劳动基础上的旧形式,对于理解社会生活并促进改革却正具有核心意义,这一点政治经济学已经准确认识到了。

政治经济学关注宏观社会的权力组织,并发展了用于此类研究的方法论。虽然文化研究基本上没有对权力问题作同等思考,但也有例外,有些研究侧重考察了地方性权力组织,集中研究权力如何共同构成"交互主体性"。此外,虽然一些文化研究分支几乎只关注"文本",选择从文本中"读解社会",但另有一些分支汲取了人种志的方法论,专门研究文本(包括媒介)接受与使用中的社会关系(Morley,1986;Radway,1988)。这个可观察到的转变也没有免遭批评,人们指责它在运用人种志方法时表现得力不从心,还有,它赖以概括结论的论据也很有限。例如,伊文思(Evans,1990:154)就说,许多此类研究"通常并不是沿用传统的人种志方法",他进一步指出,这些研究"采用一次性的、无限制的、自我讲述式的访谈方法,偶尔才采用系统观察的人类学方法"。而加里吉(1990)直斥人种志,认为它并不能算是系统的方法论,而竟然有学者直接通过它得出结论,认为受众同生产、分配文本的公司一样都是文本的缔造者。文化研究对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有益的批评,提醒它注意权力的地方性和交互主体性;它还指出观察法可以应用到权力研究中;除此之外,文化研究也直接丰富了政治经济学对权力的理解。[10]显然,一些运用人种志进行文化研究的学者也认识到了此类研究的局限,他们呼吁在研究中把全球性和地方性联系起来:

---

⑨ 文化研究经常运用这些概念进行具体界定。例如约翰逊指出(1987:43):"文化研究的对象是自觉意识或主体性的历史形式,或者说是我们生活的主体形式,又或者冒险缩小范围来说,是社会关系的主体性方面。"约翰逊又进一步把这种界定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传统,尤其是他们的早期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在此之后,他又提出了与笔者的政治经济学理念极为一致的观点,他说:"在我看来,文化研究的最终客体,不是文本,而是时刻流传着的*采取主体化形式的社会生活*,其中包括它们的文本化体现。"

⑩ 关于政治经济学对人种志的反思,参见潘达库尔(1993)。

> 人种志研究若要合理而敏锐地考察当代文化状况的特性，就要超越狭隘的地域眼界，同时还要确立这样一种意识，即生产/分配同消费之间、一般与特殊之间、全球性与地方性之间都存在着不对等状况，而这一切又是互相关联的。(Ang,1990:251)

他山之石：政策研究

政策研究主要汲取了多元政治科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果，对社会活动(包括传播)的不同过程进行分析和评估。这个研究取向中最主要的一翼是**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它既是***实证政治经济学***又是***理性预期观***，它的直接意图是把正统经济学研究的工具移用到政治科学中，以创建一门政策科学(Alt & Shepsle,1990;Brennan & Buchanan,1985;Buchanan,1986;Buchanan & Tollison,1984;Posner,1992;Stigler,1988)。公共选择理论明确地把这门科学的座标定为市场、个人选择和私人利益。市场提供了所有集体行为的结构模式，包括企业的、政府的、志愿者联合体的、利益集团的以及家庭的结构模式。规范性判定的基础是这些行为模式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经济学理论中理想的、完美的市场模式。集体被化简为个人选择的总和，不管怎样描述、解释和判定这些个人选择，它们都反映了私人利益。没有个人所属的社会或社会团体，也没有整体会大于部分。研究个体也就得到了集体行为的资料，因为结构也不过是为了方便描述个体追逐利益的全貌而杜撰的。这个理论还使私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它一开始就认定，人首先是个人私利的追逐者。根据布坎南(1986:6)的总结，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教诲"就是："人在政治场合同在其他场合一样，其中包括市场场合，……他们仍是自己私利的追逐者。这虽然可鄙，但确是事实。"据此他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并非完美的各个市场，个体从中进行选择，参与进去，以实现个人效益最大化；正是在这个持续过程中，社会秩序产生了。公共选择理论推动政策研究去承担法规和道德的义务，以促进社会生活的市场化，因为市场原则才是人们实现个人效益的最佳方法。例如，根据这个观点，政策研究的职责之一是提出能使选择过程中的业务成本、信息成本和机遇成本降低的策略(Alt & Shepsle,1990)。[11]

---

[11] 业务成本指的是在交易过程中支付的行为成本，如使买卖双方走到一起的成本。信息成本指的是为进行最佳选择而必需的关于产品、人、市场等知识的成本。机遇成本或者说"内存"成本则是为目前选择而进行的前期选择的成本。

公共选择理论在一系列学科中都有发展,并因它的数位领导人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赢得普遍关注。[12] 它的成功也使得其倡导者如曼库尔·奥尔森等人呼吁一统社会科学天下,将所有传统学科拆散整合纳入公共选择理论的旗帜下(Olson,1990)。通常公共选择理论采取保守主义,这吸引了一批取向各异的学者,其中包括推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学者。[13] 这个取向也被逐渐移用到一般社会行为的经验研究中,包括家庭问题和性问题的研究(Posner,1992)。结果,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只是思考政策问题的方式之一,但在某些人看来,它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这个领域中的主要取向。[14] 多年以来,这个取向也对传播研究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传播政策研究中,例如:广播波段的价值与适当的分配政策;在管理机关雇员中的势力拓展;撤销管制的成本与后果等等(Coase,1991;Crandall,1991;Derthick & Quirk,1985;Stigler,1971;Wilson,1980)。

政策研究从几个方面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所教益。它汲取了传统多元政治科学的成果,它在具体应用时的理论出发点是:有各种各样相对平等的参与者直接介入到政策制定过程中,只有在讨论了每一种参与者的特定利益和特定行为之后,才有可能勾勒出政策成形的全貌。[15] 它反对把资本逻辑等单一因素作为政策成形的惟一驱动力,认为这会使特定利益和行为化简到资本逻辑清晰表达的最低程度。政策研究确实倾向于极端多元论,而没有全面的主见,这种无政府主义式的混乱受到政治经济学极其正确的批评。然而,在最近的著作中这种偏向已有所纠正,较开阔的理论框架得到了引进。例如,著名的多元论学者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就采纳了批判主义理论家如哈贝马斯的观点。正如海文-史密斯所说(Haven-Smith,1988:120),其目的就是对政策分析家曾经以为不言而喻的地方提出质疑,以此来加强政策研究的根基:

> 在设计政策研究的方法论时,政策分析家们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他们假定政策研究的主题可以独立于理论框架之外进行界定,这个方法论假设使政策分析家将研究目标定为对“政策业绩”的评

---

[12] 近期获奖的公共选择理论学者包括乔治·J.斯蒂格勒、詹姆斯·M.布坎南、罗纳德·科斯和罗伯特·E.卢卡斯。

[13] 著名的“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性著作包括埃尔斯特(Elster,1985)、普里切沃斯基(Przeworski,1986)和罗默(Roemer,1982)等人的著作。关于对这个学派的批判性概述,参见基辅(Kieve,1986)和伍德(1989)。

[14] 有数种期刊都以公共选择理论为特色,其中一种旨在以古典经济学的当代观点取代异端政治经济学,干脆就叫《政治经济学学刊》。

[15] 关于政策研究在传播学中的应用,参见德希克和库尔克(Derthick & Quirk,1985)、克莱斯诺等(Krasnow 等,1982)。

估。但这个目标忽略了一点:无论是政策方案还是业绩指标,都不可能是不言而喻、不证而明的。

霍克斯沃斯(Hawkesworth,1988)走得更远,他呼吁政策研究克服事实—价值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默认了政策分析家和政治决策者之间的明确分工"(p.4),会使政策研究简化为"非政治性的科学论"(p.10)。他提出的独特主张是进行"后实证主义"的分析,"对可疑政策假设的政治性内涵作持续的、批判性的考察"(p.9),使得"多一些检验,少一些假设",建立一种"民主化的科学"(p.191)。其实,政策研究如何解决这些课题并不是本章研究的中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有时只是对资本主义过程的逻辑后果进行实验性的思考,就凭此读解出特定的影响,而政策研究则全面介入对利益冲突的特定的、具体的分析之中,这给政治经济学上了重要的一课。[16]

政策研究的政治学一翼有非常强烈的多元论倾向,它把国家视作利益竞争的复合机器,利益各方都积极介入了决策过程中。例如,1970年,尼克松政府认为传播管理机构联邦传播委员会没能对它的保守主义议程做出充分响应,就在白宫设立了电信政策办公室。从政策研究学者角度来看,这件事具有重要意义。尼克松政府察觉到公共广播事业中有自由主义倾向,试图将它终结。更笼统地说,尼克松政府试图沿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主张和市场界限重组已有的公共利益标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政府机构内部的合作与冲突形成了国家对于媒介和电信业转型的态度,而这场转型中的动荡同样也影响了政府机关的结构及其权力。我们再次注意到,政策研究过分强调"国家",尤其强调处理政策问题时的法律—法规形式体系。这种形式主义的趋势和"最后游戏"的观点忽略了法律—法规机关之外广泛的权力资源和权力运用,也忽略了这些问题在得到国家注意之前的长期酝酿和发展过程。当然,政策研究的建设性意义还是首位的,它提醒政治经济学抛弃唯经济论,不要只从工业结构中去读解政策决定。

政策研究的经济学一翼,即公共选择派,也提供了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尤其是它满怀热情,讨论了一系列涉及广泛而意义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处于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的传统研究领域,但他们只满足于自己学科范围内的研究,从而冷落了这些问题。公共

---

[16] 另有一种努力,力图为政策研究在传播学中的具体应用扩大阵地。参见布里南(1992)。

选择理论不囿于传统经济学的支配区域,它继承了传统的个人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论,把它们应用在对决策过程的理解中,而这些决策过程广泛存在于家庭、国家范围、宗教组织等等之中,涉及性、行政系统、家庭结构、预算等诸多方面。此外,公共选择论也没有回避规范和道德问题,这类问题不久前还是社会科学主流研究的禁区,如今已进入政策分析学者尤其是公共选择派的注意中心。公共选择派以先锋的精神近观社会性,向社会科学现代论中的胆怯成分以及因此在许多时代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发起了挑战。[17] 他们这样做如果不是出于精密方法论策略的考虑,那就是向一种价值观念的回归,这种价值观也曾促使亚当·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放开眼界,将那个时代的核心道德课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虽然政策研究在讨论这些课题时遭到了批评,比如它将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推向了极端,还把国家看作是利益竞争的独立仲裁者,但它毕竟提示传播政治经济学扭转研究偏向,这种偏向会导致研究目标的狭窄,还会在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筑起高墙。

在分化与瓦解的现状中强调普遍性和共同性,这种努力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吉特林(1993)等人指出,从事中间偏左的政治运动的人偏爱关注身份政治,强调区分群体的特征如性别、种族、民族、年龄以及性取向等。这种倾向可以理解,它力图改变弱势群体在社会中、在左派中的地位,但用吉特林的话说,其后果是使"身份政治更多地植根于团体内部的自我维护,而不是植根于建立广泛联盟的意图"。身份政治激发了一系列范围广泛而取向各异的政治运动和知识运动,而它同时也扭转了传统的左派—右派政治倾向。左派曾经坚持普遍性,无视其缺陷,现在却提倡一系列分散化利益;而右派本来坚持单一的精英标准,现在,在里根—撒切尔时代奠定的牢固基础之上,它大胆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保守主义平民论。

政治经济学的回应

政治经济学也分别对政策研究和文化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其中有些方面是重合的,从这些方面出发进行讨论尤为方便。下面我们将从

---

[17] 这种先锋精神尤其在布里南和布坎南(1985)的著作中得到证明,他们认为自己的道德重建计划不亚于在美国建立一个"市民宗教"。

传播分析的核心概念**权力**(power)入手开始讨论。在政治经济学中,权力占有相当大的分量,这是它与政策研究和文化研究不同的几个方面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权力在政治经济学中,既是达成目标的力量源泉,又是社会层次体系内的控制工具。而政策研究的核心政治倾向多元论则把权力看作政治领域内广泛分布的资源,所有的个体或多或少都能拥有(Derthick & Quirk,1985)。权力的分配在特定例子中或许有重要意义,比如说,在某些课题中,权力分配偏向广播电视从业者,在另一些课题中则偏向电信企业,在另一些课题中又偏向消费者团体。但是,根据多元论的观点,权力不会有结构性的偏向,不会集中在某个集团或利益个体手中。同样,多元论认为,既然权力已经普遍散布在整个社会之中,那么可以顺理成章地说,它根本就不具有核心的形成性影响。

政治经济学赞成在将权力视作控制形式的同时,也把它作为一种资源来考虑,但非常不同意整个政策分析中确定的权力的位置。政治经济学认为权力是一种***结构化了的***资源,或者用马洪(1980)的话说,植根于"不平等的再现结构"之中。权力构成了一个体系,谁在社会层次体系中拥有优势地位,谁就将有权获得相应的市场位置。另外,权力还不仅是资源——它也是一种***控制能***力,用来反击挑战者,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虽然在实践层次上政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有所重合,但在知识层次上,二者泾渭分明。它们对权力的认识,在本体论上有实质性的不同。政策研究认为权力是分散的,是社会领域中起作用的众多力量之一;政治经济学则认为权力是凝聚的、结构化的,是塑造社会领域的核心力量。[13]

文化研究当然没有忽略权力,它从许多方面来考察权力,尤其强调它的个人性、地方性和交互主体性。但文化研究的权力观与政策研究更接近,而不是和政治经济学更接近。文化学者没有把权力放在思考社会关系的根本思维方式的核心上。另外,他们的权力概念更多地是植根于个人的交互主体性、个人身份和集体行动中,而不是像政治经济学那样植根于社会的制度结构中。文化研究往往对结构的概念避而不谈,一些极端的观点(Laclau & Mouffe,1985)还反对社会与社会整体的提法,即便是那些在提出时已经严谨地预测了各种可能性的提法。

政治经济学的回应重新肯定了社会整体理论化的价值,认为它不单单是系统论所维护的抽象理念,更是共同利益体和权力结构的具体表现。

---

[13] 例如,比较一下政治经济学对媒介产权及产权集中的众多分析与公共选择理论文献对此方面的较少涉及,众多现象表明,权力概念在前一类研究中是核心,而在后一类研究中几乎不见踪影(Demsetz & Lehn,1985)。

思考权力的主体性固然有益,但政治经济学认为,权力从控制社会结构的基本规则中获得了客体性,主体性和客体性共同构成了权力,二者不可或缺。

有趣的是,政策研究和文化研究其实在媒介内容的多样性问题上持有相似看法。它们以各自的特定方式将多样性(diversity)和多个性(multiplicity)相结合;它们都反对说多样性难以获得,换句话说,它们都不承认要获得多样性就非得采取一致的政治行为。政策研究的立场倾向中的核心观点就是认为内容的多样性同市场或社区中声音的纯**个数**有密切关系。它反对媒介集中,认为这会限制信息和娱乐内容的流通,但它只满足于扩大市场竞争者队伍的补救方法。例如,对于欧洲广播频道的国家垄断控制问题,典型的政策研究派的解决办法是向私人业者颁发营业执照。对于北美电信业的私人垄断控制问题,标准的政策研究答复是支持一个或几个同业者与垄断者竞争。它对于媒介集中的主要测量手段,就是评估市场中生产者与分配者的个数,以此来判断市场中是否有足够多的声音构成了充分的竞争。简单地说,政策研究***把多样性等同于多个性***。只有在政策研究的外围,这个学科同国家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才会有将二者进行区分的努力。在这些异端观点看来,声音的纯数目(多个性)与***不同***声音的数目(多样性)之间存着根本差异。政策研究的正统理论称,竞争单位的存在必然产生多样性。根据这一观点,多样性的获得相对而言就很容易了——只要增加生产者和分配者的单位的数量就可以了。政治经济学则提出结论说,不管生产者和分配者的数量有多少,它们提供的讯息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多个并不一定导致多样。这使得区分二者的问题更加棘手,而政策研究正统派对这种区分工作没有丝毫兴趣。默多克的福克斯电视网进人美国,使得原来由 ABC、CBS、NBC 等寡头垄断的卖方市场中,声音的数量增加了。但是,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它提供的新闻和娱乐节目同“标准的”电视节目是否有根本不同表示怀疑,并据此提出,如果不能保证多样性的提高,那么单纯增加媒介声音的数量只能一无所获,或者获益甚少。

文化研究的传播论虽然在一般认识论、理论层次以及实质立场上同政策研究存在差异,但在媒介政治的多样性问题上,它们的结论倒是很接近。[19] 文化研究从截然不同的受众观点出发,却得出了几乎同样的结论:媒介多样性不是一个大问题。它认为,信息和娱乐是多***义的***,受众可以对

---

[19] 据伍德称(1989),公共选择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的相似之处远远超出大多数学者的论述。

它们进行主观的多重读解和诠释，也就是说，它们自己产生了多样性，而不论现存生产者和分配者的数目是多少。文化研究倾向于把每个信宿都看作是不同意义的生产者，他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身份互相重叠，组成了其特定的"主体性地位"（费斯克语），他所赋予讯息的主观意义就是这个地位的因变量。媒介集中不会限制多样性，因为对新闻、戏剧、滑稽表演等如何解释可不是它们正式的生产者所能影响到的。更进一步说，受众把主体经验带到传播和信息产品中，造成了文本的多样化。文化研究以此纠正唯经济论/唯生产论的双重偏向，它认为，正是这个偏向困扰着政治经济学。在这一点上，除了少数值得一提的例子，文化研究认定政治经济学中存在唯经济论，即根据资本的逻辑、结构和发展来读解文本；还存在着作为唯经济论特殊形式的**唯生产论**（productivism），即从组成生产过程的资本循环中读解文本。[30]

政治经济学家对政策研究做出反应，承认增加讯息提供者可以增加讯息数量，他们还介入到政策制订过程中去力图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也同意文化研究的观点，即对同一个新闻或娱乐节目不可能只有一种受众反应。但是，政治经济学仍坚持认为，透彻认识商品化过程如何影响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循环，对理解文化是十分关键的。政策研究从它的各个理论立足点出发，对此亦有所了解。而文化研究就逊色多了，因为它对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都非常有限，这令人遗憾。它显示出自己对正统的和异端的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观点的深度、复杂程度、流派分支直至整体的多样性都不甚了解。结果，文化研究采取的行动，根本不是根据经济学概念对经济学进行分析，而是直接抛弃了在分类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观点。经济学观点之所以被抛弃，只因为它们是唯经济论。关于文化生产的经济过程的提法也成了唯生产论而被搁置一旁。尤其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为抛弃而抛弃的立场极大地妨碍了文化研究的深刻见解，否则的话，它有可能同政治经济学一起，为创建一个有益的交流地带做出贡献。请思考下面对唯生产论的批判：

> 生产的文本与读解的文本不是一回事。阿多诺的分析中存在的

[30] 霍尔的著作反映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态度，可以说是一个例外。在一些著作中，他将权力赋予资本，以至于文化研究的捍卫者把它们当成了唯经济论的著作。例如，他认为（1986：11）"产权与控制"极为重要，它"给再现的机械流程在财产和利润的价值体系中定下了根本的方向"。在霍尔看来，资本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阻止了新的集体类别、新的社会目标和新的控制形式进入文化生产的核心"。然而在另一些著作中（1989a：50），他又尖锐地批评政治经济学，指责它是"不成熟的简单化理论"，"对于为意义而进行的斗争一点概念都没有"。

> 问题,也许是唯生产论观点中通常都存在的。他们不仅从生产的文本中推出读解的文本,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忽略了其他环节的生产要素,而只关注创作者和批评家的"创造力"。或许这就是最深的偏见,它存在于知识界的分工中,存在于作家、艺术家、宣传家、教育家、教师和传播者之中。(Johnson,1987:58)

政治经济学并不否认生产的文本与读解的文本之间存在差异,它也不否认读者也创造意义的说法。此外,政治经济学家也没有回避对当代媒介的考察,从博物馆和剧院中的传统艺术到"信息社会"中的新媒介,政治经济学都把它们看作根本的**文化**力量加以研究(Babe,1994;Schiller,1989;Webster & Robins,1989)。还有,政治经济学家也意识到人种志方法的价值,认为它有助于描述读、听、看大众媒介的社会经验(Pendakur,1993)。迄今为止,两者相安无事。但是,如果离开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立场,认定表面上看起来的作者与生产者的混淆就是其罗列的知识工作者的"最深的偏见",就未免是极度的言过其实。[21] ***受众不是消极的,但生产者也不是缄默的***。正如默多克所指出的(1989a:439),从提出辩论的基础一下子到彻底的抵制主义,这个令人遗憾的转折在一些文化研究中极为明显(Carey,1994;Grossberg,1991)。[22]文化研究忽略了一些很有趣的问题,例如,读者和受众到底有多大力量成为文本的创造者?文本的生产者能在多大程度上预测到读者和受众的反应并据此采取行动?在控制文本生产工具和创造意义之间有什么联系?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在意义的产生中的位置之间,又有什么联系?[23]在面对巴赫金(Bakhtin)所谓文化产业的"独白演讲"时,反主流者和非主流者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又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一旦我们避免了抵制立场,这些就是进行有益交流的区域。不论"个人能自觉地、批判性地评估媒介内容,我们应为此浪漫欢呼"的想

---

[21] 公正地说,约翰逊也评击了形式主义文化分析的读者观(1987:67):"读者行为的缺席是形式主义分析的特点。即使有人关注创造性的、解构性的或批判性的解读,也只是把这种解读归因于文本的类型(例如,巴特的术语学中有'能成文的',却没有'能读取的'),而不是归因于活生生的读者的历史。……最多不过把特定的读解行为理解为人的原始经验再一次起作用。"伊文思(1990:152)扩展了这个观点,他指出,许多社会科学取向宣扬读者和受众的诠释性理解,也不过是心理主义的又一次还魂而已。

[22] 以下是凯尔纳(Kellner,1995:42)所描述的文化研究的退化效应:"忽略政治经济学,欢呼受众及大众的愉悦,忽略社会阶级和意识形态,也就无力对文化文本的政治内容作批判性的分析,这样就使文化研究仅仅成了另一个学术亚分支,对文化产业本身不但无害,反而最为有利。"

[23] 伊文思(1990:150)从另一个方面展开了论述:"除了早期的皮下注射模式,大众传播学中再也没有一种传统认定受众是消极的。实际上,真正的差别不在于受众是积极还是消极,而在于受众行为是此类还是彼类。"

法多么诱人,它确实是有所不足的(Evans,1990:152)。[24] 政治经济学除了接受文本多义和文本多重创作的观念,也认识到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完整循环圈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并把这些都视为建构社会生活和实现价值过程中的核心环节。[25] 然而政治经济学不同意说多样性是多个的自然产物,不管这种"多个"指的是媒介单位还是受众。众多媒介单位只能提供根本上相同的媒介实质内容和媒介形式。正如莫德尔斯基(Modelski,1986)所说,受众的抵抗已被箝制在媒介产业设定的约束之中。集中研究受众行为,把它作为最有力的社会行动,等于是在夸大,使偶尔发生的社会行为超越了其意义的合理界限。例如,观众在诠释电视节目时只要不是只解读表面意义,或者在利用广告资料时采用了非正统方式,就都成了有重要意义的抵抗行为或者对立意识苏醒的证据。但正如米勒(1988)指出的,这些行为早就落入人家的预料之中,传播者采取反讽的市场手段,利用受众的复杂意识作为工具来建立相互的认同。夸大受众行为的倾向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文化研究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当中,这招致了各派批评家的强烈抨击(Ahmad,1992;Norris,1992;Palmer,1990)。

另外,**受众**(audience)这个概念也不像阶级、性别、种族那样是学术分析的范畴,而是媒介产业自身的产物。媒介产业用这个概念来识别市场,界定商品。"受众行为"这样的提法使这个词在分析中和经验上立住了脚,但它未经证实,使用时应多加小心。至少,断言有一个人口学类别"受众"在*行动*未免为时过早,我们还没有确定这个词的概念价值,尤其是还没有确定它和社会阶级、性别、种族、民族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才真正是超出了人口学意义的集体——它们是活生生的现实。以阶级、性别、种族等不同方面的社会性身份组织起来的人是社会行动者,他们进行着各种活动,包括反抗媒介现状。这个过程的重要意义已经过了一系列程序的检验。而媒介权力被授予了那些拥有市场控制权的人,他们使体现自己利益的内容充斥了每个媒介渠道。媒介权力构成了多义性的形式和实质内容,从而限制了诠释的多样性,使得在众多可能的诠释方式中居于突出地

---

[24] 对受众力量和受众游戏所做的研究十分薄弱,并有浪漫主义和情绪化的倾向,伊文思并不是惟一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见席勒(1989)和沙德逊(Schudson,1987)。这也是默多克(1989a:437)提到的问题,他说甚至在第一代文化研究中,包括霍加特和威廉斯的著作中,都"弥漫着世界迅速消逝的怀旧情绪",并"在他们评估这些正在消逝的生活方式的'真实性'时……染上了浪漫主义情调"。

[25] 如伊文思(1990:148)指出的,文化研究认为自己和传统取向完全不同的表现之一是反对媒介效果论中的"皮下注射"模式,它批评这种模式竟然认为媒介可以把类似麻醉药一样的内容注入受众头脑中,来制造预期的效果。但是,"到底是哪些人在援用皮下注射模式,文化研究没有指出名字。实际上,一些学者认为,皮下注射模式从来都不是传播学中的重要传统。这种直接效果论,大抵只是论战所用的稻草人,反对它,就容易使自己显得更缜密"。

位的只有固定的、重复的几种核心方式，而那些与常规相去甚远的方式只能处在边缘地位。有些学者指责所谓的唯经济论和唯生产论是皮下注射模式的当代版本（见 Grossberg，1991 和脚注 25），其实，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否认过反主流读解方式的存在，它只是认为，读解方式是受限制于以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为坐标的具体的权力几何体中的。[26]

政治经济学对政策研究和文化研究所做的具体批评也提出了解决方案。特别要指出的是，它对政策研究中的工具主义、国家主义和唯经济论倾向进行了纠正。政策研究倾向于对政策形成过程采取工具主义的解释，它认为，团体行动对国家施加压力，可以使国家依照它们的利益制定政策。它认为政策是追随那些成功利用国家工具达成特定目标的人的。这个观点可以用来解释电信业中的自由化和解禁浪潮：大型企业用户有能力把持国家决策机器，使用这个工具来达到它们的目标，即建立低成本、用户主导的网络和服务设施，以满足它们业务增长的需要。与此类似，工具主义者在解释有线电视公司实力的壮大和利润的增长时，把它归功于这个行业的游说能力超过了无线广播电视从业者、消费者团体及其他利益集团，从而使政府的政策根据公司的利益制定成形。

政治经济学承认工具主义分析自有其价值，但它认为更应该从传播产业在整个广阔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定位出发，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这意味着要把传播产业、国家管理和决策机构、平民社团等各种因素置于它们共同构成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中来分析。为了理解电信系统自由化的具体方式，政治经济学呼吁考察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起作用的特定的影响力，包括：是什么样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力量迫使大企业用户认识到政策过程的重要意义，并组织力量史无前例地大举介入；又是什么力量在国家系统内部和系统周边起作用，使它更善于接受变革（例如国家机构中的激进主义分子打破了国家与电信垄断者之间的传统联系）；还有，又是什么力量使平民社团之间发生分化，有的继承传统，要求依照公众利益来规范电信产业，而有的则支持大型用户，认为竞争才是最佳的改革之路；等等。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主张，要理解***怎样***，就得知道***谁***对***谁***做了***什么***。还有，只有***怎样***也不能解释整个过程，还得判断出***为什么***行为会发生，这就要求寻找传播政策在总的政治经济形势中的位置，包括历史的和今天的位置。最后，政治经济学超越了工具主义，它呼吁对政策过程进

---

[26] 政治经济学宁愿这么说，而反对多数文化研究中的主导立场。这种立场表达了"自由的反对派"的理念，伊文思（1990：149）评价说，它"给人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即无关霸权的受众反应更为普遍"。

行批判性的理解,把结构层面和历史层面上的认识同一系列价值观或者说道德哲学的立足点结合起来,按照民主、平等、参与、公平与公正的原则来评估政策过程。这个评估姿态还有助于政策研究走出狭隘的、叙述式的、实证主义的倾向,把对政策的分析和变革它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

政策研究中有两种偏向,或过分强调政治方面,或过分强调经济方面,政治经济学认为应当在二者间求得平衡。前者,或者说政策研究的***国家主义***取向,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决策的最终权力仍归国家。这种权力可以是形式上的,即国家依法控制政策制定过程;也可以是实质上的,即国家有权决定政策制定的内容;还可以两者兼具。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种权力都属于国家。因此政策研究认为,虽然国家会被外部团体(企业界)或内部团体(机关雇员)所"把持",成为其工具,但是正因为国家掌握着决策权力,才使得这些团体必须把持它来达到目的。这种认识的结果是造成一种研究倾向,即几乎只关注国家及其管理、立法、行政、执法机关,把国家看作是决策宇宙的核心,它决定了产业结构,塑造了产业能力(包括价格、服务及营业收入),还设定了消费者和公众介入的条件。实际上,政策研究中最标准的国家主义观点是,国家即立法权,它制定了决策过程的运作法律。

部分出于对国家主义的逆反,政策研究的公共选择派走向了另一极端。它提出了政策过程的唯经济论观点,以市场、效用、优先权等经济学语言取代了政治结构、权力等制度学语言。公共选择理论把政策领域看作一个市场,"买方"和"卖方"的意图都在这儿登记,"买方"寻求对自己有利的决策,"卖方"则提供政策输出。它沿用新古典经济学模式,以确定一个均衡位置,使政策问题上各方的优先权都得到最大的满足。这个观点的结果是国家被当成了一个仓库,任何不完善、不充分乃至市场竞争体系的失误都往这里堆放。对贝克尔(1975)来说,行政管理和办事程序的负担使得国家要承受日益加重的"累赘成本"。佩茨曼(Peltzman,1975)指出,国家的发展可以追查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崛起,他认为,在西方社会里正是这些集团在靠政府津贴计划和平等主义供养着。斯蒂格勒(1988)也认为,甚至那些国家机关(例如规范管理部门),表面上是纠正市场失误的机构,实际上却不过是将收入再分配并为管理者自己积累权力的工具。[22]

---

[22] 斯蒂格勒(1988:xiii)以公共选择理论家特有的自信,毫不在意自己的规范化观点是否需要证明:"规范化所扮演的角色的根本变更,被如此广泛地接受着,如此详尽地证实着,以至于如果这里再引述那些与日俱增的支持性研究,就未免是卖弄学问了。"

政治经济学承认国家主义和唯经济论各有所长。它指出,前者的一大功绩是确认了国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的独立意义,可以纠正政治经济学从资本逻辑中简单"读解"政策决定的偏向。它也意识到公共选择理论引入经济学语言的意图是冲淡政策研究中的国家主义。然而,政治经济学希望从政治和经济的共同基础出发,矫正国家主义和唯经济论的偏向,因为它们都是片面的,各牺牲了一个关键要素。政治与经济,任何一个都不能对政策过程进行实质性的解释,要完整理解,必须二者结合。具体地说,我们首先要抵制诱惑,不能因为正式的立法权归属国家机构就只注意政策的政治性实质。正式立法权只是权力形式的一种,它目的明确,不过是等决策在规范过程之外达成以后授予其合法性。例如,企业界和学术/知识界各派力量的强大推动力,使得一些有助于电子媒介和电信业通过商业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国际化来转型的措施得以采取。这个力量达到了如此大的强度,以至于国家措施的采取虽然也几经斗争、具有重要意义,反而不起眼了。大部分政策研究、替代性方案评估、策划、辩论,在时间上或者先于正式的立法和规范考虑而产生,或者与之同时并行,但在空间上肯定是在正式机构**之外**进行的。政策研究过于关注以国家为中心的活动,因此大部分政策研究文献都忽略,至少也是低估了正式机构之外的开发活动。政治经济学为了纠正国家主义的偏向,着力于拓展政策过程的概念内涵,使之容纳那些国家正式机关之外的活动,即各派力量(如政策研究和计划中心、企业组织、工会、消费者组织、平民社团等)对政策议程的左右,内容包括:政策议题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国家的议程;政策方针又以何种方式得以推行;等等。总之,政治经济学通过拓宽政策分析的基础,纳入那些共同构建政治过程的社会、经济角色和力量,对国家主义取向做出纠正。

与之类似,政治经济学也力图纠正公共选择理论带到政策研究中的唯经济论倾向。虽然政治经济学肯定了引入经济论点的价值,但它反对将新古典经济学的语言和假设纳入政策研究,因为新古典经济学低估甚至根本忽略了权力的运作、制度行动者的影响以及社会关系的成形,而这些恰恰构成了个体的选择。政治经济学还批判地否定了在分析政策问题并推动其解决时套用市场模式的价值。政治经济学明确地对公共选择理论的根本假设提出质疑。它对于假设的市场是否存在、是否真有某种力量能把市场制造出来以及这种市场是否经得起考验,都持有怀疑的眼光。它还进一步质疑了市场的中立性、市场对于刺激的反应能力,以及假设的市场效率(Hula,1988)。政治经济学赞成对规范化过程的社会成本予以

测量,它提醒公共选择理论学者,竞争会要求支付社会成本,而对于这一点,那些学者们或者完全忽略了,或者只是漫不经心地尝试着做一些判定和评估。政治经济学得出结论说,既然新古典经济学中存在着根本缺陷,那么无疑,它在政策研究中的应用也避免不了存在缺陷。政治经济学给政策研究带来了基础广阔的分析,以取代公共选择派的唯经济论。这种新型分析的核心就是通常渗透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三大过程。具体而言,它将政策过程及其中角色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这个社会背景主要形成于三个方面:一是当前状态的商品化,二是制度图谱构成的空间化过程,三是社会关系组合(阶级、性别、种族、社会运动)与霸权过程一起完成的结构化。虽然市场、个人优先权、选择等概念在政策研究的经济学层面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们也只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提供的范围较广的经济过程中的几个方面来发挥作用。

对文化研究提出的直接或含蓄的批评,政治经济学也做出了答复。虽然文化研究(特别是源自英国和拉美的文化研究)中有一些倾向涵盖了政治学的元素,但是总的来看,文化研究取向中漏掉了一个政治焦点。它没有建立政治规划和政治目标的意识,而政治立场多年以来几经考验,已经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推动力。勿庸讳言,政治经济学包括它在传播学中的应用,是一个对抗性的领域,许多政治派别想要在这里占据知识的和政治的上风。但是没有人会否认,不管是学科内部还是学科之外,即使上溯到它的古典创建者的时代,都没有人会否认政治经济学的特色:它模糊了甚至完全消解了分析与介人之间的界限。这也解释了实践在政治经济学中为何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从整体来看,文化研究中建立政治规划和政治目标的意识不够清晰,但这个学科中也不是没有人赞同政治目标,他们的目标虽然与政治经济学大不相同,但同样坦率。他们倾向于把政治目标的焦点从社会阶级上移开,移到性别、种族及其他身份形式上去,移到跨越了阶级界限而关注环境、女权主义、世界和平的新型社会运动上去。根据这个观点,文化研究通过关注构成社会身份和社会分化的文化实践和文化价值,为理解主流霸权的核心特征(例如权力主义的平民论如何把大多数工人阶级带到了撒切尔—里根阵营中)做出贡献,也促进了反主流和非主流大众运动形式的发展。但是这个观点在文化研究中并不被普遍持有。另一些文化研究学者的政治立场可以说更为暧昧,他们称,文化研究与具体的政治规划少有固定联系,换言之,文化研究中的主要的(如果不是惟一的)政治行为,就是研究行为本身。杰姆逊(1989:43)反省了文化研究中的政治不确

定性，他说，文化研究最感欣慰的是否就是确立了“一种无政府主义者和平民主义者的精神”，以此来热情响应费泽斯通等人所谓的“今日世界各地的公众都更有民主意识和文化内涵”的说法？[28] 最后要提到的是后结构主义学者，他们对于现实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文本和论述，因而否认研究的过程或实质内容与政治之间有任何联系。不论这里表述的意思多么明确，文化研究中的分歧并不是这么泾渭分明。只需指出一点就够了：文化研究这个领域对于自己同政治之间的关联，完全不像政治经济学那么确信无疑。

文化研究不能确信无疑的另一个方面正是政治经济学根本目标的核心之一：理解社会整体。泰茨拉夫（Tetzlaff，1991：10）指出，这源于文化研究的一个普遍倾向，这个倾向主要体现在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著作中，他们宣扬说，统一就等于社会控制，而自由化则相当于“统一体的瓦解”。[29]政治经济学则认为，与其说社会整体是抽象理念，只能以系统的内在特征完全读解，还不如说它是可以在经验中观察到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运作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展现。[30]资本主义被理解为一个由社会过程构成的特定社会整体，这些以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为起点的社会过程提供了把资本主义理解为社会过程之间关系的特定组合的方式。这个组合及这些过程间的关系是动态发展的，因此无法绝对确定。但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就是要在研究工具许可的最大范围内，一方面描述社会整体的状态，另一方面描述主要过程采取的方向。因此，政治经济学坚持认为，理解社会整体是学科根本规划的确定不移的核心，同时它以开放的态度，在广泛范围内探讨了社会整体的特征及整体组成关系的性质、形式与力量。

可以说，文化研究对探讨社会整体有何价值还不太确定，它怀疑这个概念在经验上的现实性和在理论上的实用性。文化研究偏爱关注这样一些概念，诸如文化差异、特殊主体性、地方性认同等等，而一旦提到社会类别之间的联系，它总是万分谨慎，担心这些联系会很容易发展成客体化的

---

[28]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文化研究与政策研究的经济学一翼都对无政府主义表示支持。两者都流露出为个体行动欢呼的意思，把它看作是对权力的抵制，尤其是对国家政府和垄断企业的制度化权力的抵制。观察杰姆逊疏远这个立场的方式也很有趣，他干脆承认，对他的批评非常正确；他对为“新无政府主义”欢呼确实没有足够的兴趣。

[29] 这里沿用的是里奥塔（1984）对后现代的定义：“对于宏大叙事的怀疑。”

[30] 在提到罗兰·巴特的时候，甚至连形式主义包括后结构主义的维护者也不得不承认：“巴特的‘历史’不像马克思主义，它空洞无物，令人猜疑，包括语义符号学也不能操作一次给我们看（除非它是巴特的小品文），如何将不同形式重新构成复杂整体。”（Johnson，1987：60）

系统和形式，从而湮没了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在文化主义者的认识论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政治经济学承认这种谨慎并非毫无必要。例如在女权主义研究中，建立系统阶级分析的意图，反而会消解对阶级内部和跨越阶级的性别分化力量的认识。政治经济学考虑到对社会整体的探讨中可能会出现问题，但仍坚持这样做。这种探讨中存在的危险是可能会导致简化的系统思考，即拉克劳（1977：12）所谓的"阶级简化主义的柏拉图洞穴"。但是，只强调差异性、主体性和特殊性，也会带来危险，它将终结于个人主义的复合体，个人之间如果存在联系也只是偶尔的。这种观点一旦达到极端，就等于把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统统随机化了，因而它们也就不复存在（Wood，1986）；并且形成了浪漫主义的差异观，以为差异性的获得就意味着政治性挑战行为的存在（Garnham，1990）。[31]

这样一种观点消解了权力集中（包括阶级权力集中）的重要意义，而实际上我们面对的证据已经表明，一种全球性的阶级分化正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加速恶化。按这种观点，政治性的抵抗充其量不过是用一揽子专用符号来标新立异，反抗正统。它的后果是使我们不再关注物质分化，而只看到文化差异。请思考下面这段文本，它是文化研究对多义性的分析（During，1993b：7）。它指出了多义性观念的局限，却仍然认为，"多义性确实引导我们走向更动态化、更复杂化的理论概念，有助于我们描述文化产品如何同新的要素结合，在不同环境中产生不同效果"。"杂交（hybridization）"和"洽谈（negotiation）"在这里被援用，作为例子来说明广告形象的多种运用方式中展现的不同文化过程，例如万宝路的牛仔形象：

> 可以按杰夫·昆斯的方式被制成闪闪发亮的锋刃派塑料雕像，放置在曼哈顿的高档公寓中后获得了一种后现代效果；……可以把它从杂志上剪下来用来装饰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的贫民的屋子……；还可以被模仿在CD/专辑封面上加以嘲弄。

尽管这段描述准确无误，但在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它离题甚远。它借用了极端的阶级分化状况，却只透过这种状况的表面看到了文化碎片的符号化运用。它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可以识别曼哈顿的公寓房客

[31]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1989：33）从文化研究的框架出发，为社会整体观做出了非同一般的辩护。他近乎表示歉意的语气更显示了他的立场的不寻常性："任何人都会注意到，我的后现代主义观是一个整体性的观念。今天，有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我要采取整体观，而是为什么有人会感到被它冒犯（或学者感到被冒犯）。在以前，抽象化确实是一种策略手段，使现象尤其是历史现象变得陌生，不再为人熟识……"

和拉各斯的贫民窟居民,从而把他们在符号世界中联系起来。政治经济学家则放眼更广阔的社会整体,在这里以上两类人以权力关系相连结,正是这种权力关系造成了他们现实生活的差异性。文化研究分析家从各种文化符号的非正统使用中看到了个性的形成,这可能是正确的,但与划分了物质与文化生活的权力的天壤之别相比,这个方面可以说微不足道。

政治经济学与这种观点相反,它关注社会整体,认为这不仅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也必然具有知识上的重要意义。在知识上,它坚持去考察那些连结人群的对称或不对称的社会关系,其范围从权力与依附直到平等与互相依存,它认为这才应该是核心的知识关怀。政治经济学还认识到,直接关系的缺席(直接关系由相互往来的形式所展现)并不一定意味着有重要意义的纽带的缺失。正如社会网络分析所展示的,联系通常极为复杂,那些个人及群体间的最有力纽带,往往是*通过*其他人来联系二者,而不是直接在彼此*之间*加以连结(Burt,1992)。

政治经济学还坚持认为,关注社会整体在政治上也有重要意义。在细致严谨地将资本主义结构、过程及影响纳入理论的工作中,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也时有分歧,但他们都赞同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社会形成物,看作是一个社会整体,其各个部分形成了运动的但可以识别的关系。诚然,政治经济学家在指出统治、霸权和反抗的社会关系的不同特征时,也有不一致之处,但他们一致同意,应当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关系的社会性质和集体性质之上,放在它们各部分的连贯之上。政治经济学家坚持这些立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具体体现了政治斗争的本性,而政治斗争对于政治经济学家的工作又是不可或缺的。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以解释资本主义以求它的改革作为自己的义务;作为政治经济学家,他们以理解社会关系以求它的解放作为自己的义务。不管政治经济学多么挑剔,它一定要与社会整体密切相联(例如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定要与阶级、性别、种族等社会关系密切相联。在政治经济学看来,焦点性的运动都在走向统一和社会整合,其中自然不免有差异和特殊性。文化研究批评政治经济学的取向,认为它的缺陷主要是从资本主义和阶级权力中读解出了太多的统一性,反而掩盖了社会关系和文化中的重大差异。这两种立场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两种取向之间的一个重要分界线。

以下是结论。政治经济学家和其他的批评家集中探讨了三个要点,以此构成纠正文化研究极端观点的核心方面。首先,批评家们对文化研究中的认识论转向表示担心。它从现实主义转向了唯名论,否认文本之外存在可知行为。这也使得它的研究观发生了转变,原来是尝试对行为

作可核实的陈述,在政治经济学看来,这个过程是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的,而现在它只介入持续的对话而脱离了实践。其次,批评家们指出,文化研究中的相对主义知识论已经导致了更广泛的政治相对主义,从而失掉了政治作为最终社会目标的意义。而正是有了这个目标,研究行为及其他行动才完全发挥了它们的政治作用,为争取每个人的个性进行斗争。文化研究的自足本性,以及它对广阔政治规划丧失兴趣,都助长了它的知识胸怀的偏狭,因此它的"对话"也就曲高和寡。很明显的证据是,文化研究著作中的语言除了对话圈中的少数人之外,谁也看不懂。这就是批评家们指出的第三个方面。例如帕尔默(1990)把这种状况称为"堕落入清谈"。斯雷特(1987)则探究"使用价值在符号领域中的迸发",这是个曾经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认为好的研究应当能为范围更广的社会各界所享用,如今这种看法已经丢失了。包括政治经济学家在内的批评家们呼吁文化研究重返它的研究根本,即文化是大众的,它应当反映各类社会角色的需求和愿望,包括他们政治上的需求和愿望。[32]

结论:重返阶级权力

以阶级权力为本书作结论是很合适的,因为这个方面向来都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核心位置,同时,它还标示出了政治经济学同文化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的重要边界。在反思与更新传播政治经济学时,我们的兴趣在于扩展它的认识论、本体论和实质论的范围,批判性地评估社会学中长期争论的核心概念如本质主义、阶级权力等。由此本书提议建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应当是:

1. 从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即非本质主义的)、批判的认识论出发;
2. 采取社会过程和社会变革无处不在的本体论立场;
3. 发展建立在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过程之上的实质论观点。

这些就是社会行为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坐标。社会阶级则是检视结构化过程的起点。阶级权力也仍是一个核心要素,即使传播政治经济

[32] 斯雷特(1987:478-479)抨击了文化研究想制造一个不必要的自治区域的企图:"我们所认为的商品美学的自主、使用价值在符号领域的迸发,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神秘:就是市场关系的工具性逻辑把握住了使用价值。"

学放弃了将一切要素简化为阶级的本质主义。

因为政策研究中存在方法论和实质论上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必胜的信念也在其追随者的调子中时有流露,所以它很少谈及社会阶级。然而对于文化研究,社会阶级和阶级权力可不是陌生概念。实际上,这个领域的早期著作包括霍加特(1957)、威廉斯(1958)、汤普森(1863)、霍尔和杰弗逊(1976)以及威利斯(1977)等的论著,都表明学者们强烈感到有义务紧扣阶级分析进行研究,这使得我们相信丢凌(1993b:1-2)的论断:"早期文化研究者没有退缩,他们直面这样一个现实:社会结构并不平等,个体并非生而拥有教育、金钱、保健上的相同权力。"然而时光流逝,文化研究,尤其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却从阶级问题以及物质不平等和阶级权力之间的普遍联系上撤退了下来(Budd 等,1990;Evans,1990;Tetzlaff,1991)。个中原因可以理解,他们的兴趣转移到了:1. 扩展阶级分析,使之容纳性别、种族、氏族等的分化;2. 解释工人阶级对保守政策的明显支持,或者至少解释他们在面对生活水平下降时为何表现得无动于衷;3. 解释跨越了阶级分化的社会运动的兴起。但是,除了以上这些价值,这个注意力的转移会使研究的眼界日益狭隘,直至退缩到文本,而文本又变得自给自足,只解释自己,很少或根本不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甚至文化的实践活动。这样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使研究者几乎丧失了对传播工作和传播劳动过程的全部兴趣。虽然工人阶级也不时在文化研究中出现,却几乎从未被置于工厂或办公室的背景中。关于受众是否"创造"文本也有广泛争论,却几乎没有人谈到工作本身的物质本质和符号本质。[33] 政治经济学家发现了这种情况,感到费解,更感到忧虑。我们可以理解这样一种观点,即要求对阶级分析的意义和价值进行重新思考,却很难接受为了排斥阶级分析而找的借口,毕竟,在我们面对的世界中,贫与富之间的分化正日渐加剧。[34]

不管政治经济学和它的相邻学科有什么分歧,我们的研究过程应当使知识分子和文化生产者走到一起,而不是相互远离。我们应当建立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政治目标,去促进文化的民主化,进而促进社会生活的

---

[33]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在文化研究的长卷中竟然有这样的个案分析:一批精通并支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分析英国的汽车公司 *Metro* 的兴衰时,大量论及它的设计与促销,也谈到了它的"权力关系",却一句话也没有提到汽车工业中的劳动和劳动过程,也没有提到它们与文化大循环的关系(Johnson,1987)。

[34] 关于热衷抛弃阶级概念的观点,参见高茨(Gorz,1982)。杰姆逊(1989:44)的立场没有那么过激:"现在是资本主义两个阶段的转型期,资本主义经济的早期形式正处在全球范围内的重组过程中,包括旧有的劳动形式、传统的劳动组织的制度和概念。而新型的国际无产阶级(其形式我们还无法预见)会从这场激烈的剧变中重新浮现,倒是无需预言家来预言。只是我们自己还处在波谷期,到底要呆多久,没有人会知道。"

民主化。包括政治经济学家在内的批评家们在为这个目标呼吁的时候，也提醒我们还有更广泛的目标，那就是跨越学科界限，使各学科的知识联系和政治联系得以融合。持续进行对话是很有益的，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威廉斯(1981b:54)所说的尴尬局面，成为“尽管时常衣衫不整，不守秩序，却还要充当严肃的多元主义的座上宾客”。我们的交流自然要尽可能达成这样的共识：社会现实可以理解，我们的知识活动应当组织起来促进社会现实的改革，争取使所有人都获得更大福利。

参 考 书 目

Abler, Ron, Adam, John S., and Gould, Peter (1971) *Spatial Organiz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Adorno, Theodor W. and Horkheimer, Max (1979)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 by John Cumming, London: Verso (orig. 1944).

Aglietta, Michel (1979)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Trans.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New Left Books.

Ahmad, Aijiz (1992)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 London: Verso.

Akhavan-Majid, Roya and Wolf, Gary (1991) 'American Mass Media and the Myth of Libertarianism: Toward an "Elite Power Group" Theor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8, No. 2, pp. 139–151.

Aksoy, Asu, and Robins, Kevin (1992) 'Hollywood for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Competition for Critical Mass in Image Market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6, No.1, pp. 1–22.

Alt, James E. and Shepsle, Kenneth A. (eds) (1990)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tman, Karen E. (1989) 'Television as Gendered Technology: Advertising the American Television Set,' *Journal of Popular Film and Television*, Vol. 17 (Summer), No. 2, pp. 46–56.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8) *Less Access to Less Information by and about the US Government: A 1981–1987 Chronology*. Washington, DC: ALA.

Amin, Samir (1976)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Amott, Theresa and Matthaei, Julie (1991) *Race, Gender and Work: A Multicultural Economic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Amsden, Alice (1992) 'Otiose Economics,' *Social Research*, Vol. 59 (Winter), No. 4, pp. 781–797.

Anderson, Gary, M. (1988) 'Mr. Smith and the Preachers: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6, No. 5, pp. 1066–1088.

Andrews, Edmund L. (1994) 'AT&T Will Cut 15,000 Jobs to Reduce Costs,'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1, pp. D1, D14.

Ang, Ien (1990)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Towards an Ethnographic Critique of Media Consumption in the Transnational Media System,'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 pp. 239–260.

Ang, Ien (1991) *Desparately Seeking the Audience*. London: Routledge.

Ansherry, Clare (1993) 'Hired Out: Workers are Forced to Take More Jobs with Fewer Benefits,'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1, pp. A1, A9.

Aronowitz, Stanley (1992)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Class, Culture, and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Routledge.

Attali, Jacques (1985) *Noi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usic*. Trans. by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twood, Rita and McAnany, Emile G. (eds) (1986) *Communication and Latin American Societ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Aufderheide, Patricia (1987) 'Universal Service: Telephone Policy in the Public Interes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7 (Winter), No. 1, pp. 1, 81–96.

Aufderheide, Patricia (1991) 'Public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8, No. 2, pp. 168–183.
Aufderheide, Patricia (1992) 'Cable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2 (Winter), No. 1, pp. 52–65.
Aufderheide, Patricia (1994) 'The Media Monopolies Muscle In: Bell Atlantic–T.C.I. Merger,' *The Nation*, January 3/10, pp. 1, 18–21.
Babe, Robert E. (1990) *Telecommunications in Cana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Babe, Robert E. (1994) (e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Economics*. Boston: Kluwer.
Bagdikian, Ben H. (1992) *The Media Monopoly*. Boston: Beacon Press (4th rev. edn).
Bakhtin, Mikhail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Trans. by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Balka, Ellen (1991) 'Womentalk Goes On-line: The Use of Computer Networks in the Context of Feminist Social Change.' Doctoral dissertation, Burnaby, British Columbia: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aran, Paul A. (195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aran, Paul A. and Sweezy, Paul M. (1965) 'Economics of Two Worlds,' in *On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nometrics*. Oxford: Pergamon, pp. 15–29.
Baran, Paul A. and Sweezy, Paul M. (1966) *Monopoly Capital: 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arlow, William (1989) *'Looking up at Down': The Emergence of Blues Cul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Barrett, Michèle and McIntosh, Mary (1980) 'The Family Wage,' *Capital and Class*, No. 11 (Summer), pp. 51–72.
Bartlett, Donald L. and Steele, James B. (1992) *America: What Went Wrong?* Kansas City: Andrews and McMeel.
Baudrillard, Jean (1975)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Trans. by Mark Poster. St Louis: Telos Press.
Baudrillard, Jean (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Trans. by Charles Levin. St Louis: Telos Press.
Bauman, Zygmunt (1989)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Cambridge: Polity.
Becker, Gary S. (1975) *Human Capital*.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Becker, Jörg (1988) 'Electronic Homework in West Germany,' in Mosco and Wasko (eds) (1988), pp. 247–273.
Becker, Jörg (ed.) (1989) *Telefonieren*. Marburg: Jonas.
Becker, Jörg (1990) *Fern-sprechen*. Stuttgart: Institute for Cultural Exchange.
Becker, Jörg, Hedebro, Goran, and Paldan, Leena (eds) (1986) *Communication and Domination: Essays to Honor Herbert I. Schiller*. Norwood, NJ: Ablex.
Bekken, Jon (1990) ' "This Paper is Owned by Many Thousands of Working Men and Women": Contradictions of a Socialist Dail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Boston, August.
Bell, Daniel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Bell, Daniel (197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Bell, Daniel (1981) 'Models and Reality in Economic Discourse,' in Daniel Bell aud Irving Kristol (eds) *The Crisis in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pp. 46–80.
Bello, Walden and Rosenfeld, Stephanie (1992) *Dragons in Distress: Asia's Miracle Economies in Crisis*. New York: Penguin.
Beltrán, Luis R. (1976) 'Alien Premises, Objects, and Methods in Latin Ame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3, No. 2, pp. 107–134.
Beltrán, Luis R. and Fox de Cardona, Elizabeth (1980) *Communicación Dominada: Estados Unidas en los Medios de América Latina*. Mexico City: Instituto Latinoamericano de Estudios Transnacionales/Nueva Imagen.

Beniger, James R. (1986) *The Contro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ntham, Jeremy (1890) *Utilitarianism*. London.

Benton, Ted (1989)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New Left Review*, No. 178 (Nov/Dec), pp. 51–86.

Berberoglu, Berch (ed.) (1993) *The Labor Process and Control of Labo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 Relation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T: Praeger.

Berland, Jody (1992) 'Angels Dancing: Cultural Technolog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n Grossberg et al. (1992), pp. 38–55.

Berman, Marshall (1988)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New York: Penguin (orig. 1982).

Bernstein, Richard (1989) 'Social Theory as Critique,' in David Held and John B. Thompson (eds), *Social Theory of Modern Societies: Anthony Giddens and His Cr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9–33.

Bettig, Ronald V. (1992)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Copyright,'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9 (June), No. 2, pp. 131–155.

Block, Fred (1990)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lumler, Jay G. and Nossiter, T.J. (eds) (1991) *Broadcasting Finance in Transition: A Comparative Handboo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afo, S.T. Kwame (1991)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Sussman and Lent (eds) (1991), pp. 103–124.

Boafo, S.T. Kwame and George, Nancy (eds) (1992)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Africa: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Nairobi: African Council o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Bohm, David and Hiley, B.J. (1993) *The Undivided Universe: An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Bowles, Samuel and Gintis, Herbert (1986)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roperty, Commun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Bowles, Samuel, Gordon, David M., and Weisskopf, Thomas E. (1990) *After the Wasteland: A Democratic Economics for the Year 2000*. Armonk, NY: M.E. Sharpe.

Boyer, Robert (1986) *La Théorie de la Régulation: Une Analyse Crit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Braman, Sandra (1989) 'Defining Information: An Approach for Policymakers,'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September), pp. 233–242.

Braudel, Fernand (1975)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 Trans. by Miriam Kochan. New York: Harper & Row.

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rennan, Geoffrey and Buchanan, James M. (1985) *The Reason of Rules: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ennan, Timothy J. (1992) 'Integrat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into Media Policy: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August), pp. 460–474.

Bruck, Peter (1992) 'Discursive Movements and Social Movements: The Active Negotiation of Constraints,' in Wasko and Mosco (eds) (1992), pp. 138–158.

Brunn, Stanley D. and Leinbach, Thomas R. (eds) (1991) *Collapsing Space and Time: Geographic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London: HarperCollins Academic.

Buchanan, James (1986) *Liberty, Market and State: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1980s*. Brighton: Wheatsheaf.

Buchanan, James and Tollison, Robert D. (eds) (1984) *The Theory of Public Choice – II*.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Budd, Mike, Entman, Robert M., and Steinman, Clay (1990) 'The Affirmative Character of U.S.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7, No. 2, pp. 169–184.

Buhle, Paul (ed.) (1987) *Popular Culture in Americ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rgess, Jacquelin (1990)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Environmental Meanings in the Mass Media: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1990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 15, pp. 139–161.

Burke, Edmund (1910)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London: J.M. Dent & Sons, Ltd (orig. 1790).

Burke, Kenneth (1969a) *A Grammar of Motiv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rig. 1945).

Burke, Kenneth (1969b) *A Rhetoric of Motiv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rig. 1950).

Burt, Ronald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usiness Week (1994)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June 6, p. 26.

Buxton, William (199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the "Radio Wars" and the Princeton Radio Research Project,' in Babe (ed.) (1994), pp. 147–175.

Calabrese, Andrew and Jung, D. (1992) 'Broadb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Rural America: An Analysis of Emerging Infrastructures,'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Vol. 16 (April), No. 3, pp. 225–236.

Canada, Statistics Canada (1993) *Selected Income Statistics*. Ottawa: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ada, (1991 Census of Canada), Catalogue # 93–331.

Cardoso, F. H. (1993) 'Communication for a New World,' in José Marques de Melo (ed.) *Communication for a New World: Brazilian Perspectives*. São Paulo: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pp. 9–19.

Cardoso, F.H. and Faletto, E. (1979)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rey, James W. (1979)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An American View,' in Curran et al. (eds) (1979), pp. 409–425.

Carey, James W. (1994) 'Communications and Economics,' in Babe (ed.) (1994), pp. 321–336.

Carlyle, Thomas (1984) *A Carlyle Reader*. Ed. by G.B. Tenny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rragee, Kevin M. (1990) 'Interpretive Media Study and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7, No. 2, pp. 81–96.

Castells, Manuel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Oxford: Blackwell.

Castells, Manuel and Henderson, Jeffrey (1987) 'Techno-Economic Restructuring, Socio-Political Processes 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in Jeffrey Henderson and Manuel Castells (eds),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Beverly Hills: Sage.

CCCS Women's Studies Group (1978) *Women Take Issue*. London: Hutchinson.

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1984) 'Backgroun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re,' Planning document sub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1991) 'Research Programme,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Publications,' March.

Cesareo, Giovanni (1992) 'Privacy and Secrecy: Social Control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the Information System,' In Wasko and Mosco (eds) (1992), pp. 87–97.

Chaffee, Steven H., Gomez-Palacio, Carlos, and Rogers, Everett M. (1990)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Latin America: Views from Here and There,' *Journalism Quarterly*, Vol. 67 (Winter), No. 4, pp. 1015–1024.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1994) *Harper's Magazine*, April, p. 17.

Chandler, Alfred D., Jr (1977)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pman, Keith and Walker, David (1987) *Industrial Location*. Oxford: Blackwell.

Chase-Dunn, Christopher (1989) *Global Formation: Structures of the World-Economy*. Oxford: Blackwell.

Christopherson, Susan and Storper, Michael (1989) 'The Effects of Flexible Specialisation on Industrial Politics and the Labour Market: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Industrial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Vol. 42, No. 3, pp. 331–347.

Clark, Barry (1990) *Political Econom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New York: Praeger.

Clement, Andrew (1990) 'Computers and Organizations,' in Jacques Berleur, Andrew Clement, Richard Sizer, and Diane Whitehouse (ed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volving Landscapes*.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pp. 305–326.

Clement, Andrew (1992) 'Electronic Workplace Surveillance: Sweatshops and Fishbowls,' *Canadi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17 (December), No. 4, pp. 18–45.

Clement, Wallace (1975) *The Canadian Corporate Elite: An Analysis of Economic Power*.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Clement, Wallace (1977) *Continental Corporate Power: Economic Linkages Betwee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Clement, Wallace and Williams, Glen (1989) 'Introduction,' in Wallace Clement and Glen Williams (eds) *The New Canadian Political Economy*. Kingston an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pp. 3–15.

Coase, Ronald H. (1991)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hen, G.A. (1978)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hen, G.A. (1991) 'The Future of a Disillusion,' *New Left Review*, No. 190, (Nov./Dec.), pp. 5–20.

Coletti, Lucio (1979) *Marxism and Hegel*. Trans. by Lawrence Garn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orig. 1973).

'Colloquy' (1995) *Critical Stn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12, No. 1, pp. 60–100.

Comor, Edward A. (ed.) (1994)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Hegemony, Telecommunic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Compaine, Benjamin M. (1986) 'Information Gaps: Myth or Reality?'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March), pp. 5–12.

Compaine, Benjamin M. et al. (1982) *Who Owns the Media?: Concentration of Ownership in the Mass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White Plains, NY: Knowledge Industry Publications (2nd rev. edn).

Connell, Rob (1987) *Power and Gend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oper, Kent (1942) *Barriers Down*. New York: Farrar.

Costello, Nicholas, Michie, Jonathan, and Milne, Seumas (1989) *Beyond the Casino Economy*. London: Verso.

Coulter, Bernard G. (1992)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Canadian Telecommunication Policy'. Doctoral dissertation, Carleto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Cox, Meg (1993) ' "Madison County" Author Crosses Bridge to Music,'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6, p. B1.

Cox, Meg (1994) 'Paramount Unit to Cut Number of Books Published Under the Macmillan Imprin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4, p. B5.

Crandall, Robert W. (1991) *After the Breakup: U.S. Telecommunications in a More Competitive Er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Crawford, Margaret (1992) 'The World in a Shopping Mall,' in Sorkin (ed.) (1992), pp. 3–30.

Creedon, Pamela J. (ed.) (1993) *Women in Mass Communication: Challenging Gender Val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2nd edn).

Curran, James (1979) 'Capitalism and Control of the Press, 1800–1975,' in Curran et al. (1979), pp. 195–230.

Curran, James (1990) 'The New Revisionism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Reappraisal,'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 pp. 135–164.

Curran, James (1991)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London: Routledge (4th edo).

Curran, James and Gurevitch, Michael (1991) 'Introduction,'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pp. 7–11.

Curran, James, Gurevitch, Michael, and Woollacott, Janet (eds) (1979)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Beverly Hills: Sage.

Dahl, Robert A. (1982) *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ahlgren, Peter and Sparks, Colin (eds) (1991)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New Media A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Danielian, N.R. (1939) *The AT&T*. New York: Vanguard.

Dates, Jannette L. and Barlow, William (eds) (1993) *Split Image: 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Mass Media*. Washington, D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n).

Davies, Paul (1993) 'The Holy Grail of Physics,'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rch 7, pp. 11–12.

Davis, John (1992) *Exchan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avis, Mike (1990) *City of Quartz*. New York: Verso.

Davis, Susan, G. (1986) *Parades and Power: Street Theater in Nineteenth-Century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de Haven-Smith, Lance (1988) *Philosophical Critiques of Policy Analysis: Lindblom, Habermas, and the Great Society*.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de la Haye, Yves (ed.) (1980) *Marx and Engels on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De Witt, Karen (1993) 'The Nation's Library, for a Fee and a Modem,'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8, p. E16.

Demsetz, Harold and Lehn, Kenneth (1985) 'The Structure of Corporate Ownership: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3, No. 6, pp. 1155–1177.

Denious, Robert D. (1986) 'The Subsidy Myth: Who Pays for the Local Loop?'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September), pp. 259–267.

Derthick, Martha and Quirk, Paul J. (1985) *The Politics of Deregul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Darvin, Brenda (1987)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Feminist Scholarship to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7 (Autumn), No. 4, pp. 107–120.

DeSimone, Mark (1992) 'Information is Value,' *The Globe and Mail*, March 3, p. B8.

Domhoff, G. William (1978) *The Powers That Be: Processes of Ruling Class Domin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Domhoff, G. William (1990) *The Power Elite and the State: How Policy is Made in America*. New York: A. de Gruyter.

Dorfman, Ariel and Mattelart, Armand (1975) *How to Read Donald Duck*. London: International General.

Dos Santos,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pp. 231–236.

Douglas, Sarah (1986) *Labor's New Voice: Unions and the Mass Media*. Norwood, NJ: Ablex.

Douglas, Susan J. (1987) *Inventing American Broadcasting, 1899–1922*.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owning, John D.H. (1984) *Radical Media*. Boston: South End Press.

Downing, John D.H. (1988) ' "The Cosby Show" and American Racial Discourse,' in Geneva Smitherman-Donaldson and Teun A. van Dijk (eds), *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p. 46–73.

Downing, John D.H. (199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 Television,' *Monthly Review*, Vol. 42 (May), No. 1, pp. 30–41.

Dreier, Peter (1982) 'The Position of the Press in the US Power Structure,' *Social Problems*, Vol. 29, No. 3, pp. 293–310.

Drohan, Madelaine (1993) 'BBC Broadcasts Take Reality Out of the Studio,' *The Globe and Mail*, July 21, p. B17.

DuBoff, Richard (1984) 'The Rise of 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 The Telegraph Industry, 1844–1880,'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4, No. 3, pp. 52–66.

DuBoff, Richard (1989) *Accumulation and Power: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onk, NY: M.E. Sharpe.

Dun's Marketing Services (1991) *Million Dollar Directory*. Parsippany, NJ: Dun and Bradstreet.

During, Simon (ed.) (1993a)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During, Simon (1993b) 'Introduction,' in During (ed.) (1993a), pp. 1–25.

Dyson, Kenneth and Humphreys, Peter (199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Dimensions*. London: Routledge.

Eatwell, John, Milgate, Murray, and Newman, Peter (1987)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Edwards, Richard (1979)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Ehrbar, Al (1993) 'Price of Progress: "Re-Engineering" Gives Firms New Efficiency, Workers the Pink Sli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6, pp. A1, A11.

Eisenstein, Elizabeth (1979)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liott, Philip and Golding, Peter (1972)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Social Change.' Paper given to the 1972 Conference of the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Elster, John (1985)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mmanuel, Arghiri (1972)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 Trans. by Brian Pear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Engels, Friedrich (1972)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orig. 1889).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1974) *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 New York: Seabury Press.

Etzioni, Amitai (1988) *The Moral Dimension: Toward a New Economics*. New York: Free Press.

Evans, William A. (1990) 'The Interpretive Turn in Media Research: Innovation, Iteration, or Illus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7, No. 2, pp. 147–168.

Ewen, Stuart (1976)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McGraw Hill.

Ewen, Stuart (1988) *All Consuming Images*. New York: Basic Books.

Fadul, Anamaria and Straubhaar, Joseph (1991)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Informatics in Brazil: The Current Challenges,' in Sussman and Lent (eds) (1991), pp. 214–233.

Fanon, Frantz (1965) *A Study in Dying Colon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orig. 1959).

Featherstone, Mike (ed.) (1990)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Newbury Park, CA: Sage.

Fejes, Fred (1981) 'Media Imperialism: An Assessment,'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3, pp. 281–289.

Ferguson, Marjorie (1992) 'The Mythology About Global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7, pp. 69–93.

Feyerabend, Paul K. (1988) *Against Method*. London: Verso (rev. edn).

Fishman, Mark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Fiske, John (1989)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 Unwin Hyman.

Flichy, Patrice (1991) *Une histoire de la communication moderne: Espace public et vie privée*. Paris: La Dúcouverte.

Foster, John Bellamy (1988) 'The Fetish of Fordism,' *Monthly Review*, Vol. 39 (March), pp. 14–20.

Foucault, Michel (1982) *Power/Knowledge*. Trans. by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Fox, Elizabeth (ed.) (1988) *Media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Newbury Park, CA: Sage.

Fraser, Nancy (1993)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in Robbins (ed.) (1993), pp. 1–32.

Freeman, Christopher (1984) *Long Wave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Frances Pinter.

Freire, Paulo (1974)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Seabury Press.

Friedman, Benjamin M. (1988) *Day of Reckoning: The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under Reagan and Af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Friesen, Valerie (1992) 'Trapped in Electronic Cage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4, pp. 31–49.

Fuku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Galbraith, John Kenneth (1958)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4th rev. edn).

Galbraith, John Kenneth (1967)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Galbraith, John Kenneth (1987) *Economics in Perspective: A Critical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Galbraith, John Kenneth (1992) *The Culture of Content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Gallagher, Margaret (1980) *Unequal Opportunities: The Case of Women and the Media*. Paris: UNESCO.

Gallagher, Margaret (1984) *Employment and Positive Action for Women in the Television Organizations of the EEC Member States*. Brussels: Commission for European Communities.

Gallagher, Margaret (1985) *Unequal Opportunities: Update*. Paris: UNESCO.

Gallagher, Margaret (1992) 'Women and Men in the Med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s*, special issue, Vol. 12, No. 1, pp. 1–36.

Gandy, Oscar, H. Jr (1992) 'The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A Critical Challenge,'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Summer), pp. 23–42.

Gandy, Oscar H. Jr (1993) *The Panoptic So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Gans, Herbert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Pantheon.

Garnham, Nicholas (1979) 'Contribution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 123–146.

Garnham, Nicholas (1981) 'Subjectivity, Ideology, Clas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creen*, Vol. 20, No. 1, pp. 121-133.

Garnham, Nicholas (1986)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Golding et al. (eds) (1986), pp. 37–52.

Garnham, Nicholas (1988) 'In Appreciation: 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 A Cultural Analyst, A Distinctive Tradi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8 (Autumn), No. 4, pp. 123–131.

Garnham, Nicholas (1990)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Sage.

Gates, Henry Louis, Jr (1989) 'Whose Canon Is It, Anyway?'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February 26, pp. 1, 44–45.

Giddens, Anthony (1981)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a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 Anthony and Held, David (eds) (1982) *Classes, Power, and Conflict: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ll, Stephen and Law, David (1988)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1966) *Women and Economics: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as a Factor in Social 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orig. 1889).

Gilpin, Alan (1977) *Dictionary of Economic Terms*. Londnn: Butterworths.

Gilpin, Robert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itlin, Todd (1979) '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 *Theory and Society*, Vol. 6, No. 2, pp. 205–253.

Gitlin, Todd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tlin, Todd (1993) 'From Universality to Difference: Notes on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Idea of the Left,' *Contention: Debates in Society, Culture, and Science*, Vol. 2 (Winter), No. 2, pp. 15–40.

Gleick, James (1987) *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 New York: Penguin.

Goldberg, Kim (1990) *The Barefoot Chonnel: Community Television as a Tool for Social Change*. Vancouver: New Star Books.

Golding, Peter and Middleton, Sue (1982) *Images of Welfare: Press and Public Attitudes to Poverty*.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Golding, Peter and Murdock, Graham (1991)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pp. 15–32.

Golding, Peter, Murdock, Graham, and Schlesinger, Philip (eds) (1986) *Communicating Politic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Goldman, Robert and Rajagopal, Arvind (1991) *Mapping Hegemony: Television News Coverage of Industrial Conflict*. Norwood, NJ: Ablex.

Gomery, Douglas (1989) 'Media Economics: Terms of Analysi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6, No. 2, pp. 43–60.

Gorz, Andre (1982)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Trans. by Michael Soneenscher. London: Pluto.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òn Notebooks*. Trans. by Geoffrey Nowell *Smith*.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Gran, Peter (1990) 'Studies of Anglo-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Democracy, Orientalism, and the Left,' in Hisham Sharabi (ed.), *Theory, Politics and the Arab World: Critical Responses*. New York: Routledge, pp. 228–254.

Greenfeld, Liah (1992)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rossberg, Lawrence (1991) 'Strategies of Marxist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n Robert K. Avery and David Eason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pp. 126–159.

Grossberg, Lawrence, Nelson, Cary, and Treichler, Paula (eds) (1992)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Guback, Thomas (1969) *The International Film Industry: Western Europe and America Since 194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Guback, Thomas (1987) 'The Evolution of the Motion Picture Theater Business in the 1980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7 (Spring), No. 2, pp. 60–77.

Guback, Thomas (1989) 'Should a Nation Have Its Own Film Industry?' *Directions*, Vol. 3, No. 1, pp. 489–492.

Guback, Thomas (1991) 'Capital, Labor Power, and the Identity of Film,' *Current Research in Film*, Vol. 5, pp. 126–134.

Guback, Thomas (ed.) (1993)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 Dallas Smyth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Gunder Frank, André (1969)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Gutiérrez, Félix (1990) 'Advertising and the Growth of Minority Markets and the Med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Vol. 14 (Winter), No. 1, pp. 6–16.

Habermas, Jürgen (1973) *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Habermas, Jürgen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rans. by Thomas Burger with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orig. 1962).

Hafner, Katie and Markoff, Joho (1991) *Cyherpunk: Outlaws and Hackers on the Computer Fronti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Hagerstrand, Torsten (1968)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rans. by Allan Pr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ight, Timothy R., and Weinstein, Laurie R. (1981) 'Changing Ideology on Television by Changing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Notes on a Contradictory Situation,' in Emile G. McAnany, Jorge Schnitman, and Noreene Janus (ed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Praeger, pp. 110–144.

Hall, Peter and Preston, Paschal (1988) *The Carrier Wav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1846–2003*. London: Unwin and Hyman.

Hall, Stephan S. (1992) *Mapping the Next Millennium: Discovering the New Geograph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Hall, Stuart (1973) 'A Reading of Marx's 1857 Introduction to the *Grundrisse*.' Stencilled Occasional Paper, 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Hall, Stuart (1980)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2, pp. 57–72.

Hall, Stuart (1982)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Michael Gurevitch, Tony Bennett, James Curran, and Jane Woollacott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New York: Methuen, pp. 56–90.

Hall, Stuart (1986) 'Media Power and Class Power,' in James Curran (ed.). *Bending Reality: The State of the Media*. London: Pluto Press, pp. 5–14.

Hall, Stuart (1989a) 'Ide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Brenda Dervin, Lawrence Grossberg, Barbara J. O'Keefe, and Ellen Wartella (eds),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Paradigm Iss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40–52.

Hall, Stuart (1989b) 'Ethnicity: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Radical America*, Vol. 23, No. 4, pp. 9–20.

Hall, Stuart (1993) 'Encoding, Decoding,' in During (ed.) (1993a), pp. 90–103.

Hall, Stuart and Jefferson, Tony (eds) (1976)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Halloran, James (1963) *Control or Consent?: A Study of the Challenge of Mass Communication*. London: Sheed and Ward.

Halloran, James (1978) 'Further Development or Turning the Clock Back?: Social Research on Broadcast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8 (Spring), No. 2, pp. 120–132.

Halloran, James (1981) 'The Context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Emile McAnany, Jorge Schnitman, and Noreene Janus (ed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Praeger, pp. 21–57.

Halloran, James (1983)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is the Answer but What is the Questio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7, pp. 158–167.

Hamelink, Cees (1983) *Finance and Information: A Study of Converging Interests*. Norwood, NJ: Ablex.

Hamelink, Cees and Linné, Olga (1992)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Honor of James D. Halloran*. Norwood, NJ: Ablex.

Hannigan, John (1991) 'Canadian Media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an Age of Global Megamedia Empires,' in Benjamin Singer (ed.), *Communication and Canadian Society*. Scarborough, Ont.: Nelson, pp. 238–257.

Haraway, Donna J.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Harding, Sandra and Hintikka, Merrill B. (eds) (1983) *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Boston: D. Reidel.

Hardt, Hanno (1990) 'Newsworkers, Technology, and Journalism Histor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7, No. 4, pp. 346–365.

Hardt, Hanno (1992)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in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Hartmann, Heidi I. (1979)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Capital and Class*, Vol. 8, pp. 1–33.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Haug, W.F. (1986) *Critique of Commodity Aesthetics*. Trans. by Robert Bock.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awkesworth, M.E. (1988) *Theoretical Issues in Policy Analysi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Head, Sidney (1974) *Broadcasting in Af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Heilbroner, Robert L. (1986)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6th rev. edn).

Heller, Walter W. (1967) *New Dimensions i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W.W. Norton.

Hepworth, Mark (1989) *Geography of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London: Belhaven Press.

Hepworth, Mark and Robins, Kevin (1988) 'Whose Information Society?: A View From the Peripher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0, pp. 323–343.

Herman, Edward S. and Chomsky, Noam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Heyzer, Noeleen (1986) *Working Women in Southeast Asia: Development, Subordination, and Emancipation*.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Hillard, Michael (1991) 'Domin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 Review and Appraisal of Braverman, Marglin, Noble,' *Rethinking Marxism*, Vol. 4 (Summer), No. 2, pp. 61–78.

Hills, Jill (1986) *Deregulating Telecoms: Competition and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Britain*. London: Frances Pinter.

Hills, Jill with Papathanassopoulos, Stylianos (1991) *The Democracy Gap: The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New York: Greenwood.

Hirst, Paul and Zeitlin, Jonathan (1991)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versus Post-Fordism: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0, No. 1 (February), pp. 1–56.

Hobsbawm, Eric (1973) '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in Robin Blackburn (ed.), *Ide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Hobsbawm, Eric (1983)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in Eric Hobsbawm and Ter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14.

Hoggart, Richard (1957) *The Uses of Lite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Honig, David (1984) 'The FCC and its Fluctuating Commitment to Minority Ownership of Broadcast Facilities,' *Howard Law Journal*, Vol. 27, No. 3, pp. 859–877.

Horkheimer, Max (1947) *The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rton, Byrne J. (1948) *Dictionary of Modern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

Horwitz, Robert (1989) *The Irony of Regulatory Refor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la, Richard C. (1988) *Market-Base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Humphreys, Peter (1986) 'Legitimating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Governments, Parties and Trade Unions in Britain, France and West Germany,' in Kenneth Dyson and Peter Humphreys (eds), *The Politics of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Frank Cass, pp. 163–194.

Hund, Wulf and Kirchoff-Hund, Barbel (1985) 'Problems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y Robert Peck.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5, pp. 83–88.

Ibrahim, S.M. (1981) *The Flow of News into Suda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Khartoum: El Sahafa Press.

IDATE (1992) *Industrial Analyses: The World Film and Television Market*, Vol. 1. Montpellier: IDATE.

Ingram, John Kells (1923) *A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C Black.

Innis, Harold (1972)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 (1968)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Ito, Youichi (1989) 'Major Concepts and Theories in Information Society Studies,' in *Proceedings: Asia's Experience in Informatization*. Taipei, Taiwan, May 10–12.

Jameson, Frederic (1989) '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 *New Left Review*, No. 176 (July/August), pp. 31–45.

Jankowski, Nick, Prehn, Ole, and Stappers, James (1992) *The People's Voice Local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Europe*. London: John Libbey.

Jansen, Sue Curry (1989) 'Gender an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 Socially Structured Sil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9 (Summer), No. 3., pp. 196–215.

Janus, Noreene (1984) 'Advertising and the Creation of Global Markets: The Role of the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Mosco and Wasko (eds) (1984), pp. 57–70.

Janus, Noreene (1986) 'Transnational Advertising: Some Consideration on the Impact on Peripheral Societies,' in Atwood and McAnany (eds) (1986), pp. 127–142.

Jessop, Bob (1990) *State Theory: 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Jevons, William Stanley (1965)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M. Kelley (orig. 1870).

Jhally, Sut (1990) *The Codes of Advertising: Fetish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aning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Jhally, Sut and Lewis, Justin (1992) *Enlightened Racism: The Cosby Show, Audiences, and the Myth of the American Drea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Johnson, Paul (1993) 'Colonialism's Back – and Not a Moment Too Soo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18, pp. 22, 43.

Johnson, Richard (1987)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 *Social Text*, Vol. 17 (Winter), pp. 38–80.

Jones, Alex S. (1991) 'Newspapers Try, Carefully, to Investigate Subscriber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7, p. 22.

Jöuet, Josiane (1987) *L'Ecran apprivoisé: Télématique et informatique à domicile*. Paris: CNET.

Jussawalla, Meheroo (1986) *The Passing of Remoteness: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in the Asia-Pacific*.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atz, Michael B., Doucet, Michael J., and Stern, Mark J. (1982)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eane, John (1984) *Public Life and Late Capitalism: Toward a Socialist Theory of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enan, Thomas (1993) 'Windows of Vulnerability,' in Robbins (ed.) (1993), pp. 121–141.

Kellner, Douglas (1989)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ellner, Douglas (1990) *Television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Kellner, Douglas (1995) *Media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Keynes, John Maynard (1964)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Kieve, Ronald A. (1986) 'From Necessary Illusion to Rational Choice? A Critique of Neo-Marxist Rational-Choice Theor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5, No. 4, pp. 557–582.

Kilborn, Peter T. (1990) 'Workers Using Computers Find a Supervisor Inside,'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3, pp. 1, 8.

King, Thomas R. (1993) ' "Jurassic Park" Offers a High-Stakes Test of Hollywood Synerg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0, p. 1.

Kraft, Philip and Dubnoff, Steve (1986) 'Job Content, Fragmentation and Control in Computer Software Work,' *Industrial Relations*, Vol. 25, pp. 184–196.

Kramarae, Cheris (1989) 'Feminist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57–160.

Krasnow, Erwin D., Longley, Lawrence D., and Terry, Herbert A. (1982) *The Politics of Broadcast Regul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3rd edn).

Kristol, Irving (1983) *Reflections of a Neoconserva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Kuhn, Thoma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enlarged edn).

Kumar, Keval J. (1989) *Mass Communication in India*. Bombay: Jaico (2nd rev. edn).

Laclau, Ernesto (1977)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New Left Books.

Laclau, Ernesto and Mouffe, Chantal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Trans. by Winston Moore and Paul Cammack. London: Verso.

Lakatos, Imre (1978)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ne, Robert E. (1991) *The Market Exper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rson, Erik (1992) 'Watching Americans Watch TV,' *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pp. 66–80.

Lash, Scott and Urry, John (1987)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Latour, Bruno (1987) *Science in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bowitz, Michael (1986) 'Too Many Blindspots on the Media,'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No. 21 (August), pp. 165–173.

Lee, Jeong-Taik (1988) 'Dynamics of Labor Control and Labor Protest in the Process of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in South Korea,' *Asian Perspectives*, Vol. 12 (Spring–Summer), No. 1., pp. 134–158.

Lefebvre, Henri (1979)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in J.W. Freiberg (ed.), *Critical Sociology: European Perspectives*. New York: Irvington, pp. 285–295.

Lent, John A. (1985) *Women and Mass Media in Asia: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Singapore: Asia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re.

Lent, John A. (ed.) (1990) *The Asian Film Industry*. London: Christopher Helm.

Lent, John A. (1991) *Women and Mass Communications: An International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Lerner, Daniel (1949) *Sykewar: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Germany, D-Day to V-E Day*. New York: Stewart.

Lerner, Daniel (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Levins, Richard and Lewontin, Richard C. (1985) *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vy, Jonathan D. and Setzer, Florence O. (1984) 'Market Delineation, Measurement of Concentration, and F.C.C. Ownership Rules,' in Vincent Mosco (ed.), *Policy Research in Telecommunications*. Norwood, NJ: Ablex, pp. 201-212.

Lindblom, Charles E. (1977)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Lindlof, Thomas R. (1991) 'Qualitative Study of Media Audienc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Vol. 35 (Winter), No. 1, pp. 23–42.

Lipietz, Alain (1988) 'Reflections on a Tale: The Marxist Foundations of the Concepts of Regulation and Accumulation,'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Vol. 26 (Summer), pp. 7–36.

Livant, William (1979) 'The Audience Commodity: On the "Blindspot" Debat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 3. No. 1, pp. 91–106.

Long, Elizabeth (1989) 'Femi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6 (December), No. 4, pp. 427–435.

Lonidier, Fred (1992) 'Working with Unions II: A Photo Essay,' in Wasko and Mosco (eds) (1992), pp. 125–137.

Lovelock, J.E. (1987) *Gaia: 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ukács, Georg (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Trans. by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Luke, Timothy (1989) *Screens of Power: Ideology, 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 in Informational Society*.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Lunn, Eugene (1982) *Marxism and Modernism: An Historical Study of Lukács, Brecht, Benjamin and Adorn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ux, Kenneth (1990) *Adam Smith's Mistake*. Boston: Shambhala.

Lyotard, Jean François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cAnany, Emile G. (1986) 'Seminal Ideas in Latin American Cr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 Agenda for the North,' in Atwood and McAnany (eds) (1986), pp. 28–47.

McChesney, Robert W. (1992a) 'Labor and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WCFL and the Battle for Labor Radio Broadcasting, 1927–1934,' *Journalism Monographs*, No. 134 (August).

McChesney, Robert W. (1992b) 'Off Limits: An Inquiry into the Lack of Debate over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ntrol of the Mass Media in U.S. Political Life,' *Communication*, Vol. 13, pp. 1–19.

McChesney, Robert W. (1993) *Telecommunications,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The Battle for the Control of U.S. Broadcast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Closkey, Donald N. (1985)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acDonald, J. Fred (1983) *Blacks and Whites: Afro-Americans in Television Since 1948*. Chicago: Nelson-Hall.

McIntyre, Richard (1992) 'Theories of Uneve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Rethinking Marxism*, Vol. 5 (Fall), No. 3, pp. 75–105.

McKibben, Bill (1992) *The Age of Missing Inform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McLaughlin, John F. (1992) 'Unequal Access to Information Resources among Corporations: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Ninth World Communications Forum, Tokyo, draft October 15.

McLaughlin, John F. with Antonoff, Anne Louise (1986) *Mapping the Information Business*. Publication P–86–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ogram 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Policy.

McNally, David (1993) *Against the Market: Political Economy, Market Socialism and the Marxist Critique*. London: Verso.

McPhail, Thomas (1987) *Electronic Colonialism*. Beverly Hills, CA: Sage (rev. edn).

Magder, Ted (1989) 'Taking Culture Seriousl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in Wallace Clement and Glen Williams (eds), *The New Canadian Political Economy*. Kingston an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pp. 278–296.

Mahon, Rianne (1980) 'Regulatory Agencies: Captive Agents or Hegemonic Apparatuses,' in J. Paul Grayson (ed.), *Class, State, Ideology, and Change*. Toronto: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pp. 154–168.

Mahoney, Eileen (1988) 'The Intergovernmental Bureau For Informatic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thin the Changing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in Mosco and Wasko (eds) (1988), pp. 297–315.

Malone, Thomas W. and Rockart, John F. (1991) 'Computers, Networks and the Corpor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September), pp. 128–136.

Mandel, Michael J. (1991) 'They're Not Eating Crow, But . . . : Radical Economists are Rewriting Their Critique of Capitalism,' *Business Week*, October 14, pp. 78, 81.

Mandel, Michael J. (1994) 'The Digital Juggernaut,' *Business Week*, June 6, pp. 22–37.

Manet, Enrique Gonzalez (1988) *The Hidden War of Information*. Trans. by Laurien Alexandre. Norwood, NJ: Ablex.

Mansell, Robin (1993) *The New Telecommunication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Network Evolution*. Sage: London

Markovich, Denise E. and Pynn, Ronald E. (1988)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Using Economics with Politics*.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Marques de Melo, José (ed.) (1991) *Communication and Democracy: Brazilian Perspectives*. São Paulo: ECA/USP.

Marshall, Alfred (1961)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orig. 1890).

Martin, Michèle (1991) *'Hello, Central?': Gender, 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 the Formation of Telephone Systems*.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Marx, Karl (1973) *The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y Martin Nicolaus. Harmondsworth: Penguin (orig. 1939).

Marx, Karl (1976a)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Trans. by Ben Fowkes. London: Penguin (orig. 1867).

Marx, Karl (1976b) *Collected Works*, Vol. V.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ssey, Doreen (1984)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London: Methuen.

Massey, Doreen (1992) 'Politics and Space/Time,' *New Left Review*, No. 196 (Nov./Dec.), pp. 65–84.

Masuda, Yoneji (1970) 'Social Impact of Computer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Future Research Conference on Challenges from the Future*. Tokyo: Kodansha.

Masuda, Yoneji (1981)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ashington, DC: World Future Society.

Mattelart, Armand (1983) 'Introduction: For a Class and Group Analysis of Popular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in Mattelart and Siegelaub (eds) (1983), pp. 17–67.

Mattelart, Armand (ed.) (1986) *Communicating in Popular Nicaragu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Mattelart, Armand (1991) *Advertising International: The Privatisation of Public Space*. Trans. by Michael Chanan, London: Comedia and Routledge.

Mattelart, Armand and Mattelart, Michèle (1992) *Rethinking Media Theory: Signposts and New Directions*. Trans. by James A. Cohen and Marina Urquid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orig. 1986).

Mattelart, Armand and Siegelaub, Seth (eds) (1979)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Vol. 1: Capitalism, Imper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Mattelart, Armand and Siegelaub, Seth (eds) (1983)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Vol. 2: Liberation, Soc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Mattelart, Armand, Delcourt, Xavier, and Mattelart, Michèle (1984) *International Image Markets: In Search of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Comedia (orig. 1983).

Mattelart, Michèle (1977) 'Création populaire et résistance au système des media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al Imperialism, Algiers, October 11–15.

'The Media Charter of 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1992) *Media Development*, No. 2, p. 41.

Meehan, Eileen R. (1984) 'Ratings and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A Third Answer to the Commodity Quest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1, No. 2, pp. 216–225.

Mehegan, David (1994) 'High Fliers and Bumpy Landings,' *Boston Sunday Globe*, January 2, p. 57.

Melody, William (1984) 'Direet Testimony to the Pennsylvania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Docket No. P–83045, August.

Melody, William (1990) 'The Information in I.T.: Where Lies the Public Interest,' *Intermedia*, Vol. 18 (June-July), No. 3, pp. 10–18.

Merton, Robert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Meyrowitz, Joshua (1985) *No Sense of Pl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ège, Bernard (1987) 'The Logics at Work in the New Cultural Industrie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9, pp. 273–289.

Miège, Bernard (1989) *The Capit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Mignot-Lefèbvre, Yvonne (1993) 'Media Control and Freedom of Information in Franc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1993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ference on 'Europe in Turmoil,' Dublin, June.

Miliband, Ralph (1989) *Divided Societies: Class Struggle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e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 John Stuart (1848)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ston: C.C. Little and J.B. Brown.

Miller, David (1989) *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Jeff (1994) 'Should Phone Companies Make Film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p. F11.

Miller, John (1992) 'URPE and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Whence We Came,' *URPE Newsletter* (Fall), pp. 4–5.

Miller, Mark Crispin (1988) *Boxed In: The Culture of TV.*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Mills, C. Wright (1956)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dleski, Tania (1986) 'Introduction,' in Tania Modleski (ed.), *Studies in Entertainme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xi–xix.

Modleski, Tania (1991) *Feminism without Women: Culture and Criticism in a 'Postfeminist' Age*. New York: Routledge.

Montgomery, Katherine C. (1989) *Target: Prime Time – Advocacy Groups and the Struggle over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ody, Kim (1993) 'The Tele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How Union Jobs are Being Lost in an Expanding Industry,' *Labor Notes*, December.

Morley, David (1986) *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London: Comedia.

Morris-Suzuki, Tessa (1986) 'The Challenge of Computers,' *New Left Review*, No. 160 (Nov./Dec.), pp. 81–91.

Morris-Suzuki, Tessa (1988) *Beyond Computopia: Information, Automation, and Democracy in Japan*. London: Routledge.

Morris-Suzuki, Tessa (1989) *A History of Japanese Economic Thought*. New York: Routledge.

Morrison, David (1978)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rchives of European Sociology*, Vol. XIX, No. 2, pp. 347–359.

Mosco, Vincent (1982) *Pushbutton Fantasie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Videotex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orwood, NJ: Ablex.

Mosco, Vincent (1989a) *The Pay-per Society: Computers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oronto: Garamond; Norwood, NJ: Ablex.

Mosco, Vincent (1989b) 'Labour in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A Critical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in Brenda Dervin, Lawrence Grossberg, Barbara O'Keefe, and Ellen Wartella (eds),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Vol. II: Paradigm Exemplars*.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213–225.

Mosco, Vincent (1990a) 'The Mythology of Telecommunications Deregul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0 (Winter), No. 1, pp. 36–49.

Mosco, Vincent (1990b) 'Toward a Transnational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XV, No. 2, pp. 46–63.

Mosco, Vincent (1992) 'Une drôle de guerre,' *Media Stndies Journal*, Vol. 6 (Spring), No. 2, pp. 47–60.

Mosco, Vincent (1993a)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War and Peace,' in Roach (ed.) (1993a), pp. 41–70.

Mosco, Vincent (1993b) 'Transforming Telecommunications,' in Wasko, Mosco, and Pendakur (eds) (1993), pp. 132–151.

Mosco, Vincent (1995) 'Will Computer Communication End Geography?' Report P–95–4. Program 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Policy, Harvard University, September.

Mosco, Vincent and Herman, Andrew (1981) 'Critical Theory and Electronic Media,' *Theory and Society*, Vol. X, pp. 869–896.

Mosco, Vincent and Wasko, Janet (eds) (1983) *The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view. Vol. 1. Labor,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Media*. Norwood, NJ: Ablex.

Mosco, Vincent and Wasko, Janet (eds) (1984) *The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view. Vol. 2: Changing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Control*. Norwood, NJ: Ablex.

Mosco, Vincent and Wasko, Janet (eds) (1985) *The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view. Vol. 3: Popular Culture and Media Events*. Norwood, NJ: Ablex.

Mosco, Vincent and Wasko, Janet (eds) (198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osco, Vincent and Zureik, Elia (1987) *Computers in the Workplace: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Telephone Industry*. Ottawa, Government of Canada, Department of Labour.

Mowlana, Hamid (1990) 'Civil Society,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Islamic Society: A Comparative Societ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Bled, Yugoslavia, August 24–25.

Mowlana, Hamid (1993) The New Global Order and Cultural Ecolog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5, pp. 9–27.

Mowlana, Hamid, Gerbner, George, and Schiller, Herbert I. (eds) (1992) *Triumph of the Image: The Media's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 A Global Perspectiv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Moyal, Ann (1989) 'The Feminine Culture of the Telephone: People, Patterns and Policy,' *Prometheus*, Vol. 7 (June), No. 1, pp. 5–31.

Mulgan, G.J. (1991)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Network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Murdock, Graham (1978) 'Blindspots About Western Marxism: A Reply to Dallas Sm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 2, No. 2, pp. 109–119.

Murdock, Graham (1989a) 'Cultural Studies: Missing Link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6, No. 4, pp. 436–440.

Murdock, Graham (1989b) 'Critical Inquiry and Audience Activity,' in Brenda Dervin, Lawrence Grossberg, Barbara O'Keefe, and Ellen Wartella (eds),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Vol. II: Paradigm Exemplars*.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226–249.

Murdock, Graham (1990a) 'Television and Citizenship: In Defense of Public Broadcasting,' in Alan Tomlinson (ed.), *Consumption, Identity and Style*. London: Routledge, pp. 77–101.

Murdock, Graham (1990b) 'Redrawing the Map of the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in Marjorie Ferguson (ed.), *Public Com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 Beverly Hills: Sage, pp. 1–15.

Murdock, Graham (1993) 'Communica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Modernit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5, pp. 521–539.

Murdock, Graham and Golding, Peter (1974) '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in Ralph Miliband and John Saville (eds),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ress, pp. 205–234.

Murdock, Graham and Golding, Peter (1979) 'Capitalism,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in Curran et al. (eds) (1979), pp. 12–43.

Nagel, Ernest (1957) *Logic without Metaphysics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Glencoe: Free Press.

Nasar, Sylvia (1992a) 'Employment in Service Industry, Engine for Boom of 80's, Falter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pp. A1, D4.

Nasar, Sylvia (1992b) 'Puzzling Poverty of the 80's Boom,'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4, p. D2.

Negrine, Ralph and Papathanassopoulos, Stylianos (1990)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elevision*. London: Frances Pinter.

Negt, Oskar and Kluge, Alexander (1972) *Öffentlichkeit und Erfahrung: Zur Organisationanalyse von bürgerlicher und proletarischer Öffentlichkeit*. Frankfurt: Suhrkamp.

Nesmith, Georgia (1991) 'Feminist Historiography and Journalism History: Time for Conceptual Chang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Boston, August.

Neuman, W. Russell (1991) *The Future of the Mass Aud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New York Times (1991) 'As Libraries Face Cuts, Supporters Plan a Protest,' July 8, p. A1.

The New York Times (1992) 'Fed Gives New Evidence of 80's Gains by Richest,' April 21, p. A1.

The New York Times (1994) 'Tokyo's Magic Kingdom is a Winner,' March 7, p. D7.

Ng'wanakilala, Nkwabi (1981) *Mass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in Tanzania*. Dar-es-Salaam: Tanzania Publishing House.

Nielsen, Mike (1990) 'Labor's Stake in the Electronic Cinema Revolution,' *Jump Cut*, No. 35, pp. 78–84.

Nielsen, Richard P. (1976) 'Mass Media Public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awls and Nozick,'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Spring), pp. 16–22.

Nisbet, Robert (1986) *Conservativ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Noam, Eli. M. (1987) 'The Public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A Concept in Transi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7 (Winter), No. 1, pp. 30–48.

Nordenstreng, Kaarle (1968)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Gazette*, Vol. 14, pp. 207–216.

Nordenstreng, Kaarle (ed.) (1974) *Informational Mass Communication*. Helsinki: Tammi.

Nordenstreng, Kaarle (1984) *The Mass Media Declaration of UNESCO*. Norwood, NJ: Ablex.

Nordenstreng, Kaarle (1993) 'New Information Order and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Reflections on a Delicate Relationship,' in Wasko et al. (eds) (1993), pp. 251–273.

Nordenstreng, Kaarle and Schiller, Herbert (eds) (1979)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orwood, NJ: Ablex.

Nordenstreng, Kaarle and Schiller, Herbert (eds) (1993)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orwood, NJ: Ablex.

Nordenstreng, Kaarle and Varis, Tapio (1974) *Television Traffic: A One-Way Street?* Paris: UNESCO.

Norris, Christopher (1992) *Uncritical Theory: Postmodernism, Intellectuals, and the Gulf War*.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Nove, Alec (1983)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Oakeshott, Michael J. (1962)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expanded edn).

Oakeshott, Michael J. (1975) *On Human Conduct*. Oxford: Clarendon.

O'Brien, Mary (1981)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O'Brien, Richard (1992) *Glob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the End of Geograph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O'Connor, Alan (1991)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in Latin Americ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8, No. 1, pp. 60–73.

O'Connor, James (1987) *The Meaning of Crisis: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O'Connor, James (1991) 'Socialism and Ecolog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 2, No. 3, pp. 1–12.

Oettinger, Anthony G. (1980) 'Information Resources: 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Science*, No. 209 (July 4), pp. 191–198.

Oettinger, Anthony G. (1988a) *The Formula is Everything: Costing and Pricing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ogram 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Policy.

Oettinger, Anthony G. (1988b) 'Political, Scientific, and Other Truths in the Information World.' Samuel Lazerow Memorial Lectur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November 10.

Offe, Claus (1984)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Offe, Claus (1985) *Disorganized Capitali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Oliveira, Omar Souki (1991) 'Mass Media, Culture, and Dependency in Brazil: The Heritage of Dependency,' in Sussman and Lent (eds) (1991), pp. 200–213.

Oliveira, Omar Souki (1992) 'New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For Freedom and Dependenc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1992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ão Paulo, Brazil, August.

Olson, Mancur (1990) 'Toward a Unified View of Economics and the Other Social Sciences,' in Alt and Sbepsle (eds) (1990), pp. 212–231.

Oppenbeim, C. (1990) *Poverty: The Facts*. London: 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

Ortega y Gasset, José (1957)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New York: Norton.

Outhwaite, William (1987) *New Philosophies of Social Science: Realism, Hermeneutics and Critical Theory*. Houndmills: Macmillan Education.

Owen, Bruce M. and Wildman, Steven S. (1992) *Video Econom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wen, Robert (1970) *The 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 New York: Kelley (orig. 1842).

Palgrave, Sir Robert Harry Inglis (1913)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III.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Palmer, Bryan D. (1990) *Descent into Discourse: The Re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Writing of Social Hist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apathanassopoulos, Stylianos (1990) 'The EC: "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 but with Media Monopolies?' *Intermedia*, Vol. 18 (June–July), No. 3, pp. 27–30.

Parker, William (1986)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Modern Economist*. New York: Blackwell.

Parsons, Talcott (1966)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Parsons, Talcott and Shils, Edward (1951)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asquali, Antonio (1967) *El Aparato Singular: Análisis de un Día de TV en Caracas*. Caracas: Universidad Central de Venezuela.

Passell, Peter (1992) 'George Bush's Sins of Omission,'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0, p. D2.

Peiss, Kathy Lee (1986) *Cheap Amusement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eiss, Kathy Lee (1991) 'Going Public: Wome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ultural History,'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Vol. 3 (Winter), pp. 817–828.

Peltzman, Sam (1975) *Regulation of Automobile Safet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Pendakur, Manjunath (1990a) *Canadian Dreams and American Contro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anadian Film Industr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endakur, Manjunath (1990b) 'India,' in Lent (ed.) (1990), pp. 229–252.

Pendakur, Manjunath (1991)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elevision: State, Class and Corporate Confluence in India,' in Sussman and Lent (eds) (1991), pp. 234–262.

Pendakur, Manjunath (1993) 'Political Economy and Ethnography: Transformations in an Indian Village,' in Wasko et al. (eds) (1993), pp. 82–108.

Peters, Edgar E. (1991) *Chaos and Order in the Capital Markets: A New View of Cycles, Prices, and Market Volatility*. New York: Wiley.

Peters, John Durham (1993) 'Distrust of Representation: Habermas on the Public Spher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5, pp. 541–571.

Phillips, Adam (1993) *On Kissing, Tickling, and Being Bored: Psychoanalytic Essays on the Unexamined Li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icard, Robert (1989) *Media Economics: Concepts and Iss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Piller, Charles and Weiman, Liza (1992) 'America's Computer Ghetto,'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7, p. A27.

Piore, Michael and Sabel, Charles (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Pizzigati, Sam and Solowey, Fred J. (eds) (1992) *The New Labor Press: Journalism for a Changing Union Movement*. Ithaca, NY: ILR Press.

Pogorel, Gerard (1991) '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Structure of Firms: A European View,' *KEIO Communication Review*, Vol. 12 (March), pp. 91–109.

Porritt, Jonathon (1984) *Seeing Green: The Politics of Ecology Explained*. New York: Blackwell.

Posner, Richard A. (1992) *Sex and Rea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oster, Mark (1984) *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Mode of Production versus Mode of Information*. Oxford: Blackwell.

Poulantzas, Nicos (1978) *State, Power, and Soc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Pred, Alan (1966)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U.S. Industrial Growth, 1800–1914: Interpretive and Theoretical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ress, Andrea Lee (1991) *Women Watching Television: Gender, Class and Generation in the American Television Experie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reston, William, Jr, Herman, Edward S., and Schiller, Herbert I. (1989) *Hope and Fol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ESCO 1945–1985*.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rokop, Dieter (ed.) (1973) *Kritische Kommunikationsforschung: Aufsätze aus der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Munich: Hanser.

Prokop, Dieter (1974) *Massenkultur und Spontaneität: Zur veranderten Warenform der Massenkommunikation in Spätkapitalismus (Aufsätze)*. Frankfurt: Suhrkamp.

Prokop, Dieter (1983) 'Problem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the Mass Media,'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5, pp. 101–116.

Przeworski, Adam (1986)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uette, William J. (1992) *Through Jaundiced Eyes: How the Media View Organized Labor*. Ithaca, NY: ILR Press.

Rabinach, Anson (1990) *The Human Motor: Energy, Fatigu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Raboy, Marc (1990) *Missed Opportunities*.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Press.

Radway, Janice (1988) 'Reception Study: Ethnography and the Problems of Dispersed Audiences and Nomadic Subjects,' *Cultural Studies*, Vol. 2, No. 3, pp. 359–376.

Rakow, Lana F. (1988) 'Gendered Technology, Gendered Practi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5, No. 1, pp. 57–70.

Ramirez, Anthony (1991) 'Baby Bells are Accused of Overcharging,'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p. D5.

Reeves, Geoffrey (1993) *Communications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Reich, Robert (1991) *The Work of Nations*. New York: Knopf.

Reid, Margaret G. (1934) *Economics of Household Production*. New York: Wiley.

Resnick, Stephen A. and Wolff, Richard D. (1987) *Knowledge and Class: A Marxian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yes Matta, Fernando (1979) 'The Latin American Concept of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9 (Spring), No. 2, pp. 164–171.

Reyes Matta, Fernando (1983) *Comunicación Alternativa y Búsquedas Democráticas*. Mexico City: ILET.

Rheingold, Howard (1993)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Ricardo, David (1819)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Rideout, Vanda (1993) 'Telecommunication Policy for Whom?: An Analysis of Recent CRTC Decisions,' *Alternate Routes*, Vol. 10, pp. 27–56.

Ries, Al (1993) 'An Idea Whose Time Never Came,'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1, p. F13.

Roach, Colleen (ed.) (1993a)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War and Peace*. Newbury Park, CA: Sage.

Roach, Colleen (1993b) 'Feminist Peace Researchers,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 Roach (ed.) (1993a), pp. 175–191.

Robbins, Bruce (ed.) (1993) *The Phantom Public Sphe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obinson, Joan (1962) *Economic Philosophy*. Chicago: Aldine.

Roemer, John (1982)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gers, Everett (1976)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assing of the Dominant Paradig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3, pp. 63–78.

Rogers, Everett with Shoemaker, F. Floyd (1971) *Communicat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Rogin, Leo (1956) *The Meaning and Validity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Roll, Eric (1942)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New York: Prentice Hall.

Roncagliolo, Rafael (1986)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Atwood and McAnany (eds) (1986), pp. 79–88.

Rorty, Richard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ss, Andrew (1993) 'The Fine Art of Regulation,' in Robbins (ed.) (1993), pp. 257–268.

Ross, Steven J. (1991) 'Struggles for the Screen: Workers, Radicals, and the Political Uses of Silent Fil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6 (April), No. 2, pp. 333–367.

Rucinski, Diane (1991) 'The Centrality of Reciprocity to Communication and Democrac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8, No. 2, pp. 184–194.

Rusk, James (1991) ' "The Greatest Moral Challenge of Our Time",' *The Globe and Mail*, February 19, p. B8.

Russial, John T. (1989) 'Pagination and the Newsroom: Great Expectat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mpleted in 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Temple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August.

Ryan, Charlotte (1991) *Prime Time Activism: Media Strategies for Grassroots Organizing*. Boston: South End Press.

Sahlins, Marshall (1976) *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inath, P. (1992a) *Patent Folly: Behind the Jarg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ombay: Indian School for Social Science.

Sainath, P. (1992b) 'The New World *Odour*,' in Mowlana et al. (eds) (1992), pp. 67–74.

Sale, Kirkpatrick (1995) *Rebels Against the Future: The Luddites and their War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Salutin, Rick (1993) 'An Industrial Strategy for the Arts,' *The Globe and Mail*, June 4, p. C1.

Samarajiwa, Rohan (1985) 'Tainted Origins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or* (April–July), pp. 5–9.

Samarajiwa, Rohan (1993) 'Down Dependency Road? The Canada–U.S.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Canada's Copyright Amendments of 1988,' in Wasko et al. (eds) (1993), pp. 152–180.

Sassen, Saskia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unders, Anthony (1989) 'New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Banking, and Finance,' in Paula R. Newberg (ed.), *New Directions i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266–289.

Saxton, Alexander (199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hite Republic: Class Politics and Mass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Verso.

Schiller, Dan (1981) *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Schiller, Dan (1982) *Telematics and Government*. Norwood, NJ: Ablex.

Schiller, Dan (1985) 'The Emerging Global Grid: Planning for What?'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7, pp. 105–125.

Schiller, Dan (1986) 'Transformations of News in the US Information Market,' in Golding et al. (eds) (1986), pp. 19–36.

Schiller, Dan (1988)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in Mosco and Wasko (eds) (1988), pp. 27–43.

Schiller, Dan (1994) 'From Culture to Information and Back Again: Commoditization as a Route to Knowledg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11, No. 1, pp. 92–115.

Schiller, Herbert I. (1969/1992: 2nd updated ed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 Boston: Beacon Press.

Schiller, Herbert I. (1973) *The Mind Managers*. Boston: Beacon Press.

Schiller, Herbert I. (1976)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White Plains, N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Schiller, Herbert I. (1981) *Who Knows: 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 Norwood, NJ: Ablex.

Schiller, Herbert I. (1984) *Information and the Crisis Economy*. Norwood, NJ: Ablex.

Schiller, Herbert I. (1989) *Culture, In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iller, Herbert I. (1991) 'Public Information Goes Corporate,' *Library Journal*, October 1, pp. 42–45.

Schiller, Herbert I. (1993) 'Not Yet the Postimperialist Era,' in Roach (1993a), pp. 97–116.

Schlesinger, Philip (1991) *Media, State, and Nation: Political Violence and Collective Identities*. London: Sage.

Schor, Juliet B. (1992) *The Overworked American*. New York: Basic Books.

Schramm, Wilbur (1964)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udson, Michael (1984) *Advertising, The Uneasy Persuas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Schudson, Michael (1987) 'The New Validation of Popular Culture: Sense and Sentimentality in Academi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4, No. 1, pp. 51–68.

Schumpeter, Joseph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Scott, John (1991)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Handbook*. Newbury Park, CA: Sage.

Seccombe, Wally (1974) 'The Housewife and Her Labour Under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No. 83 (Jan–Feb), pp. 3–24.

Sennett, Richard (1976)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Vintage.

Sherman, Howard J. (1987) *Foundations of Rudical Political Economy*. Armonk, NY: M.E. Sharpe.

Shimony, Abner (1993) *Search for a Naturalistic World View. Vol. 1: Scientific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chterman, Barbara (1986) *Femininity: The Politics of the Persona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Siegelaub, Seth (1979) 'Preface: A Communication on Communication,' in Mattelart and Siegelaub (eds) (1979), pp. 11–21.

Siegelaub, Seth (1983) 'Working Notes on Social Relation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Mattelart and Siegelaub (eds) (1983), pp. 11–16.

Silk, Catherine and Silk, John (1990) *Racism aud Anti-Racism i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Portrayals of African-Americans in Fiction and Fil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Simon, Herbert (1957) *Models of Man*. New York: Wiley.

Simpson Grinberg, M. (1981) *Comunicacíon Alternativa y Cambio Social*. Mexico City: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Sivanandan, A. (1989) 'New Circuits of Imperialism,' *Race and Class*, Vol. 30 (April–June), No. 4, pp. 1–19.

Sivanandan, A. (1990) *Communities of Resistance: Writings on Black Struggles for Socialism*. London: Verso.

Slack, Jennifer D. (1984)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Norwood, NJ: Ablex.

Slater, Don (1987) 'On the Wings of the Sign: Commodity Culture and Social Practic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9, pp. 457–480.

Slaughter, Sheila A. (1984) *Serving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Academic Social Science Expert*. Westport, CT: Greenwood.

Smith, Adam (1937)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orig. 1776).

Smith, Adam (1976)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orig. 1759).

Smith, Anthony (1989) 'The Public Interest,' *Intermedia*, Vol. 17 (June–July), No. 2, pp. 10–24.

Smith, Anthony (1991) *The Age of Behemoths*. New York: Priority Press.

Smythe, Dallas W. (1957) *The Structure and Policy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mythe, Dallas W.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 I, No. 3, pp. 1–27.

Smythe, Dallas W. (1978) 'Rejoinder to Graham Murdock,'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 II, No. 2, pp. 120–127.

Smythe, Dallas W. (1981)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

Smythe, Dallas W. (1991) 'Theory About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Draft paper originating in work at CIRCIT, Melbourne, Australia, May 1.

Smythe, Dallas W. and Melody, William H. (1985) *Factors Affecting the Canadian and U.S. Spectrum Management Processes: A Preliminary Evaluation*.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Federal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Ottawa, Canada, March.

Soja, Edward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New York: Verso.

Somavia, Juan (1979) *Democratización de las communicaciones: Una perspectiva latino-americana*. Mexico City: ILET.

Somavia, Juan (1981)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s: From Minority Social Monopoly to Majority Social Representation,' *Development Dialogue*, Vol. 2, pp. 13–30.

Sorkin, Michael (ed.) (1992)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The New American City and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Sparks, Colin (ed.) (1985) 'The Working-Class Pres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7, No. 5.

Sparks, Colin and Dahlgren, Peter (eds) (1991)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New Media Age*. London: Routledge.

Spigel, Lynn (1989) 'The Domestic Economy of Television Viewing in Postwar Americ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6, No. 4, pp. 337–354.

Squires, James (1993) *Read All About It!: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America's Newspap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Staniland, Martin (1985) *What is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Social Theory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taples, Robert and Jones, Terry (1985) 'Culture, Ideology and Black Television Images,' *The Black Scholar*, Vol. 16 (May/June), pp. 10–20.

Steeves, H. Leslie (1987) 'Feminist Theories and Media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4, No. 2, pp. 95–135.

Steeves, H. Leslie (1989) 'Gender and Mass Communic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in Pamela J. Creedon (ed.), *Women in Mass Communication: Challenging Gender Val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83–111.

Sterngold, James (1992) 'Fed Chief Says Economy is Resisting Remedie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5, p. D2.

Steuart, James (1967) *An Inquiry i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orig. 1761).

Stigler, George J. (1971)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cience*, Vol. 2, No. 1 (Spring), pp. 3–21.

Stigler, George J. (ed.) (1988) *Chicago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tone, Alan (1991) *Public Service Liberalism: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ransitions in Public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one, Alan and Harpham, Edward J. (eds) (198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Policy*. Beverly Hills: Sage.

Stouffer, Samuel Andrew (1949) *The American Soldi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range, Susan (1988) *States and Markets*. London: Frances Pinter.

Strover, Sharon (1993) 'Trends in Coproductions: Demise of the Nationa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Dublin, Ireland, June.

Sussman, Gerald (1984)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Third Worl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6, pp. 289–300.

Sussman, Gerald and Lent, John A. (eds) (1991)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s: Wiring the Third World*. Newbury Park, CA: Sage.

Sutherland, John (1993) 'Where's the Lit. in Lit. Crit.?'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February 7, p. 23.

Szecsko, Tamas (1986) 'The Political-Econom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Hungary,' *Massacommunicatie*, Vol. 14, No. 2–3, pp. 110–116.

Tabor, Mary (1991) 'Encouraging "Those Who Would Speak Out with Fresh Voice" Through FCC Minority Ownership Policies,' *Iowa Law Review*, Vol. 76 (March), pp. 609–639.

Tang, Wing Hung and Chan, Joseph Man (199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A Study of Dependent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 No. 1, pp. 53–80.

Tetzlaff, David (1991) 'Divide and Conquer: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al Control in Late Capitalism,'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3, pp. 9–33.

Thomis, Malcolm I. (1972) *The Luddites: Machine-Breaking in Regency England*.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Thompson, E.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Thompson, John B. (1989)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in David Held and John B. Thompson (eds), *Social Theory of Modern Societies: Anthony Giddens and His Cr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6–76.

Thompson, John B. (1990)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hrift, Nigel (1987) 'The Fixers: The Urban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apital,' in Jeffrey Henderson and Manuel Castells (eds),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London: Sage, pp. 203–233.

Thrift, Nigel and Loyshon, Andrew (1988) ' "The Gambling Propensity": Banks, Developing Country Debt Exposures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Geoforum*, Vol. 19, No. 1, pp. 55–69.

Thurow, Loster (1992) *Hen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Warner Books.

Tierney, John (1993) 'Will They Sit by the Set, or Ride a Data Highway?'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0, pp. 1, 24.

Time Warner Annual Report (1993).

Tinker, Tony (1985) *Paper Prophets: A Social Critique of Accounting*. New York: Praeger.

Tomlinson, John (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raber, Michael and Nordenstreng, Kaarle (eds) (1992) *Few Voices, Many Worlds: Towards a Media Reform Movement*. London: World 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Tran van Dinh (1987) *Independence, Liberation, Revolution: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ird World*. Norwood, NJ: Ablex.

Tuchman, Gaye (1978) *Making News*. New York: Free Press.

Tunstall, Jeremy (1977) *The Media are Americ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unstall, Jeremy (1981) *Journalists at Work*. London: Constable.

Tunstall, Jeremy and Palmer, Michael (1991) *Media Moguls*. London: Routledge.

Turkel, Sherry (1984) *The Second Self*.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Turow, Joseph (1984) *Media Industries: The Production of News and Entertainment*. New York: Longman.

Uche, Luke Uke (1986) 'The Youth and Music Culture: A Nigerian Case Study,' *Gazette*, Vol. 37, Nos 1–2, pp. 63–78.

Ugboajah, F.O. (1986) 'Communication as Technology in African Rural Development,' *African Media Review*, Vol. 1, No. 1, pp. 1–19.

Umesao, Tadao (1963) 'Joho Sangyo Ron (On Information Industries),' *Chuokohron*, March.

UNESCO (1979)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 *Final Report*. Paris: UNESCO.
UNESCO (1983) *History in Black and White: An Analysis of South African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Paris: UNESCO.
UNESCO (1989) *World Communication Report*. Paris: UNESCO.
UNESCO (1990) *UNESCO Yearbook 1990*. Paris: UNESCO.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Worldwide Telecommunications Development (1985) *The Missing Link*. Geneva: ITU.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1987) *The Electronic Supervisor: New Technologies/New Tensions*. OTA-CIT–33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1990) *Critical Connections: Commun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TA-CIT–40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1991) *Rural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Networking for the Future*. OTA-CIT–47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pril.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Subcommittee on Technology and the Law (1991) *Motion Picture Anti-Piracy Act of 1991: Join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Technology and the Law and the Subcommittee on Patents, Copyrights, and Trademarks*. 102nd Cong., first s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S., Congress, Senate, Subcommittee on Education, Arts and Humanities (1995) *Humanities Reauthorization: Testimony of Victor R. Swenson*, March 2.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0)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10th edn).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3)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13th edn).
U.S., FCC (1991) *Monitoring Report.*, CC Docket No. 87–339, prepared by the Staff of the Federal-State Joint Board in CC Docket No. 80–286,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anuary.
Useem, Michael (1984) *The Inner Circle: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Business Political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an Dijk, Teun A. (1991) *Racism and the Press*. London: Routledge.
van Zoonen, Liesbet (1991)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he Media,'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pp. 33–54.
van Zoonen, Liesbet (1992) 'Feminist Theo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4, pp. 9–29.
van Zoonen, Liesbet (1994) *Feminist Media Stndies*. London: Sage.
Veblen, Thorstein (1932) *The Theory of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New York: Scrihner's (orig. 1904).
Veblen, Thorstein (1934)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orig. 1899).
Vedel, Thierry and Luven, Ronan (1993) *La Télévision de demain: Cable, satellite et TVHD en France et dans le monde*. Paris: A. Colin.
Vernon, Raymond (1992)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Where are They Coming From, Where are They Heade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Vol. 1 (April), No. 2, pp. 7–35.
Veron, Eliseo (1987) *El Discurso Politico*. Buenos Aires: Hachette.
Vijayan, Jaikumar (1996) 'India,' *Computerworld*, February 26, p. 101.
Wall Street Journal (1993) 'Entertaining Numbers: A Statistical Look at the Global Entertainment Industry,' March 26, p. R16.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lerstein, Immanuel (1991)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rd, Dwayne (1977) *Toward a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A Critique of Liberal and Radical Economic Thought*. Santa Monica, CA: Goodyear Publishing.

Waring, Marilyn (1988) *If Women Counted: A New Feminist Economic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Wasko, Janet (1982) *Movies and Money: Financing the American Film Industry.* Norwood, NJ: Ablex.

Wasko, Janet (1983) 'Trade Unions and Broadcasting,' in Mosco and Wasko (eds) (1983), pp. 85–113.

Wasko, Janet (1984) 'New Methods in Analyzing Media Concentration,' in Vincent Mosco (ed.), *Policy Research in Telecommunications.* Norwood, NJ: Ablex, pp. 213–219.

Wasko, Janet (1989) 'What's So "New" About the "New" Technologies in Hollywood? An Example of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in Brenda Dervin, Lawrence Grossberg, Barbara O'Keefe, and Ellen Wartella (eds),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Vol. II: Paradigm Exemplars.*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474–485.

Wasko, Janet (1994) *Hollywood in the Information Age: Beyond the Silver Scree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Wasko, Janet and Mosco, Vincent (eds) (1992)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in an Information Age.* Toronto: Garamond; and Norwood, NJ: Ablex.

Wasko, Janet and Philips, Mark (1993) 'Teal's the Deal in Sports Merchandise,' *Oregon Sports News* (Spring), pp. 48–51.

Wasko, Janet, Mosco, Vincent, and Pendakur, Manjunath (eds) (1993) *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Essays in Honor of Dallas Smythe.* Norwood, NJ: Ablex.

Waterman, Peter (1990) 'Communicating Labor Internationalism: A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Resource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5, Nos 1/2, pp. 85–103.

Waterman, Peter (1992) 'The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Information in Peru,' in Wasko and Mosco (eds) (1992), pp. 224–241.

Weber, Max (1946)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 by Hans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Trans. by Ephraim Fischoff.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bster, Frank and Robins, Kevin (1986)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Luddite Analysis.* Norwood, NJ: Ablex.

Webster, Frank and Robins, Kevin (1989) 'Plan and Control: Toward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8, pp. 323–351.

Wedell, G. (ed.) (1986) *Making Broadcasting Useful: The African Experie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Weinherg, Steven (1993) *Dreams of a Final Theory.* New York: Pantheon.

West, Edwin G. (1990) *Adam Smith and Modern Economics: From Market Behaviour to Public Choice.* Aldershot: Edward Elgar.

Williams, Raymond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Harmondsworth: Penguin.

Williams, Raymond (1961)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Williams, Raymond (1975)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Fontana.

Williams, Raymond (1976)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aymond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aymond (1980)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London: Verso

Williams, Raymond (1981a) *Culture.* London: Fontana.

Williams, Raymond (1981b) 'Marxism, Structuralism, and Literary Analysis,' *New Left Review*, No. 129 (Sept./Oct.), pp. 51–66.

Williams, Raymond (1983) *Toward 2000.* London: Hogarth Press.

Willis, Paul (1977)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Clint C., II and Gutiérrez, Félix (1985) *Minorities and the Media: Diversity and the End of Mass Communication.* Beverly Hills: Sage.

Wilson, Edward O. (1992) *The Diversity of Li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James Q. (ed.) (1980)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Wilson, Kevin (1992) 'Deregulating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Natural Monopoly: A Critique of Economics i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4, pp. 343–368.

Winseck, Dwayne (1993) 'A Study of Regulatory Change and the Deregulatory Process in Canadian Telecommunication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elecommunications Labor Un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inston, Brian (1986) *Misunderstanding Med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ood, Ellen Meiksins (1981) '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in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No. 127 (May–June), pp. 66–95.

Wood, Ellen Meiksins (1986) *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 London: Verso.

Wood, Ellen Meiksins (1989) 'Rational Choice Marxism: Is the Game Worth the Candle?' *New Left Review*, No. 177, pp. 41–88.

Wood, Ellen Meiksins (1990) 'The Uses and Abuses of "Civil Society",' in Ralph Miliband and Leo Panitch (eds), *Socialist Register, 1990: The Retreat of the Intellectuals.* London: Merlin Press, pp. 61–84.

Wright, Karen (1990) 'The Road to the Global Village,' *Scientific American*, March, pp. 83–94.

Yates, JoAnne (1989) *Control through Communication: The Rise of System in American Manage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Zachary, G. Pascal and Ortega, Bob (1993) 'Age of Angst: Workplace Revolution Boosts Productivity at Cost of Job Securit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9, pp. A1, A6.

Zimbalist, Andrew (1979) 'Technology and the Labor Process in the Printing Industry,' in Andrew Zimbalist (ed.), *Case Studies in the Labor Proces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p. 103–126.

Zuboff, Shoshana (1988)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New York: Basic Books.